

江青全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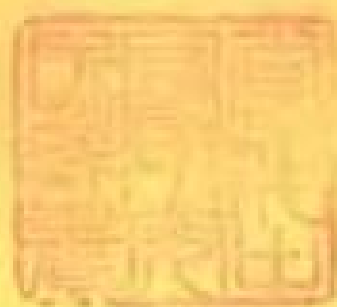
美 R·特里尔 著 ◎ 刘路新 译

◎ 河北人民出版社

005624

江青全传

[美]R·特里尔 著 刘路新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1 号

MADAME MAO
THE WHITEBONED DEMON
By Ross Terrill

Simon & Schuster, Publishers,
Touchstone First Edition 1992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OUCHSTONE and colophon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Simon & Schuster Inc.
Manufactu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江青全传

[美]R·特里尔 著
刘路新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河北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2印张 265,000字 2插页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定价:12.80元

ISBN 7-202 01575-7/A·19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出版前言

江青，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在走完她 77 年的人生旅程后，于 1991 年 5 月 14 日凌晨在公寓自杀身亡了。她为自己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主动画上了句号。

江青，三十年代初曾是上海影剧界的一个明星，1937 年投奔延安，之后与中国革命的伟大导师毛泽东结合，成为毛泽东 38 年的妻子。由于她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使得江青在六十年代的中国政坛上，飞扬跋扈，权极一时，给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最终成为党和人民的阶下囚。江青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中国现当代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了解江青，对于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总结历史教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我社推出了西方学者罗斯·特里尔先生这部《江青全传》中译本，以飨读者。

罗斯·特里尔先生，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现

FJ 18-18

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他的中国政治人物传记，在西方颇具影响。他所撰写的《毛泽东传》，其中译本自1989年在我社出版以来，在社会引起轰动，荣获多次图书奖并连续重印十余次，成为近几年国内图书市场中不可多得优秀畅销书。《江青全传》是作者继《毛泽东传》之后又一部颇有影响的人物传记。他依据一个外国学者尽可能接触到的丰富资料，多次采访在三十年代、在延安、在五六十时代曾接触、憎恨、热爱过江青的各阶层人士，以一种客观、独特的视角，对江青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深入而精微的刻画，对她性格中的各种品质及复杂心理特征予以层层剖析，将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作者写这部书时，江青尚在人世，所以，作者也只能记叙江青自出生到受审这60余年的人生历程。随着历史的发展，本书作者又几次来到中国，探访了许多江青在秦城监狱的生活情况及其他自杀的前后详情与舆论评价，将这段最新且极少披露的真相写进原书中，使这部书日臻完善，终于有了这本完整的《江青全传》。

江青的政治野心并未与生俱来，透过传记中对她早年生活经历的记叙就可看出这一点。江青的发迹完全凭借毛泽东的影响，以致于在中国六十年代的戏剧、电影和政治舞台上颐指气使，结党营私。毛泽东晚年虽然重用过江青等人，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在江青日益膨胀的恶性品质面前，也曾多次对她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对她的拉帮结派表示了极大的愤怒，指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正道出了主席对她的深刻认识和强烈不满，也使得江青及其同伙的篡党夺权阴谋未能得逞，也为党和人民粉碎江青反党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巨大

的，但这不只是由她的个人品质、欲望等因素所造成的，也反映出我们党和国家政治体制的不够健全之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日益健康发展，我们相信过去的悲剧不会再度重演。

这部传记出自一个西方学者之手，由于所处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书中的一些观点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有些史实也有诸多不确之处。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在力求保持原书风貌的同时，对书中作者的某些主观臆断与史实的不确之处，进行了必要的删节和订正，个别不当用词也进行了技术性处理，使本书更加准确与完善。希望本书出版后，能够得到各界读者的指正和欢迎。

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的有关同志审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许多具体修改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2.



权力和个性是如何在中国相互作用的，这是我从写《毛泽东传》就开始的研究，而本书则是这一研究的继续。江青——演员、毛夫人、政治家，称霸艺术界的女主人——她的沉浮暴露出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许多问题。

当我在1980年撰写《毛泽东传》的时候，很少有人认识到毛的个人生活对他如何统治中国的影响。而今天，人们已普遍认为，毛的政治方略与他的阅读习惯、与他和女性的关系、与他的健康状况、与他对死亡和不朽的看法、与他听不进批评意见，等等，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也正是《毛泽东传》的中文版在中国销量超过百万册的原因之一。

江青对中国的影响与毛相比要远所不及。但她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曾手操大权，她的个性对于她行使权力的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时期她甚至比毛有更突出的表现。如本传记所揭示的，绝对的权力是显现个性的放大镜。

过去对江青生涯的评价是单纯的是非善恶之说，她是反革命，是狐狸精——按中国传统——她把男人引入歧途。但现在，人们开始了解到，阶级斗争在毛的晚年时期被过分渲染了，中国的传统，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并没有被社会主义铲除干净。

我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力争对江青的生活经历作客观的描述。在邓小平的改革年代，空想已被抛弃，行动重于空谈，实实在在的小康生活是人们最关注的；在这个年代，除了实事求是，没什么更能满足读者的了。

同《毛泽东传》一样，本书有一些事实在中国是鲜为人知的。这包括江与俞启威和唐纳的关系、她三十年代在上海论戏剧的文章、以及她自杀的细节。我很高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的中文版全译本。

《江青全传》是在综合了众多材料的基础上完成的。我亲手梳理过大量文件，并徒步寻访知情者。我不停地探索、挖掘，盘根究底，并持之以恒，以致到了招人厌烦的地步。但我认为这是传记作家所必须的。写传记就好象组织一支交响乐队。正如任何一种声音都代替不了整部交响乐一样，对传记来说，任何一种类别的材料都传递不了人物的全部信息。为了组合我的“小提琴”、“乐鼓”、“管乐器”，我找遍了全中国，也在法国、台湾、美国及其它一些地方寻觅。

江青确实伤害了太多的人。她延续了早该被埋葬的、空洞的阶级斗争政治的生命。对她来说，阶级斗争意味着复仇，而共产主义则是指绝对权力。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篡改她的历史——就象她篡改过许多人的历史一样。根据事实并按照法律来评判江青，对于澄清我们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中国议事日程中的一项神圣的任

务。只有在大众的社会生活以法律为准绳而呈现出一种平等公正的气氛时，权力的行使才能真正服务于大众的利益、人权的保障、经济的繁荣，而政治体制才能在领导人更替时保持稳定。我相信中国正是朝着这一昌盛、自由和公正的灿烂前景迈进的。

罗斯·特里尔

1994年4月于美国波士顿



这是11月份一个寒冷的下午，在距北京饭店一箭之远的地方，几辆拉着窗帘的黑色轿车在骑自行车的人流中爬行，汽车喇叭如蝉鸣。拐进一条两旁耸立着辉煌建筑的狭窄而古老的街道，这里是北京的正义路。汽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一个灰砖铺地的门廊前。沉重的大铁门很少打开，同时把内外隔开如两个世界，静寂中很有几分威严，这里是这座城市的公安局总部。

一周来，这里开始了中国的一个新时代，正义得到伸张。星期六的晚上，在院内的公安局礼堂里，作为法官的曾被认为是罪恶深重的昙花一现的人物在看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被认为不适合于外面的平民百姓看的。

一行九人分别从轿车中钻出，他们大多穿清一色的卡其制服，但是制服上没有作为军人标志的领章。他们象驯顺的绵羊被领着走上台阶。最后是一个女人，黑色服装，眼镜架在苍白的脸上，精心梳理的头发有些发亮，性格坚强的嘴角掠过一丝

微笑。她跟在他们后边，拖着身子，脚步缓慢，几乎是以国王的姿态走进礼堂。这是审判庭，地上铺着绿色地毯，前面是分成十格的被告席，600名应邀前来的客人作为“公众”的代表参加旁听。

曾经是电影演员而后来成了毛泽东夫人的江青，将在这里受到特别法庭的审判。她被指控的罪名是：反革命，陷害无辜群众，作为她丈夫的政府中的一名高级成员到处施加影响，以及诬蔑毛以后的中国的一批务实派领导人。

这位国婿最后一个走进大厅，因为在十名被告——“四人帮”、前国防部长林彪的军事同伙和毛的御用笔杆子陈伯达——中，她在开庭审判前的讯问中表现最差。她不是回答问题而是不停地发问。入场时把她排在第十位是一个小手腕，是想借此杀杀她的嚣张气焰。再说，王洪文走在最前面也是安全的，这位“四人帮”中最年轻的成员，在此前的讯问中已经完全屈从，甚至承认了一些并非他所犯下的罪行，而不是象江青那样甘冒风险：对特别法庭，对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任何胆敢反对她的人都摆出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势，表现出绝对不屑一顾的神态。

江青当时66岁，但是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几岁，她比其他所有被告都显得神气活现。其他人面对守卫在笼子前的卫兵，一个个显得畏缩、窘迫，甚至内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江青一脸傲慢无畏的表情，皱纹使她的面部失去了一些光彩。多年来人们一直谣传她的头发是假发，现在看来这种谣传可以休矣！因为没有哪一位理发师能把假发做得这么完美。是的，江青在她的得意的日子里已经把自己看作是中国的第一夫人，每天啜八个煮熟的小鸡的鸡汁，使她受益匪浅，面色红润，头发油光发亮。

“不是这样的。”她反驳庭长的判定。声音低沉而又带着女性的气质，完全是一种傲慢的腔调。“我不知道。”当问及一个棘手的问题时她傲慢地而且很自信地回答。她摇着头，似乎是对法庭上出现的紧张气氛感到很得意，她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以阻止下一个问题的提出。

投影仪在屏幕上打出的一份材料说，江青阴谋陷害周恩来总理，庭长抓住这一问题问道：“被告江青，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江青皱了一下眉头，身子沉重地往前一倚，按了按戴在头上的耳机，看着庭长，“我耳朵有点儿背，没听清你说的什么。”她声音嘶哑，带着演员的抑扬顿挫。

“我要上厕所。”在两名年轻女兵的陪同下，她缓慢地走进旁边一间小屋，好长时间没有出来。卫兵和其他人都感到奇怪，这位无法预料的女人不知道还能不能出来。

难道江青——她现在被北京的官方新闻媒介称为“白骨精”——以某种奇怪的招法成了这种悲惨处境的重要罪魁？

“我干的所有的事，都是毛主席叫我干的。我是他的狗，他叫我咬，我就咬。”江青拒绝回答对她的指控，神经质的笑声弥漫大厅。

江青的真正观众当然不止是这35名法官和应邀前来的600位旁听者（他们来自中国的各个省份，集体住宿，实际上与北京的其他人隔离开来，住在迷宫似的舒适的京西宾馆）。就在这个公安大院的另外一个小房间里，安装着一排闭路电视，当今政府要人挤在电视机前，观看从各个角度拍下的“白骨精”的表演。与此同时，每天晚上都还要有选择地向数万名电视观众转播特别法庭的审判，或许这是江青最近的也是最后一次向她的“敌人”发起攻击。

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江青就感到她受到各种各样的枷

锁的束缚，但是，很少经受过如此高贵的枷锁。在今天的法庭上，她面对着锁住自己的手铐和笼子，象一幅画像站在被告席上。她好象不是在礼堂里参加这种难受的预先设计好的仪式，倒象是面对天安门广场上数百万拥挤的人群，看着移动着的人流，注意每一个照相的姿势，向那些心不在焉的超政治的力量发出呼吁，他们承认她自己认为该扮演的角色。

有人发现这个世界简直令人无法容忍，江青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社会没有为她保留应得的一席之地，没有人能道出她的内心深处的情感状态。生活变得既无秩序也无公正可言，为什么人们要相互残杀？她在扪心自问，为什么中国这个有着悠久而伟大历史的国度成了野蛮的场所？为什么女人要比男人忍受更多的不平？

喧嚣的世界变得与她想象的很不协调，这是她最感困惑的。她过分自信，认为自己把握了问题的任何一面。但是她没有意识到，这中间有着宽阔的鸿沟，而且企图以自己的势力弥补它——通过舞台上的幻想，借助于她自己的意志，把这种影响吹遍宇宙，最后，政治行动的风暴仅仅是为了满足她个人的贪欲。

江青自少女时代起就深受话剧《玩偶之家》的影响。剧中娜拉的丈夫对娜拉说：“你讲话象个孩子，你根本就不了解你所生活的世界。”娜拉感到迷惑不解，然而仍坚定地回答：“是的，我不了解，但是现在我要走进这个世界……我一定要证明到底谁是对的——是这个世界还是我。”

白骨精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在这一正式仪式之前很久，这一中央大国的宣传工具、街头漫画以及男女老幼都已经宣称江青是“妖婆”、“刽子手”，她则对这些指责一个也没有承认。

一位中国的高级官员十分愤怒地对我说：“我们已经说过她是一个坏女人，你为什么还要写她呢？这么多的好人不写。”对江青来说，似乎她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是处。

江青出身于一个破裂的家庭，她一生都在努力忘却她那性情暴躁的父亲和她那做女仆但是地位和妓女差不多的母亲。江青有过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而她的走上舞台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很难避免有一连串的男人在她的面前走过，但是他们都感觉到她抑郁在心的坚强意志，在济南时那位固循传统的年轻商人；在青岛时那位出身于富裕家庭相貌英俊的激进分子；在上海大世界那位浪漫的剧作家和评论家。

当上海的艺术世界随着日本人的炮火坍塌的时候，她又一次选择了冒险，她出现在中国大西北黄土弥漫的废墟上。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开蒋介石，取得中国抗日民族战争的胜利来到这里。经过一番戏剧性的变化，江青嫁给了他——这位比她大 20 多岁、结过两次婚已经有 8 个孩子的男人，他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最高人物。毛泽东把江青看作是“娜拉”式的人物，看作是他的伙伴和支持者。江青接受了这一角色，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演戏和政治——二者对江青来说并无多大区别，应该说，她对二者都能胜任。当时机成熟，毛意识到自己需要她时（就象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需要埃利诺·罗斯福那样），江青以同样的手法为北京的政治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就象她曾经为上海的戏剧界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一样。她不是等待别人为她捧场，而是自己主动发表演说。用迷人的微笑，用自己的处事方法——而且常常能够达到目的。

在毛泽东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时候，她认为她继之而成为女皇是天经地义的事。早在 1300 多年前，武则天就已经证明：一个女人完全有能力统治中国。跟随英明、伟大的毛泽东 38 年，

难道江青的学徒期还没有满吗？她心中认为，人民仍然把她看成是一名学徒，现在她可以证明：人民错了。她实现了个人意志最后一步，就是以一位女皇的恩泽去统治落后但是崇拜英雄的中国大众。

江青这一关键的实验失败了。令她十分惊讶的是，她被列入中国万恶之神的行列。中央大国的芸芸众生开始象昨天崇拜英雄一样不遗余力地诅咒她。“中国不是很文明的民族。”她说道。

透过江青一生中所发生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男男女女追求的目标不同导致了这种混乱和悲剧。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仍然是与众不同的，最近几年政治家和新闻媒介所宣称的只不过是一些表面的文章。在这里，孩子因父母的罪过而受到惩罚；真理在某种形式上毫无价值可言；功绩让位于关系；最不可饶恕的罪过是超越群体的规范。

中国有些人对位居领导层的固执的女人是很有些看法的。认为她是通过女性的魅力才获得了权力。江青借助于毛而步步高升。

如果说，在江青的时代，性是女人获得权力的唯一途径的话，这也是绝望中一条冒险的路。女人的权力仅仅被看作是某些男人的权力的延伸。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些妓女走进宫廷获得了权力，并做出了伟大的事业，但是她们获得权力的路径更被人津津乐道。失去了权力的江青，在接受审判时，恰如妓女站在被告席上。

她的故事是非凡意志的表现。她一直在和各种各样的敌人作斗争。还是在19岁的时候，她斩断了过去的一切，只身来到上海这个最危险的城市，希望碰碰自己在艺术上的运气。她一直都感受到意志的束缚。一方面，权力和名望等待着她；另一

方面，是声名狼藉和屈服的威胁。

她的兴趣的中心是在于自己，具有远见，同时，又能象旁观者一样审视自己在群众面前的表演，她把群众看作是自己的观众。象埃莉诺·罗斯福那样，当丈夫手中的权力开始滑落的时候，她能全力以赴而且充满信心地接过权力。

有人在谈到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时说：“我们不必对其进行深究，共产党员也不是圣徒。”

在共产党看来，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是不适于向群众公开的，除非某个领导人倒了霉，那么这位倒霉者“堕落腐化”的一些细节都会被描绘得淋漓尽致。这是真实的，但是其外表是斑斓的。

一位中国官员告诉我：“人品在中国政府中会起很大作用。”近几年的事实就是如此，在中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显得更加重要。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女人抓到了很多的权力，这在任何地方的共产主义历史中都是不曾有过的。

中国一位部长发表声明似地告诉我：“这就象桥下的流水，现在我们关心的是经济的发展。”事实并非如此。在北京，政治仍然超过经济。中国的报纸和领导人的宣称：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是坚持和发展真理的（不是选举产生的），因而具有合法性。

中国人看他们自己的交往方式是独特的。中国人的习惯是：对当前所发生的事不作评论，“装聋作哑”。在江青行使权力的时候，报界对她的过去、她的婚姻、她的孩子一概不知。一旦她被逮捕，对她的辩护也作出各种攻击。在审判时，对她所作的长篇控告提到了文化大革命，但是一次也没有提到红卫兵。谁是这一事件的决定性力量？

当然，除了天真的外国人，谁也不会接受这种沉默。地下

的信息网络填补了这一空缺。在中国的历史上，非官方的史实称为“外史”或“野史”。在中国共产党的时代，事实的真相有时为了策略是不在正式报道上报露的。

这本书是根据来自中国的“非官方”的史实写成的，里面有普通人的亲眼见闻，有现在住在海外的中国人的回忆，他们接触过，认识、憎恶或热爱过江青，也参阅了许多我可以想尽办法可以阅读到的文件。

在北京的高层人物看来，历史是道德的判断。在本书中，至少在一部分上记录了真正发生过的一些事。



三十年代的江青



1937年上海《联华画报》
以蓝苹为封面女郎。



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
主演《娜拉》的剧照。



杭州六和塔前三对上海银色情侣的合影
(左起睡而已,杜小鹃,唐纳,蓝苹,叶露茜,赵丹,中
为证婚人沈钧儒)



江青初到延安。



1945年,江青与毛泽东在延安时的合影。



江青1947年在延安。



五十年代初,李锐念中学时,与毛泽东、江青合摄于中南海(右一为李锐,左三为李锐)。



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



1967年的毛泽东与江青



江青、张春桥在中共“十大”主席台上



江青接见《红都女皇》的作者维托克。



江青在摄影



江青在审判台上的表演。



旗手(华村武画)



被告江青

被告张春桥

被告姚文元

被告王洪文

被告陈伯达



被告黄永胜

被告吴法宪

被告李作鹏

被告邱会作

被告江腾蛟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



第一章	初出茅庐 (1914—1933)	(1)
第二章	在上海的舞台上 (1933—1937)	(29)
第三章	在延安：毛的家庭主妇 (1938—1949)	(101)
第四章	黯然失色 (50年代)	(155)
第五章	恢复与报复：在政治的舞台上 (60年代) ...	(210)
第六章	要做女皇 (70年代)	(268)
第七章	“住口，江青” (法庭审判—1980年末)	(338)
第八章	骚动的监狱生涯 (1981—1990)	(353)
第九章	自杀之谜 (1991年5月14日)	(360)

第一章

初出茅庐 (1914—1933)

“我甚至连内衣都没有。”

——李云鹤（江青）

这里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县城，大街两旁是低矮的店铺。在远离大街的一条小巷里，灰尘满地，拉着青菜的大车穿巷而过。就在这条小巷里，一位颇有几分姿色、疲惫不堪、大约30岁左右的妇女刚刚生下一个女婴，但是，女婴的降临并未带来常见的那种热闹场面。这位妇女的一个朋友担起了接生婆的责任，孩子的父亲也不在跟前。母亲在产后吃了一点儿粘乎乎的小米粥和红糖，按照习惯的喂养方法，她们掰开婴儿的嘴角滴上几滴水。孩子尖声地哭了起来。

这是1914年，中国的最后一个儒家王朝早在三年前就已覆灭，但是新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守旧派为太平盛世的失去感到悲哀；现代派则为通向自由世界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感到恼火；普通的民众无力改变时局，只能躲进家庭或从事一些经济活动，他们一天到晚已经够忙的了，很少有时间去听什么“革命”之类的新鲜玩意儿。

然而，这个女婴将会在中国革命中有一番作为。现在，她的哭声只是个人的，有朝一日，它将成为政治斗争的呐喊。

诸城是一个只有三万人口的宁静的小镇，四周是古老的城墙和城门。周围的乡村盛产玉米、花生、烟草和小麦。这些山东人身材高大，性格豪爽，皮肤粗糙。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经常沉湎于过去悠久辉煌的历史中，这里是中国的两位最伟大的圣人——孔子和孟子的故乡。

这里的生活比起山东其他很多贫困拥挤的城镇还是富庶的，虽然说自从修了铁路以后大不如前——二十多年前修的这条铁路自省城济南绕过诸城。诸城靠近黄海，受到了外来贸易的影响。本世纪初，当中国象一个西瓜被西方国家瓜分时，这里受到日本人的侵扰。就在这个小女孩出生后不久，日本人赶走了德国人并取代了在山东的势力统治。

孩子的小名叫淑蒙，出生在一个古怪的人际关系紧张的家庭。几十年后，当她成为一个极有权力的女人时，她这种幼年时期的家庭生活被神秘地遮掩起来。有一次她在天津时，对一位体力工人说：“你的父亲是石油工人，我的父亲是木匠——我们都是出身于工人阶级。”事实并非如此。她的父亲是一位木匠，但是已经开了卖大车轮的店铺和一家供过往行人住宿的小客栈，后来又开始买进土地。

她的父亲李德文，脾气阴郁暴躁，酗酒成性，在诸城的名声很不好。淑蒙出生时她已经 60 岁，李德文对这个女儿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所以留给她的全是不好的印象。他与淑蒙的母亲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比较暧昧，而且越来越疏远。

淑蒙的母亲比她的父亲年轻得多，她是济南一个教书匠仅有的两个女儿中的一个。她精心地照料着淑蒙，所以，留给孩子的记忆比父亲要好得多。然而，她感到遗憾的是，淑蒙是个

女孩子，在后来的生活中，女儿对她的回忆也缺少感情，而且从来不谈论她的性格。诸城人认为，淑蒙的母亲是一个驯服的、受蹂躏的、憔悴不堪的女人。

她并不是李德文的第一个妻子，他们的年龄相差将近 30 岁，淑蒙与她的哥哥姐姐之间的年龄差距也很大——他们当中最小的比她大 12 岁。

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家庭成员有九口人。淑蒙开始上小学的时候，她的一个哥哥已经当上了警察的头目，有一个姐姐已经结婚。还有一点应提到的是，淑蒙在济南作教师的外公显然是同意自己的女儿与这位手艺人同居的，这座小城镇离济南有 300 多公里。

淑蒙对母亲不定期地经常在夜间外出感到迷惑不解，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更不知母亲是什么动机。孩子的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的母亲只是李德文的妾或者说是“小老婆”。直到今天，人们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她去世的日期和原因。

家境并不窘迫。淑蒙的父亲雇了一个整劳力、两个盲人打砂纸，还有一名临时工，他的木匠铺生意很好，所以他后来有钱在城外买下一大片土地。

在家里，如果他的正房妻子的孩子都回来的话，显得有些拥挤，但是总是比较舒适，白石灰粉刷的墙壁、棕色的房梁、纸糊的窗户。有三四个大房间，其中包括一个很大的厨房，取暖的炉子，干菜挂在房梁上。用当地木头制作的家具很漂亮也很结实，油灯发出的光照亮舒适的房间。

如果说淑蒙真的象她后来所说的缺少食物和衣服的话，这是因为家里发生了争吵，或者说是因为社会的动乱，这种威胁影响全省甚至全国，而不是因为家庭收入不足以给她提供这些必需品。

在汉语中，“家”这个词既指家庭的成员，也指这些成员共同居住的场所。儿童时期被认为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全部生活的意义都包括在家庭的各种关系中。当一个年轻人到了结婚的年龄，其配偶要由父母为他选定，这在一个家庭中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新的家庭的建立强化了家庭中原有的纽带关系。但是，淑蒙的生活与这些家庭的情况有些不同。

她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她是个女孩子。在过去的中国，父母热切地希望自己能生个儿子，女孩子常常使父母大失所望，取名字也只是随便给个记号而已。女儿不象男孩那样永远在自己家里，她是开放一时的花朵，将来终究要被别人摘走，嫁到丈夫的家里去。淑蒙曾有一次听到父亲咒骂自己命运不好，因为有了个女儿，她感到很奇怪，她的父亲也是女人生的，而生为女人又有什么过错？

淑蒙的脚也被裹了起来，这在1920年以前的诸城并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女孩子裹脚以便显得精巧，同时也说明她的成长不是为了干活而是为了嫁人。淑蒙的一位同学回忆说：“她讨厌这样做，把裹脚布扯了下来，所以我们大家都叫她‘解放脚’。当然这还是在她的脚上留下了印记，使她一生走路时两腿稍有点向外弯曲。”

如果说淑蒙的父母都更喜欢男孩子的话，那么，淑蒙的妈妈又是她父亲的小妾这一事实使问题变得更糟。人们讨厌她在家庭中的这种地位，她的存在特别使遗产继承这样重大的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她比李德文的大儿子大不了多少，她和淑蒙也就更受到冷落。

淑蒙常常挨打，有时是她自己引起的。她的父亲打她，她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有时也这样做，云霞比淑蒙的年纪大很多，但

是不是太粗野，淑蒙常常做一些恶作剧使她很恼火。作为报复，云霞绕着房子追赶淑蒙，手中拿着鸡毛掸子，一旦被抓住，淑蒙的屁股就会挨上几下。

有一年的元宵节晚上，城里一片光明，人们张灯结彩，吃着丰盛的菜肴，饮酒取乐，还有很大的足以够几个人吃的馒头。淑蒙当时大约5岁。

可能是因为李德文对他的小老婆已感到厌烦，也可能是因为她与家庭其他成员的紧张关系使他再也无法忍受。即使淑蒙的母亲不象一些中国官方人士所说的“道德败坏”，但是因为她比李德文年轻很多，不可能不与其他年轻的脾气较好的男人有来往。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李德文那天晚上大发雷霆，用铁铲打淑蒙的母亲。先是猛打她的背部，又打她的手，以致于手指被打断一根。淑蒙自己后来回忆说，她发疯似地护着母亲。父亲挥舞着的铲子打在她的嘴上，打掉了一颗牙齿。

母亲背着淑蒙连夜逃出这个家庭，她们来到诸城的大街上，不知往何处去。

一位了解这种关系的人回忆说：因为父亲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压力，不得不给淑蒙的母亲一点钱把这个妾打发掉。这可能就是元宵节打架的背景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淑蒙的母亲与李德文的关系本来就不协调。有人看到那天晚上后，淑蒙的母亲到了乡下，住在李德文1920年买下的农田里的一所房屋里，无疑，她还与这个家保持着某种联系，以希望得到部分“继承权”。

以前，淑蒙常常与她的哥哥姐姐在一起，现在，只有她和母亲两个人了。

母亲慢慢地消沉，尽管她与李家还保持着一些联系，但是，

以后的几年中，她不得不带着淑蒙到别人家作女仆，从一家到另一家。

一个女人被她的丈夫赶出家门或是自己离家而走，这是不寻常的，淑蒙的母亲发现自己的处境很悲惨。她只有自己的小女儿相依为伴，又远离父母亲，不免受到各种欺凌。一个四处游荡的女人很容易成为人们饶舌的对象。不久，她们母女二人回到了济南，回到了淑蒙外公的家里。

不久，她们又返回到了诸城，因为母亲希望从淑蒙的父亲那里继承一些遗产，特别是经济上的资助。然而，希望是十分渺茫的，后来，不管她们是否得到了遗产，反正母亲还是带着女儿四处找活干。

因为家庭的关系，淑蒙先后上过两个小学。这种时断时续的学校生活使她的性格逐渐开始形成，身体也开始发育。她是一个高个子女孩，行动有些笨拙，嘴巴有点儿大，但是有着迷人的笑。她扎着两根小辫，这是很出众的，因为当时的人们一般只梳成一根辫子，人们常常为此开她的玩笑。

使她感到难堪的是她的衣服，因为这些衣服既不是新的，也不是女孩子的衣服，而是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穿旧的衣服。读二年级时，有一次，她的同学们嘲笑她穿的又大又破的鞋子，他们把前边露出的脚趾叫做“老大哥”，把后边露出的脚后跟叫“鸭蛋”。

她少言寡语，很少开口，但是一讲话总给人很深的印象。她很容易生气，一生气说话就很快，或是掉下泪来。她的外表变化很快，情感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学校，甚至在镇上，人们都知道她是“没有父亲的孩子”。

特别是在第二所学校读书时，她的处境很尴尬。这所学校是县里为富家子女办的，淑蒙是这所学校少数的几个“免费学

生”，可能是她的家庭不愿意象其他孩子的家庭那样供她读书。

她常常和其他的学生打架，可能是因为他们欺负她的外表和奇怪的家庭背景。因此，老师常惩罚她，有一次，她在上课时睡觉，被一位老师打了五板子。

社会的残酷和暴力给她幼小的心灵投下了阴影。淑蒙常常在深夜听到处死犯人的枪声，慢慢地，她学会了通过枪声计算有几人被枪毙。在离她家较近的小东门，她常常看到有人被斩首示众。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她会发现悬挂在高高的杆子上，还滴着血的人头。所有这些，都是当时的合法政府所为，它使人们不能不怀疑这样的统治能维持多久。

一个学期过去了，淑蒙被赶出了县办小学，这可能是她经常与人打架的缘故。她后来在回忆这段学校生活时说：“我发誓不许任何人再欺负我。”这表明，穷困的处境使她产生了个人仇恨。

与此同时，淑蒙的母亲流浪似地轮流在几家富人家作女仆。即使我们不相信今天的北京官方对她的评价——说她是道德败坏的，也不相信淑蒙后来自己对她的肯定性赞扬，我们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她的女仆地位肯定不是十分清白的。

多年以后，淑蒙告诉一位来访者，当时“一个妻妾成群但没有子嗣的地主叫她母亲作自己的仆人”。她对母亲答应这份差使怀着十分复杂的感情。她讲过好几次：“当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常常在黑夜里寻找母亲。”（这位精明的来访者感到奇怪，她的母亲夜间外出到底做什么工作，一般来说，受雇于某一家的佣人是不会夜间外出的。）她常常回忆起和母亲一起呆在乡村的日子，以及因母亲外出自己孤独度过漫漫长夜的情景。

为什么母亲常常夜间外出？为什么一个生活艰苦的寡居女人常常离开诸城？为什么不断地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如果认为

淑蒙的母亲仅仅是家庭女佣，是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

可能她在做家庭女佣的同时兼做地主的情妇，这在那种圈子中是常见的。当初可能就是在这种不停的转换当中她遇到了淑蒙的父亲。

二十年代中期，母女俩在诸城的生活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淑蒙的父亲大约在此时死于伤寒，母女二人既不能与这个家住在一起，又不能到她外祖母家去，她们过着悲惨的生活。这时谣言四起。

在地主家的生活既不稳定，也不是平静如水的。淑蒙与一位地主的女儿打了架，又挨了她的妹妹，因为她们侮辱她。她打地主的狗因为它咬她。痛苦之中，她把自己的敌人比做豺狼。

母亲贫病交加，她绝望了。她给在济南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对淑蒙的未来表示担忧，同时表示，希望回到济南父母的身边。父母愿意照顾她们母女，这是不同寻常的。一般外祖父母并不承担养育外孙女的责任。但是他们年纪大了，也需要有人陪伴。再说，他们身边现在也只有一个女儿，也高兴“以桃代李”，让外孙女来替代她母亲。他们还没有见过这位外孙女。

母亲变卖了自己的东西，包括从李德文那里得来的一间房子，好凑钱买车票。她稍作准备，雇了脚夫，带着淑蒙向邻居们告别后，长途步行到东北方向的胶县搭火车。

据说她们母女往北走的路上，一辆飞驰而过的漂亮马车差点儿把她们碾在轮下，坐在车上的胖地主叫道：“找死啊你们？”他嘲笑她们母女俩“象狗一样走在路上”。他对坐在身边的儿子说：“这是一条母狗和一只狗崽。”淑蒙的母亲哭着悻悻地对她说：“你怎么就投胎成女孩子呢？”

在胶县，她们晚上九点上火车，只能以咸菜和馒头充饥，第二天晚上就到了她外祖母家。与诸城相比，省会济南是大都市。

济南位于黄河以南九公里处，是一座宁静而古老的城市；传统风格的房子，门面宽敞的店铺，它的街道名字也反映了这一点：刑部衙门街、省财厅街、西长官街；还有几座富丽堂皇的寺庙、剧场以及青楼（妓院）。天然泉水使济南闻名天下，其中最著名的是大明湖。

一本当时的旅游指南对它的评价是贴切的：“这是一座热闹的城市、商业中心，同时也是政治堡垒，它还没有摆脱晚清遗风的影响。”尽管军阀混战已经搅乱了这座城市的生活，但是，特有的手工业仍然使它在经济上落后于其它的中国城市，在它四十万人口中有五千日本人。

外祖父的家位于市中心的按察司街上，安静舒适，淑蒙又入了第一师范学校的第二附属小学，学校与外祖父的家在同一条街上。她又取了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比较普通的名字：云鹤，标志着她人生新阶段的开始。

她的一位同班同学回忆说：“这个名字对她并不合适，因为她并不具有‘云中之鹤’的那种安详和高贵。”在她的同学看来，云中之鹤不应是象她那样心胸狭窄。可能这个名字是她外祖父给取的。

外祖父给了她很大帮助，使她能够继续学习，得以摆脱在诸城时的那种动荡艰苦的生活和别人的闲言碎语，而且在这种城市的文化和环境中开始了一种稳定的生活。在济南的四十万人口中，只有一万二千名学生（二千五百名中学生），云鹤就是

* 中国人对给孩子取名字很重视，他们不象西方人有一套固定的名字（乔；比尔；梅维斯；贺拉斯……）可供选择。任何两个字（有时是一个）都可用作孩子的名字，这些字取自一首诗、一篇古文，或是家庭的传统，也可能受启发于孩子的外表或孩子生时的情况。因此，中国人取名字比西方人有更大的灵活性，也更有意义。

这些幸运儿中的一个。

云鹤说她学习很刻苦，然而苦难的个人经历和变化不定的性格特征决定了她的生活。有一次，一个男孩子打她，几个女孩子站在旁边拍手喝彩。云鹤忍受着侮辱，没有还手，因为她知道自己是孤立的，但是她并没有求饶，她一动不动地咬着牙看着地面。那天晚上，家里人责怪她回家晚了，继而发现她脸上的伤痕和被撕着口子的书包。对此云鹤一句话没说，她情愿默默地忍受着环境给她的不公正待遇。

她憎恶传统礼教，她认为“三从四德”是阻碍人们自我发展的罪魁，她有自己的看法（“三从”是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按照传统习惯，她的家庭认为她应该努力学习，光耀门庭，但是云鹤对这个家庭谈不上感情。不管怎么说，女孩子很难象男孩子那样使蓬荜生辉。

1926年或是1928年，云鹤的生活发生了一点儿变化，她和母亲北上来到港口城市天津，在云鹤同父异母的姐姐家住了一段时间。她没有入学，而是在家里帮助做家务，打扫房间，洗衣服，上街买东西。但是她讨厌做家务，也不愿象二十年代的其他中国妇女一样被限制在家中，她在一家烟草公司找了份工作，和其他童工一样每天手工卷烟，但是家庭否定了她的计划。

1928年她们回到济南，云鹤的母亲却从女儿的生活中消失了，很多认识云鹤的人都认为她母亲死了，事实上，她的母亲似乎又结了婚。云鹤也没有完全失去与她母亲的联系（后来，她找到工作后，还寄钱给她母亲），但是，母女之间的亲密关系从此成为过去。

十几年来，母亲一直是云鹤的保护人，她常常孤独凄凉地一个人守着一盏油灯等着母亲的夜归，她害怕、恐怖，然而她并不知道，母亲随时可能落入坏人手中永远也不会回来。云鹤

还不完全懂得母亲生活的世界。云鹤从不对人谈起自己对母亲的同情，她对母亲的再婚也同样保持缄默。母亲认真地完成了对女儿的义务，但是对云鹤来说，童年的岁月中并没有多少美好的事物可以回忆，她的母亲成了旧中国的牺牲品，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云鹤希望自己成为的那种自由的人。云鹤从母亲的遭遇中深深地感受到，自己要冲出母亲生活的那个世界，她希望自己成为与母亲不同的人。

14岁的时候，云鹤实际上成了孤儿。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在这混乱的时代，她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女孩，却不知道如何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如何去适应这奇怪的世界。外祖父让她继续读书，但是，云鹤是不愿意受任何约束的人，再说，一个女孩子要想升入中学并非易事。

山东以戏剧著名，除官方机构外，还有一些颇有声望的剧团，以及一些低级的地下戏班。他们演出一些精彩的地方戏，而且大多与秘密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常常通过各种渠道搜罗社会上的一些散兵游勇，因此，不乏才资出众的演员。同时，也常常发生绑票案，有些地下组织专门绑架所谓的“金童玉女”，把他们卖为家仆，或卖入大明湖附近数不清的妓院（女孩子16岁就可注册成为妓女），或卖进戏班。

1928年，云鹤成为地下戏班中的一员，戏班在济南市郊的历城。云鹤不是被绑架，而是朦朦胧胧地自愿加入的，她希望碰碰运气，也不希望再依靠外祖父母生活。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云鹤和其他新人伙的人一样，主要做一些体力活，偶尔串演一些小角色。她与戏班里的人住在一起，他们虽然粗俗，但是与她以前遇到过的人完全不同。

因为演戏，戏班里的男女常常手拉手，他们也不象其他的中国男女，只有结婚才可以多看几眼对方的身体。观众的掌声

使这些金童玉女感到了自己的价值。这一切都改变了云鹤的生活。

她喜欢新鲜的东西，喜欢幻想。在戏班的一段时间使她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象在家或者在学校里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在这里，她成了一个性格外向的人，她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自己的性格特征，而不再受传统习惯习俗的压抑。

云鹤发育得越来越迷人，但又不失几分稚气，“她象一只将熟未熟的瓜”。她被认为是善于言谈的女孩，举止优雅。虽然她还只有14岁，但是发育的乳房和明亮的眼睛常被人认作18岁。有人回忆说：“她对自己的相貌很自信，显得有些傲慢自负，同时，她又对自己贫苦的经历很敏感，又带着点儿奴性，这一切使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戏班里有的男人发现她很吸引人，有的认为她早熟，象一朵越开越艳的花，不是等待蜜蜂和蝴蝶的光临，而是昂首去迎接它们。

云鹤喜欢舞台，她从化妆和演出中获得不少的乐趣。同时她也看透了这一职业，在这种地下戏班中，女演员常常不只是演戏，还兼卖身。这些玉女虽只是逃出了家庭的监视，但还是赚钱老板的摇钱树。这使云鹤更加了解了女性的困境，在那种社会环境中，不管具有多大的魅力，一个人都是软弱无力的。

她的外祖父母还不知道云鹤的这些事。一天晚上，他们去看《打金枝》，这是一出京剧，他们发现了云鹤。她演的是因不愿参加公公的生日庆典而挨打的公主，身穿蓝色丝袍，头上缀满了珍珠，脸上扑了粉。

云鹤愿不愿意回家呢？最近几周，云鹤常挨打受骂，阴沉着脸的班头对她很不好。在这种下等戏班里，女人是不能自由的。初登舞台的尝试吸引着她，但是她也发现这是一个是非之

地，尽管她感情复杂，但在外祖父的劝说下，她还是回到了济南的家。

戏班老板把这些金童玉女看作自己的“摇钱树”，他为云鹤的离开索要很多的赔偿费，外祖父好不容易凑够了这笔钱。云鹤给凶恶的老板鞠了三个躬后，默默地跟着外祖父离开了。老人希望她再去学校读书，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外边的蜜蜂和蝴蝶已经把这朵花转向另一个方向。为了克服生活的挫折，实现自己的幻想，云鹤已经做了尝试。

对云鹤来说，她的家现在是在济南。这座古老的城市也受到了社会变革的挑战，左的思潮、改革的呼声、女权主义都冲击着这座城市旧有的传统。这种冲突对云鹤有着强烈的个人意义。很有可能，她的外祖母这时正考虑让她嫁人，使她有个稳定、安全的家。济南出现的现代浪潮能使她摆脱这种命运吗？

云鹤听说刚成立一个实验剧院，是由山东省府资助的，正在招收艺术、音乐和演出方面的年轻人。她报名参加应试。她告诉她的朋友说，这没什么坏处，与升官考试不同，在这种考试中落第不会丢面子，况且女孩子成功的可能性比男孩子大，因为人们对女孩子的要求并不高。考试结果，她被录取了，并将于1929年春季入学，她感到兴奋，也感到意外。

外祖父感到失望，他叹息着说：“真是没有办法，煤油只能装到煤油瓶里。”因为他知道，是云鹤的性格使她走上这条下贱的路。

自古以来，戏子一直是被社会瞧不起的，但是，“五四”运动的改革浪潮多少冲刷了这种社会偏见。实验剧院就是很受人敬重的、严肃的，进步学生的周末演出成为轰动济南的一桩盛事。这是一个新时代开始的信号。学生的这种活动受到了省教

育厅的资助，参加演出的学生，每月可以有6块钱的收入，而且免去学费和生活费。一个学生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们吃的都是鸡鸭鱼肉。”如果没有这种补贴，云鹤是不会被录取的，云鹤之所以参加应试，主要原因是想摆脱外祖父母的管束，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经济上的独立应当是首要条件。

实验剧院在一所破庙里，除了教授古典音乐和戏剧外，还是山东探索演剧艺术的先驱，这当然是在国民党的支配下。实验剧院的老师有的是颇有名气的艺术家，如院长赵太侔，还有对云鹤影响很大的王泊生，他们熟知西方文化，并且认为，中国的进步是与西方价值观念的融合分不开的。

一位当事者回忆说：开学那天，她高兴得蹦蹦跳跳。云鹤穿着白衬衣、黑裙子，两根长辫垂在脑后，是一个甜甜的天真的小姑娘。有人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小白兔”。以后她每天黎明时分就起来练嗓子，或在排练房对着镜子练姿势和表情。

剧院录取的人员都要求具有中学学历或“相当水平”。“小白兔”没有中学水平，只是作为“相当学历者”被录取的。她的同班同学王庭书回忆说：“云鹤是仅有的三个女孩子之一，因为女孩子愿意从事这种艺术工作的不多，对她们也就相应地降低了标准。”两家剧院同时举行招生考试，一家在济南，一家在北京。一些成绩最好的学生被录取到北京，因为它的考试要求考生能讲流利的官话，录取标准比济南的这一家更高。

王庭书回忆说：“云鹤通过了济南的考试，这并不是因为她考得很好，而是因为某种偶然因素。”她的飘动的长发在南方较为普遍，但是在中国北方则不多见。负责考试的老师吴瑞燕正需要这样的人扮演活泼丫环，她看到云鹤时很高兴，这使云鹤“通过”了过关考试。

但是，一旦被录取，云鹤就剪掉了辫子，受当时的社会“新

思潮”的影响，她也想显示自己的时髦。她需要的不是漂亮，而是象男人那样。她企图证明，自己并非孤独无助的人，也不需要等待男人的拯救。

王庭书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精干的年轻人，他通过了北京的考试，他说：“吴老师发现云鹤剪去了她的长辫子，很是懊恼。但是云鹤不是那种依附顺从的人，她认为不适合自己的事，很难改变她的主意。”云鹤本来可以在现代戏中扮演一位天真的农村少女，现在剪去了长发，一时间还找不到合适的角色。

在旧中国，艺术被认为是为社会服务的，它应象水泥一样，稳固儒家社会这座大厦上的一砖一石。读书人通常也就是人们的历史教员，歌曲也是为某种社会目的而演的。

在剧院，“小白兔”学习的是，戏剧是社会斗争的武器，就象后来共产党所说的，是“反封建的戏剧”。她开始学习外国的文学和戏剧，与中国传统不同，它们都强调个人的意志。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改变了她的生活的颜色，一位同学回忆说：“她一读到《玩偶之家》，马上就想演娜拉这一角色，并且把自己认作娜拉，希望砸碎玩偶之家的大门走出去。”

云鹤从没学过任何外语，也没有受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方面的大学教育。但是，在实验剧院的学习还是令她十分兴奋的，对她也很有帮助。这种学习使她开阔了眼界，改变了她生活的道路，从普通的青年开始追求艺术上的成功；生活方面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约束，开始浪漫起来，希望来点儿改变。

这是一种西方式的教育。音乐部——另外还有表演部和剧作部——的学生每人都要选择一种西洋乐器或是中国古典乐器。云鹤选择了钢琴。这表明她在开始脱离中国传统的轨道，她把学习音乐看作是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在王泊生和赵太侔的影响下，这位乡下姑娘也坚定地认为，戏剧在服装和表演方面

不受西方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云鹤并不是一名出色的学生。王庭书回忆说：“在唱京剧时，她常常跑调，而且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他对来访者苦笑着说：“当时我们常常嘲笑她。”在钢琴演奏方面，云鹤的进步也很缓慢，有时被老师抓起手掌打几板子，让她更多地练习。

虽然云鹤还带着点儿乡下姑娘的天然和粗俗，对许多男生来说，她还是很吸引人。“毫无疑问，她是当时最漂亮的女生。”王认真地回忆说：“她与一位学音乐的学生谭文和另一位学京剧的魏鹤龄关系不错。”她常常与另外一些男生喋喋不休地吵个没完，其中包括一位现代戏剧专家高永辉。这说明，她不是一位顽皮的姑娘，就是有性的吸引力。

在这座破庙的中央，是威严的孔子塑像，高大而令人生畏，旁边是他的七十二贤徒，一律戴着头巾。王庭书回忆说：“与这座古老的庙宇相比，我们显得很年轻。这里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座建筑使我们生畏，尽管我们认为自己是现代人，它还是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害怕。”没有人敢到大殿的深处去，特别是在夜间，我们认为那是鬼魂出没的地方。“有一天，一位同学发起一场可怕的竞赛，看看哪个男同学的胆子大，条件是：夜半三更时，走到大殿深处，爬上孔子塑像，取下他的头巾，拿回来让同学们看，证明自己的胆量，就能得到奖励。”一连几个晚上，没有人敢试自己的胆子。后来有天夜里，宿舍里一片混乱，原来一个女孩子爬上了孔子的塑像，抓住了他的头巾，同学们一个个目瞪口呆。这个女孩子就是李云鹤。

王庭书说：“自那以后，她使人更难忘记。我们感到吃惊的是，一个女孩子竟然敢做这件事。说实话，我们男生都不敢，不用说一个女孩子了，她引起了轰动，一时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在实验剧院的一年多时间里，云鹤学了不少东西，培养了

其自我表现的兴趣，她的表演虽然不能说令人难忘，但是很出色，因而受到了表扬。在传统剧目中，云鹤扮演青衣行当，大多是成年女主角，是严肃的悲剧人物（与小旦角色不同，小旦多是年轻的女仆或天真活泼的少女）。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云鹤的演出，那些喜欢她的人认为，她的青衣演得生动鲜明，也演出了悲剧的味道。

但是，正当她不断取得进步的时候，云鹤发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这里常常有明争暗斗，她每天都要防备不测，想法与侮辱自己的事作斗争。与当时中国大多数有才能的女孩子一样，她常常感到为难。这倒不是要养家糊口或是光宗耀祖，而是要找个好男人。人们普遍鼓励她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甚至妖艳一些。然而，过分妖冶的女孩，又常常被人嗤之以鼻，她的才能被认为是蓄意达到某种目的，她的言行常常被说成是卖弄风情。因此，如果云鹤表现得有棱有角的话，就象其他出身低贱的女孩子一样，日子更不好过。

王庭书说：“很明显，她的家庭状况不好，因为绝大多数学生都能收到父母寄来的钱，云鹤却不能。谁也不问及她的家庭，我们都知道她出身低微。”

三位女生共住一个宿舍，和教室一样，宿舍也在这座孔庙里。云鹤与另外两名女生都打过架，她们常常还为争戏中的角色而争吵，对她的衣服评论也会使她感到受了侮辱。一位女生是王泊生老师的妹妹，而云鹤又有很多男朋友来找她，这也常常导致关系紧张。

一天晚上，云鹤终于抓住一个露脸的机会。在周末的例行演出中，这次表演的是上海作家田汉的《湖上惨事》，由王泊生的妹妹领衔主演。但是在周一的加演中，云鹤得到了这一角色，虽然观众比周末略有减少，云鹤终于有机会为自己辩护。

云鹤努力使自己进入角色，演出效果很好，使几乎所有的观众都为女主角的悲惨命运掉下泪来。不知是因为一时感情冲动，还是因为自己终于有机会战胜对手而兴奋，云鹤也哭了。

在后台卸妆时，剧院的导演和老师走过来表扬她。她又一次哭起来，冲出化妆间，使在场的人目瞪口呆。

1930年晚期，山东省实验剧院不得不关门歇业，因为政治的更迭砍掉了它的经费来源。这些还没有完成学业的学生只得面对严酷的现实。济南的艺术发展受到军阀和日本人的压制，有几个学生被北京的演出单位录用，其他人有的在上海的电影圈子里找到了饭碗，很多人放弃了艺术去干苦力活。

王庭书回忆说：“王泊生老师带着云鹤我们几个到了北京。他让我们进了他组织的‘演唱会’，同时也帮助我们在首都的剧场里争到了一些小角色。”但是云鹤在北京并不成功，她只是在《打金枝》和一出描写一个名妓的戏中露了一下脸。王解释说：“她与北京人的口味不合，特别是深厚的乡音使北京的观众和剧院都不喜欢她。”

回到济南后，没有人帮云鹤谋个职业，她也没有一个舒适的家可回。直到这时她才知道，自己因为没有良好的教育和可靠的家庭背景而很难立足社会。她只能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品格闯荡。

一位姓费的年轻人，中学毕业，喜欢京剧和现代戏，在云鹤主演《湖上惨事》的那天晚上，他正巧去剧院。费是济南一位商人的儿子，他为云鹤的风度和美貌而着迷。他比云鹤大几岁，一表人才，是一位孝顺的务实的青年。自己的演出能使人着迷，云鹤感到很高兴，她和费曾有几回约会。

因为剧院关门，云鹤生活拮据，再说，在剧院的学习使她

与家庭比以前更加疏远了。很多朋友劝告她不要坐失良机。1930年底，她与这位姓费的青年结了婚，按照习惯，成了费家的儿媳妇。

看起来云鹤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巢窠。云鹤的外祖母在这件事中可能起了作用，他们同意了这门亲事，云鹤还只有16岁。王庭书回忆说：“结婚的费用大多是新娘一方支付的，再说，云鹤年纪也小，所以，当时我们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可能是她的外祖父母花钱把她嫁给了这位青年。”

也可能是云鹤自己的主意，因为她当时已别无选择，直到艺术世界的另一扇门向她打开。

这桩婚事只维持了几个月，到后几周，他们每天都是不停地吵闹，据说云鹤很懒，“日出三杆才起床”，“象贵妇人一样”坐在那里等别人伺候她，也不到厨房做饭。家里人指责她不尊重婆婆，不守家规，经常外出参加舞会，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她不知道自己的地位虽然变了，但是在费家，仍然是地位最低的人。

家庭关系日趋紧张，据说连费本人也责怪她：“你搞得鸡飞狗跳。”婚前，费认为，与女演员在一起生活一定很快活，然而事实证明，他只能占有她的身体，却不能改变她的灵魂，最终他选择了家庭。对云鹤来说，就象在后来的生活中一样，她没有多讲，为什么结婚会影响其人格发展。占语说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符合她的本性。

欢快的游船在大明湖瓦蓝的水面上穿行。湖畔的石凳上，这不幸的一对阴沉着脸在谈判。据说云鹤坚持过小家庭生活，坚持分家，只有他们两个在一起。她要费在她和他的家庭之间做出选择。

在三十年代，核心小家庭在中国并不多见，象分家这样的事多由父母提出，而一个年轻媳妇提出分家是不能让人容忍的。费很快觉察到，云鹤的这一要求只是一种策略，这个女演员已不再属于他，她这样说的真正目的是要离婚。可能云鹤不愿自己提出，而是希望由费提出，这样，归于她名下的财产就会多一些。

在现代风气渐盛的济南，受过教育的年轻妇女提出离婚，如果说还需要一定的胆量的话，也可说在当时是很时髦的。就象反对裹脚、反对卖淫、反对旧的婚俗，就象支持自主的婚姻和纪念“三八”妇女节一样，也是妇女解放的标志。

云鹤有一位属于现代派的、生活豪放不羁的朋友，她曾经征求这位密友的意见，她的这位女友代表云鹤到费家谈判离婚的条件。谈判的结果是“无条件地离婚”。也就是说丈夫家不再对云鹤有任何要求。云鹤解放了，改正了自己犯下的错误，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希望的是社会所禁忌的自由，这虽是短暂的。离婚使云鹤的外祖父母大惑不解，家庭比以前更不愿意收留她。

云鹤开始打听以前在实验剧院时的老师赵太侔的去向，因为在演出《湖上惨事》时，赵曾表扬过她。她听说他现在在青岛，是一所新建大学的校长。她的同学告诉她，青岛在她的老家诸城的东边，大约有80公里，是一个在艺术和政治上都很活跃的城市，或许赵老师能帮她一把。

她买了车票，打起自己仅有的几件行李，把钱小心地藏在衣服里，这钱是她离婚时从费家得到的。她感到自己在济南已没有可牵挂的，于是，往东到青岛。

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云鹤每次与自己的情人闹翻后，都会离开那座城市，到另一个地方去过一种新的生活。这一次与

费是这样，后来与她的第二和第三个丈夫分手后也是如此。*

与济南相比，青岛是一座新城市，这里有德国的纺织厂和租界，是一个有约四十万人口的工业城市，位于海滨，它是中国和西方签订的条约的产物。通过这些通商口岸，中国开始与西方接触，虽常有摩擦，但还是很诱人的。如果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济南的现代化姗姗来迟的话，青岛则已完全成为一座现代城市。无论是起先锋作用的文化、社会主义思想，还是民族抗日情绪，青岛都领先于省会济南。它在城市气氛和城市规划上都是一座半西方化的城市。

赵太侔这时还是文学教授，云鹤给赵校长写了张纸条，赵想起她是在自己在济南时的学生。但是，赵并没有为她提供一个工作机会，或是录取她为青岛大学的学生，即使她在赵老师的办公桌旁痛哭流泪。她所得到的只是赵校长为她在集体宿舍找到一个临时住处，她坐在那里思考，怎样才能打进青岛的文化界。**

云鹤决定走后门，接近赵太侔的妻子。她壮起胆子，坐着马车来到俞珊的家，俞也是演唱京剧的好手，而且象她丈夫一样有名。俞珊的出身和地位都比云鹤高得多，她的家庭深受天主教的影响。俞珊被云鹤的精神所打动，同时也同情这位离婚少女的悲惨遭遇。她从两个方面帮助了云鹤。

* 后来，云鹤说她的第四个丈夫毛泽东的童年生活比她稳定得多。毛16岁才离开他在湖南韶山的老家；而云鹤在这个年纪已经到过三个城镇，并在很多地方住过，而且已有丈夫和许多男朋友。毛的父亲虽然很严格，但不象云鹤的父亲那样粗暴和不讲理；而他的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比云鹤的母亲文静单纯。在1900年，湖南的社会动荡和帝国主义的入侵也比不上七十年代的山东。

** 多年以后，云鹤在谈到当时对赵太侔的失望时，没有说自己缺乏能力，只是说她与赵的冲突是赵用温和的改良主义反对她的满腔革命热情。

不久，青岛大学图书馆准备雇用一批小职员，云鹤就在被录用的人之列。这要感谢俞珊在她丈夫面前的说情。青岛大学校园原是德军基地，图书馆建在一个小山坡上，一眼可以望见大海。红色的玻璃瓦，窗户上没有玻璃却有很漂亮的方格。云鹤坐在入口处整洁的木桌前，穿着西式棉衣，用漂亮的字体写借书卡片。图书馆在校园正中，一边是教学楼，另一边是西方建筑风格的集体宿舍。云鹤在与人的接触中感受到校园生活的活力。她是一个很会引人注目的女孩，也很会讲话，只要听到什么消息，马上就会告诉另外的人。

作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她可以去教室旁听老师讲课。她旁听了中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课程。大部分教师都持左派观点，他们曾在美国学习，现在又用自己的新思想影响中国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她充满热情地写小说、诗歌，甚至还创作了话剧《谁之罪》，内容是说一位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他的政治活动使其母亲死亡，自己也遭逮捕。但是，这些作品毫无影响，谁也不认为她将来能成为一名作家。学习了文学知识后，云鹤也尝试敲开文学的大门，但是能力有限。

和已往一样，李云鹤给一些人留下较深的印象，但是糟糕的是，她还是与人干仗，常为一些小事而发火。她既不能不损害别人，也不能委屈了自己，她不会选择一条中庸之道。据她自己说，一本著名小说的作者杨振声教授曾经“侮辱”过她，她的戏剧老师也曾嘲笑她是政治上的傻瓜，赵校长说她是到处惹是生非的人。她的很多同学发现她很笨，脾气怪，而且不饶人。不管怎么说，青岛大学给了她比学习更重要也更让她兴奋的东西。

俞珊的第二个帮助是把她介绍给一位很聪明的学生，一位

年轻的政治活动家，这就是俞珊的弟弟俞启威。* 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韦尔斯描绘俞启威说：“与一般中国人比，他的个子很高，穿着中式长袍，他有很漂亮的相貌，表情丰富，而且常常面带笑容。”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斯诺夫人被俞启威的人品和能力所打动。“他沉着冷静，举止文雅，宽容至厚，他具有领导才能。他一走进房间，人们的注意力就会转向他，居然他有时显得腼腆。”女人都喜欢接近他。

俞启威是青岛地下共产党的负责人，与文艺界的公开活动有复杂的联系。这位出身于上层社会的青年，已经背离自己的家庭背景，支持帮助共产党的事业。与俞启威相比，云鹤是一位出身低下的少女，她在寻找任何能够实现自我的事业。

他们常常一起到赵校长家作客，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的关系日益亲密。他们常到小山上那座两层的别墅中去，这里树木茂盛，幽静恬淡，景色宜人。

青岛人最喜欢去的地方是青岛码头，很长也很漂亮，码头的尽头有一个传统建筑风格的亭子。每当旭日东升，远处吹来咸味和鱼腥味，这座美丽的城市开始苏醒的时候，云鹤和启威总是出现在这里。他们更多地还是夜间到这里来，月光洒在银色的海面上，他们依偎着眺望远处的帆船，桅灯象星星在天空闪烁，或是沿着海滩漫步，谈论妇女运动、社会主义、自由恋爱，谈《红楼梦》和其他小说，谈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面临的危险。在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启威常去游泳，而云鹤在来青岛之前还没有见过大海，她坐在船上或躺在岸边，看启威穿着摩登的泳装。他们常常在海边白色的沙滩上走得很远很

* 俞珊采取这一行动可能是出于对云鹤的嫉恨，因为云鹤和自己的丈夫虽然一开始互无好感，后来却很亲密，致使俞珊感到不舒服。而俞珊又不愿与丈夫公开吵闹以免使其失去校长一职，故而把云鹤介绍给弟弟启威。

远，他们常常一起出席讨论会，一起参加各种娱乐活动。他们感到生活得很愉快。

俞启威的一位好友回忆说：“这一对陷入了情网，1931年间，他们开始同居。”这是现代式的结婚，没有任何证明，也没有任何仪式。

云鹤找到了一位比费先生强得多的伴侣。俞启威是一名聪明的、有知识的青年，云鹤认为他如果不是把许多时间用于政治活动，他学的生物学专业成绩会好得多。俞出身于书香门第又有社会地位。在云鹤看来，从事激进的政治活动使启威反而增加了几分神秘感，她自己也感到负有某种使命。在青岛，与这样一位反封建的现代青年生活在一起，没有作为儿媳所受的奴役，也没有家庭的吵闹，云鹤很满足。

俞启威在青岛大学党组织中的工作是宣传部长，应该感谢俞的帮助，才使云鹤进入共产党的文化圈。依靠自己的几份手稿、满腔的热情、社交能力和俞启威的影响，她加入了左翼剧联和左翼作联。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的东北三省，青岛大学发生了学生罢课事件。围绕着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问题，剧联内部也发生了争执，云鹤参加了观点激进的反帝联盟。她全身心地投入“海边剧社”的活动，到乡下演出，以戏剧艺术的力量反抗日本人的枪炮。剧社曾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等剧，这是描写东北人民经受日本奴役之苦的话剧。她感到自己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她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活动会给中国带来光明的前途。

云鹤有强烈而真挚的民族感情，然而她的知识有限，到现在为止，她甚至还不知道共产党与国民党有什么不同。她又当上了演员，而且是共产党的事业中的一员，然而这并没有给她带来地位，在学习上和创作上她也毫无所成，实际上，她成了

俞启威的帮手。

俞启威使她着迷，把她抬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这不只是把她引入共产党的活动之中，还帮她认识了一些很有趣的人物，他们是社会的精英。最初几个月，云鹤还不知道俞启威是共产党员，每次回家晚了，她都责怪他是不是去会其他女孩子，实际上他是参加组织活动。慢慢地，作为一名坚实的政治活动家的俞对云鹤产生了影响。

尼姆·韦尔斯回忆说：“俞的确是很出众的人物，所以，我一直认为李云鹤也是如此，否则，他不会与她保持某种关系。”

1933年2月，这是一个冷风袭人的下午，浓雾笼罩着码头，云鹤与一名精瘦的男生并排走在鹅卵石铺就的街上，这里是工业区。他们手拉着手，亲密地偎在一起。脸色苍白的工人们匆忙地下班回家。他们夹杂其中，走得很慢，多情地交谈着。

云鹤曾为此付出了代价，尽管她几乎还不知道这位紧紧搂住她的男人是谁——他不是俞启威，她不知道这黄昏的散步将走向何处。附近有一个小公园，长满了柏树和修剪齐整的灌木。他们拐进一条小巷，那男人扫了身后一眼，他们消失在一家货栈门前。半小时以后，云鹤成为中国共产党青岛支部的一员，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宣誓、登记。

党的主要领导人会经常遇到各种危险，对云鹤来说，她的入党只能说是出于模糊的动机。的确，她恨中国的社会秩序，这种感情很自然地成为共产主义信仰的出发点，然而，如果不是为了俞启威，她不会走进那家货栈，为中国革命举起拳头。即使在她跨过这个门槛的时候，她的心仍然向往着自由，仍然保留着演戏时的那种幻想。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热血青年认为艺术也是左翼的，因此，在舞台上的自我表现与党内的自

我克制之间，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只选择其中一个。

作为共产党员，李云鹤有时看上去衣衫褴褛。她并不是不时髦，而是不可避免的礼仪上的需要。年轻的政治活动家有时必须如此，吃饭无定时，参加各种会议，云鹤也不例外。她两腿细长，衣服很短，步伐轻快，因此，人们给她取了个“麻杆儿”的绰号。但是，在一些特殊场合，或在娱乐活动的晚上，她仍然是一位迷人的少女，她穿上蓝色的丝绸旗袍，显得楚楚动人。她迷人地笑着，静静地听着，只是在别人讲话时讲几句简短的话，引起一阵共鸣。

不久，云鹤就失去了俞启威。国民党开始逮捕这座城市中列入黑名单的最有影响的50名共产党员。迫于压力，青岛大学也开始驱逐党员学生，学校当局给某些学生50元钱让其离校。在这种紧张的政治气候下，俞启威也被跟踪。一天晚上，当他与另外两名党员学生在中山大道碰头时被逮捕，并被投入监狱。俞珊赶去告诉云鹤这一消息，云鹤感到震惊，她哭了，她无法控制住自己。在以后的几周内，她心身交瘁，她甚至开始怀疑，共产主义道路是否适合自己。

几个月后，俞启威被放了出来，因为他们的家庭可以施加某种影响，俞珊在俞启威被捕后与他叔叔取得联系，俞启威的叔叔俞大维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俞大维给俞珊拍来电报，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心安勿躁。”俞大维认为，侄子那些人“实际上只是出于爱国的目的……。他们还年轻，只是反对外国人欺侮中国，我认为这不应该投进监狱。”

俞启威出狱后就离开了青岛，很明显，共产党又指派给他新的任务。他到了北京，参加那里激进的学生运动。云鹤悲痛欲绝，直到启威被投进监狱，她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爱他。为了减轻这种无边的孤独感，她又交上了男朋友，一位姓乔的学

习体育的青年，启威可能是为此才离开了她。可能云鹤在政治上背叛了启威，因为警察审问过她，试图得到关于启威的情况。

也可能云鹤开始认识到自己不配俞家，启威是一名共产党员，俞珊是一位颇有艺术才能的贵妇人，他叔叔俞大维是蒋介石政府中的一名部长。

颓废之中，她决定离开青岛。和在济南一样，一桩婚姻的结束使她希望改变一下自己的整个环境。在一个新的城市里，她可以一切从头开始，而且没有羁绊。为什么不去中国的纽约——上海？也可能会有在那里找到自我表现的机会？

孤独的童年培养了云鹤独特的个人主义精神，甚至有些不合时宜。她很象年轻时的埃莉诺·罗斯福，她也是一个孤独的孩子，从不与兄弟姐妹们亲近。10岁时成了孤儿，常常为不得不穿一些不合身的衣服感到难堪。童年的创伤成为这位女性创造性和独立精神的源泉。

云鹤周围的大多数人都是循规蹈矩的。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听话。云鹤不同，坚强的意志，特别是不幸的记忆，使她走上与众不同的道路。

她不象其他的女孩子，有一位守旧的父亲，被迫成为温顺的妇女，长大后依赖别人生活，成为丈夫的玩物。再说，她也没有一位爱她并能经常在她身边保护她的男人，也没有兄弟姐妹之爱。

早年母亲给予的关心和爱抚，不仅没有使她陷于其中，而且使她养成了自己拿主意的习惯。她的自尊心没有受到打击，象在中国常见的，由父母和家庭决定一切。她的孤独是好事，也是坏事。

在这种独立精神的支配下，云鹤越来越坚信，要想不被社会所践踏，自己就要不停地斗争。她的亲身经历使云鹤感觉到，

自己一旦放松警惕，就会有有什么不幸降临到自己头上。她不得不反抗各式各样的男人（她的父亲、地下戏班的老板、费先生）；不得不面对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她深知，自己生活在一个正在解体的社会之中，这个社会不可能给她带来希望和安定。她要自己努力，不惜任何代价去寻求安定，而隐藏起自己的仇恨，这对中国社会和家庭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而对云鹤来说，似乎不可理解。即使条件不具备，她也会走向极端。她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感情，而是把它作为斗争的武器。家庭争吵使她变得心胸狭窄，诡计多端。

云鹤感到自己被相对剥夺，所以她要寻求报复。在她长大成人要离开山东的时候，她性格中的另一面也已经开始形成，这就是独立精神和斗争的冲动。孝敬父母的义务和根深蒂固的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心理，使中国的年轻一代常常不敢尝试自己想做的事，而是情愿地囿于某些教条的约束。然而，云鹤不理睬这些，她敢于反击自己的敌人，当她觉得时机还未成熟时，她把仇恨牢记在心底，忍耐着寻求将来的报复。

云鹤在济南时的同班同学王庭书说：“回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我对她的一生感到震惊。她终于成了‘剧院老板’，中国的艺术和艺术家任其玩弄。我所认识的云鹤是一个天真的少女，是的，她坚强，有性格，但是头脑简单，以自我为中心。”王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回忆着在山东他们在一起的岁月，“在这位普通的人身上贴上傲慢的标签，我是否应该感到遗憾？看到云鹤的经历，看到她地位的改变，我是否应该感到欣慰？”

第二章

在上海的舞台上 (1933—1937)

“我只知道要养活自己，我崇拜戏剧。”

——李云鹤（江青）

在青岛开往上海的轮船上，李云鹤坐在干净整洁的船舱里，心情不禁有些紧张，她不知道自己在上海这新的天地里会遇到什么。当轮船自东海驶入黄浦江的时候，她想到了自己的无力，她意识到自己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两个强大的对手：疾病和男人。

她还从来没有乘船航行过，海上的颠簸使她几乎呕吐一路。更糟糕的是，她在济南实验剧院认识的万籟天，受山东省统一战线的委托，一路上照顾云鹤。这位讨厌的戏剧活动家对云鹤过分殷勤，令她生厌。看到她途中晕船，引起体力不支，万借机试图拉云鹤与他同住一家旅馆。真是一头蠢猪，云鹤想。

轮船在一片浓雾之中挤进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码头。云鹤飞快地跑上甲板，她兴奋得不能自己，急速地走下跳板，完全忘记了晕船和呕吐，把护送她的男人抛在了脑后。史东山会不会如约前来迎接她呢？

史东山是赵太侔和俞珊的朋友，云鹤在他们家见过这位电

影导演。她在拥挤的人群中寻找着史东山的身影。过分的紧张几乎使她又一次呕吐起来。突然，她发现了史东山。他们乘上一辆莫里斯牌出租汽车，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史东山在虹口的住宅，这里是繁华的市中心。

作为中国面向西方世界的门户，上海吸引了大批的创业者。这里令人激动也让人心碎，是享乐主义的天堂，也是左翼思潮的巢穴；有天主教的传教士，也有堕落的混世魔王；是趾高气扬的欧洲人在远东经商的理想场所，但同时，日本人的侵略正在毁掉其前进的车轮。上海是一口大锅，是一只万花筒，集中了各种矛盾和纠纷，各种人物和事件。

如果说北京热衷于政治的话，那么金钱支配了整个上海。国民党在这里的统治严酷但作用不大，即使那些关心政治的人，也没有注意到共产党最近在上海的损失。党外的人士大多还没有听说过毛泽东的名字，这位“农民共产主义者”和他的军队当时正在荒凉的江西山区。

在上海，争吵不休的共产党总部坚持走“城市道路”夺取政权，与此同时，1927年被军阀和国民党赶出城市的毛泽东等人坚持走“农村道路”。在上海的共产党迫于形势不得不转入地下，他们竭力反对毛的游击战争，而拜倒在莫斯科的脚下。尽管如此，在上海就象在青岛一样，共产党对文艺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说这些影响大多只是间接的话。

一位19岁的少女到上海碰运气，和这座城市一样，她既没有过去留下的沉重负担，也不考虑遥远的未来，她只关心当前，只关心当前能得到什么。她是一名左派，就目前来说，城市道路最适合于她，因为她分不清小米和高粱，也辨不出骡子和水牛。她年轻，有精力，她希望能成为一名演员，如果单纯凭借自己的能力不行的话，她希望借助于别人取得成功。所有这些，

对一位出身低微的女人来说，也就更加困难，从某种程度上说，无异于妓女的弃恶从良*。

与云鹤同一年开始电影演员生涯的康健回忆说：“一眼就能发现她土里土气的。云鹤是一位很俭朴的女孩子，特别是在服装上。但是她很迷人，有一双细长的腿。”

康健很有表演才能，也很成功。她从南京来到上海，因为有时与云鹤争风吃醋，所以对她的看法也是复杂的。“云鹤作为一名戏剧演员还不错，但是不太适于上镜头：下颌凸出，牙齿外露，我从南京来，都不能适应上海人的世故和狡猾，李云鹤初来乍到，更是如此。如果你没有‘上海化’，人们会劝告你，必须首先‘上海化’才能登上明星的宝座。”

一开始，上海的妇女使云鹤感到震惊。在北方人看来，即使在云鹤这样约束很少的人看来，上海的女人傲慢、饶舌、卖弄风骚、服饰华丽、行为做作。看到上海女人在街上边吵边打，听到南京路上的妓女高声招徕嫖客，象报童卖报一样，云鹤感到吃惊。云鹤并不认为自己是弱不禁风的墙头草，她感到，自己虽然在山东属于激进分子，但是在上海，可能属于落伍者。

对年轻的女性来说，上海是自由的地方。姑娘们崇拜的电影明星是梅·韦斯特，她们争先恐后地看这位电影明星主演的电影。而在中国乡下，女人被看作奴隶。然而，人们常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迅疾的变迁已经带来混乱和无序。

二十年代，女权运动在中国城市很快地发展，妇女向男人的统治地位挑战，发誓永不结婚，支持女性的叛逆者如韩英，她鼓励仇恨整个制度，她认为所有的男人都是妇女运动的敌人。比

* 据当时颇有影响的《申报》报道，1934年，上海每130人中就有一名妓女。与之相比，伦敦是960：1，柏林是580：1，芝加哥是430：1。

云鹤大 15—20 岁的妇女已经形成了她们自己的对男人、对婚姻和对工作的态度，这种态度与云鹤相去甚远。

三十年代，妇女运动被新的浪潮所左右，这是激进的政治浪潮（“主要的敌人不是男人而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至少在上海是如此。同时，因为突然出现了“梅·韦斯特现象”，运动有所缓和。西方解放型妇女的形象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她们可以干自己的事，有时开男人的玩笑，既不把男人看作是自己的老板也不看作是自己的敌人。裤子、发髻和男性化的行为方式让位于旗袍、长发和高跟鞋。

作为三十年代的年轻女性，云鹤对“梅·韦斯特现象”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与前一代妇女不同，她接受过一些现代教育，她的生活也没有被“钉死在婚姻上”，因此，她没有直接感受到封建压迫的残酷。她不恨男人，她怀着一颗开放的心灵，没有任何约束地来到上海，她只想养活自己，只想追求自己喜欢的戏剧。

然而，在“开放的三十年代”，作为女人，云鹤也在严肃地考虑自己的出路。上海是一块宝地，但是与中国的其他地方并不是相互隔绝的。能够独立生活当然是件好事，但是上海的社会和经济情况相当复杂，其居民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有很大悬殊。年轻的女性希望过“自由的”生活，但是她们处处遇到大男子主义的困扰。特别是作为一名女演员，简直是在“明星”（人们崇拜的人物）和“玩物”（老板或导演的玩物）之间走钢丝。谁能保证不要男人的扶持呢？*

* 林语堂在其 1935 年的文章中曾揭露过这种矛盾的心理：“今天，百货商店的女售货员依然带着羡慕的眼光瞧那些挎着鼓鼓的小包的已婚妇女。她们希望自己是买东西而不是卖东西。有时，她们也想能坐下来为自己的孩子织件毛衣而不是站在这里算帐，一站几个小时，对穿高跟鞋的姑娘来说，确实够累的。她们自然知道哪条路好，有些人也情愿独立，但是，在男人统治的社会里，这种所谓的独立又有多大意义呢？”

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云鹤与史东山共进晚餐。这位三十多岁的导演兼剧作家，自1921年起就活跃在上海的戏剧界。他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在左翼文化圈子里很活跃。

在购物天堂南京路，他们走进大顺百货商店。在宽敞的餐厅里，他们坐在棕色小桌旁，一位经验丰富的导演和一位颇有前途的新手谈左翼剧联及其性质。剧联联系了艺术、政治等各方面的人士，在上海文化界的左翼人士中有的同情，有的仇恨。云鹤对这一联盟很感兴趣。

他们以中国的方式吃着西餐，边吃边谈。他们谈到田汉，这位曾留学日本的剧作家，是《湖上惨事》的作者，云鹤在实验剧院时扮演过其中的女英雄角色，那是令人难忘的夜晚，她当时的老师王泊生和吴瑞燕都是田汉的同路人和崇拜者。当他们走出大顺商店来到繁华的南京路，云鹤真是眼界大开，她当时已经决定要见见田汉。

田汉是一位才华横溢而且固执己见的剧作家，在当时上海的戏剧界，他算是老者，而且已经享有较高的声誉。他生活得很浪漫，他说：“喝酒，听音乐，摄影，是男人的三大娱乐。”同时，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田汉的家当时在虹口区中国书店对面，云鹤在他宽敞的家里呆了好几天，这样，田汉的朋友就可能发现她的才能。但是，田汉对她不感什么兴趣。他很忙，有时他的一个剧本要举行首场演出了，演出开始前他还在修改这个剧的第三稿，所以，他让他的弟弟照顾云鹤。

后来，云鹤可以与田汉平起平坐了，这要感谢她未来的丈夫，但是现在，她不得不想方设法靠近上海的左翼戏剧界。她凭借着勇气、韧性和魅力，企图钻进这个世界。

当时，她并没有象她后来讲的那样“一心一意地寻找党”，“与党联系”。1927—1930年的大灾难，已经使中国共产党元气

大伤，作为这一组织中的一员，与这一组织同样处于危险的境地。三十年代早期，愿意参加共产党的人很少，象云鹤这样的人更是如此。自从失去了俞启威，她为共产党工作的热情开始迅速下降。

从田汉这一边来说，还是小心为好，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使共产党在接收新成员时十分谨慎，以免特务钻进这一阵营。作为演员，云鹤可以在戏剧界为党工作，但是不适于吸收进党的队伍。

在云鹤看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其艺术追求和个人目的都没有必要。她对共产党的同情依然存在，这还是因为结识俞启威而产生的。但是在上海，她最关心的还是演戏，结识象样的男人，探索城市生活的道路，党员问题已退避三舍。

云鹤的政治气质依然存在，她希望自己能象投入戏剧那样投入到政治中去。她认为这在当时是有必要的，她也乐于在这方面有所表现，如果田汉不能确定她是否可靠，她可以把她的斗争精神表现得不容置疑，这样，田汉就不得不把她拉上共产党这条船。

他们日夜排练，到街头巷尾散发反政府传单，在临时搭起的简易的舞台上演出，一个个累得精疲力尽，而且要冒生命危险。在虹口的咖啡馆里，云鹤与其他艺术家们热情地争论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她到上海大学旁听，她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各种爱国戏剧活动。他们很少睡觉，热烈的争论过后常常是大伙儿睡在一起，这在上海戏剧界很普遍。

上海的戏剧界是一个朦胧而诱人的池塘，作为一名新手，云鹤只是这个池塘中的一条小鱼。在她看来，大鱼们常常高傲地游来游去，稍在其次的鱼则寻找机会欺侮她或是耍弄她（在这个戏剧加政治的世界里，嫉妒和仇视使她很少与女性建立或保

持友谊)。她认为自己一直被压在肮脏的池塘底，做一些庸俗的事务性工作，与众人瞩目的大鱼相去甚远，更没有机会跃出水面翻起朵朵浪花，哪怕是一点点涟漪，以引起池塘边众人的敬羨。

云鹤在 1933—1934 年间的政治活动是以共青团员的身份进行的。她的领导是徐一冰，一位爽直的、讲话嘶哑、脸上有颗黑痣的妇女。云鹤叫她“徐大姐”，徐发现自己的新下属很有意思也很轻浮，二人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是不时发生摩擦。

1933 年秋，云鹤到一家为工农妇女开办的补习夜校讲课，这可能就是徐大姐和共青团员安排的，而不象是田汉或其他左翼文化界知名人士的作用。这所学校得到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的支持，当时的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在上海的小沙渡路一幢漂亮的英式洋房里。这一工作低贱、粗俗，与云鹤热爱的戏剧风牛马不相及。

她教识字，一天要上两节课。学员大多是轮班职工，商店里的营业员、裁缝，还有袜厂、棉纺厂和烟厂的工人。这些女学员衣着不整，语言粗俗，浑身散发着臭味，劳动一天下来已是精疲力竭，所以很难教。

一位来自上海卷烟厂的女学员回忆说：“我们的唱歌课没有人教，夜校的徐老师请党组织给予帮助，后来李云鹤就来教我们唱歌课。她一周来两次，而且一直很准时。她常常是自己拉二胡，教我们一些新歌，她唱得很美，音域很宽。”

云鹤斗争着。她不认为自己也是无产者——和这些女学员一样，而她所从事的共产主义事业却把这些妇女看作是自己事业的脊梁。她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少女！舞台上明亮的灯光召唤着她！

她不穿她的学生那样的工人服装，而是穿中产阶级的妇女

常穿的西式衣服或是打扮成上海知识女性的模样。她自己住一个房间，在学校的后边，而学员则是好几个人挤在一屋，住在学校的前边。

在钱的问题上，云鹤虽不是身无分文，却也常常捉襟见肘。她从家里得不到资助，这对一个 19 岁的少女来说是不多见的。但是她从夜校可以有点儿收入，另外在其他地方讲课也可赚点钱，这是按时间付给报酬的。很显然，她与费先生离婚得到的钱还有剩余，另外还有在青岛大学攒下的积蓄。

有时她去剧场看戏，回来时连买车票的几分钱都没有，因为她常常是一时冲动买上等座票，其实她完全可以坐次等的座位，这样只需花六分之一的钱。一年以后，云鹤离开了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办的夜校。有一次，她的室友、在别人家做女佣的阿桂偷了一碗米饭和一只鸡蛋给她吃，而就在这前一天，云鹤刚买了一件蓝色镶白边的丝绸旗袍。云鹤租了一家小阁楼住下，有一个月，她没有钱交房租，不得不把情人送作纪念品的表典当后去还帐。剩下的钱，她去了一家饭店，挥霍得一千二净。她坐在靠窗的桌子边，一边炫耀自己的“富有”，一边欣赏街上的人群。

和在青岛一样，云鹤和一些政治人物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金钱交易，外人谁也搞不明白。离开田汉家后，她又来到左翼剧联的另一成员廖沫沙的家里住了一段时间。

虽然说她的政治信仰很模糊，但是云鹤还是抱有革命的理想主义，而且愿冒政治风险。曾经有一段时间，她作为业余工作人员，参加了送知识下乡的活动，这是没有报酬的。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是陶行知教授，一位善良的、坚持做好事的人，运动继承了苏联知识分子“走向人民”的传统。在做完其他的活后，已经很疲劳了，但是云鹤还是来到他的办公室，帮助整理

文件，收发信件，做旅行安排。这给她的一些朋友，包括她未来的丈夫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天晚上，她参加了《杀害婴儿的凶手》一剧的演出，慰问罢工的烟厂工人。这是一出伸张社会正义的话剧，云鹤在剧中扮演的是受尽折磨而勇敢斗争的女工。整个下午，上海都在大逮捕，逮捕英美烟草公司的罢工工人。晚上，罢工仍在进行。在她化装准备登台的时候，云鹤感到了演戏的激动，也感到了这一行为的危险，她认为演戏也是政治。每个人都知道，国际租界的印度锡克教警察会突然冲击剧场，逮捕演员和观众。她演得很好，因为她受形势的鼓舞，同时也要找机会证明自己的胆量。演出结束后，演员和观众走出剧场，加入到游行的行列中去。云鹤精疲力尽，虽饥肠辘辘却异常激动。

国民党政府认为，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反政府的演出都是违法行为。他们把这与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同等看待，认为都是危险的。云鹤这位天真的少女，常常意识不到自己行动的危险。不过，她慢慢地学会了欺骗，也学会了辨别。在三十年代初的上海，这是左翼知识分子必不可少的。

与朋友一起或自己单独带着机密文件外出乘电车或公共汽车，一旦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盯梢，她知道怎么镇定自若地溜下车来，甩掉盯梢。如果这种遭遇不可避免，她会谦恭有礼地迷惑盯住自己的警察。危急时刻，她还会发出绝望般的呼喊，使警察大吃一惊或尴尬无奈。

云鹤成为一名涉足政治风云的演员。她当教师是为了把两种目的同样对待，看样子她们很欣赏自己的做法。她在本质上还是诚实的，如果她追求的是舒适享乐的生活，她完全可以找一个商人，做他的姨太太。然而，危险时代的戏剧对她更有诱惑力，朦胧地投入某种事业的感觉比这一事业本身更吸引她。这

种左翼政治对许多人是生死攸关的事业，对中国的未来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但是对云鹤来说，这只是一种自我表现，她希望借此赢得自己在社会上的一席之地。

在上海时期，和在她以前的生活中一样，云鹤搞不清楚什么是“政治迫害”，什么是个人恩怨，而是把二者混淆为一。她努力投入共产主义事业，但是她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某些小错误，突然闯进来一个不受欢迎的男人指责她；她不知道她在夜校的学生的悲惨遭遇是因为国民党的镇压；她不知道在革命斗争爆发之前，左翼阵营内部会出现敌对势力或不同意见；她不知道自己会招致一批导演、演员、编辑的追逐。

这就是李云鹤。电影女演员康健回忆说：“她当时的思想很不成熟，她也不知道那么多，但是她能使事情富于戏剧性。”

一位当时就认识她的男艺术家回忆说：“如果她来吃晚饭，那么她离开以后，主人肯定会和他的妻子吵一架。”

1933年秋，云鹤离开上海来到北京，她想到北京见见世面。很难说清此行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是她对自己在上海的工作感到厌倦，可能是她不满意自己较低的社会地位，可能是因为她与男人的瓜葛纠纷，也可能是十月的冷风使她再也不能在夜校的住所呆下去。

她在这座北方城市呆了几个月，没有参加什么戏剧演出。她在北京大学作过逗留，去旁听了一些社会科学的课——这倒不是因为她的兴趣在此或是想在这一领域作一些严肃的研究。她的目的是想与她在青岛时的恋人俞启威取得联系，俞现在是北京大学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主要人物。很显然，她认为俞启威能帮助她在上海找到一个更好的立足点。她需要进入高层文化界，而俞在青岛曾帮助过她。

如果说云鹤还希望与俞启威恢复婚姻关系的话，这一点没有做到。如果说她希望得到一份工作的话，也没有实现。她靠每月七块钱的补贴生活，这可能是俞启威安排的。她住在很简陋的一个小屋里，每月除了付房租外，每顿饭只能用几分钱来应付。在北京呆了整个冬天，她没有明确的目的，也没有得到什么。她在济南实验剧院时的几个同学现在在北京的剧团工作，她曾与他们有过联系。但是她还是无事可做。她与俞启威的感情之火已经熄灭，而且不可能复燃。

据一位可靠人士说，云鹤在北京时曾与启威同居并怀孕（以流产告终），后来又与他吵得很凶。不管怎么说，这种关系没有恢复。

1934年早期，云鹤乘火车回到上海，等待着她的有新的机遇，也有新的风险。俞启威虽然不愿意恢复这种罗曼蒂克的关系，他还是给他在上海的同志写了信介绍云鹤。再说，他家在上海的关系比在山东更广泛，这对云鹤也会有所帮助。

1934年后期，云鹤陷入了困境。俞启威在上海的关系为她提供了新的立足点，然而，在左翼政治的圈子里，她显得很幼稚，特别是因为她的好冲动，常常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她在青岛时的一位老朋友现在也在上海，最麻烦的是云鹤遇上了这位年轻英俊的青年。他与云鹤联系是处于多种动机，当时他是上海某邮局的现金出纳，这位青岛小伙在大街上邂逅云鹤，不久就要求云鹤帮助他加入“进步”事业的行列，还邀请她共进晚餐，到兆丰公园散步。

云鹤频繁地与这位漂亮青年约会，还从他那里借过激进杂志《世界知识》。和以往一样，这位热情好奇的年轻女人又尝到了被人追求的喜悦。

一天晚上，与“老朋友”约会后，两位便衣国民党警察便

逮捕了她，把她送到警察局。她带的一本《世界知识》使问题更加复杂，警察要她当晚就离开上海。云鹤并不感到害怕，她气愤的是自己竟落入这班畜牲之手。她被关在二楼一间女监室里。

云鹤在济南时的同班同学王庭书，现在在上海的一家演出公司工作。有一天，他来到警察局，他回忆说：“很多戏剧界人士都是左翼分子，我的一位朋友被关进了警察局，我到那里去看他。”

王走进这座灰色的楼房，这里即使在夜间也被电灯照得雪亮。正巧，接待室的一位职员是王的熟人，也来自山东。他告诉王：“昨天晚上，我们刚关进来一位山东小姐。”王说：“当时我马上就意识到，这位山东小姐肯定是李云鹤。”他不久就证实了自己的判断。

王庭书盯着阴暗的走廊。他回忆说：“我生怕与云鹤联系，我知道她是左翼分子。自从她离开济南到了青岛，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她就加入了共产党。我不敢与她联系，那是很危险的。”王很想看看他的老朋友，但是那要经过女监门口。王解释说：“我怕云鹤会认出我来，一旦这样，她肯定会叫我的名字，云鹤就是这种人。那么，整个警察局都会盯住我、怀疑我。”王悄无声息地走出了警察局，他谁也没有看。

云鹤自己的解释增加了这一事件的戏剧性效果，可能她是想借此掩饰自己的恐惧和愤怒，也可能是想炫耀一下自己对警察的影响。她争辩道，那晚她并没有认真地梳妆打扮，警察押着她走到市郊，突然发现她“穿着漂亮的天鹅绒制作的中式旗袍”，显然，这种服装很适合于做这种旅行。

她脱下了自己的西服，穿上丝绒睡衣，穿上一件毛衣背心，然后把西装套在外边。她这样做产生了效果，使她得以从警察

手中逃脱。在朦胧的夜色中，她走向郊区的菜地。

可能警察并没有把云鹤看作是问题严重的革命者。但是，云鹤怕后人认为她不是受迫害的共产党员，于是添枝加叶地渲染这件事，以致让人无法相信。她说，在漆黑的晚上，当她走向郊外时，她把“从党组织领到的秘密申请表格”从内衣藏到背心里（通过广泛的职证研究，1934年，上海的共产党组织还没有这种申请表格，而且任何党员或党的追随者都不允许携带能表现自己身份的文件）。

在她往西走的时候，不止一个陌生的男人企图“拦截”她，所以，她坐在稻田里把党的文件吃了下去，走不多远，她又被国民党的便衣警察绑架了（也就是当晚放她走的那些人）。不管云鹤的回忆有几分真实性，1934年10月，她确实进过监狱。她因为与国民党认为的所谓危险分子们有各种联系而受到怀疑。在铁栅牢房里，她对同监的狱友和看守人员说：“你们应该追求真正的共产主义。”可能这带有几分夸张，但是与真理一致。得到的反应是令人失望的，对云鹤来说，仍得继续呆在监狱。

曾是云鹤的夜校学生的一位烟厂工人回忆说：“她突然不来了，一天，徐老师来了，脸色很难看，她告诉我们，李老师被捕了。……我们大家凑了一点钱，买了饼干和其他食品以及一些日常用品，我们请求徐老师转交给李老师，以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慰问。”

云鹤回忆说，她在监狱的几个月受尽了折磨和男人的压迫，最终还是战胜了他们。她的月经停止了，一到下午就发烧，一个看守粗暴地打她耳光，另一名看守象对待其他女犯一样用鞭子抽打她。但是，云鹤还是唱京剧中的唱段（这会不会使看守们相信她不是共产党员），她教给其他女犯怎样对付看守的审问，同时还能收到党组织送给她的面包等礼物（她还一直没有

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你们为什么不毙了我?”她以此作为反抗。1935年春,在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的一位外国官员来到警察局,他担保云鹤是无辜的,云鹤才被放了出来。

关于云鹤的“三个月”的监狱生活,还有另外一种看法,即认为她并不是一位英雄,这一点可能较接近事实。还认为她被审常常取胜,这不是因为她有精明的政治斗争手腕,而是利用了她女性的魅力,她的最终被释放是因为她供认了。

据中国关于当时的资料记载,她与看守们聊天,陪他们喝酒,给他们看她的舞台照片。她给他们唱自己拿手的京剧选段,这倒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左翼分子,而是想借此引诱看守们以便得到宽大的对待。接受讯问时,她与看守聊天。慢慢地,她被看守争取了过去,因为他们说她“年轻漂亮”、“正处在金色的年华”,如果她承认共产主义是愚蠢的,同时宣布自己坚定地信仰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她就会被释放。结果,她写了一份自首书后,于1934年初被释放。

一位当时曾做过她的看守的人回忆说:“我去告诉她,你的案由很简单,只要改变一下观点,一切都还是很美好的。”这位看守很自豪的是,他当时并没有象其他看守一样拷打她,而是亲切地给她讲道理。“每次谈话她都是一副可怜相,我对她说,只要她不再信仰共产党,一切都会得到原谅。不久,她就写了一份自首书。”

云鹤自己对这段经历的回忆是添枝加叶的,但是有些的确是真实的,她受到剥夺、侮辱和不公正的待遇。如果在这期间她的月经停止了,说明她的身体之虚弱,体重也有所减轻。她忍受了一些痛苦的折磨,她没有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也不能确知外边的政治形势如何,以及党组织对她是什么态度。监内的云鹤和以往一样,仍然努力试图把她的冲动和外部发生

的事结合起来。

还在监内受审的时候，云鹤曾问一位同室的女犯，释放后，谁能向党组织作证，说她的“真实身份没有被发现”。这说明，云鹤自己对此也不清楚。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云鹤感到迷惑不解。她朦胧地觉得，自己应该算是一个，因为她有时代的民族的感情和对下层贫民的同情。她认为，总是回忆过去或者用苏区的标准衡量上海的事情是不公正的。在上海，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宣传性的组织，而在毛的江西苏区，共产党才是一个政治的和军事的组织。上海的斗争主要在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到底哪一个更具有战斗性呢？

一个日本进步作家代表团访问上海，上海戏剧界的一些左翼人士会见了他们，云鹤也在其中。一位日本作家回忆说：“她显得单薄，举止优雅，但是可以看出，她的内心有某些坚强的东西。”临别时，中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每人写一张纸条送给日本代表团，让他们带回国内散发，云鹤写的是：“请停止侮辱中国的举动。”

不管与国民党达成了什么样的妥协，自从被释放出来后，她不再象以前那样冒风险，对政治也不再象以前那样关心。她的主要兴趣已有所转移，从公共事务转移到个人问题，从政治组织转移到了表演艺术。她的理想主义依然存在，但是，表现这种理想的方法变得更精明，也更慎重了。

在那种时代，左翼政治有自己的一套联系网络，大多数是垂直的单线联系，有严格的纪律和约束，很少有横向联系，相互联系的双方也必须时常对对方保持警惕。一位同志如果被派去会见另一位同志，他要通过一些精心设计的信号去识别他或她——上衣的某一个或两个钮扣没有扣上，左手拿一顶草帽而

且草帽向一定的角度——从事这种活动要小心谨慎、鬼鬼祟祟，有时还要妄自尊大。

这是一个没有友谊的世界，云鹤发现了它的寒冷，在她所希望的生活和工作中，除了较少的危险外，还要有更多的情感满足。

她没有回到她在夜校的住所中去，很多政治活动家都知道她在那里的住处。她到了法租界，与一位戏剧界的朋友住在一起。作为一个崭新的开端，为了重塑自己的形象，她为自己取了另外一个名字：蓝苹，意思是“蓝色的苹果”。

她以前的老师万籟天，认为“云鹤”（“云中之鹤”）不符合她热情奔放的性格特点，它不仅含有被动和退隐的意思，还有道教的色彩。现在，应该是埋葬云鹤而成为一个更有个性的人物的时候了。

她也曾考虑过还用以前的名字：淑蒙。但是她的朋友对她说，这个名字太俗气，不适于上海这种地方。她还想过用“懋”，这个字可以体现出她的家庭背景，后来还是打消了这个主意，因为这个字写起来太麻烦（“懋”一字有二十二画）。

她最后选定了“蓝”字作为自己的姓，这是因为，一来可以使她想起“懋”，还有一个原因是她比较喜欢蓝色（特别是在服装上）。她之所以又选定了一个“苹”，可能是她想起了或是想记住她的家乡山东烟台，这里盛产美味的苹果。这样，蓝苹就诞生了，她当时20岁。

洪深是一位著名的制片人，他曾在美国学习深造，是俞启威的姐姐俞珊的好朋友。有一天，洪深对崔万秋说：“你应该见见她。她刚来不久，和你一样，也是山东人。她在青岛时曾听过我的课，很有才华。”崔万秋当时是上海文艺界的知名人物，

精明、漂亮。他与洪深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来到法租界一幢破旧失修的礼堂，蓝苹正在这里排练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崔看到的是一位身材修长的少女，穿着深蓝色的旗袍，头发梳成刘海型。他回忆说：“看上去她还带有一点儿土气，不象上海人。”洪深打手势让蓝苹到这儿来一下，蓝苹马上跑了过来，脸上带着羞涩的笑，一手还拿着剧本。“这位是崔先生，《大晚报》的编辑，也是你的大老乡。”

“哦，我拜读过您的文章，还有您的书。”蓝苹很尊敬地说。崔万秋发现，经过舞台训练，她已能讲比较纯正的官话了，虽然偶尔还带点山东口音，例如在谈到她的家乡诸城时。“我还是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就知道您的大名了。”

“预祝你成功。”崔说。他为洪深的这位年轻的学生和朋友的魅力和谦恭所吸引。

蓝苹甜甜地说：“这场演出过后，我想去拜访崔先生，当面向您请教，我们还可以聊聊家乡的事。”

崔回答说：“谈不上向我学习，随时欢迎你到我家里来聊天。”

后来，蓝苹和一位朋友谈到这次引见时，说：“见到他，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再说，他长得也很帅。”

崔万秋回忆说：“从一开始，她严肃的态度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别人都在休息或聊天，她却在背自己的那部分台词。”对于她的外貌长相，这位喜欢在女人中间厮混的崔先生回忆说：“不能说她很美，但是她细长的身材，瘦削的面孔，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小巧的红嘴唇，精干的气质，使人一望可知，这是一位可爱的女孩。”引用中国古代形容美女的一句话是“明眸皓齿”，但是崔先生不完全同意这样形容她。“明眸倒是，但是不

能说是皓齿，我发现她前边的一颗牙齿是黄色的。”*

洪深和崔万秋在台下看排练，洪对崔说：“你也是山东人，你要帮帮她，给她捧捧场。”崔回答说，他很高兴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她，通过他的报纸和其他途径。洪总结说：“她很有希望，也很有性格。”

导演章泯指示演出开始，蓝苹扮演的是娜拉，一位有反叛精神的人物。

左翼剧联是一个内容庞杂的组织，其主要成员都是有某种政治倾向的艺术界人士。包括上海的一些知名人士、生活豪放不羁的艺术家、民族主义者、浪漫的年轻人（实际上，这些人与蓝苹有生活或工作上的联系），还有共产党员和信仰共产主义思想的人。

我们常常认为，“革命者”与“个人主义者”是不相容的，但是蓝苹却希望自己两者兼得。她对戏剧艺术和政治目标的界限的认识是很模糊的。

蓝苹的生活方式不能说反复无常，特别是她在上海四年生活的后半期，这对一个企图爬上艺术阶梯的女演员来说是不同寻常的。很多导演希望自己的女演员到处乱搞男女关系。蓝苹深知这一点，在这一圈子里的其他很多人也知道这一点，同事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发脾气、婚外恋、泪水和拳头交织的夜晚——这些都是女演员演戏能力的充分体现，把生活和演戏混为一谈，这正证明了一个人对艺术的理解力，蓝苹就经常这样。

戏剧界和体育界的人士常常联姻成婚，现在在中国依然如此。蓝苹也不例外，她遇上了一位姓李的足球明星。他们住在

* 据蓝苹说，这颗牙齿是被她父亲打掉的，当时她父亲打她母亲，她在一旁劝架，被父亲打掉了这颗牙齿。

法租界的同一条街上，而且相距不远。

李回忆说：“每次我在逸园或其他体育场比赛，她都会前往，并为我鼓劲。”在他的记忆中，蓝苹是一位很会卖弄风情的少女，中等身材，相当苗条，在社交场合很善于表现自己。一个是演员，一个是足球运动员，正如他的朋友所说：“英雄配美人儿。”

他们的会面短促、简单，常常是相对而言，而且从未私下里约会。直到有一天，他们同时被邀请到北丰公园参加一个招待会。他们坐在一起，没等到丰盛的宴会结束，他们就偷偷地溜了出来，走到金刚路的一家电影院。这是一家很有名气的电影院，来这里看电影的观众多是成双成对，一边欣赏电影，一边卿卿我我，他们坐在影院的最后一排，欣赏明星公司的《美人之心》，这部电影的主角是美丽迷人的胡蝶和英俊潇洒的顾迈君。

后来，李先生到了香港，他回忆说：“一到撩人的场面，她总是转过头来，用奇怪而深情的眼光看着我。有关性的镜头出现时她就会往我身上靠靠。”

蓝苹试图得到这位足球明星，但是她错误地估计了男人的进攻性。李说：“不管怎么说，我总是有一个有经验的男人。一个女孩子对性的好奇心，不会轻易打动我。对她浪漫的引诱，我没有什反应。”

“可能你不太在意吧？”蓝苹的提问带着温柔的责怪。

“不，不！”李轻声地回答，“我被电影和胡蝶的高超技巧迷住了。”过了一会儿，李叫道：“太棒了。”胡蝶的精明演技赢得了很多中国观众，当时，观众常常这样评价她的演出。

蓝苹“温柔的玉臂”轻轻地搂住了李粗壮的腰，她想在电影结束灯光重亮之前撩起李的某种欲望。

一会儿，电影散场了，观众涌向南京路，有的人睡眼朦胧，

有的人热烈地讨论着。李说：“到这个时候，我已深知她的意图。”他了解蓝苹。她年轻，刚到上海，又想出台，甚至有些不择手段地利用一切机会。

即使对一个足球明星，她的野心和表现癖也表现得赤裸裸。“好一个冒险家。”李感到惊讶，也有点迷惑不解。

夜幕降临时，南京路上的霓虹灯闪烁着迷人的色彩。蓝苹和李先生走进一家饭店。他们坐在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吃着米饭和鱼，又要了几杯红葡萄酒。

等到天色全部暗下来时，他们已经在惠中饭店四楼的一个房间里，华丽的吊灯散发出昏暗柔和的光，房间很舒服，而且有一个很大的盥洗室。这里很安静，南京路上嘈杂的声音显得很遥远，“这里的一切条件和气氛特别适合于做爱。”李评价说，语调带着典型的中国实用主义的味道。

“我刚刚关上门，坐在沙发上，她就激动地搂着我，一边说着热情的话语，一边吻我。”

蓝苹的双手搂住李的脖子，情不自禁的热吻，一边问：“这个星期还有比赛吗？”她象个孩子爬在父母的身上，为李脱去背心。“你们要和哪个队比赛？”她开始有些急不可待。

“这个星期没有比赛，但是我要到苏州去一趟（李的老家）。”

蓝有些失望地说：“那我要好长时间见不到你了？”

“只一周的时间，会很快过去的，我下个星期天还有比赛。”

蓝热情地说：“我喜欢你比赛的冲劲，特别是射门的技巧。”她急促地说着，脸变得通红，浑身发烫……

不管怎么说，蓝苹在这位足球明星的记忆中刻下了自己的烙印。他在香港回忆说：“至今三十年已经过去了，但是那晚的情景我不会忘记，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蓝苹扮演《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与她搭档的赵丹后来成为中共文化界的著名人物，这次演出是她走向成功的突破点。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情节松散，但是很有影响，其主题是描写娜拉的觉醒、反抗，最终摆脱婚姻家庭琐事的羁绊，离家出走，她的丈夫托瓦尔德·海尔默是一位律师。还在济南实验剧院的时候，蓝苹就很喜欢这个剧，这一次，在长达两个月的排练中，她每天都花好长的时间用功练习。“我全身心地进入角色”，她说。

在金城剧场的首场演出，观众爆满，上海戏剧界的所有头面人物都来了，包括蓝苹的“靠山”史东山，还有许多著名的戏剧评论家，其中有《大公报》潇洒英俊的记者唐纳。他看了演出，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演出结束后，观众的热情达到了极点，蓝苹通过娜拉的口，对中国的传统道德提出了挑战。她看到了自己成为“女性叛逆者”的希望（这个词是她自己说的。后来，她在吹嘘自己的演技时说，她的娜拉已远远地超出了易卜生原来的想法）。

蓝苹很善于捕捉机会，她在写给费先生的一封信中说：“我们都必须完全自由，瞧，这里就有过去的你。我也要自由。”她敢于表达自己对男导演的憎恶。“我一直在为你演戏，托瓦尔德。”

蓝苹就是娜拉，在她以后的生活中，她有很多地方继承了娜拉的习惯，不管是高兴的时候或是莫名其妙发火的时候。

《玩偶之家》演了两个月，这在当时的左翼戏剧界是少有的，蓝苹的演技得到很多的赞誉。

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写道：“蓝苹小姐使我们第一次认识了真正的娜拉。她哭的时候，大家都感到难过，她笑的时候，每个

人都感到高兴。”

另一位不属于左翼派别的著名评论家后来写道：“在上海的戏剧界，1935年是娜拉之年。”

崔万秋回忆说：“娜拉使她名声大振。你知道，那是很激动人心的，她演的娜拉是一个极端叛逆者的形象。”崔脸上带着很勉强的笑容，他喜欢蓝苹，但是不喜欢她的政治。“对她来说，她认为这就是革命。”

人们通过娜拉，也看到了蓝苹本人的性格特征，崔万秋在看完演出走出剧院时对一位朋友说：“这位年轻的明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妻子，谁娶她谁倒霉。”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对一位爱上了蓝苹的年轻人又重复了这句话——这位年轻的评论家也观看了《玩偶之家》的首场演出，崔劝告他不要娶这样的“年轻有才的叛逆者”，因为她是一位“不称职的妻子”。

崔走到他在《大晚报》的办公室，准备发一系列评价蓝苹和她演出的文章。一连几天，报上都发表了赞赏文章。蓝苹对这种评价是不是很感激？多年以后，一位来访者用英语问崔万秋，崔淡然一笑：“你用的词太好了。”他美丽的妻子张君慧对客人说：“不要再谈它了。”

《玩偶之家》的导演章泯才华横溢，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忠实信徒。蓝苹的表演以及蓝苹本人都给他以很深的印象。当初是洪深的介绍才使章泯注意到她，章没有选那些优秀的有些是很有才气的演员，而是选中了名不见经传的蓝苹扮演娜拉，从现在起，章泯准备更多地注意洪深发现的这位山东才女。

在一片赞扬喝彩声中，有人发表了不同意见。这在蓝苹生活中是很正常的，这就是作家兼导演的张庚，他对蓝苹扮演的娜拉从演技到演员都提出了批评。

张庚，这位自信而老练的作家兼导演，从1933年起就是蓝

苹的老板，“她是我们的女孩，不要碰她。”他认为这位来自山东的姑娘应该被自己独自占有，蓝苹对他把自己看作私有财产很是恼火，她想办法不让他接近她，晚上排练结束或参加完政治性的会议，她总是拒绝张庾要送她回家的请求，张对这位小演员的抵抗精神感到惊讶，看起来到了无戏可唱的地步了。张庾突然宣布自己要娶她，企图以快刀斩乱麻的策略把她弄到手，结果，遭到她直截了当的拒绝。在这一段日子里，蓝苹不断地拒绝各式各样的求婚，而她的朋友——足球运动员李则连续获奖。

一年以后，这位出色的导演和批评家盯着蓝苹扮演的娜拉像，他感到这种演出很粗糙，过分自信，而且带有令人不快的叛逆性，他慢慢吞吞地断言：“绝对的自然主义。”*

第二个贬低蓝苹的人是吴涓，她是当时较有名的艺术家，在争演娜拉这一角色中败在蓝苹手下。这位漂亮的女演员一脸怒气地说：“她是个母老虎，从头至尾对章泯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吴涓当时是田汉“南国剧社”的成员，导演章泯安排她在《玩偶之家》中扮演娜拉的女邻居，这是一个小角色，她为此对章泯很有意见，她拒绝参加排练，直到临近首场演出的时候，经过一些朋友苦口婆心的劝说，她才放下架子，屈尊登台，为蓝苹的娜拉作陪衬，蓝苹又树立一个敌人。**

对于有些人的批评，蓝苹可以为了政治和艺术上的进步，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自己取得的地位。对于女人的忌恨，她会永远记在心中。不管怎么说，蓝苹的娜拉成了她走进电影界的入场券，而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

* 几十年后，蓝苹把当时的一切个人思想都深涂上政治色彩。她说，当时张庾到处造谣说她是托派分子（这在当时是要命的，并企图把她驱逐出左翼剧联）。

** 二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吴涓的家被红卫兵彻底搜查五、六次。

《玩偶之家》的演出成功，加上史东山的鼎力相助，不久，蓝苹与电通公司签订了三个月的合同，每月工资 25 元。史东山之所以竭力帮忙，一是为了青岛的两位朋友，另外，他也欣赏蓝苹。

电通公司是一家左翼影片制作公司，共产党在这里的影响很大。它所生产的影片成本很小但是生动活泼，很受观众欢迎，其主题大都是努力唤起民众的社会意识和爱国思想。

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曾经指出：“电通与其他商业性公司如明星公司的不同之处在于，电通是一家新成立的公司，没有什么经济资助，因而经费拮据。这是一家由艺术家自己创办并主持的公司，它的宗旨是服务社会。”电通的影片都是“知识影片”，喜欢明星公司的“奶油小生”影片的人不欣赏通俗影片。“你知道，蓝苹不是一位普通的演员。”她的一位年轻同行苏菲说。苏菲后来长期为共产党工作。“蓝苹在电通公司工作时，生活很简朴，性格直率也很严肃。她不象明星公司的女演员那样擦胭脂、涂口红、打眼影。”康健回忆说，她当时在明星公司工作，每月薪金 70 元，几乎是蓝苹的三倍。

为了获得一个固定的职业，蓝苹还要不停地奋斗，但是很多人已经知道她是一名“进步”的演员，她在电通公司呆了有一年，从 1935 年春天，到 1936 年春天。到电通公司的前几个月，分配给她的工作是低贱的——缝补演出用的服装或是帮助拉布景。她总是想方设法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在人们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爱交际的女孩子，常常走到公司门口就与一些导演勾肩搭臂，经常与一些漂亮的英俊男演员卿卿我我，或是看过晚场电影后与别人一起去昼夜餐厅。

一天晚上，蓝苹与一群朋友走进一家俄国餐馆，其中有著名的女演员王莹和她的男朋友周伯勋，他们叫了几份俄国菜和伏特加酒，吃过晚饭后，朋友们一一散去。周伯勋和蓝苹、王莹都喝醉了。周伯勋先把蓝苹送到电通公司大门口，再折回去接王莹。到电通公司门口，周伯勋让看门的老头把蓝苹送到她屋里去，并要看到她平安睡去。看门老头心想，最好还是找蓝苹的同事把她送上楼去，于是，他叫了一位男导演把她架上了楼。

第二天早上，蓝苹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躺在床上，衣服全部放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她看了看自己裸露着的身体，发现腰部有一行红字：“下次小心，馋鬼！”字是用她的口红写的，口红还敞开着放在床边的桌子上。蓝苹匆匆忙忙地穿上衣服去找王莹。

“亲爱的，我也喝醉了。”王莹告诉蓝苹，“我还真不知道俄国酒这么有劲儿。”

“莹，我怎么回的家？”

“周伯勋让看门老头把你架上楼的。看门老头不可能做这样的恶作剧。”蓝苹去问老头，他解释说：“我让导演把你架上楼的。”

蓝苹把这位很有才华的年轻导演叫到自己屋里，问道：“你怎么能这样？”

“你生气了？但是你还是应该感谢我。”这位英俊漂亮的小伙子说道，蓝苹的心情从愤怒变得有些温和了。小伙子笑道：“如果你认为我不应该写这些字，那么脱掉衣服，我给你擦掉。”蓝苹与这位导演的戏并未到此结束。

二十——三十年代，上海的电影界不乏粗制滥造的作品，大

多数电影都是多愁善感之类，而且有世界主义倾向。但是从中国悠久历史的长河中观察，这一行为还是方兴未艾。*

电影界人才济济，引起的轰动也是此起彼伏。商店的女店员和人力车夫，一方面抱怨电影明星的表演艺术不高，一方面又热心于阅读毫无价值的电影杂志。其专心致志的劲头儿犹如经纪人研究股票行情。在新兴电影业，有才华的男女演员或导演都能走红一时。他们付出的劳动不多，技术水平也一般，然而大量的观众具有某种魔力使他们出名。

此时电影的艺术水平也不高，因为没有传统的标准衡量或刺激当前的电影生产。政治上常常把艺术改造成宣传的工具，因此很多的电影看起来不伦不类——没有中国痕迹而是一味地模仿西方，成为世界主义的东西。

毫无根基的蓝苹也踏进了这一领域。虽然，她时常感到困惑，但是她的弱点反使她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在这里，她慢慢地成熟起来。

在电影界，笑声与泪水是一对孪生子，贫困和荣耀相辅相成。而当时的现实又是，中国在日本人的手中挣扎，社会秩序分崩离析。在这种时代，在这种社会，在上海这个大世界，残酷的现实不容许人们沉湎于幻想之中，凭一时的冲动，靠一夜的风流，在银幕上混一个角色（田汉曾说电影是“银色的梦境”），这一切，正适合于蓝苹。她无牵无挂，没有多少经验。她要追求自己渴望已久的某种满足。

但是，她要在名誉和诽谤、自由和压迫之间艰难地前行，在古老而奇怪的传统影响下，在表演艺术这个虚幻的世界里，女人尤其如此。银幕上的女明星更是“玉女”中的佼佼者，被人

* 1929年，上海放映的电影中，90%的是美国电影。

羡慕，被人嫉妒，成为观众注意的中心。一旦这种光环消失，她仍是她，在上海这个大世界，就是流浪者，甚至成为妓女。

有人认为，女演员比一般的妇女更多地得到解放，她们没有家庭的拖累，而且能够站在与男人平等的位置上表现自己。要知道，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只是在外人看来是这样的。在她们自己眼中，生活是另一种颜色。她要一直处于某种压迫之中，作导演的“玩物”，因为她要从他那里得到角色，在这个男人的怪诞的貌似制造娱乐的世界里，她是奴隶。

蓝苹能够看到这种生活的两个方面。但是她又与作家丁玲不同，丁玲把演电影看作游戏，她反对这种游戏，因为女人在这一领域要从属于男人。蓝苹的选择余地很少，同时她实现自我的愿望又很强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会选择各种可能的手段，包括忍受暂时的侮辱。

如果说，与深受传统束缚的中国乡村相比，上海是一块正地的话，那么，在上海这个嘈杂的商业世界，上海的艺术家们形成了自己的自由解放的独立王国。

在蓝苹轻浮的外表下，她已暗自下定决心：不容许任何人“支配”她或“占有”她。如果有哪一位演员或导演企图违背她的意志这样做，她迷人的红颜会暴怒起来，以自己的方式反抗。如果一个男人满足了她想去看剧场或饭店的欲望，那么下一次，作为回报，她会花掉自己所有的积蓄报答他。

有些人过低地估计了这位美丽可爱的少女的内心深处的坚强个性，一些生活放荡的男女甚至给她起了个“烂苹果”的绰号，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目的和想法。

同行们有时会看到她坐在上等的咖啡馆或高级饭馆里，只要一杯茶或一碗米饭，便认为她是在等自己的男朋友——过去的或是现在的。通常，在这种时候，会有一个男人走进来和她

坐在一起，这不仅是表现自信的一种行为，而且自信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据说，绝大多数的人都要乐于接受某种义务或规范的约束，而不是绝对的自由。或许这是对的，如果确实如此的话，这种现象在中国比在世界其他地方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蓝苹是个例外，她更愿意自己把握自己。她没有依赖于别人的渴望，她也不愿意依赖于一个男人、导演、教师或其他的任何人。

她的同行们（包括仇人）认为她是个自命不凡甚至有点厚颜无耻的女人，认为她是一个毫无“根基”或资历的暴发户，而她在以自己的行动粉碎这种看法。她看上去显得有自制力，沉着冷静，是一个精于算计而不是凭冲动行事的人。实际上，她在感情上是一枝易碎的花儿，她与其他的人特别是女人相处得并不好，除了其很强的性格外，生活的动荡也使她饱受此苦。

一天下午三点，在《大晚报》工作的崔万秋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校对稿件。电话铃响了，是蓝苹打来的，《玩偶之家》的演出刚结束，她想对崔万秋的捧场表示感谢。演出期间，《大晚报》的文艺副刊《火炬》上发了不少捧场文章，她还想知道能否亲自登门拜访并致谢意。

崔万秋已经与明星公司的电影剧作者阿英有一个约会，但是工人都很高兴地约请蓝苹与他们共进晚餐，这位娜拉很有迷惑力。阿英写完部分镜头剧本后，崔万秋带着蓝苹到淮海路，他们三人一起享用饭前咖啡——这在当时是一种时髦。

蓝苹着一件淡蓝色的旗袍，脚穿平底布鞋，涂了口红，擦了胭脂，刻意地化妆了一番，显得颇有姿色。看上去是一个不同凡俗的艺术家，一个无产阶级分子，一个快乐的少女。

这里是法租界的锦江饭店，他们边吃边谈。话题转到京剧，蓝苹有很强烈的反传统观点。她说，梅兰芳“很保守”，与绝大

多数新派人物不能相提并论，崔万秋和阿英表示异议，蓝苹举例证明了自己的看法，她谈到梅兰芳的《天女散花》等戏，她厌恶地说：“这些都是多愁善感的女人，一会儿含着怯笑，一会儿又是歇斯底里。”她说她不喜欢“弱不禁风”或是“需要男人扶持”的女人。

崔万秋被蓝苹坚强的性格所震惊。她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男人喜欢这种痨病鬼。”

碗中渐空，论辩也毫无结果，三人开始每人来一段京剧道白，蓝苹知道的很少，这比不上崔万秋，以致崔和其他人认为她唱的京剧完全是业余水平，尽管她说她还能比这唱得更好。

崔问她是否常去看电影。蓝苹回答说：“电影对我们好象教科书。”她说她并不特别喜欢外国电影，中国电影和外国电影她都看。他们谈到当时中国电影界最有名气的两位女明星胡蝶和阮玲玉，蓝苹更多地称赞阮玲玉。

蓝苹说：“胡蝶是一位‘冷血动物’，象一尊雕像。”崔万秋和阿英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蓝苹皱着眉头说：“‘九·一八’事变的那天晚上，她与张学良跳舞通宵达旦（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首领，有义务率军抵抗日本侵略者）。”

很多年后，崔万秋笑着回忆道：“蓝苹和我差不多同时到上海，她从青岛到上海，我从日本回到上海。”经过洪深的引见，他们开始了很友好的交往，一个是著名的编辑，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女演员。或许个人友谊也在这种交往中逐渐萌发。他很了解她，有时很自豪地把她介绍给来访的日本友人。蓝苹则常常当着这些日本知识分子的面发表反日言论，但是言中也常常流露出她的“小家子气”。

蓝苹与崔万秋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合作。崔万秋不是一名

左翼分子，而是中青党的成员，中青党在政治上亲国民党。诚然，在戏剧表演上小有成就的蓝苹，自从上次被捕后，在政治上比以前温和得多。但是，实际情况绝不象北京某些人所说的，崔万秋是“国民党特务”，曾趁机劝诱蓝苹为国民党效力。崔万秋的确对蓝苹很好，但这不是出于政治上的精明考虑，而是因为他喜欢她，同时也感到她有一定表演才能，值得给予鼓励。

一位颇有才华、感情丰富的艺术评论家一直喜欢着蓝苹，他就是在《大晚报》任职的记者唐纳。年轻的唐纳长得秀气、潇洒，嘴巴和鼻子之间的距离稍大。他的大眼睛能使人感受到幽默和激动。他经常穿一身考究的淡色西装，头发修剪得很整齐。手中经常夹一支香烟，讲起话来不停地做着各种手势。他讲话速度很快，为了不影响讲话，香烟只有噙在嘴角。蓝苹在金城剧院的首场演出，他就前往欣赏，他发现她很迷人，也很性感，看起来会见她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一个暖风习习的夜晚，唐纳步行到电通公司去，他是那里的杂志的兼职编辑和导演。法租界的淮海路上挤满了行人，有小贩，有乞丐，也有勾肩搭臂的情人。突然，唐纳隐约看到蓝苹从不远处走来，迈着轻快的步伐，梳着少女式的发型，淡蓝色的旗袍在霓虹灯的照射下闪出道道亮光。只有细心的人才能发现她走路时两腿向外轻度弯曲，这是早年裹脚留下的痕迹。蓝苹认识他，他也认识蓝苹。

他们同时停下了脚步。唐纳坦率地一笑，蓝苹伸出手来向他问好。唐夸奖蓝苹演的娜拉非常出色，蓝苹说她早已拜读过唐纳先生的文章，而且很欣赏他的文笔。“我可是一个革命者。”蓝苹初次见面就对这位上海文化界的左翼人士说，她的坦率和

任性不仅没有震住唐纳，反而更加使他着迷。

唐纳回忆说：“当时我异常激动，这位刚从山东来上海不久的演员长得非常迷人，就在那天晚上，在淮海路，她告诉我她在从事革命活动。”

在社会地位、文化素养、经济状况等各个方面，唐纳都比蓝苹高出许多。

唐纳生在天津，他的父亲是一位铁路职员，在唐纳很小的时候，父亲因外用药不慎身亡，唐纳成了孤儿。14个月就被送到苏州他的姑妈家。姑妈一人寡居，有很多土地，把他抚养成人，因此，他跟着姑妈姓唐，取名“纳”，含“容纳忍让”之意。他的母亲和哥哥留在天津。与蓝苹一样，他也是来自破裂的家庭。

唐纳回忆说：“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在苏州一家地方小报上发表的。当时一听说编辑同志发表它，别提我有多高兴。文章写的是关于连锁通信的问题，我反对连锁信。你知道，这纯粹是迷信，说什么，你收到信后如果不写几封同样内容的信发出去，就会倒霉，如果这样做了，再在信封里装上一块钱，马上就会变富，这纯粹是一派胡言。”

他的姑妈为他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但是唐纳和当时其他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样，讨厌传统的儒家教育。“我每天都要背四书五经，一有差错，老师就用戒尺打我的手掌心。”唐纳沉思着说，他还谈他的反抗策略，“每隔一会儿就说要去撒尿，我的老师慢慢地发现，我这是企图逃避背诵课文，他很恼火。”

“你觉得苏州怎么样？”很多年后，一位朋友在巴黎他的寓所问他。

“很美，小桥流水、街道园林，苏州人也长得很美。”

“但是我并不认为苏州姑娘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漂亮。”唐马上转过话题，他总是能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他微笑着说：“譬如我吧，我就一直没有选苏州姑娘作妻子。”*

这位来自苏州的叛逆者，在上海这种特殊的环境中，不自觉地成了一名左翼分子。在圣约翰大学这所外国人控制的学校里，一位美国教授给他们讲中国文学。他感到：“作为一个白痴并不是件十分丢人之事。在上海有两件事使我成为左派分子。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作威作福，以及贫富之间的悬殊差异。”

唐纳没有象蓝苹在青岛时卷入共产党的政治活动之中。“我从来没有想过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一帆风顺的天才艺术家解释说：“我们只是一群艺术家，我们有同样的思想，关心时局，我们用我们的笔、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躯体去帮助中国。这不需要首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唐纳也从未读过一本马克思或列宁的书，在政治方面，或许蓝苹比她在淮海路上遇到的这位艺术家更坚决，更有心计，也更认真。

第二天，蓝苹到电通公司去看唐纳，她很坦率，自从与俞启威分手以来，她还从未与一个男人同居过，她依然在上海的人海中漂浮。她说她能遇到唐纳很高兴，并刻意奉承了一番。随后，又是一番调情，使唐纳怦然心动。

这位有才华的人还要经常到办公室去工作吗？蓝苹还是明知故问，她大胆地企图把两人的点头之交发展到心灵碰撞的地步，唐纳解释说，他工作起来很刻苦，玩起来也很卖劲。蓝苹小姐是不是也同样呢？

* 唐纳现在的、也是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妻子是聪明漂亮的陈润琼，她来自福建，她的家庭后来迁到北京，她的父亲曾是国民党政府的驻法国大使，后来成为外交部长。

她的确如此，她显得很纯洁、很天真，她说她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好象是想让人相信自己的诚实。那些没有能力达到某一限度的人是不可能享受最纯洁的乐趣的，唐知道这一点，然而，蓝苹传神的眼睛使人想到，任何欢乐都会稍纵即逝，正象一年只有一个春天，这种欢乐不会悬在半空中，应该在它升起的时候紧紧地抓住它，否则就会消失……

蓝苹的纯洁、大胆和令人兴奋，使唐纳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她。

在过去的中国，姑娘们只能含蓄地暗示自己的爱慕之情——日落之时，弹琴诉心声，让心上人自己去体会。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少女的求爱已变得大胆得多。

“即使在上海，她的胆量也是很大的。”唐纳回忆说，“不要认为蓝苹是温顺的中国姑娘，有人说中国姑娘都很腼腆的，蓝苹可不是这类的人。她会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与一个男的说话，采取主动攻击的战术，与一个男人一道前进。不管怎么说，她是一个很有胆量的少女。”

蓝苹走进虹口区苏州街405号大院，这里是电通公司。她穿着蓝色旗袍，很有风度，长发在落日的余晖中闪光。这幢一层楼房后来属于一所小学，现在是电通公司职员宿舍，*还有篮球场和网球场，另外还有办公室和制作间（成为左翼人士并不妨碍他们追求享乐的生活）。

看门的老头儿把她带到网球场，四位同行正在这里打网球，一名演员当起了裁判，蓝苹问唐纳先生在不在，四位网球运动员都不认识这位新来的唐纳先生。实际上，唐纳不打网球。她又问起王莹和另一个人，他们也都不是来打网球的。蓝苹坐下

* 公司的有些职员包括唐纳，在市里的其他地方似乎也有住处。

来看打网球。几位运动员看到她的装束和奇怪的言行，开始猜测她与唐纳先生是什么关系。几分钟后，她颇具魅力的微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邀请她打几拍。

对方一记重扣，球打在蓝苹的胸脯上，她摔倒在球网附近。几个人赶快跑过来给她按摩，把她慢慢地扶起来。随后，她又坐在场边看别人打球。晚上，在电通公司的餐厅里，经理马德建介绍说：“蓝苹小姐是公司新来的演员。”下午的那四位网球手才知道这位惹人注目的来访者的名字。

连续几天，他们一直在谈论蓝苹，虽然还不敢直接地看她一眼，其他的演员则大胆地打听有关她的各种消息。一段时间内，她成为大家注意和谈论的中心。在王莹主演的《自由神》一片中，她扮演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此间，不是唐纳请她去看电影，就是别人请她去公园散步，或是年轻导演与她卿卿我我地走出去，或是豪爽的男演员求她一起去吃宵夜。

一天夜间两点，她躺在床上，在熟悉第二天要拍的《自由神》中的台词，突然，她发现窗前有一个黑影闪过，她惊叫一声，“谁？”没有回答。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她突然看到一只男人的手打开了房间的门，这一次，蓝苹惊恐地叫了起来。住在一幢楼上的职员差不多全都跑了出来，身上穿着不同颜色的睡衣或短裤，他们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知蓝苹是真的害怕，还是想借此引起人们的注意。

第二天早上，她发现门口有一个人，披个被子，蜷缩在门前。她掀掉被子一看，是男朋友，睡得正熟，他圆圆的脸在早晨的阳光下有些稚气。“你在这里干什么？”她发火了。头发蓬乱的男朋友受了一顿训斥，只能狼狈地一笑，卷起被子，悻悻地跑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一天，蓝苹的信箱里有一封充满感情的信。信中向蓝苹倾

吐了叫人肉麻的爱情。对于这些，蓝苹既感到恼火，也感到飘飘然。她要利用这一优势。

她感到了被人追求的喜悦，尽管有时也因别人说她生活放荡而大发雷霆。

在对蓝苹感兴趣的所有男人中，她对唐纳最感兴趣，至少经常为此而感到苦恼。

突然，蓝苹消失了。几天后，她又重新出现在电通公司的大院内。这是一个春天的下午，暖意融融的，她与唐纳并肩走出公司的大门，手拉着手，肩膀靠在一起，亲密地交谈着。当晚，他们都没有回到自己的宿舍。公司里轰动了。第二天晚上他们仍然没有回来，蓝苹的另一位崇拜者悲痛欲绝。直到第三天晚上六点钟，蓝苹和唐纳才一起回来，勾肩搭臂，亲切地低语着。他们没有回各自的宿舍，而是一起走进了经理马先生的办公室。

吃晚饭时，马先生站起来，说他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同事唐纳先生和蓝苹小姐经过相互了解，志趣相投，现已决定在一起生活。”整个饭厅沸腾了。所有的男女演员——只有三人除外——放下手中的筷子，鼓掌祝贺。他们围在这对红光满面的新闻人物桌前，一边表示祝贺，一边按中国的传统习惯问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恋爱的。

当天晚上，人们发现，追求蓝苹的年轻导演躺在床上悲伤得死去活来；另一个喝得酩酊大醉，躺在饭厅的桌子底下；而后一个在附近的一家妓院一连呆了三天才回来。唐纳和他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的妻子走进他在国际租界舒适的套房，这里的房子不仅建筑风格是西式的，连内部摆设也是西式的，蓝苹感到，这是她来上海三年所住的最舒适的房间。

这一对的行动在上海的艺术界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因

为唐纳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而蓝苹则是崭露头角的新秀。两人都年轻、漂亮，又都在电影界工作。

蓝苹发现，唐纳不只是上海的左翼文化界年轻有为的人物，而且他支持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是进步的，反对帝国主义，尽管在组织上他没有入党。

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共产主义思想与表演艺术自然而然地成了伙伴关系。因为国民党压制人们自由发表言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践踏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地位更有吸引力。

与中国共产党不共戴天的仇人蒋介石正在捕杀进步作家。共产党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同情，他们利用艺术作为反对日本侵略的武器。正因为如此，很多演剧界人士，如蓝苹和唐纳，自然而然地成了拥护共产党的人士，尽管他们并不理会共产党的政策。

一天晚上，蓝苹和唐纳外出吃饭回家。他们正走着，突然听到不远处有打人的声音。唐纳拉着蓝苹走近一看，一个高个子俄国人正在打一名中国人力车夫，他边打边说，这位人力车夫要价高，周围围满了旁观的人，唐纳和蓝苹看到此景，气得满脸通红。

唐纳挤进人群，愤怒地与俄国人讲理，因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在上海，与外国人打交道必须讲英语。唐纳平静地说：“咱们可以商定一个比较公平的价钱。”蓝苹站在一旁，眼里迸出怒火。唐纳对这一带地区很了解，他提出，俄国人付一块钱了结此事。

“一毛钱。”俄国人傲慢地不屑一顾地说。突然，满嘴流血的人力车夫一跃而起，猛地扑向俄国人。唐纳和蓝苹以及周围的人把两人一起送到附近的警察局。到了警察局，唐纳才意识

到，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局势，因为中国警察不问情由，一味偏袒欧洲殖民者。一位警察冷冷地问唐纳：“你们凭什么逮捕这位先生？”

唐纳愤怒地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能眼看着外国人欺负我们中国人不管。”

但是，不一会儿，这位俄国人的朋友来了，他在租界认识一些有权势的人物，就连警察局也要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唐纳和蓝苹输了，人力车夫被罚款。唐纳和蓝苹对在场的人说了几句打气的话，然后气冲冲地走回家去。和其他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相信，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

唐纳和蓝苹都是夜猫子。他们常常去法租界的淮海路，到一家俄国风味的饭馆吃饭，很晚才回来。当时上海的厨师中，有很多来自蓝苹的老家山东，他们跟着俄国餐馆的老板学习烧饭，慢慢地，没有俄国人的指导，他们也能烧出俄国式的菜肴。唐纳回忆说：“那里的饭菜很便宜，两毛钱就可以买一菜一汤，茶水免费供应。通常我们总是多买一点，留下一些带回去。”

他们两人都抽烟，蓝苹稍好一些，唐纳抽得很凶，他们常常喝很多白干酒或黄酒。他们年轻气盛，精力充沛，经常热烈地争论某一个问题，有时甚至通宵达旦，结果还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晚饭后，他们有时去跳舞时，有时去看电影。看电影多是去一家百货公司的四楼（这里和其它类似建筑的最高层一样，虽然不是妓女的避难所，也是昏暗潮湿、烟雾迷漫）。他们去跳舞一般总是一群人在一起跳。唐纳说：“每个人都不断地与别人交换舞伴，在那里，你买一张一块钱的票，就可以有三个应召女郎陪你跳舞。”通常，当唐纳与其他的应召女郎跳舞时，蓝苹总是坐在一旁休息。唐纳回忆起那些脸色苍白、打扮得珠光宝气的

应召女郎时说：“她们成排围坐在房间四周。舞技一般的坐在最显眼的位置，最出众的坐在最后一排。”

唐纳并没有多少钱，然而他和蓝苹都认为他们属于上流社会。他们雇佣了一个保姆，每周来打扫几次卫生。通常，他们出门总是乘公共汽车或电车，但是也常常坐人力车，还从不同的出租汽车公司叫来不同颜色的出租汽车。

“你去没去过大世界？”唐纳对这个问题一笑置之，他认为，“艺术家”应该去高雅的娱乐场所，“那是下层的人常去的地方，那里没有什么好看的。”唐纳和蓝苹怎么能去这种场所看耍蛇人、看算命先生？“我们的保姆常去。”这位漂亮的年轻报人说，他认为自己是艺术界的一员，“她们喜欢看玩杂耍。”

这是一个炎热的星期六的下午，南京路沸腾了。蓝苹和唐纳来到一家电影院的入口处，手中拿着一卷印刷粗糙的传单，“我们到那里是抗议一部美国电影的上映，这部影片充满了暴力和独裁，是一部败坏道德的片子。”它的主题讲的是美国商人在东方的经商活动。他们二人受洪深的影响，这位电影制片人因翻译《温尼太太的扇子》而闻名上海，他告诉他们这部影片是对劳动人民也是对中国的侮辱。

“如果你们是中国人的话，就不要进去看这部影片。”蓝苹站在入口处，对茫然的、不知所措的青年说，她衣着简单，脚穿布鞋，脚踝突出，站在人群中很不显眼。她不停地把传单塞进一只只汗浸了的粗糙手中。蓝苹和唐纳都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就象六十年代的美国青年学生一样，他们游行示威反对越南战争，但是谁也没有到过越南。唐纳笑着回忆说：“洪深的年纪比我们大，他是教授，又毕业于哈佛大学。蓝苹和我们都相信他。”

锡克教警察戴着头巾冲进人群。他们是国际租界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南京路属于国际租界的管辖范围。蓝苹、唐纳还

有其他一些人被逮捕。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反抗，蓝苹哭了起来，唐纳安慰她。他们不得不在拘留所度过一夜，但是他们赢得了胜利，电影推迟两天才放映。

唐纳沉思着说：“当时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这种事，我认为我们是对的。”

“当然，我们也见过史东山。”唐纳回忆说，“这位有才华的艺术家曾经帮助蓝苹走进上海的戏剧界。有天晚上，他带了一份手稿来，写的是关于妇女关系问题，他想让我看看能否发表。”

唐纳能讲流利的英语，也通晓一些外来文化，因此常有人来请教。“有几位导演想让我们去见见白杨。”他谈到这位不久就出了名的女演员，她当时正在筹备演出《十字街头》。“我们一起来到一家排练厅，我们认为她的演技很好，只是脸有点儿胖。”

有一次，唐纳自己也参加了电影的演出，这部影片的名字叫《逃亡》*。唐纳回忆这件事时说：“导演告诉我往哪个方面看，怎么微笑，怎么叼着香烟。”

一切都很简单，象是开玩笑。后来，唐纳为了这部片子的发行问题出差到北方，他和蓝苹彼此思念。蓝苹对朋友说，她觉得唐纳象一位军人，是她的军人，现在被送到了“边防前线”。

一天下午，蓝苹和唐纳来到田汉的住处。这里是青年艺术家的沙龙，他们在这里谈戏剧，谈政治，聊天。

田汉直到现在才知道谁是蓝苹。唐纳使蓝苹为大多数人所知，同时，关于她的私生活的传闻也使人们比以前更注意她。田

* 唐纳后来的妻子说：“这是一部很蠢的电影。”《逃亡》后来以《都市里的黑影》之名发行。

汉从来没有象她自己所说的讨厌她，而只是在此之前没有注意到她，直到她演过娜拉并与唐纳同居以后，田汉才对她有所了解。

“噢，我要去参加一个晚宴。”田汉说，他是位很出众的主人，“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和我一起去。”田汉公开的身份是一位剧作家，交了很多富商朋友。今天，就是一位这样的朋友约请他赴宴，企图开导开导他和他的一些文化界的朋友。蓝苹和唐纳非常高兴随同前往，至少有一个原因是晚宴设在大雅餐厅，这是他们非常喜爱的一家饭店。田汉叫了五辆人力车，他们精心打扮了一番，一边愉快地聊天，一边与唐纳、蓝苹和另外二人各坐一辆人力车朝南京路跑去。

“我带来四位朋友。”田汉一进门就愉快地和主人打招呼，他们正围坐在餐桌旁（座位早已准备好，只是没有考虑到会突然增加四位客人）。富商爽朗地笑着，挥动着他修剪得很好的手表表示欢迎。田汉和他的四位朋友非常喜欢这顿丰盛的晚宴，同时也给主人传播了一些左翼思想。*

一出新戏上演时，唐纳和蓝苹从不错过机会。他们把各种戏叫“人民戏”，这在中国是新事物。它与中国传统的古装戏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唱词对白都是日常用语，这在老年人看来是粗俗的，但是蓝苹和唐纳认为，这种戏富有战斗精神，是生活的向前看。所以，他们经常去戏院，就象内地的中国人经常去寺庙一样。

“听说，马上就要上演一出《武则天》的戏，而且很不错，我们能不能弄到首场演出的票？”有一次蓝苹问唐纳，他们常到

* 丁玲曾去过田汉家一次，她回忆说：“有一天，我去拜访田汉，他是中国著名的剧作家。刚一进门，我看到他的朋友在搂着很摩登的女孩子跳舞，有些打扮得象妖女，我感到恶心，马上就跑了出来。”

四川北路的一家咖啡馆去，他们是那里的常客。今天，他们一起用完咖啡后，来到金城剧院看戏——《武则天》的首场演出。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的唯一登基称帝的女人，她运用智谋和残忍等各种有利武器统治中国 50 年，这出戏把她描写成伟大的女人，虽然也有瑕疵。

蓝苹深深地被这出戏所吸引，但是演出结束后，她马上就火了。她当面批评演武则天的演员，起初还很温和，随即变得很激昂。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唐纳尤其如此，他们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肝火旺盛。她感到气愤只是因为她没有捞到这一角色，因为她觉得她比其他女演员更能演好武则天。

蓝苹年轻、漂亮，刚来上海不久，因而还带着一身土气，受西方的影响也很少。她一生也没有访问过西方，没有掌握一门西方语言，甚至连一位亲密的西方朋友都没有。

然而，她的趣味和性格完全象一个西方化的中国人。她穿西式服装、高跟鞋，她喜欢外国电影。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基督教女青年会帮她找到的，在夜校教女工识字。

蓝苹是一位现代派的世界主义者，但是实际并非如此。她羡慕好莱坞的生活却对美国一无所知，她爱读西方文学却对西方和西方语言了解甚少。演员生涯使她的思想不只是局限于中国的传统的范围之内（但是她在政治上不是亲西方派）：中国的电影，说到底，是好莱坞模式和技术在中国的移植。应该说，当时中国的电影界是受传统束缚最小的领域，或者说是传统的影响力最弱的领域，这可能也是蓝苹选择这一块天地的原因。蓝苹独立的个性根源于其孩提时代的经历，这使她在气质、性格等方面更象一位西方女人而不是中国传统所培养出来的那种温顺、节俭、生儿育女式的女人。

蓝苹更象一位西方女人还表现在，她总是向前看，而很少

留恋过去，特殊的社会出身使她在这方无所依靠，她一切都要凭自己的双手去争取，象一位西方女人那样靠自己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她喜欢孤独，这一点是西方人的特点而不是中国人的风格。她深深地感到，最终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依赖别人不会带来自己预想的后果。

上海时的蓝苹之所以受传统的束缚较小，唐纳的影响是第三个因素。

在圣约翰大学，唐纳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蓝苹所接受的教育中，虽以传统文化为主，亦不乏西方文化的因子。与唐纳同居的日子里，传统文化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唐纳感到了自己对蓝苹的这种影响，他觉得是自己使蓝苹成为心情开阔的人。

唐纳把蓝苹带入一个她不熟悉的西方世界。他教给她英文，所以，她后来才能教给别人蹩脚的英文。和他在一起，她更好地理解西方戏剧。因为唐纳深受西方文学中个人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在政治思想和左翼价值观方面。在上海，唐纳对她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主要是在文化方面，他使蓝苹摆脱了中国传统的束缚，思想意识不只是局限于这一领域。

蓝苹曾一度感到，中国与西方没有很明确的差异，她不需要在两者中间只择其一，象1949年进入北京以后那样了。她当时认为，世界——特别是戏剧世界——是超越民族界限以上的文化统一体。所以，在1936年，她认为，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她穿上与自己崇拜的偶像格丽塔·嘉宝同样的衣服是很自然的，无可厚非的。

在一起生活几个月后，蓝苹和唐纳的生活进入了暴风雨时期，一会儿是泪水、拳头、“砰砰”的关门声，一会儿又是短暂

的温存和亲昵。

为了避开唐纳，蓝苹自己在国际租界的一家公寓里租了一间亭子间。^{*}在她的下面是一位整天为人做衣服的裁缝，经常熬到深夜，缝纫机的轧轧声使人难以入眠。所以蓝苹常常一边不得不陪着这声音熬到深夜，一边背诵第二天拍戏或排练的台词。在她的上面，也是一间干净整洁的亭子间，住着阿桂，她是来上海给人作女仆的乡下姑娘。阿桂和蓝苹成为好朋友，她们亲如姐妹，同命相怜，同乘一艘小舟在大上海飘荡。

阿桂很勤快，经常帮蓝苹打扫房间，或是洗衣服。如果蓝苹排戏很忙或生活拮据时，阿桂常常帮助她，给她搞点吃的，让她休息好。有一次，蓝苹饥肠辘辘，阿桂到街上买了几个番茄，回来后不声不响地放在了蓝苹的窗台上。

蓝苹的性格与阿桂有很大的不同，她经常给阿桂讲一些戏剧界的趣事。有时，为了感谢阿桂的帮助，还给这位住在自己楼上的乐善好施者几张自己的舞台照。

大约是在1936年3月初的一天夜里，蓝苹屋里传出的尖叫声把睡梦中的阿桂惊醒，惊恐不已的阿桂听到有打架的声音。一会儿，又是蓝苹高叫：“救命啊，救命啊。”阿桂跌跌撞撞地跑下楼梯，急匆匆地闯进蓝苹的房间，她看到唐纳和蓝苹正在打架。阿桂的到来（据她自己回忆说）才使这场恶战停息下来，“武器”摆在一边，唐纳悻悻地走开，蓝苹“得救了”。

之后不久，为了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党指派蓝苹负责组织一次业余戏剧演出活动，并为此租下了一家饭店的大厅。这种事繁琐而紧张，蓝苹在某种程度上又恢复了原来的政治热情，这纯粹是一种宣传性质的演出。她感到自己还是有能力完

^{*} 唐纳初到上海时，也曾在这种亭子间住过一个时期。

成的。然而，与唐纳的关系使她苦恼，感到疲惫不堪，并且病了一场。她仍然认为，她与唐纳的纠纷是因为经济困难引起的，但是这一点很难衡量，只是蓝苹常常任意挥霍。

为庆祝活动而组织的戏班中，有些人根本不来参加排练。蓝苹慢慢地意识到，原来是她以前的追求者——她的仇人从中作梗。她的仇人想以此证明，没有他的帮助，这种活动是搞不起来的，蓝苹为此费了不少气力。

最后，观众总算来了，蓝苹不能也不愿让他们失望。

她演得很动情。她把自己的痛苦经历融入艺术之中，至少她是在为她的工人阶级观众哭泣。她跌跌撞撞地走上临时搭起的舞台，长时间的劳累几乎把她累垮，她忘了不少的台词，只有临场发挥了。她回忆说：“我的脑袋在膨胀。”她听不到提词员的提词。她相信，观众已被她的心情所打动。因为演到悲惨的情节，她哭泣时，观众们也跟着哭起来。

但是她的同伴们与她配合得不好。她后来说：“他们不知道我的情况严重，因此他们不给我帮助。”当时，一名男演员装作喝醉的样子，重重地打了她几下，把正常的演出岔开了，舞台也开始摇晃。当时蓝苹高烧 40℃。

36年后，她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演出结束时，她由发烧转成肺炎，几位朋友急忙把她送到医院，她在医院住了好几天。但是，她当时的描述与此不符。她写道：“我雇了一辆黄包车回家。”还说，“当时我们（她和唐纳）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南洋大道。”这个地址是唐纳的住址。这是 1936 年的 3 月 8 日，演出的幕布落下来后，她急匆匆地来到这里，可能她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因为什么。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不知不觉地来到唐纳的宿舍，而没有回到自己的临时住处，或是到电通公司的宿舍去住。在起居

室的桌子上，她看到有一封信夹在一本书的中间。她拿起一看，原来是两封信。其中一封是唐纳写给一位少女的情书，看来她已经取代了蓝苹的位置。另外一封是那位少女写给唐纳的回信，字里行间流露出缠绵的深情蜜意。

蓝苹后来回忆说：“天啊，谁能想象出我当时心里的痛苦。”疾病的折磨，朋友的误解，情人的背离，这一切，象“铁棍”打在她的头上，她晕倒在地。不知是为了求得解脱还是出于虚荣心，她边哭边说：“我还是蓝苹。”

她没有简单地给她的“纳”留下一张纸条，然后离开，就此结束两人的来往。不，她认为她不是那种轻率地不替别人考虑的人。她坐在那里沉思着，她已“无处可去”（如果她已决心与唐纳决裂，她完全可以回到自己临时住处去），看来她要与唐纳决一雌雄。

她打起精神，给唐纳留下一张纸条，然后乘车来到一家戏剧俱乐部。她认为在这里可以遇到几位朋友，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和劝解。她走进一间排戏时用作男演员休息室的房间，刚坐下一会儿，门突然被推开，唐纳走了进来，他求她回去——和他一起回到他的公寓去。她回答说，事情不说清楚她不会回去，“我们再也不能在一起了。”她哭起来，哭得很悲恸，象一个被抛弃的孩子。他胆怯地要求她，至少应该先回去，然后再把事情说清楚。

她站了起来，带着受伤的骄傲。他们一起又哭了起来。蓝苹让步了，答应陪他回家。她后来解释说：“我怕呆在那里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他们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回到唐纳的住处。

他们既不能恢复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又不愿就此决裂，只有反复地交涉。双方都感到精疲力尽。蓝苹说：“黎明时分，我试图离开，但是，天啊，这位可怜的人哭得很悲恸。我至死也

不会忘记他那可怜兮兮的面容。”唐纳请求她的原谅，原谅他追求别的女孩子，没有把她作为他生活的中心。她没有原谅他，终于，他一气之下冲出房间。

过了一会儿，她发现他的情绪不对头。也跟着跳下床来（很显然，她是坐在床上与他谈判的），来到会客室，这间会客室唐纳与其他几位住户公用。她在会客室的桌子上发现一张纸条，她打开来看到的是唐纳秀气的字体，原来纸条是留给她的，他要去自杀。

她赶紧披上一件衣服，“用我全身所有的力气”冲出房间，来到潮湿的大街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找唐纳。她发现了她，要他回去。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要她安慰自己受伤的心。在拥挤的人海中，他问她是不是还爱他？能不能原谅他的过失？

她后来说：“我的天，我真想象不到，一个要自杀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这样对我说话。”为了避免不应有的事情发生，她作了让步，“我告诉他我爱他，我还告诉他我原谅他。”

如果说，蓝苹一开始对唐纳的恳求不作让步，说明她是一个有个性的女人的话，那么她后来的让步也很值得一番思考，或许她还怀有一线希望，相信自己能够改造好他，或许她还记着他的帮助，使她得以进入电影界。

危机过后，蓝苹旧病复发，高烧 41℃，躺在床上说胡话，一会儿莫名其妙地骂人，一会儿又是用拳头砸床。她的肉体和精神都开始崩溃了。唐纳非常殷勤地照顾蓝苹，这样，他赢得了她的感激，也再次赢得了她的情爱。在唐纳的建议下，她决定离开上海，来到唐纳的家乡苏州，这里距上海乘火车只需两个小时，这是一个垂柳石巷的花园城市。唐纳的姑妈照顾着蓝苹，唐纳每个周末也都从上海回来看她。经过七个星期的休息，蓝

莘恢复了。

蓝莘所说的唐纳的缺点并不全部都是实事求是的，因为谁也不能都满足她的要求。

在上海的艺术界，认识蓝莘和唐纳的很多人都认为，他们不是很合适的一对。崔万秋说：“她太要强，而唐纳又太文雅。”有些人认为，蓝莘之所以愿意和唐纳在一起，是想借助于他流利的文笔和他的影响，这些对她的演员生涯都有帮助。

唐纳深受一些人的敬重，他们在他的背后议论道：“蓝莘实际上就是娜拉，只不过她现在是在唐纳的公寓里扮演这一角色，其实与她在金城剧院的演出没有两样。一旦时机成熟，她肯定会离他而去，就象娜拉离开海尔默一样。”

一些认识唐纳的非艺术界人士对他们的生活也持怀疑态度。《大公报》记者陈吉英在谈到唐纳时说：“唐纳这种人是在温室中长大的，蓝莘比他要强得多。”陈当时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他继续说道：“他总是远离现实世界，生活在幻想之中，感情主宰了他的一切。”

崔万秋去看唐纳时，婉转地和他谈起爱情和婚姻，他随随便便地说：“在婚姻生活中，脾气性格的相投比美貌更加重要。”这位《大公报》的编辑说，一个人在选择伴侣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一朵美丽的鲜花会吸引不少的蜜蜂和蝴蝶。

唐纳的大眼睛盯着他的这位有些瘦小的朋友，他说：“男女之间伟大的爱情会超过其他一切条件。”崔想起外边风传的关于蓝莘的言论，他看到唐纳天真无邪的面孔，不忍心刺伤他，所以再也没有说什么。

多年以后，唐纳对一位来访的朋友说：“我和她在一起住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一点也不知道蓝莘曾经被捕过，更不知道她

叛变过。”不管这件事的真相如何，蓝苹在政治上比唐纳要成熟一些，不管以何种方式和态度参加进共产党的圈子之中，总会自己的生活蒙上一层新的色彩。

“叛徒就是叛徒。”唐纳在谈到蓝苹的狱中招供时说，尽管我们至今还不懂蓝苹在狱中同国民党当局都谈了些什么。

唐纳否认他写给他以前的女朋友的信是“情书”，而蓝苹则否认她与章泯有过深夜约会，更否认与他发生过性关系的章泯是《玩偶之家》的导演。不管怎么说，这些事给他们的共同生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并使他们最终分道扬镳。

蓝苹和唐纳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既关心事业的建树，又重视感情的力量。可以肯定地说，蓝苹不会满足于只与一个男人共同生活，同样，唐纳可能也不会满足于只与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

蓝苹的行为使这种关系难以维持，然而，蓝苹也不是纯粹的机会主义者，她不是单纯地依靠机遇遇上了唐纳。唐为她的工作说了不少的好话，这对她的演员生涯给予很大的帮助，无疑，她希望他这样做。她的经济拮据也因为碰上了唐纳而有所缓解。然而，从一开始，她与唐纳就是在不断的争吵中度过，这一事实说明，她所需要他的只是他的帮助。后来，她近乎疯狂地经常激怒唐纳。当然，她也关心他，但是，她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事业，蓝苹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证明她自己——证明她的才能和她的感情。

但是，蓝苹对唐纳并不公平，因为她只要唐纳对她忠诚，而她并不以此作为回报，很多电影界人士看到了这一点，她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她的这种做法终于使唐纳失去了信心。

她对唐纳的要求是：除了为她的演出捧场并为她争取更能出名的角色之外，还要把她作为一个有独立精神的女人看待，与

此同时，他要对她十分地忠诚，不与其他的女人有任何来往。

这是一个春日融融的愉快的早晨，一列火车从上海站开出，喘着粗气朝杭州方向前进，四周是绿茵茵的稻田。在一节车厢里，几位年轻的艺术家的兴致勃勃地谈论电影，谈论浪漫的爱情故事，谈论杭州的秀丽景色，当时时髦的政治话题被他们远远地抛在脑后。他们将要去往十三世纪马可·波罗曾经去过的西子湖畔，当时，马可·波罗曾经慨叹这里的景色说：“简直是到了天堂。”

著名的电影导演郑君里是唐纳的密友，因没有情人陪同前往，不断地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郑君里说：“我的情人还在浩瀚的人海里。”*

同行的其他人都是一对一对的，总共三对，他们要去举行集体婚礼。

其中一对是赵丹和年轻漂亮的演员叶露茜，赵丹在《玩偶之家》中曾与蓝苹同台演出。第二对是顾而已与杜露露。第三对是唐纳和蓝苹。

唐纳今天终于成为新郎，他感到很兴奋，而蓝苹呢，经过在苏州的休息疗养，精神也比以前好多了。

他们租了一条小船，泛舟在波光鳞鳞的西子湖上，然后在湖边的黄龙泉野餐。集体婚礼在六和塔下举行，三对新人与六和之塔，取其“和谐相处”之意。

沈钧儒作为集体婚礼证婚人，他是律师，也是蓝苹和唐纳的好朋友。郑君里是司仪，他后来导演了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他负责主持仪式，沈钧儒帮助他。他们两人把他们的几位

* 郑在此后不久即与黄晨结婚。黄现在还活着，住在上海。她为此书上海时期的江青提供了不少资料。

打扮得很漂亮的朋友从一处带到另一处，象导演指挥他的演员一样，每一对新人都以不同的热情洋溢的语言宣布自己的订婚。这次集体婚礼反映了当时电影人士的生活方式，也是以此证明他们与普通的中国人有不同之处。

当晚，他们一起乘车返回上海，这次婚礼一时间成为上海艺术界的热门话题。十天以后，他们又在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举行了一次招待会，六位新人的亲戚和朋友再次聚会，祝贺他们新婚。

蓝苹说：“这次聚会就象一次野餐，只是象征性地证明我们的结婚，并以此得到朋友们的认可。”

在一起举行集体婚礼的三对新人中，只有蓝苹和唐纳没有结婚证书。他们把这个问题看得很彻底，他们二人都认为自己不需要去领取一纸结婚证书。蓝苹说：“只要二人真诚相爱，结婚证书是没有用的。”

与唐纳相比，蓝苹更不愿意结婚。有很多次，他提出结婚，她总是不同意。“三八”节的那次争吵后，加上蓝苹又在苏州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是唐纳的家庭起了作用，软化了蓝苹的感情），她才改变自己的观点，答应与这位据她说差一点儿把她逼疯的男人结婚。

她后来告诉她的朋友说：“我们结婚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根本没有感情可言。”据她说，唐纳因为“失业和生病”，经常入不敷出。他们结婚后，唐纳可以从他家中得到经济上的资助。

这是蓝苹的第三次婚姻，这时她刚满 21 岁。

几年后，一批文学艺术界的朋友聚会桂林，其中有田汉和著名女演员王人美。他们在谈到杭州的那次集体婚礼时，其中一人说：“六和塔前六不和。”实际上，当时参加集体婚礼的三对新人中都没有维持多久婚姻关系，蓝苹和唐纳又是其中时

间最短的。蓝苹是否愿意维持这种关系，是否乐于过稳定的家庭生活，或者说，她是否愿意生孩子，这一切都很值得怀疑，她不认为她未来的幸福会从这种婚姻中得到。

婚礼后几天，蓝苹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平静地写道：“当时，虽然说我原谅了他，但是，一想到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一想到那两封信，我的心都要碎了。”

败在唐纳手下的追求者之一，在蓝苹与唐纳即将成婚之际，曾对蓝苹说：“你们两个只要有一方不作让步，就会出现一场悲剧。”唐纳崇拜蓝苹，他的生活也被这种感情所左右。但是，唐纳似乎并未因此而不对其他的女人感兴趣。他没有努力使自己成为蓝苹所认为的合格的男人。而蓝苹呢，又过分的固执己见，从不让步（她在后来的婚姻生活中也是如此）。

当时上海的一家电影杂志有一篇文章写道：“提到章泯，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蓝苹。”章泯在上海很有名气，这主要因为他是上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代表人物，赵丹等著名的演员把他捧得很高，认为他是导演兼戏剧理论家。章泯与一位小学教师结婚，他的妻子漂亮而文静，但是不能满足他各方面的需要，他们有一个8岁的儿子。蓝苹和章泯同居是1937年春天的事，不过，在1936年可能就已经开始了。

电通公司于1936年中间倒闭，倒闭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的压力，二是观众的逐渐减少。唐纳回忆说：“他们拖着不付给戏的薪水。”几个月后，蓝苹与一家较大的电影制片公司联华公司签订了合同，在四处找工作的这几个月里，蓝苹到处努力，希望找到一个舞台或电影中的角色，以挣来自己的生活费用。她可能找到了章泯，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她知道章泯一直对她有好感，她在章泯导演的《大雷雨》中得到了一个角色，这是俄

国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个剧本，她在整个剧中演得不错。

因为蓝苹与章泯的私通，唐纳感到受了欺骗，他对章泯一直没有好感，就象章泯的妻子对蓝苹一直没有好感一样。章泯的妻子和她的朋友对蓝苹的做法很不满意，蓝苹对此则无所谓。她可能也意识到了因为自己的介入给章泯的婚姻带来的危险。她只是淡淡地告诉唐纳，她有“权”看上章泯。后来，到了1937年的春天，章泯的夫人离开了家，蓝苹则搬进章泯家。她遇到了章泯的儿子，还大言不惭地说，她与小儿子相处得很好。*

六和塔婚礼后只过了五个星期，蓝苹和唐纳又一次的大吵起来，吵的原因是，关于章泯，关于唐纳的“意中人”爱霞，以及关于蓝苹有权在任何时候做她想做的事。

蓝苹非常恼火，她决定离开上海，到济南这个较为宁静的地方稍作休息。她乘火车来到济南。在济南，她看到了她的亲戚与朋友，可能还有她的第一个丈夫费先生。唐纳，据当时知情的人回忆说：“他爱得发疯了。”马上跟着蓝苹来到济南。他要诚心地劝说蓝苹回上海，他要蓝苹宣布她爱他，而且只爱他一个。

崔万秋说：“虽然我对他们能不能白头到老一直持怀疑态度，但是，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快就分手。”

唐纳于6月27日夜间乘火车到达济南，他住进离大明湖不远的铁路饭店，他知道蓝苹肯定呆在她姨妈家，就给她姨妈家送了一封信。蓝苹在回信中历数唐纳给她带来的痛苦，唐纳读着这封信，彻底绝望了。晚上，唐纳吞食了很多安眠药，企图自杀，幸亏饭店的主人及时发现，才使他免于死。来自上海

* 或许正是因为章泯的夫人离开了家，而没有大吵大闹，所以后来蓝苹离开上海以后，章泯太太与章泯又重新生活在一起。

的这位著名的评论家竟到如此惨痛的地步，饭店主人感到震惊。他与蓝苹取得了联系，蓝苹来到饭店看望唐纳，经过一番交涉，双方回到上海。

蓝苹和唐纳再也不能彼此平安地相处下去，同时，他们谁也不愿意失去对方。

唐纳的自杀使蓝苹比以前更加闻名。7月份，一家经常报道艺术界轶闻的杂志发表文章，谈到蓝苹的美貌、倔强和独立个性，认为正是这点才使唐纳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说，蓝苹还一直没有使自己声名大振的话，这次事件则使她闻名遐迩。

唐纳与郑君里一起在郑的宽敞杂乱的房子里共进晚餐。郑的妻子黄晨也是一位演员和作家，她当时不在家。蓝苹这几天在忙她自己的事。济南发生的那一次荒诞的事件使两人没有离婚，但是绝没有带来持久的和谐。唐纳在精神上受到了刺激，但是仍很乐观。朋友的信任和他对戏剧事业的热爱，使他仍为此工作。

饭后，唐纳和郑君里先生一起聊天，一边喝着白干酒。郑君里对蓝—唐关系的前前后后，每一次波折了如指掌。“我有一件东西给你。”郑在谈话的间隙对唐纳说。

郑君里走到写字台边，拿出一封信，回到扶手椅上，轻声地说：“你可能也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边说边把一个淡蓝色的信封递给唐纳。上边写着唐纳的名字，这是蓝苹的有些稚气的字体。“她告诉我，在你心情好的时候，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

对唐纳来说，与好友郑君里愉快的谈话带来的却是一个令人愤怒的夜晚。

蓝苹在这封两千字左右的信中写道：“你可能为此等了许久。我相信，你完全知道我一直在忍受着怎样的痛苦。”她对这

位为了她刚刚企图自杀过的男人说。

蓝苹在信中说，她不得不离开唐纳，她坦率地承认，她不愿就此维持下去，作为唐的妻子，或是作为她热爱的上海艺术界的一员。

蓝苹说：“进入电影界后，我时常感到自己的言行处于一种矛盾之中，而且这种矛盾越来越激烈。”这种矛盾带来的痛苦几乎使她走到自杀的边缘。直到遇上了唐纳，她才忘却了痛苦。然而不久，她发现，唐纳使她进入一种新的更加矛盾和痛苦的处境之中，这是她在他们相爱之前没有预料到的。

她说，她曾尽过各种努力去爱他。“在我打算回济南之前，为了使你高兴，我答应再在一起过几天幸福的日子。”但是，她总是忘不了两人的打架，她为此常常感到痛苦，当她在雨中徘徊、痛苦无言的时候，她知道他们的爱情已经到了尽头。

她带着浓浓的戏剧家般的感情写道：“当我意识到我不得不离开你，当我回想起你对我讲的话，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象根鱼刺梗在我的咽喉，我全身抑制不住地颤抖，不能挪动一步。”她回忆说，她摇摇晃晃地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来到赵丹的家。她说，混乱的形象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她想到她在南洋路上与唐纳在一起的日子，想起她曾经那样执著地爱过他。

她说“矛盾”的痛苦一直折磨着她。因为她经常不得不说着一套，做着另一套，常常不得不假装着去赞许那些自己内心深处讨厌的东西。她说，在他看来，她应该与他一生生活，但是事实上，她总是想着别的事情。

她解释说，她不愿再忍受这种痛苦。她，蓝苹，要斗争；要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她说，她已经找到了“解决矛盾”的办法，这样做即使死了也值得——那就是，离开唐纳。

她写道：“在我们在一起的最后日子里，你的坏脾气再一次

使我清醒了。”否则，她不会下决心离开他，离开上海的艺术界。

她和唐纳不止一次地争论过她是否“安顿下来”，和他共建一个稳定的家庭。蓝苹说：“你是对的，但是我认为我也是对的。你的真理只适于你的那个世界，适用于你和赵丹等人的世界。但是我自己还了解另一个世界。三四年来，我一直在尝试一种与此不同的生活。”蓝苹想起了她的政治活动，她认为唐纳在这方面是幼稚的，他只懂戏剧，只懂艺术，不懂政治，她以此认为她不能改变自己。

“你不是说我前进了一大步吗？”蓝苹继续写道，“你完全正确。”而他认为没有比朝前跨出一步再回头更痛苦的了。在进入上海的艺术界方面，她证实了自己的能力，但是她承认，不断地前进是她的天性，蓝苹告诉唐纳，她希望继续前进，超越婚姻，超越戏剧。

她回忆说，她曾经多次尝试着努力使他爱自己，“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考验，我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说，蓝苹没有把她对唐纳的爱放在第一位的话，这时，她则转而责备唐纳也是如此。“你爱戏剧胜过爱我，对于你所说的爱情的漂亮话，谁都要打上个问号。”蓝苹写道，唐纳曾经提出以后要尽力照顾她，她问道：“如果你真想这样，你怎么才能照顾我呢？”

对唐纳来说，即使对任何人来说，都很难去爱这样的女人。蓝苹坦率地承认：“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也不是一个好情人。”虽然这封信充满对唐纳的责备、对唐纳的不满，但是蓝苹没有隐瞒主要问题：“就我来说，的确，我爱工作胜过爱我的情人。”

蓝苹的梦想是任何形式的婚姻都不可能实现的（最起码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是如此），“也可能你认为我这个人很自私，但是，难道在你一开始爱我的时候，我不就警告过你，爱我的人将来要受苦的。”

唐纳曾经说过，为了能和她在一起，自己甘愿忍受各种各样的苦难。她也曾问他：“如果有朝一日我不得不离开你，你会不会恨我？”唐纳回答：“我至死也不会恨你。”现在，在她写给唐纳的这封类似绝交的信中，她谈了自己的动机，还谈到她永远不会忘记这段爱情。

一个还只有22岁的女人，对唐纳有着相当的感情，又因与他的结合得到过不少的帮助，现在，她为了保护自己的独立个性，毅然与之决裂，这不能不令人吃惊。如果有可能把事业的成功与作为一个女人的成功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在电影界闯荡，又有唐纳的陪伴，无疑是一条理想的路。在蓝苹的内心深处，她已经开始希望获得超出成功（事业和婚姻）以外的更辉煌的目标。

她写道：“在我所有的困难中，顽强的自信和对名誉的追求形成一股强大的动力，逼我前进。”

“有的朋友说，我对你产生很大的影响，”蓝苹继续说，“在最初一个时期，是这样的，对你有一些影响。因为当时你非常地爱我。”

她提到他对她产生的影响，“我时常努力，希望受你的一些影响，并希望借助于这些影响给我以生活的勇气，但是，尝试的结果令人失望。”她感到对她的各种要求紧紧地束缚着她。

蓝苹说，她认为她应该指出唐纳的缺点。当她回过头来思考过去的时候，她发现，唐纳有三个缺点。唐纳生活作风不检点，实际上，“你们男人都是如此。”“你一直说你爱我，但是一和别的女人鬼混在一起，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

唐纳的第二个缺点是性格的被动和顺从。“你常常让事情从眼前流过，得过且过。”她感到迷惑不解，他的抱负在哪里？他的理想在哪里？为报纸写评论也是常常拖到最后一刻，直到再

也不能往后拖的时刻才动笔，这是不是软弱的标志？

“你总是掩盖你的缺点，”蓝苹谈到唐纳的第三个缺点时说，“你时常知道你是错的，但你总是说你对，还说是我误解了你。”

蓝苹宣称：“这三个缺点阻碍了我们的爱情，或许这些缺点都可能得到克服，但是无论如何，除非你克服了你的这些缺点，否则，你就不配~~对别人说你曾是我的情人。~~”

蓝苹微笑着继续说，唐纳尽管有很多缺点，但他是“诚实而热情的孩子，”“对任何人都没有坏主意。”她说，“有时你对你的敌人都是那么的善良。”这可不是她的性格。她说：“我相信，你如果听从我的劝告，就现在开始努力，你会成就一番大事业。”

她开诚布公地对唐纳说：“请你记住，我是一个活泼而有个性的女人——从不向男人低头，也从来不承认比男人差。”她要可怜的唐纳想一想，她什么时候认过输。

“亲爱的，不要过分悲伤。为了我们未来的生活，我们必须克服当前面临的难题。”她说，她相信他还会找到一个好妻子，她则要去实现自己更高的目标。“未来不会欺骗人的，只要付出努力，总会有所成功。”至于她自己，她准备暂时还是去教书。

蓝苹在信中还提到多年未见的一个人，“至于我的母亲，我已经把她安顿在乡下（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处），一切不必挂念。”可能她的继父这时已经死去。

“忘掉我吧，亲爱的，走你自己的路吧——你已经选择的路，预祝你在未来的事业中取得成功。再见，你最亲爱的，苹。”

最后，她提出，希望得到唐纳的一支圆珠笔和手表作为纪念。她告诉他，圆珠笔可以帮助她记下以后的生活经历（她没有说要写诗或写剧本），手表则可以告诉她工作的时间。同时，她送给他一本影集，里面有她的演出剧照和日常生活照，还有

一件白色的针织毛衣外套作为纪念，并要求他“努力奋进”。

唐纳读完蓝苹的信，他感到绝望了。但是他很快又振作起来。蓝苹这时已经再次回到济南她的亲戚那里去了。唐纳没有回信，“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她的确切地址。”然而，不知是因为唐纳真的“爱得发狂”，还是因为蓝苹天生具有欺骗自己的本领，他们的婚姻并未因这封信到此结束。如果说双方没有以前那么情意绵绵的话，他们也是相安无事地度过了1936年。唐纳对蓝苹的期望有所降低。在她写过这封信后，这种婚姻只是双方暂时的妥协。

蓝苹之所以没有马上离开唐纳，其中一个原因是她和章泯的关系，或是和其他男人的关系使她自己感到理亏，不敢认真地追究唐纳的生活作风问题。有一天，蓝苹读书时，在书中夹的一份剪报上，她看到唐纳写给他从前的女友爱霞的一首情诗，那时，蓝苹正在济南。唐纳否认这首诗是写给某一个具体的女人的，但是仍引起了她的怀疑。她回忆起，她躺在地板上，“象发了疯似的，两眼直呆呆地瞪着窗外的树，树在风中颤抖，云在天空飘游。”但是，蓝苹还是没有离开唐纳，也没有马上与他干仗，如果是在以前，她是不可能放过这种难得的机会的。

蓝苹告诉朋友说，她也感到害怕，她怕唐纳再次自杀，同时也怕因此而给自己招致更多的非议，认为是她把唐纳逼疯的。

她曾经写道：“如果我当时就和他一刀两断，我怕他受不了，会再次自杀。”实际上，她当时曾和她的“三位朋友一起”劝说唐纳。她感到她必须“先稳定一个时期，让他还抱有一线希望。”她也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在走下坡路，已无可挽回，但是她向唐纳隐瞒了这一感情，她也承认这一点。她说：“这样，他会认为他们的爱情还能够恢复。”

他们的关系暂时得以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蓝苹一直把她

的工作放在首位。“今年是蓝苹的读书年。”1937年开始的时候，她写下这张纸条贴在自己的床边。她希望在戏剧理论和表演技巧上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最近，她刚在一部新电影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而且演得很顺利。这部电影是联华公司拍的《狼山喋血记》，她在其中演的是一个勇敢战斗的妻子形象。被一群狼（象征着日本侵略者）包围住的她，勇敢地与狼搏斗。对蓝苹来说，这些狼不只是象征着日本侵略者，还象征着她自己的敌人。

几个月前，她在电通公司闲着无事可做的时候，她还向唐纳抱怨电影业的不景气，并说她一定要离开这种肮脏的环境，到其他地方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当时唐纳给她建议说，她应该再拍一部能打响的电影，然后再离开。

蓝苹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回答说，这个建议一点用处也没有。一部好的电影会使她名声大振，也就不会有什么烦恼，更不会再想离开电影界。

《狼山喋血记》的拍摄成功，以及其后不久拍摄的《王老五》，实现了蓝苹的设想。与此同时，评论家和观众对她在《狼山喋血记》中的表演给予了很高的赞誉，使她成为一个非常幸福的女人，就连和她在一起的唐纳也感到很幸福。

电影《王老五》讲的是发生在贫苦地区的一个惨痛的故事。蓝苹在其中扮演一个很贫穷但是性格很坚强的女人。她遇上了王屠夫并与他成婚，这并不是出于对他的爱（他是爱她的），而是出于对他的善心的报答。贫困、酗酒和日本人的侵略使生活很艰苦，但是她奋力抗争，必胜的信念使她活了下来——生存成了生活中唯一的也是最现实的目标。电影的结尾处，她抱着王老五僵硬的尸体，没有被眼泪和鲜血所吓倒，发誓要报仇，反抗她自己的和中国的敌人。

电影上映的同时，人们都传说蓝苹就象王老五勇敢不屈的

妻子一样。“她的表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蓝苹在济南时的同学王庭书回忆说，他当时也在上海的戏剧界。但是，可怜的是唐纳，因为一部出名的电影不仅使蓝苹离开了电影界，同时也离开了唐纳。

唐纳也写文章赞扬电影《王老五》和蓝苹在其中的精彩表演，但是，他这时的夸奖对她的作用已远远地不如前几年。正象1936年间，蓝苹在事业上遇到挫折时唐纳很难帮忙一样，1937年，有了两部出了名的电影作资本，她对唐纳这座“靠山”的需要也大大地降低了，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感情上。

这是1936年隆冬，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很多人聚集在上海的金城剧院门前，这里将首演夏衍的一部新作（他是田汉的好友，蓝苹也认识他）。巨大的广告牌上写着：“我们的女英雄，用她的小嘴，挽救了北京城千百万无辜人的生命。”

《赛金花》描述的是一位大胆的女人的故事，故事发生在社会传统要求好女“笑不露齿”的义和团时代。她起初是一名妓女，一度成为风云一时的政治人物，后来又为许多中国人所不齿。她的生活（1874—1936）后来成为人们喜爱传颂的历史与浪漫的传奇故事。

赛金花是一个宁愿独立的女人，哪怕作为妓女，她也不愿作为男人的附庸，就象蓝苹，宁愿去走冒险的路，去从事冒险的职业，也不愿呆在济南作费先生温顺的妻子。赛金花和蓝苹在其后期的政治生涯中一样，天生具有一副政治天才，而不是过分地关心自己的理论素养，在耍手腕和演戏方面都很有一套。

和蓝苹一样，赛金花也是中国扭曲的政治和文化环境的产物，而且其名声都没有随其时代的过去而消逝，不管是作为卓有贡献的人物，还是作为卖国贼。

夏衍把赛金花写成一个女英雄的形象，蓝苹则希望能由她来扮演这一角色，她和唐纳谈过此事，也和章泯谈过此事，而且她的这一愿望很强烈，甚至拿赛金花和自己进行比较。对蓝苹来说，比较合适的一点是，这也是一个终生不渝地与自己的坏名声作斗争的女人，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象当时的政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影响一样。当时剧中的男主角扮演者是金山，这位著名的演员被称为上海舞台上的克拉克·加布尔。

但是夏衍，这位曾留学日本的著名的左派人物，并不崇拜蓝苹的演技。他把赛金花这一角色给了王莹，她常常在一些戏剧和电通公司的电影中饰女主角。蓝苹一听到这消息后，对《赛金花》的迷恋马上转变成愤怒。她说，象赛金花这样“卖国的妓女”怎么能写成剧本上演呢？象这样的妖婆怎么能“替中国说话”呢？这不是抹煞义和团这一“英雄的人民运动”的历史作用吗？不久前她还下决心要争演这一女主角，现在，她的态度马上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或许因为双方都对过去的感情危机念念不忘，蓝苹和唐纳的关系慢慢地在朝离婚的地步发展。相爱和分手是一出戏中并行的两部分，二者互为补充。

关于双方的权利的争论取代了爱情的流露。在上海的艺术界，人们越来越多地批评蓝苹，认为是她拴住了唐纳，不象唐纳关心她那样去关心他。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唐纳太软弱，而且反复无常。同时她也承认，她已不爱唐纳，她看上了章泯。

一天，唐纳怒气冲冲地来到蓝苹的临时住处。他说他受够

* 在她政治上居支配地位的六十年代，江青说这出戏“深受资产阶级的毒害”，称赛金花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叛徒”。

了，今天要和她“清算”。他抽出一页爱霞的信，他的这位刚从日本回国的前女朋友在信中说，唐纳因为蓝苹而抛弃了她，她感到悲痛欲绝。唐纳边说边颤抖，他企图以此为据证明自己对于蓝苹是一心一意的。

但是，从蓝苹这方面来说，根本就没有“一心献身于某人”的想法。那天，她把自己的立场讲得很清楚，“我已经不再爱他”，她说，她准备作他的“好朋友”。

在唐纳看来，这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她问唐纳，他是否希望在新闻界发一个两人分手的声明。唐纳回答说，如果她认为有必要，可以发。他自己认为没有必要发什么分手的声明。唐纳决定离开上海一段时间。

几周以后，唐纳又出现在蓝苹的门前，他说，蓝苹为了“往上爬”而与“其他的男人睡觉（与章泯）”，她耍弄了他。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的问题解决了，难道我再也不能去爱别的男人？”她又进一步说，“即使我们的问题没解决，我也仍然有权去爱别人。”

蓝苹回忆说：“那天他骂我，我保持沉默，一句话也没说，就让他骂。直到他骂够了，也就走了。”她说这话时显得决心很大，似乎他要是再回来，她就会搥他两耳光。

他真的又回来了，蓝苹在回忆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时写道：“在我屋里，只有一把小水果刀和一把剪刀，别的什么武器也没有。没有什么可怕的，他来就来吧，我不动。”

蓝苹在他背后关上门，回过头来就打他，唐纳也还手打她。几个朋友和女佣听到打架的声音闻讯赶来，但是谁也进不去，因为蓝苹把门锁得很死。蓝苹说，唐纳离开时拿走了他写给她的几封信，还有两本日记，里边是蓝苹记的他们在一起的生活片

断。但是蓝苹的自尊心没有受到损害。

她说：“他临走时声称，要去发一个我们两人分手的声明，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正在蓝苹心情抑郁的时候，唐纳从黄埔江边的围堤上跳入江中企图自杀。这正好是白天，有人看到他跳江，因而他被救了上来。《大晚报》等几家报纸简短地报道了这一事件，但是都没有提到蓝苹的名字。

离婚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他们结婚时就没有经过合法的婚姻手续，所以离婚也比较容易，1937年5月，双方达成离婚协议。蓝苹留下一笔在上海银行没有还的借款，唐纳不得不替她还上，她还典当了唐纳给她的一支笔和一块手表。

与唐纳相处期间，职业的戏剧表演成了蓝苹的生活重心，而且这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对蓝苹来说，钱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从电影公司得到的报酬虽没有使她变得很富裕，也绝对算不上贫困。人们发现，她在服装和化妆品上花很多的钱，满身的土气也早已消失。生活中令人头痛的问题，古怪的行为举止，以及固执的性格不断给她带来的麻烦，现在，这一切都发生了质变。不论是在舞台上演戏，还是在摄影机前拍片，对蓝苹来说，都是一种感情的发泄，她以此打动观众。

虽然说在中国人的术语中，“文艺”二字常常并列使用，但是在三十年代的上海，蓝苹这类人的表演艺术与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还是处于不同的层次，前者比后者的影响范围要广一些。

鲁迅坚持要把文学和宣传区分开来，但是，要想划清宣传和表演艺术的界限则较难。在表演艺术中，真挚的感情能够打动观众的心，但是，印在纸上的真挚的感情在这方面的作用就

较小。蓝苹在观众面前的表演常常比她在青岛时写作诗歌小说起的作用更大。*

同样，演员的生活方式与作家也有很大的不同，而这正适合于蓝苹。因为前者要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在众人面前表演；今天是这一角色，明天又是另外的角色；要经常与不同的人接触。相反，作为一名作家，要忍受孤独，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持之以恒的毅力。

这种区分具体地刻印在蓝苹的心中，并影响到她后来的政治思想，她一直认为观众就是群众。她这时已慢慢地开始认为，观看她表演的人们，与中国共产党所说的工农大众的“人民”是一个意思。二者都是她的英雄，她则要成为二者的向导。她经常津津有味地谈论她的“基层工作”，这种工作不是政治上的组织工作，而是指引起人们羡慕的表演艺术工作。

蓝苹把对戏剧和政治的热情熔为一炉，多年以后，这种融合促使她去争取并行使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狼山喋血记》中，那只紧追不放的狼引起她对幼年时期的痛苦生活的回忆，同时，她也把那只狼与日本侵略者同样看待（如评论家们所言），或是把它比作“资本主义阶级敌人”，这些都是可能的。

蓝苹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这不只是停留在体验上，而且体现在行动上，她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所要创造的角色，带着她作为一个妻子、情人和三十年代中国公民的价值观，去塑造自己理想中的人物。她把《狼山喋血记》中的狼看作是自己生活中的狼，她在舞台上与之搏斗的敌人也就是生活中的“阶

* 她也意识到自己写作是不可能成功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多年以后，当她成为政治家的时候，“失败的作家”这一阴影一直潜藏在她的抱负之中，就象失败的画家这一阴影一直笼罩着希特勒一样。

级敌人”，而这正是政治讨伐的对象。她在演出《王老五》时，肯定融入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是的，她把自己的资历和感受倾注于她的艺术之中，但是，她的生活也同时深受这种艺术的影响。

观察任何一位从演员转向政治活动的人的生活，我们都很难辨别出，哪是他（她）作为演员的思想，哪是他（她）作为政治家的思想，因为他（她）已经习惯于对别人的不同思想作同样动情的表达，蓝苹正是如此。我们只要看一看三十年代演电影时期的蓝苹，就可以意识到她以后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八十年代的罗纳德·里根也是如此。人们不禁要问：“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他（她）？”二者都是。以动人的感情打动观众和以坚定的意志征服敌人的都是这同一个女人。

崔万秋在观看蓝苹扮演的娜拉时，就曾对一位朋友说：“她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妻子。”“你看她在抛弃海尔默宣布自己自由时的那种自信劲儿。”崔觉得，他看了蓝苹扮演的娜拉，也更了解了她本人。

“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要讲出事情的真相。”蓝苹在联华公司办的一份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因为报界和唐纳的一些朋友传说，蓝苹对唐纳很“冷酷”，这使她很恼火，所以她要告诉公众她的看法。这是1937年5月，她正与章泯同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过唐纳了。

她写道：“一开始，我对这种谣传保持沉默，耐心等待。老天知道，难道不是唐纳又一次来打扰我吗？”后来，她意识到，她如果再不出来说话，人们就会认为她是个罪人。“他们的目的只是想侮辱我。”

蓝苹也承认，她不是一个很合格的妻子和情人，然而在她

看来，错误是在唐纳一方。她说：“他是怎样爱我的呢？他在爱（？）我的同时，还很痴迷地爱着别人。这就是他爱我的方法。”

她说，她曾经很天真。“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在电通公司作为朋友初次交往的时候，他正爱着别的姑娘。”她一直没有追问他关于爱霞的事，直到后来，他说，与他和蓝苹的爱情相比，他对爱霞的爱只不过是过眼的“烟云”，“这件事象流星一样在我的心中一闪而过。”蓝苹写道。但是她同时又告诉《联华画刊》的读者，唐纳却一直没有中断与爱霞的来往。“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为我一直认为，一个男人如果真的爱我，那他就不应该背叛我。”

难道她真的想和他结婚而且不伤害他吗？“他和我都没有把举行婚礼当真。”她现在向世界宣布。在济南，唐纳第一次自杀未成后，也是如此。她谈到在济南铁路饭店的那一夜，“当时，我的想法是，我应该让他尊重他自己，然后我就可以离开他。”她感到，在济南时，她的心“令人难以置信地软了下来。”她向他作了很大的让步，她说，这“完全是出于同情和怜悯，”“我做了我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事——和他一起回到上海来。”

从蓝苹这一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唐—蓝婚姻在1936年后期已开始破裂。“当时我的好友告诉我，不能马上与他离婚，因为那样会把他逼疯的。”这一段分手的日子并没有对唐纳产生多好的效果。蓝苹解释说：“他并没有下决心改变自己，我这里决不是说，他如果改变好了，我还会再爱他，不！蓝苹不可能再去爱他，因为伤痕太深了。”

蓝苹说，她与章泯同居后，唐纳曾第二次企图自杀，她宣称，唐纳的一些朋友因此要对她动武力，“天啊，如果这些人把这种勇气和胆量用来对付日本侵略者，中国也会有救了。他们把如此之大的愤怒之火发在一个可怜的姑娘身上，真是太可怜

了。”

《唐纳和我为什么分手》是一篇傲慢的、强词夺理的文章。蓝苹为自己辩护，她不止一次地说，她相信自己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唐纳。她没有提章泯的名字，转而谈到联华公司的另一位制片人费穆，但这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她认为，为了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她有必要作长期的抗争准备。她有很多次企图自杀，但却一次也没有去做，而唐纳却是真的自杀过几次。

她说，在唐纳第三次自杀未成后，“我告诉他，如果你真的自杀了，我要比以前更坚定地活下去。”

当然，蓝苹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我必须尊重我自己。”这是她一贯的口号。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我从来不会让步，这是我一生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她把自己与阮玲玉相比。这位漂亮的女演员，因为受不了有关她的离婚和生活作风方面的闲言碎语，25岁时绝望地自杀了。蓝苹写道：“我绝对不会象阮玲玉，因为畏惧别人的闲言碎语而走上绝路，我不会，我一寸也不让步。”不管是唐纳的打骂，还是唐纳朋友的语言攻击，她总是很勇敢。”

“他们把我当作一只可怜虫，认为可以任人践踏，不，我不是，蓝苹是人，她一千年也不会投降，特别是在这些阴谋诡计面前。”

她需要的是意志坚强的男人，然而，这样的男人和她在一起，犹如两只老虎挤在一只碗橱里，力量过剩。她不停地要求唐纳“好好想想你自己。”然而，蓝苹的日子又有多好过呢？

* 多年以后，她有好几次回忆起在上海时所受的这些“侮辱”，每次都很动感情，因为那帮人蔑视她。有一次，她拿一本鲁迅杂文对来访的一位美国客人说：“你读读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受阮玲玉自杀的启发而写的），你从中可以找到我自己的生活线索。”

1937年夏天，日本人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加上政治的压力，摧毁了这个城市的电影业，蓝苹在联华公司又拍了一部电影，这部抗日题材的短片使蓝苹赢得了女英雄的声誉。但是，联华也濒临倒闭。

蓝苹的个人生活也快轮回回到它的终点。她离婚了。特别是她发表的《唐纳和我为什么分手》一文使她成为很有争议的女人，甚至在生活放荡不羁的艺术界也是如此。人们认为，她是为了在《大雷雨》中争得一席之地，才投入章泯的怀抱的。在章泯的戏班子中，她也因其傲慢的举止和与老板特殊的关系而受到指责，例如，大家都在自助餐共进晚餐时，她却常常和导演在一间小屋单独吃饭。

如果说她还有什么希望的话，现在看来，即使和章泯在一起，希望也很渺茫。不管怎么说，她是演员，要有舞台或银幕，而这些正在消失。和其他很多从事表演艺术的人一样，现在，蓝苹不得不把政治作为自己生活中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对蓝苹来说，上海现在在政治上也很不安全。当时，一位与蓝苹比较接近的年轻演员回忆说：“所有曾被国民党逮捕过的人，都知道自己已经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所以，到了1937年，这些人大都开始惊慌地寻找另外的政治环境。我想，这可能是蓝苹之所以离开上海的原因之一。”

在蓝苹一开始写给唐纳声明要“再见”的信中，为了减轻唐纳因这次分手所要忍受的痛苦，她给唐纳提了一个建议，“就说我死了，”她写道，“无论如何，我要离开这里的一切——这和死了有什么区别？”她还要唐纳对外界说，她死于脑膜炎。“实际上我还活着，这个秘密只有你我两人知道。”她还大言不惭地说，“我相信你会保守秘密的。”

现在，再也不需要这种精心安排的计划了，对于上海来说，蓝苹的确正在死去。1937年7月起，她收拾自己的东西，其中包括一大堆她的演出剧照，离开了这座城市。唐纳只听说她已离开上海，但是不知道确切的原因。不管怎么说，现在这应该是章泯关心的事，与他再也不相干。

蓝苹在上海的几年，留下了不少的“难解之谜”或“自相矛盾”的东西。她说她曾想方设法地“与党联系”；与唐纳和其他男人的忽冷忽热的关系；四年中表现出来的自我放纵和勇气，等等等等。但是，如果与她内心的终极目的联系起来，这些并不难理解。她要摆脱别人的玩弄，把握自己的环境，作为一个人自由地表现自己。其余的一切，任何组织，任何思想，或任何人，都只不过是她个人奋斗的场所。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四年是她的黄金时代，多年以后，她回忆说：“我并不是一个天姿卓越的演员，但是，在一批新演员中，我是相当出类拔萃的。”的确如此，因为有与史东山的关系，有唐纳的热情捧场，有章泯的鼎力相助，有共产党领导的左翼艺术群体作为保护层，她在人生的道路上已经前进了一大步。这还因为她个人的意志、能力和勇气，因为她有对生活的热切追求。

后来，当她越升越高，有时带着尴尬的神情回忆起自己三十年代在上海的生活时，她很少细谈过这一段经历。但是，可以说，在上海的舞台生活为她增色不少。或许，蓝苹才是江青的最好体现。

离开上海之前，蓝苹写了一篇《我们的生活》的文章。文章概述了她在上海几年中一直恪守的价值观，表达了她一直未变的一些人格特点，预示了她把握将来的第四次婚姻的观点，以

及由此将带来的政治生涯。

文章一开始，她就把自己摆在与众不同的位置上，人们常说：“做一名演员多迷人，有多好。”但是蓝苹认为，他们忽视了一点，人们也常说，“啊，但她是一个不道德的演员。”这激怒了她。

她坚持认为，戏剧应该是促进社会改良的工具。在1937年的上海，它还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因此，演剧界人士受到来自各方的侮辱和攻击，也是毫不奇怪的。“帝国主义的魔爪”企图“抱住旧世界不放”，这正成为“新的戏剧运动”的靶子。

在这种寒冷的气候条件下，男女演员们（蓝苹在文章中每次都用“他”，而把“她”字置于后边的括弧内，以表达她所要谈的既包括男演员，也包括女演员）必须锻炼和约束自己，成为不可动摇的“铁汉”。“他们不只是玩偶。”她大声呼吁。

她似乎想起了张庚，“她是我的女孩，不要碰她”，可能因为他比章泯更慈善一些；也想起了她自己的个人奋斗。她企图证明，她不只是有漂亮的脸蛋，还有坚强的意志，这应该也是令男性导演和作家们羡慕的。

戏剧要想实现其真正的社会功能，剧作家和导演必须具有“深刻的社会分析”能力。即使剧本是好的，如果导演的社会分析不够强或不正确，也不可能出现好的戏剧。但是，蓝苹坚持认为，男女演员在这一创造过程中也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他们必须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只有这样，才能对社会作出正确的分析。

他们不应该被自己漂亮的脸蛋所左右，象在“资本主义的舞台上”常发生的那样。他们不应该只知背台词，还应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深入到剧本之中，与作家的写作意图相结合。事实上，他们应与剧作家和导演一样，具

有很强的创造性，因为社会用“同一尺度”衡量他们的劳动。

这篇文章辞藻华丽，感情充沛，态度武断，观点明显地左倾。《我们的生活》是一声战斗的呐喊，它代表了坚强的意志、勇敢的创造精神和独立自主的思想。

“很多人认为，演戏很容易，”蓝苹继续说，“只不过是背背台词，一会儿笑几声，一会儿掉几滴眼泪，一会儿握握拳头，如此而已，谁不会笑，谁不会扭几下？”她批驳这种谬论说，“演员也可能因为他（她）有这方面的才能，但是，如果他（她）不用功，意志不坚强，才能就会萎缩，就会成为一堆废物。”

她宣称，没有刻苦和勇气，只有“漂亮活泼”是不够的，——可能她想起了阮玲玉等的悲剧结局（我认为，她在这里把演员的个人成功与完成社会使命混为一谈），蓝苹是在告诉世界，她拥有美丽和微笑，但是她更拥有能力和勇气，在未来的任何领域，她都会运用自己的这些武器。

与此同时，还只有23岁的她，觉得自己能够为那些朝气蓬勃的男女演员们指一条正确的路。

蓝苹建议说，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表演才能，要不断地努力提高，其主要任务，是要发挥你自己在精神和身体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去适应你所适应的不同环境。这似乎反映了她过去的行为。

她一直在这样做。这似乎给人们一种印象，不管在什么地方——在舞台上，在左翼政治活动中，在婚姻爱情方面——她的眼睛都不是盯在当前的事物上，她一直在寻求超越。

蓝苹在文章中不时地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影响，她在分析戏剧表演时说，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因此，在舞台上也不单纯只是表演。A角色可能比B角色更适合于某一演员，但是，扮演任何角色都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

“表演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种生活手段。”蓝苹说。

蓝苹指责那些把她看作玩偶的导演，坚决地认为，演员也是创造者。

蓝苹声称，上海的戏剧环境是“有害的”，她要不顾各种压力，离开这种戏剧艺术和这种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她表现出了自己的表演技能，但是她没有也不愿受这种环境的摆布。她的创造性才能表现在扮演“娜拉”、《王老五》中的妻子，以及《狼山喋血记》中与狼搏斗的妇女身上。与这三个女人相比，她都有自己的不同之处，她自己把握了这种差异。

在中国革命的激流中，她年轻，可塑性强。几年来，她的“艺术”一直是在舞台上，但是在未来的日子里，她不准被舞台限制住。

就象一位在宗教家庭长大的青年，突然发现自己有演讲才能，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又能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的才能，他会选择牧师的职业。蓝苹也曾一度把自己向上爬的野心与演戏结合起来。

但是，她肯定自己的动机很强烈，使她不可能依附于任何艺术、任何事或任何人。正如她在《我们的生活》一文中所说：“要用我的精神和身体，去适应我所处的各种环境。”

“她意识到她不得不离开上海，”唐纳对一位朋友说，“她的《我们的生活》这篇文章是她去延安的通行证。”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西北的根据地。

对唐纳来说，蓝苹是太要强了，她的野心不断膨胀，以致戏剧再也容纳不下。她的下一个男人必须也非常要强，她的下一块天地必须更加广阔，不仅需用感情去打动自己的观众，而且能实际控制它。她曾经说过：“永远不要忘记，魅力远没有权力重要。”

第三章

在延安：毛的家庭主妇（1938—1949）

在远离上海的陕北高原，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旁，有一座灰色的小城。泥土垒起的房子，纸糊的窗户，只有大街两旁觅食的小鸡的叫声，打破这里的平静。大街上偶尔走过几头驮着东西的毛驴，炊烟袅袅升起，锅里只有小米饭。在最高的一座山头上，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宋代建的宝塔，为这里带来祝福。

土墙上的大幅标语，学校操场上练习搏斗和刺刀的精瘦的战士，手持毛瑟枪站在毛泽东等领导人门前的卫兵，只有这一切才表明，位于中国大西北的这片宁静的小城，不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小镇，而是中国共产党起决定性作用的前哨基地。

太阳落山了，周围的山头一片枯黄。延河水泛出层层涟漪，河边的一块石头上坐着一位少女。卡其布制服卷到膝盖，两只长腿叉开，双脚泡在浅水中，她一只手拿着一块肥皂，另一只手拿着一件脏了的制服。好一会儿，她也没有注意到旁边还站着一个人——陈杰克，这位艺术家刚来延安不久。陈和她打招

呼，这位迷人的姑娘马上回之一笑。她站起来的时候，陈才发现，这是苦笑。她伸了伸腰，盯着刚洗完的衣服。因为还有事要忙，她没有与陈继续谈下去，捡起湿衣服，匆匆地回接待站去了。她当时待在那儿。

对蓝苹来说，过去的几周是她重新确定自己位置的几周。在日本人的大举进攻下，上海沦陷了，共产党组织了几个在政治上很有影响的艺术团体，组织他们成立抗日救亡剧团，分散到四处，去为受苦受难的国民演出。蓝苹所在的业余实验剧团由她的男朋友章泯负责。先是从上海乘火车来到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蓝苹想知道的是，她能否如愿以偿地进入四川，那里有很多上海演剧界的人上。

蓝苹的过分直率，以及她与唐纳的分手，使她树了不少的敌人。再说，她又不是著名的影星，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工作，或得到任何自己想要的角色。史东山一直是态度暧昧，他说蓝苹只不过是一个很平庸的演员，她怀疑他瞧不起自己。

她到了武汉，在这里呆了两周。从上海到四川，武汉差不多是一半的路程，郑用之回忆说：“蓝苹要见我，要我帮她找一份工作。”这位导演当时在中央电影制片厂工作，“她托了郭沫若的秘书阳翰笙。”郑用之两次拒绝见她，因为他认为，他帮不上她的忙。“1937年7月份，我这里没有空缺，用不着再雇女演员。我不想见她的第二个原因是，唐纳当时在我这里。他一直很恨她，所以，对于雇用她我不得不慎重考虑，因为唐纳不愿再见到她。我想，她可能不久就离开了武汉。”

蓝苹意识到，她可能不得不离开萧条的电影业。

蓝苹能够吃苦，至少她反对日本人的侵略，然而，她同时也希望自己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她的一些朋友感到，蓝苹好象已经决心在共产党的活动中扮演一个角色，而不是纯粹的艺

术上的角色。唐纳曾对他的一个朋友说：“瞧吧，她就要离开上海了，一旦决定下来，她就会想办法在延安钓一条鱼。”他们当时还不能肯定，但是他们也知道，蓝苹要进行一次新的冒险。

蓝苹有自己的梦想，她认为，她能够把艺术和生活结合在一起，而且不偏废其中任何一个。到延安，她要在剧团工作，但同时，她也要在这块共产党的根据地实现自己。

在延安，有两个人，而且是共产党的要人，可以帮助她起步。一个是她在青岛时的丈夫俞启威，他也在这前后到达西北。蓝苹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可能她知道这件事。一个是她的同乡康生，康生在青岛大学毕业后做诸城小学校长时，她就认识他。后来康生到苏联留学，回来后就到了大西北。可以肯定地说，蓝苹知道，自己可以依靠这座“靠山”。

因此，她到了黄土高原上的这块地方。她希望在这里能发挥自己“各方面的才能”。这里是另外一个世界，不同于上海，就象上海不同于诸城一样。她要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未来。至少可以说，要有所变化。

西安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有着宽阔笔直的大道，低矮的带着院落的建筑。佛教的大小雁塔俯视全城，好象是在保护着这个中国内地通往欧亚大陆的战略门户。在这中日交战正酣之际，西安成了一座政治的桥梁，连接着争吵不休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国共两党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并成立了所谓的“统一战线”，这里，是从蒋介石的“白区”（西安就属于白区）到毛泽东的“红区”（1937年1月，总部迁至延安）的交通要道。

1937年7月末的一天，蓝苹来到了西安。她带着自己的两包行李和一点积蓄走下火车，然后坐马车来到共产党的八路军

驻西安办事处，这是毛的中国驻在蒋介石辖区内的一个使馆性的机构。到红区去的所有人们，都要先到这个低矮的、白色的营房接受审查，并得到批准。

在去西安的路上，蓝苹遇上了李丽莲。这位年轻的女演员也是刚离开上海的戏剧界。她后来不久就与奥托·布劳恩结婚。这位隐居的德国人是共产国际派给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是莫斯科企图支配中国革命的工具。未来的布劳恩夫人一路上更加了解了蓝苹：吱吱喳喳，好奇心强，神经质。

蓝苹不是一位普通的朝拜者。她变了，不再是普通的女学生，普通的费先生的家庭主妇，普通的演员，也不是普通的唐纳的妻子。没有人护送她去大西北，她也没有接受党的指令或有明确的使命。但是，她带着投机的心理，企图来这里找到些什么。“我自己要求去那里的。”她承认说。

在共产党的中国，每一个人都属于一个“组织”，个人的生活和行动都受到组织的监视。他或她也常常谈到自己所属的组织。蓝苹希望，与自己组织中的其他人员相比，自己能占据一个闪光的位置。因此，她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组织到另一个组织，带着中国人少有的不安分。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不管是结婚，还是独身，不管自己是有工作还是到处流浪，从本质上来说，蓝苹一直都是一个人的组织。

在西安的两周时间里，她似乎与其他的同路人不合群。他们没有个人的目的，而她则是一个非常自信的漫游者，她的情况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同时也吸引了另外一些人。

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招待所里，蓝苹发现了徐大姐。徐在上海时曾与蓝苹有过政治上的接触，现在，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徐大姐已改名叫徐明清。她已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这位自己以前的下属了，她感到很惊讶。当蓝苹和她谈起自己的时候，她不

自然地笑了笑，她不明白，她以前的“小妹妹”李云鹤怎么变成大明星蓝苹小姐了。

徐大姐早已知道蓝苹会搞小阴谋，蓝苹对她很警觉。精于算计的蓝苹这时在考虑，自己的角色要进行怎样的转变，才能适应新的环境。她感到不安的是，她在上海的一些事会给她带来不利的影晌。到了延安，他们会不会知道她曾被捕入狱？当时还写了“自白书”。国共两党刚成立统一战线，她肯定还会遇到在上海时的熟人，他们会不会漏出自己在上海的底细？她想到了这一点，她知道，有些人肯定会对她在上海时的生活作风问题指指戳戳。如果这样，她就不得不拿出童年时的悲惨生活作为挡箭牌，不知这样能否打动共产党的领导人？

徐大姐和小蓝妹相处得很热火。她们意识到她们需要互相帮助，她们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聊天。蓝苹正在靠近政治的漩涡，如果想要成功，她需要她以前“组织领导人”的大力帮助。

住在招待所里的很多妇女都穿着臃肿的衣服，只有蓝苹的服装得体，身材苗条。在这种环境中，忘掉自己的外表成了一种规范，蓝苹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炎热的夏天，她蹦蹦跳跳地跑来跑去，哼着歌子（象《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不停地打听大西北的生活情况。

她见人就笑，似乎生活中充满了欢乐，不停地发表评论，还常能找到逗乐的事。一遇到高兴的时候，明亮的大眼睛放出光芒，她圆润的歌声也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

经过舞台训练的蓝苹，在着装方面很有经验，她知道怎样在特殊的场合穿上特殊的服装去创造一种特殊的效果。到西安后，她脱下了旗袍，也丢掉了梳妆打扮的癖好。穿起分不清性别的衣服，腰间扎上一根皮带。服装是战士服装，但头发还是油光发亮，她把长长的头发梳成两根辫子，又选了一条蓝色的

带子扎起来，即使这样，在去延安的一批妇女中，她还是够惹人注目的。

在大男子主义的环境中，女人之间可能相互嫉恨、互相争斗，也可能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穿着一身制服，象麻袋片一样的徐大姐津津有味地听蓝苹谈她在上海的电影生活，影迷们向她欢呼，给她写信，给她送花。蓝苹在吹嘘自己的演员生活的同时，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她说，虽然她碰巧当上了演员，但是她生活中的事业还是革命的政治活动。她们二人一起吃饭，坐在硬板床上聊到深夜，谈自己的过去，谈革命和战争的未来。领导批准她们去延安，她们决定结伴同行。一个薄雾朦胧的早晨，六点钟左右，她们坐上一辆卡车，开始了第一段行程。

对于蓝苹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有黑色的山羊，农民们穿着蓝粗布衣服，扎着白羊肚手巾。对上海来说，这里和月球一样遥远。与她童年时代的山东相比，这里的农民衣着不整、骨瘦如柴，黄土弥漫的山坡在她看来根本不可能种庄稼。

一场暴风雨刚过，道路泥泞难行。她们搞到几匹皮包骨的老马，企图继续赶路。有的人努力骑了上去，蓝苹却是白费劲。当地的老乡知道怎么和马交谈，她却不知怎样才能爬到马背上去。

这位后来成为“骑马迷”的女士，在愉快地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不知道怎样骑马。”

蓝苹发现，她一骑上去，马就低着头，一步也不往前走。她不得不向别人请教——这位来自上海的艺术家在这里显示了才能——她愠怒地跳下来，抓起一根柳枝，又从马屁股上爬上去，然后猛抽几下。

“马一下子惊了，疯狂地朝前跑。”她回忆说，其表情好象

是在谈她的某一个丈夫。

但是，这几下没起多大作用，在朦朦细雨中，漫无目的地跑了一阵，老马便精疲力尽。

蓝苹、徐大姐及其他的投奔者浑身上下溅满了红泥。雨停后他们乘军车继续前行。在1937年8月的第三个星期，他们一行人到达洛川。

这是一个小镇，光秃秃的小山上有一间低矮的草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围坐在一张长长的木桌旁，屋内烟雾弥漫。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讨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这篇报告。它的作者是这间屋里最有权力的人物，此时他也坐在这里，这就是毛泽东。

徐大姐能够陪蓝苹经洛川到达延安，因为她的丈夫王观澜这时正在这里参加会议。王观澜是统战部部长，也是从上海过来的。她们二人住进了当地老乡家的草屋里，准备等会议结束后，一起去延安。

第二天，蓝苹起得很早。这是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早晨。四周一片宁静，空气清新，驴子的叫声可以传出几里路远。初升的旭日把周围的黄土山坡染成桔黄。天空很低，蓝苹感到，自己几乎能摸到它。不管怎么说，他们并不是很惨。

该吃早饭了，这里没有上海的烤面包，只有小米粥。吃饭的时候，蓝苹听说，政治局会议昨天半夜结束，参加会议的人员和蓝苹这一批逗留者将在七点钟出发，到延安还有五十多里路。

他们爬上卡车。蓝苹与徐大姐和她的丈夫王观澜坐在一起，等待着出发的命令。一些主要人物纷纷走出草房，口袋里别着自来水笔，坐在准备好的轿车中。他们一个个都显得很自信，这使蓝苹感到很惊讶。在蓝苹看来，他们象是在排演一出政治剧，

这些站在舞台上的演员们，一个个衣着俭朴，举止粗犷。蓝苹想看看自己的头发是否很乱，可惜卡车上没有镜子。

人群中的一顶轿车还空着。卡车上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小草房。和一般的明星一样，毛泽东最后一个走了出来。他个子很高，身材瘦削，笑容满面，长长的头发，象一位上讲台讲课的教授。

“那就是他。”王观澜悄声对蓝苹说。初来乍到的人也都早已听说他的名字，但是不能盯着他看。毛泽东的出现还是引起一阵骚动。蓝苹突然感到一阵紧张，她这时才发现自己的年轻和政治上的无知。在共产党领导的这个世界里，还有这么细小的差别，还有很多她闻所未闻的秘密。她会不会淹没在这个海洋中？走向延安的她会不会成为一个傻瓜？

多年以后，蓝苹回忆那天早上的情形时说：“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走过来向我问好。”这是扯谎！毛的高级同僚和对手张国焘当时在场，他回忆说：“她当时只是一个艺人，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谁也不知道她是谁，但是她吸引了一些人的目光。也就是说，领导同志没有和她打招呼，但是的确看到了她。”

大队人马开始出发了。蓝苹以尽量严肃的目光看着陕北的黄土高原，被水土流失严重侵蚀的山丘上很少有几棵树。但是，她的心已开始想这批很自信的共产党领导人召开的这次神秘的会议，她在沉思。毛泽东看上去有40岁，而她只有23岁，对她来说毛似乎老了些。他的妻子在哪儿？她在问自己。

队伍快到延安的时候，蓝苹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在延安城的南大门上，她看到两个古老的字：“安澜”。安谁的澜？安的力量在哪儿？

延安是共产党抗日游击战的指挥协调中心，这座小城只有

五千居民。延安比一个欧洲的乡村强不了多少。这里根本没有工业，汽车如剑龙一样稀少，机场是一片黄土飞扬的平地。大多数延安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上厕所。

延安附近的陕北农村是中国最穷的地区。据说，这里的人一生只洗两次澡：出生时一次，结婚时一次。1928年——1929年的大饥荒，这里有三百万人饿死。幸存者中，大多数人不识一字，他们不知北京在什么地方，不知日本侵略者是谁，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何时出生的。

蓝苹不得不自己动手洗衣服，在泥浊的河水中一泡半天。这里没有上海常见的那种社交活动和娱乐活动，她每一刻都必须忍受自己的痛苦。

在延安，人们为某种精神支柱而生存。因此，蓝苹和大多数人一样，不顾脏臭的衣服、臭气熏人的厕所、床上的虱子，因为他们有更远大的目标。

如果说，蓝苹来延安的动机是复杂的话，其他很多人也是如此。有的是因为国民党统治区太危险，没有个人自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有的年轻人跑到延安来是为了逃避家庭的包办婚姻，有的不能付起上海一些大学的学费，还有的纯粹是出于好奇。

在上海，共产党的任务是模糊的，在延安则与此相反；在上海，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混为一体，在延安，到前线去冒险与共产主义事业也是合二为一的。这与1949年以后的情况不同。

在三十年代后期到达延安的青年人中，蓝苹的意志力是出类拔萃的，但是，她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也没有政治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她只知道几句术语，了解得很少。她在谈论战争和革命的时候，似乎是在谈论京剧中的英雄和奸臣。她只知

道“我们是正义的，他们是错误的。”她对一切都充满着激情，有一种斗争的思想。但是，对她来说，历史还是一本没有打开的书。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对社会作出正确的分析，她所拥有的，只是冒险的准备。

在其后的六个月中，蓝苹主要考虑了两件事。在“艺术”领域，她需要从党内寻找一只绿灯，使她能够开始工作和学习，进而开始自己的事业。在“生活”领域，作为一个女人，她需要在延安留下自己的痕迹，尽可能给死气沉沉的延安注入一些上海的春风。

在接待站的食堂里，蓝苹津津有味地吃着定量供应给自己的东西——带着她自己认为的无产阶级感情。早饭的小米粥，她边喝边说味道很好，尽管她在心里讨厌这粗糙的伙食，很怀念上海的生活。轮到她参加军训的时候——到延安的人谁也不能免去这一项——她灵活地移动着自己的身体，还带有几分演员的优雅。她有点卖弄似地双手握枪，还真有几分味道。

这位乡下姑娘的某些特点又表现了出来。或许是在延安过了一段时间她终于发现，在这里，俭朴才受到欢迎。在上海时，她的生活中充满了竞争和浪漫。在延安，红军战士通过烟盒等收集上海的电影明星和白俄罗斯芭蕾舞演员的照片。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蓝苹就是这些明星中的一个。

在某种意义上说，蓝苹还不符合延安的要求。因为，在大西北的这块地方，一个人有无某种特殊的才能是其次，重要的是其过去有没有很好的政治表现，这一点才能决定其能否很快地被承认。蓝苹没有这种经历。1933年到上海时，她走进了一片广阔的动荡不定的海洋，在那里，每个人都以自己愿意的方式生活。当1937年到延安时，她等于敲响了军营的大门，在这里，有固定的义务。要想被承认，首先要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检

查。

蓝苹是一位没有什么成绩的共产党员，与参加过长征（如毛的妻子贺子珍和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二十——三十年代在国外留过学和从事过劳工运动或教育的妇女（如李富春的妻子蔡畅和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不能相比。

蓝苹也不是一位有成绩的知识分子，否则，她可以得到一份教书或编辑的工作，如丁玲写过不少的小说，当时是共产党的报纸《解放日报》的文学编辑。^{*}蓝苹不得不从头干起，虽然她认为自己是一位革命的思想家。但是，她有两件法宝可以帮她的大忙：上海培养出来的气质和吸引男人注意自己的能力。

和初到上海时一样，她又回到了过去。这部分是因为环境的因素，部分是因为她一直有要求自立的意志。归根到底，她是想做一个有强烈个性的吸引人的年轻女性。不管怎么说，她要对蓝苹做一番改造，要让她的“生活”适应于她的“艺术”。因为她知道，在这里，作为女人的蓝苹比作为演员或共产党员的蓝苹更能起作用。

一天，蓝苹遇上了朱光，这位27岁的上海人在党的宣传部门工作，从此开始了一连串的故事。一位当时在延安的人回忆说：“他们一天到晚在一起，到1937年秋天，大家都认为，他们就是一对儿。”朱光长得很漂亮，也很健谈。他曾经是上海大学的学生，老师之一就是田汉。蓝苹和他都发现，他们在一起有很多话题。

“蓝苹申请恢复她的党籍的时候，”一位当时接待过她的官员回忆说：“她总是和她的朋友朱光一起到我的办公室来。”蓝

* 丁玲和另一位从上海来的女演员——蓝苹的仇人陈波儿，刚到延安不久就被送到党校学习，因为她们以前从事过政治工作，而蓝苹则等待了好几个月才到党校学习。

苹也总是穿一件中式裤子，一件浅色的工作服。他们很活泼，笑容可掬，具有艺术家的风度。很显然，陕北的风还没有吹走他们身上的上海味。

与朱光的罗曼史没有持续多久。有人说，因为蓝苹发现，朱光不能作为自己的“靠山”。至于蓝苹的真正感情，我们无从知晓。我们所能知道的是，他们的关系结束的时候，蓝苹还是住在接待站里，还在等待着党的检查和分配工作。

冬天来了，蓝苹也找到了自己的两座“靠山”。一座是徐大姐的丈夫王观澜，他代表蓝苹去找过李富春——著名的女革命家蔡畅的丈夫；还找过有关部门，因为他们负责审查从上海和其他白区来延安的人。另外一个俞启威，他也找过李富春，和他谈蓝苹积极要求“参加革命”的愿望。现在，俞启威发福了，再也不是在青岛大学读书时那种穷困潦倒的模样，讲话也是一口官话。他不住在延安，但是经常来延安向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汇报共产党在白区的活动。

蓝苹需要王观澜和俞启威为她说几句好话，因为第一，她在上海从事过什么政治活动谁也说不清；第二，在国民党狱中的那段经历象阴影一样一直笼罩着她。她在西安时就和徐大姐谈过自己的担心。但是，关于她在青岛的那段时间，俞启威能帮她的大忙。她的确是在1933年2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点，谁也没有俞启威清楚。至于蓝苹在上海的经历，可以肯定地说，俞启威也不大了解……

徐大姐帮蓝苹证明了她在上海的活动。当然，徐大姐也曾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但是，她有王观澜这样的丈夫，她能够帮助蓝苹。因为蓝苹的魅力和勇气令她敬畏。

当决定权停在李富春那里的时候，蓝苹去找了张国焘。一位当时在延安的人回忆说：“她之所以去找张国焘，因为她知道

他的地位很高。”但是，张国焘现在已经败在了毛泽东的手下，作为边区政府主席，他手中无权。他们的关系没有得到发展的第一个原因是，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一位著名的革命家，于1937年末突然来到延安，和她的丈夫在一起。

杨子烈愤怒地回忆说：“蓝苹是一个放荡的女子，她好象离了男人就不能活似的。”

杨子烈回忆说：“在延安，我丈夫的办公室是唯一的西式砖瓦建筑，有床，有炉子，很舒服。”她描述当时的情况说，“蓝苹经常和一个姓王的男演员在一起，只要她知道我丈夫不在办公室，她就带着那个姓王的住进去。他们离开后，床和炉子都还有热乎气。”或许杨子烈到延安正是时候，或者蓝苹只是开玩笑，或许她想给延安一点儿上海的礼物。她很了解张国焘，不管怎么说，她可以自由地出入他的办公室。

李富春作出了决定，蓝苹进入党校学习。当时一位处理这件事的人回忆说：“李富春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很不情愿，但是俞启威影响了他。”蓝苹往前迈进了一步。当时，这所学校还没有成为党培养自己的积极分子的场所，而是主要对那些正在接受考验的人作短期训练。对蓝苹来说，这里是很合适的地方。教室以前是天主教堂，在300名学员中，只有10名女学员。蓝苹象是鲑鱼堆中的一条小金鱼，她非常认真地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听军事讲座时也是全神贯注。

一位当时曾教过蓝苹的女干部回忆说：“蓝苹讲话不多，她也不可能多说，因为她对政治了解得还很少。”其他的一些老资格的或受过教育的女学员都“看不起她。”

蓝苹在学校的第十二班。一天下午，全校学员集合在学校礼堂里，要听一位领导同志的讲话。他们手捧着笔记本，因为

天气寒冷，不得不轻声地跺着脚。下午两点整，这位领导同志很准时地出现在讲台上，原来是毛泽东。人们起立、鼓掌、微笑。有人说，蓝苹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还用手指了指毛泽东，而且鼓掌的时间比其他任何人都长几秒钟（她后来的回忆与此稍有不同，她说，毛从人群中单独把她叫出来，给了她一张去听讲座的票，是毛泽东在马列学院的讲课）。

当天晚上，蓝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她曾经见过他，为了进一步引见自己，她说自己有很多理论问题搞不明白，再说只有面对面的交谈才能解答她的问题。

一些贬低蓝苹的人说，她几乎是强行走进毛泽东住在凤凰山上的三间窑洞。没有等到毛泽东回信，她就风风火火地来到了毛的住处，象老朋友一样和卫兵开玩笑，还没有等到卫兵让她进去，就和毛泽东打招呼。后来，她终于见到了毛，但是毛对她很冷淡，她问问题的时候，毛仍在看文件，只是给了她几个书名，让她自己去读，自己去找答案。

这是1938年早春的事。如果毛确实和蓝苹讲过话，那也是他自己想这样做。的确，蓝苹是一位很大胆的年轻女性，常常不打招呼就走进男人的房间。然而，要知道，毛的住处不是公共汽车站，在延安，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进去的。实际上，手持毛瑟枪的士兵日夜站在门前，可谓是重兵把守。

在1938年的早春，蓝苹的注意力似乎还没有集中到毛的身上。她依旧希望在表演艺术方面走自己的路。在这条路上，她遇到了一位来自上海的情人。

在延安，有一所鲁迅艺术学院，这是最适合蓝苹的地方了。多年以后，她说，她当时对此并无多大的兴趣，这是不真实的。实际上，她曾经费了不少劲，企图从党校调到鲁迅艺术学院去。但是，她对去鲁艺以后的工作又有些拿不准。在处于战争之中

的延安，她还能象在上海时期那样闪光吗？她过去的敌人和对手会不会把她压下去呢？

蓝苹知道，袁牧之和其他一些她以前的同事们，正在大西北组织筹建一个电影制片厂，这是共产党发起的。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她没有好印象。当这家制片厂在延安开始工作的时候，没有邀请她参加进去。女明星是可爱的陈波儿，蓝苹很嫉妒她。在左翼电影圈中，她能否成功，甚至会不会受到欢迎，蓝苹一直是怀疑的。

她仰望着鲁迅艺术学院，就象一位受伤的芭蕾舞演员仰望着挂在墙上的自己心爱的那双舞鞋。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后来才矢口否认自己曾很想去那里。

为了纪念“一·二八”事件，在延安最好的礼堂演出了一幕抗日剧《被践踏的人们》。蓝苹经过试演，才得到一个小角色。一位当时看过她的演出的人回忆道：“简单地说，她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演员。”当时，主角是刚从苏联回来的女明星孙维世，她在苏联时专门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风格。“这位年轻姑娘很有才气。”另一位当时看过演出的人回忆说。

他同时又说：“纪念‘一·二八’的那天晚上演出后，观众对蓝苹的评价并不高，从此，她再也没有上过台。”可能这一角色不适合于蓝苹，可能她被孙维世所掩盖，因为孙很漂亮而且比她年轻七岁；可能对舞台演出已感生疏；也可能她不适应延安的口味。

尽管带着怀疑，1938年的三、四月间，蓝苹还是提出了申请，要求转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她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躲避党校的那种僵硬的政治学习。陈云接见了她，这是一位工作有条有理的实干家，后来成为北京制定经济政策的高级领导人。陈云没有答应她的要求。蓝苹在讲话时犯了一个错误，她总是喜

欢讲连自己也不怎么懂的马克思主义，生怕这位不懂艺术的陈云认为她只知道戏剧。再说，蓝苹的性子也太急，她带着自己的行李去见陈云，好象她当天就想进鲁迅艺术学院似的。

正在这时，一座“靠山”给蓝苹帮了忙。康生从苏联回来了，而且成了党校的代理校长。在中国，从同一个地区来的人彼此有一种亲近感，他们常常是互相帮忙。如果在一个很大的群体中，有少数几个人来自同一地区，他们会象兄弟姐妹一样。蓝苹和康生也是如此。从山东得到的信息说，蓝苹的母亲曾在康生家做过女佣。不管康—蓝的关系始于何时，有多么亲密，在青岛时，康生曾引导蓝苹参加左翼活动，并把她引见给她的情人俞启威。

蓝苹去见康生。他们用诸城口音交谈，谈过去，谈山东。可能他们的关系还较为暧昧。过了不久，蓝苹不仅进了鲁迅艺术学院，而且当上了教学助理。有人曾听蓝苹说：“有康生这位可靠的朋友，就没有敌人能伤害我了。”陈云没有象康生那样为蓝苹开后门，他很不高兴的是，康生干扰了正常的工作程序，在鲁迅艺术学院为蓝苹找了位置。不久，在一次校内演出结束后，陈云就找到了批评蓝苹的机会。*

蓝苹在一开始要求恢复党籍的时候，曾受理过她的申请的一位党的官员后来回忆说：“1938年夏天，她已经在鲁迅艺术学院了。当时，她正与徐一新恋爱。”徐是一位艺术界人士，漂亮而且聪明，在学院里是一位很有地位的教师。他是蓝苹曾经打过交道的那种人，而蓝苹也是他曾对付过的那种女演员。当时一位颇知内情的人回忆说：“和徐在一起，蓝苹很会卖弄风情。

* 后来，陈云和蓝苹在政治上有了交往，但是彼此一直互无好感。陈云和康生也是多年的仇敌。

这表明她爱他（后来，她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时候，就比较文静，这说明她更多的是尊敬他）。”徐和唐纳、章泯是一类人，与朱光有很大的不同。

蓝苹感到恼火的是，徐一新越来越多地注意孙维世，这位非常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在纪念“一·二八”演出的那天晚上曾使蓝苹大为失色。在这种时候，不管蓝苹是否愿意与徐生活在一起，主动权都已不在她的手中。徐对孙的迷恋并未因为蓝苹的恼怒而停止，他们不久就结了婚。^{*}

蓝苹强打起精神，全力以赴忙于自己的教师助理工作。这个学院教学的内容很全，京剧、乐器演奏、民歌，还有欧洲的歌剧。蓝苹在现代剧组。蓝苹给在上海的朋友写信说，她在教戏剧表演，同时兼做学生的“生活顾问”。

上海的一家曾报道过她的爱情波折的杂志，又发表了一篇写蓝苹现在生活的文章，文章依据她给朋友的信写成。读过文章后，会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现在的蓝苹，生活已经稳定下来，而且正在从事“革命的文艺”工作。其实并不完全如此。作为鲁迅艺术学院的一名小教师，她并没有到达自己满意的高地。她得到这些，也不是全凭自己的本事。一旦她找到一个理想的男人作“靠山”，她还会继续前进。难道女人要想前进非得如此吗？

当然，在过去的中国的确如此。在那种时代，女人只有通过自己的丈夫或儿子才能真正进入社交场合。在延安这种新社会，新的风尚也正在形成，女人可以有自己的职业，可以作为

* 多年以后，蓝苹对徐和孙都进行了报复。“文化大革命”期间，两人都受到了无端的指责和迫害，孙死在狱中。孙比徐一新活的时间长，后来，她成了金山的妻子。金山这位上海舞台上的克拉克·加布尔，1963年在上海曾主演过《赛金花》。因此，蓝苹有很多理由使孙难过，这是六十年代的事。

独立的个人存在，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选择理想的生活伴侣。

有朝一日，蓝苹终会不再需要一个“靠山”，但是现在，这一天还未到来。

蓝苹在鲁迅艺术学院的工作不久就受到批评，因为她教学效果不好，不能象演戏那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这无关大局，事实不久将证明这一点。

毛泽东感到，艺术有很重要的政治作用（尽管他个人只是对中国传统戏曲感兴趣），所以，有一天，他来到鲁迅艺术学院谈了这个问题。当毛泽东象一位不修边幅的教师走上讲坛的时候，蓝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蓝苹的脸比绝大多数学生都要白，他们出身于农民或是到延安的时间比她长。她首先鼓掌欢迎。讲话结束的时候，她又问了两个很容易的问题。毛要离开的时候，她又在讲台前与毛交谈了几句。

如果她不得不有一座自己的靠山的话，为什么不可以选择最高的一座！

延安是块小地方，埃德加·斯诺的夫人说，那里是人们“胳膊肘碰胳膊肘的世界”。蓝苹曾在洛川和延安党校两次见过毛泽东。1938年，毛泽东还是住在小城中的一个，而不是一尊蒙着面纱的遥远的神。人们常常看到他，他在开始夜间的工作前，习惯于走下山来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到附近的集贸市场逛一圈儿。每个人都认识他的汽车——汽车在延安很少——上边写着：“救护车，纽约华人洗衣工人救亡联合会捐赠。”绝大多数想见见他的人都能如愿以偿。

现在，蓝苹已经认识了他。的确，他两次出现的时候，她都尽量使他注意到自己，这是蓝苹的风格。但是如果愿意，毛泽东完全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看她。他没有。他们二人在其后的几周中见面好几次，在毛的窑洞里或在凤凰山的山坡上。不

是蓝苹，这位普通人群中的普通一员，挑中了毛泽东；而是毛泽东，这位小城中最有权力的人物，于孤独之中挑中了蓝苹。

也可能蓝苹对毛泽东特别具有吸引力。在爱情和婚姻很少同步的中国，这种情况不能排除。毕竟蓝苹才只有24岁，毛泽东已经45岁，这位研究政治和军事艺术的伟人与蓝苹在上海和初到延安时遇到的那些漂亮、浪漫、健谈的艺术家们完全不同。我们很难在深沉的毛泽东与活泼的唐纳之间找到共同之处，蓝苹在唐纳之后遇到的情人也都是唐纳一类的人。

“在这件事上，我不认为只是毛泽东采取了主动，”唐纳评论说，“我想，蓝苹曾对我做过的也会对毛泽东做一遍。她很迷人，同时，她又表现得很革命，这两点结合在一起，使毛泽东爱上了她。”这位蓝苹的以前的丈夫继续说，“我敢肯定，如果蓝苹不是从上海出来的，毛泽东不可能被她所吸引。你知道，上海和内地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生活很不相同，虽然内地的农民把毛泽东看作神。”

9个月前，蓝苹还在延安的接待站接受检查、等待分配工作。这是1937年岁末，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一位28岁的妇女住进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招待所，这就是贺子珍，毛泽东的五个孩子的母亲，现在名义上还是毛的妻子。她满脸病容，疲惫不堪。她和她的第三个女儿刚刚从延安来。

几个月前，在这同一个招待所，也住过一位年轻的女性，她活泼、爱笑、满怀抱负。她是在去延安的路上。现在，贺子珍疲惫不堪，满怀仇恨。她是在离开延安的路上。蓝苹和贺子珍，一前一后，走在同一条路上，朝着不同的方向，带着不同的梦想。蓝苹在寻求冒险和男人；贺子珍则对冒险、男人和生儿育女已深深地厌倦。

1928年，贺子珍遇到毛泽东并和他同居的时候，她是一位聪明活泼的18岁的少女（当时，毛的一位指挥官说，她的一双眼睛是“一对水晶”。和她在一起，心中会“象蜜一样甜”）。现在的贺子珍面色苍白，双眼突出，瘦得象一个稻草人。长征期间，她多次受伤，现在身体中还有没有取出的弹片，时常痛得她满头大汗。想起过去两年的事，她的心凉了。她也不知道从西安最终将去往何处。

她呆在屋里，两眼发直，坐在一张小凳子上。她努力集中自己的思绪。她想起了她的丈夫……在永新山上的第一次会面。那是一次政治集会，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会议结束后，他们两人在一起聊天，又在一起吃晚饭，吃了两只鸡，喝了许多酒……几天以后，毛泽东向他的几位同僚宣布：“贺子珍同志和我已经相爱。”……她很崇拜他。那个时候，毛年轻气盛，正在组建一支农民的军队，并希望有朝一日开进城市。她突然想起毛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1930年她被国民党杀害。他从未谈起过她……然后，她又想起最近几个月与毛的争吵。

绝望之中，贺子珍蹒跚地走到木床边。她躺在硬板床上，昏昏沉沉地睡去。

两个妇女走进屋来，她醒了。其中一个提着行李的女人，进屋后就把行李放在另一张空床上，贺子珍认出，拿行李的那个是邓颖超，周恩来的妻子。看样子，邓颖超是来送一位刚到这里的人。

贺子珍坐起来，强作笑容地打了招呼。邓颖超向另一位妇女介绍说：“这是贺子珍同志，毛泽东同志的爱人。”来与贺子珍同住一屋的是杨子烈——张国焘的妻子。她们两人握了握手。

第二天早晨，贺子珍和杨子烈同时醒来。她们一起洗了脸。

早饭是馒头和粥，她们边吃边谈。她们的丈夫张国焘和毛泽东这时已到决裂的边缘，可是他们的妻子却是同命相怜。她们相处很好，谈了整个一上午。

贺子珍很感茫然，她不理解杨子烈的延安之行（她的丈夫现在在延安，她已有七年没有见过他了）。“你怎么在这儿？为什么不回延安？”杨子烈问贺子珍。

“我的身体不好，我可能要去莫斯科治病。”

“但是，要是等安排好还得一段日子，你不要在这里等，不如回延安，我们还可以一起去。”

贺子珍的健康状况愈益恶化，她离开西安去了苏联，她的女儿和她一起同去。1937年初夏，她已怀上了毛泽东的孩子。这个孩子出生在苏联，但是出生不久就死了。

1937年，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已无可挽救了，这是事实。但是，博古的妻子在西安对杨子烈所讲的那些并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内容。在蓝苹和毛泽东走到一起之前，贺子珍已经对毛很不满。

延安时期，参加过长征的女同志大约有50名，她们享有很高的声望，地位也很高。不管是作为共产党的第一代革命家，如康克清，还是作为共产党上层领导人的配偶，如贺子珍，她们都经历了严酷的考验。

这些勇敢的女英雄可以到处施加自己的影响。不管是作为革命家的伴侣，还是她们自己作为革命家的形象，她们手中最大的武器是可以控制男人对她们的一些要求。因此可以说，她们在这方面具有垄断权。她们没有必要去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貌，从来也不需要化妆。头发太长有碍行动时，随便拿一把剪刀剪去即可。

到延安后，那些温顺、政治上落后的陕北乡下的妇女对这

批强悍的女英雄们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但是时隔不久，从上海和其他白区来了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姑娘们，这些“公主”摇曳了女英雄的宝座。尼姆·威尔斯注意到，离婚率开始上升。阿格尼斯·史沫特莱在毛的窑洞和毛谈过话后，曾写信给埃德加·斯诺：“毛对我说，所有这些女人（长征过来的女英雄）都反对跳舞，因为她们根本不会跳舞。”小时候裹过脚的女人，长大后跳舞不容易，很多女英雄都是如此。

史沫特莱成了现代思想的传教士，这对康克清及贺子珍这些女人是一种威胁。她谈论爱情，在领导人的窑洞与他们单独交谈。她提倡跳舞。斯诺在一份个人备忘录中写到：“女英雄感到，男人们在蠢蠢欲动。她们想方设法制止这种反叛。”特别是史沫特莱和贺子珍之间的个人仇恨不断发展，甚至到了可怕的程度。

在延安，如果没有史沫特莱这一角色，毛泽东的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婚姻很可能不会到来。

史沫特莱在给斯诺的信中写道：“我还没有使毛学会唱歌跳舞，但是很快使他的情绪产生这种效果。他对我说，如果他能去国外，他一定学会唱歌跳舞。”史沫特莱附加的一句话也使斯诺非常吃惊：“我认为，他会抛弃他的妻子，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事有凑巧，被派来作史沫特莱翻译的吴女士，也是从白区来延安的一位很有魅力的公主。吴是一位诗人、演员，离过婚。她有优美的线条，明亮的大眼睛，很优美的声音，这些在延安都不多见。她那飘散的长发和口红使延安的男士们领略了上海的气质。尼姆·威尔斯称她是“地方舞台上的贝尔纳”。

斯诺根据自己在伦敦与史沫特莱的私下交谈，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阿格尼斯和他谈了自己与查托帕迪亚博士的婚姻。她与这位著名的科学家生活在一起，在印度独立运动中，她既

是他的情人也是他的合作者。她告诉毛泽东，她生活中真正的爱情是‘闲聊’。毛问她，‘爱情对她们意味着什么，日常生活中怎样表达爱情。如果真的结了婚，遇到夫妻争吵怎么办？’”

史沫特莱回忆说：“他那孩子般的好奇心，使我感到吃惊。他告诉我，他常常感到迷惑的是，那些西方文学中描绘的爱情是不是真正存在？若存在，那会是什么样的？”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不属于这一类，在毛的心中，贺子珍只是一个英雄女人，一个能生儿育女的母亲，在精神气质上与自己不能相比。史沫特莱说：“他说，我是他遇到的第一个有过浪漫的（西方的）爱情的女人。他似乎感到，自己在这方面还是中国式的。”史沫特莱觉得，“在他们三人谈论爱情的时候，吴女士就是这一主题的化身。”

有一次，也是一个漫长的令人激动的夜晚，毛泽东背诵了一首他写的纪念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的诗。这给史沫特莱——实际上是给自己心灵——一个很明确的信息，贺子珍在他心目中已不占什么位置。而贺子珍这时正在一里之外毛的窑洞里，那里是他们的家。

与此同时，在两三千里之外的上海，蓝苹正与章泯同居，并在想方设法反击因为自己离开唐纳引起的批评浪潮。

蓝苹到延安的时候，这件事达到了高潮。她从毛、贺婚姻的破裂中得到好处，起初是因为机遇，后来则变成有意识的。她填补了贺子珍的位置，成为继贺之后的一个幸运儿。聪明的蓝苹成了“西方浪漫爱情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向党汇报了这件事。党内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但是中央委员会一致同意，这件事不能“公开”。然而，纸包不住火，贺子珍到处宣传。再说，她与毛的婚姻也已终结，贺子珍不会再对毛敞开自己的心扉。

贺子珍智穷计尽，与毛多次争吵并打架后，她已无计可施，1937年底，她不得不离开毛泽东。在这之后不久，张国焘的夫人就在西安遇到她。毛泽东没有要贺子珍离开黄土小城延安，这时候也没有提出离婚问题。

1938年的前几个月，毛泽东一个人生活。

杨子烈向毛泽东提出了告诫，她在西安时就对贺子珍说过她会这样做。她责备他：“都是你的错，你要马上写信，叫她回来。”毛泽东虽然一肚子火，但还是没有对张国焘的夫人发火。几天后，他突然遇到她，毛说：“我给她写了信，但她不会回来的。”杨子烈不能确定毛是否真的写了信。据当时接近毛的人说，他是写了信（或发了电报）的，当时是1938年1月中旬。她回信说，她不想再见他。

可能贺子珍心里真是这么想的，她是这种人。她要毛泽东求她回来，即使毛泽东求她，她也不一定就回来。至于贺子珍以后是否为此事后悔，我们无从得知。

蓝苹说她从未见过贺子珍，她对自己的这位前任的评价时常有出入。^{*}因为她也隐隐约约地感到，贺子珍与毛泽东离婚，有这样的结局是很自然的。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结合体，他把他们引入中国革命之中。

蓝苹说，贺子珍不配毛泽东，因为她出身于地主兼商人家庭，“习惯于过城市生活”，“看不起体力劳动”。的确，贺子珍是出身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比蓝苹强得多。但是，贺子珍勤劳、温顺、政治军事经验丰富，自1927年起就是中共党员。与蓝苹相比，贺子珍的城市生活经验等于零。

* 她对维特克说，共产党一到陕北（1935年底），贺子珍就离开了毛泽东，还说，她1937年8月到延安时，毛泽东已经与贺子珍离婚。她这样说，实际上是想为自己辩护。因为有了她，毛与贺子珍的婚姻才彻底完结。

难道蓝苹真的相信，任何女人都应该比贺子珍更顺从于毛吗？难道她真的发现，女人的阶级背景就能决定其是否能把握自己的生活？

1937年后，有人问蓝苹关于贺子珍的精神病问题，蓝苹的回答前后不一致，“艰苦的生活环境使她绝望。”看上去，在蓝苹的心中，有两个贺子珍：一个是作为自己对手的贺子珍，一个是作为女人的贺子珍。在某种程度上，蓝苹把贺子珍看作是她在争夺目标的对手，然而对手失败了。

年轻的蓝苹没有意识到，贺子珍曾忍受过的，有朝一日也会落到她头上。然而，蓝苹作为毛的妻子，与贺子珍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

就在蓝苹与毛泽东同居不久，毛的婚姻达到了第二个高峰。

布劳恩的夫人李丽莲也是一位演员，她与蓝苹一起到达陕西西安。布劳恩说：“我们举行周末舞会的时候，蓝苹一开始还是我们的客人。但是不久，她就不来了。因为这时，她与毛泽东的事在党的高层领导中也引起了不满。”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嫁给了毛泽东最小的弟弟毛泽覃。在毛泽东到达延安之前，毛泽覃就被国民党杀害。但是毛到延安不久，贺怡也来到了延安。她现在的丈夫夏征农是共产党的一位高级官员。贺怡和夏征农坚决抗议毛泽东抛弃他们的亲属贺子珍。

夏在谈到蓝苹对毛泽东的影响时说：“毛主席的身体变得很弱，证据就是，现在他在与人交谈时常常借酒提神。”夏为了与自己的前妻离婚而与贺怡结婚，在党内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拖了好长时间才得到批准。然而，在他看来，毛泽东在这方面也做得太过分了。

对于贺怡和夏征农的不满，毛泽东不仅装作没有听见，他还把夏征农调到南方去工作，以阻止他们的抗议。

长征过来的女英雄、贺子珍的亲属以及一些学生都反对这一婚姻。然而，并不仅仅这样，毛泽东的许多高级同僚也对此持不同意见。

中国并不是一个清教徒的社会，象有时人们认为的那样，而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规定的职责。完成自己的职责永远比行动过程中涉及的“道德问题”更加重要。因此，蓝苹在其成年生活中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很少因为其生活作风问题，更多地是因为她对这种制度的反叛，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延安时期，性的问题也是如此。

党认为，为毛主席选择一个女人“支持”他的工作，是革命事业的需要。但是，党也要保留一定的权利，如何对待前任“支持者”，共同确定主席是否真的需要这位“支持者”？

在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及其他反对毛一江婚姻生活的人看来，第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毛泽东和贺子珍还保持着婚姻关系，蓝苹就插了进来。他们都很了解贺子珍，也很尊重她。这与党的制度相抵触，也与延安普通的看法相违背。第二，他们认为，让蓝苹来“支持”他们的主席，这个人不合适。高层人物博古的谈话代表了大家心中的疑虑，蓝苹的“过去不是很单纯的，她与国民党圈子内的联系也不清楚，与共产党的关系还很模糊。”

毛的一位正在走下坡路的手王明说：“革命的领袖应该更加注意自己的私生活，注意自己的行为。”（这些受共产国际影响的人物，王明是他们的代言人。他们认为，毛泽东和蓝苹在私生活方面都是乡巴佬的近视眼。）

因此，1938年后期，蓝苹在军事委员会做档案员的同时，还

不时地与毛同居，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几乎每个人都希望有某种变化。

蓝苹则我行我素。毛泽东比她大 21 岁，差不多可以做她的父亲。因此蓝苹时常怀疑自己是否已真的抓住了毛泽东。当然作为毛泽东的夫人，比作为一个漂亮姑娘要理想得多。

在党中央委员会，有些人出于对贺子珍的尊重，对这件事持强硬态度。有些人可能希望，这件事的结果是把蓝苹弄到一边去。

与其他任何人相比，毛泽东却不愿意做出让步。但是，他也不得不面对这些事实：贺子珍的控诉，党的压力，也可能会因此而不得不疏远与女人的联系。1939 年夏，经过两名高级医生检查，发现蓝苹怀孕了。这一事实使毛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这件事，党中央也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主席与电影明星”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有人帮忙就意味着有了一切，自己的才能倒在其次，特别是在政治和感情交叉的敏感领域。现在，来自蓝苹的老家山东的政治特务康生，就为她帮了最大的忙。

康生，聪明、易动感情、诡计多端，在成为骗子之前，就是一个无赖。41 岁的年纪就成为秘密工作的专家，因为这一优势，他很快就成了毛泽东政治圈子里的内线人物。

康生从 1938 年夏天起，就支持毛泽东与蓝苹的同居。1938 年秋，他在党内带头支持毛泽东与贺子珍离婚，并克服党内的抵制势力，支持毛与蓝苹正式结婚。

康生知道，这件事成功后，会给他带来不少好处。因此他为蓝苹的过去作担保，这是这一问题的关键。他谈了蓝苹在山东时的表现，在这一点上，谁也不比他更有发言权。至于蓝苹在上海时期，没有与党保持联系，他认为，这是条件的限制。他

从徐大姐写的材料中抽出有用的部分，证明自己的看法。他把各种材料分门别类进行处理，不利的部分全部毁掉，有用的部分加以折光润色。他还利用自己的部下向组织汇报，以证明蓝苹到延安后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好。

康生还亲自出场，以表明自己是蓝苹的表演艺术的崇拜者。一天晚上，蓝苹参加演出《打渔杀家》时，观众看到，康生坐在台上打鼓，这个狐狸精还很卖力。作为共产党的一位高级官员，康生的逢迎拍马立即产生了效果，形势对这位年轻的女人越来越有利。

康生象一位下棋的老手，他不会忽视棋盘上的每一颗棋子。在这种关键时候，他利用了毛岸英。毛岸英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儿子，当时17岁，还没有去苏联。在康生的幕后操纵下，毛岸英也说贺子珍不好。

亲自登台为蓝苹打鼓，用孩子的感情作为证据。

这场战斗不容易。周恩来和刘少奇不算是党内的强硬派，但他们对蓝苹也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有必要往上海发一封电报，调查一下蓝苹的背景。当时共产党驻上海的代表是刘晓，后来成为中共驻莫斯科大使。刘回电说：“怀疑蓝苹是国民党派来的秘密特务”。

最后产生了妥协，有人说这是斯大林的主意。不管怎么说，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这三位主要人物同意了这一决定。这样，各方均有所得。毛泽东与贺子珍离婚。多年以后，蓝苹坚持说这是贺子珍的请求，有人指出这是毛的请求，在当时的条件下，党勉强地默许了毛泽东的这次婚姻，但是，毛首先还是需要离

* 当党内发生斗争时，“秘密特务”的头衔足以使问题发生质变。蓝苹与崔万秋的联系就足以使她的敌人加给她这顶帽子。

婚。

蓝苹成了毛泽东的正式夫人，对毛泽东私生活方面的压力解除了，但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中央要求，蓝苹婚后只能作为家庭妇女照顾毛主席，不能涉入任何政治生活。这样长达31年。

蓝苹因为不是长征过来的女英雄，所以党认为，她没有资格接受一个政治上的角色。

康生和蓝苹形成了一种有用的联系。一位爱耍花招的天才与一位聪明过人的学生结成联盟。蓝苹为康生阴险的治理国家的本领所迷惑，康生则发现，蓝苹能帮助他取得更大的权力。他们很巧妙地相互利用。

一天，在延安机场，美国武官大卫·巴列特看到周恩来出发到南方去，邓颖超到机场去送他。周恩来登机前，回过头去与邓颖超告别，没有人见过毛泽东曾这样吻蓝苹。

周恩来一直对邓颖超十分忠诚，同女人也保持比较友好的关系。毛泽东与周恩来不同，他在职业上并不尊重女人。周恩来和女人接触是十分注意的，举止有礼貌，关心她们。他一生中，不管旅行到何地，总是每天与邓颖超通电话。

毛泽东特别被女演员所吸引。和某些手中有权的人物一样，他也发现这些来自娱乐世界的女人对政治家很有好感。他并不鄙视女人——而是不能把她们与自己同等看待。蓝苹在上海时就了解这一点，女演员一般被认为是水性杨花的、轻浮的，也可能发脾气，性格有缺点，但充其量只能是演演戏。

然而，毛希望他的妻子有个性，他喜欢活泼而勇敢的女人，后期尤其如此。在蓝苹身上，毛泽东发现了这一点。他感到，这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他希望，她的意志能服从于他的意志。为了丈夫和丈夫的事业，她应该坚强起来，而不是作为一个独

立有个性的只顾自己的女人。

毛泽东自身的经历也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蓝苹则使毛泽东开始了与以前不同的生活。蓝苹与毛以前的任何一位妻子都有不同，这种不同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间的历程。

1908年，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还在位时，毛泽东第一次结婚，这是父母包办的婚姻。新娘象一件包裹一样作为礼物送给了少年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第二次婚姻是在1920年，与杨开慧浪漫的爱情在“五四”运动的热情中开花结果。在那种充满热情的浪漫的年代，男女学生完全平等，他们相信，用他们的赤手空拳就可以改造世界。

1928年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这是他的第三次婚姻，这是两个政治斗士的结合，当然，这次婚姻是爱情的果实，但双方的结合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在当时游击战争的男人世界里，产生了贺子珍的自私的爱，同时，毛泽东的自我形象也开始逐渐形成。

与蓝苹的第四次结婚，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传统的回归。这是一代伟人与演员的结合，蓝苹以自己的政治活动转为对至高无上的政治领袖的“支持”。但是，毛选择的这位演员有着可怕的性格特点——可能当时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蓝苹的独立个性在女人中是少有的，她也曾经体验过这种独立的意味。然而，因为社会对女人的束缚终究比男人多，同时，社会要求女人应该是顺从的、依赖于男人的。所以，几乎每一个女人在其成年生活中，都会时常经历某种诱惑，不自觉地_·从争取平等的斗争中退却。她甚至会在这种退却中得到某种解脱。蓝苹曾一度接受了一一如果她没有意识到的话——对一

个男人的依赖，这个男人在延安统治着中国的九千万人口。她后来说，她“崇拜”毛泽东，这在当时是真心话。

蓝苹安静了。虽然这种安静不能保持永久，但并不意味着它不曾存在。她不再用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去折磨毛，象对唐纳那样；她也不再去告诉毛怎样才能值得自己去爱他。成为思想家兼领袖的妻子后，蓝苹真的陶醉了。

大家能都知道自己是主席的“爱人”，这是一种满足，一种令人兴奋的事。或许这是获得自由的一条捷径，但是无论如何，不必担心其他男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也不必再去考虑时常令自己痛苦的其他女人的嫉妒。

与毛泽东结婚后，蓝苹放弃了自己的演员生活。一位美国外交官约翰·塞维斯回忆说：“我们感到奇怪，蓝苹在延安的舞台上似乎并不活跃。”毛泽东认为，她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蓝苹也服从了这一点。她与鲁迅艺术学院一直保持联系，但这只是兴趣所在，而不是什么职业活动，就象伯德·约翰逊夫人关心公园建设，南希·里根关心精神病人一样。

蓝苹肯定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作出让步，放弃自我表现的目标，放弃寻求独立的价值观。她知道，战争中的延安与上海的艺术界有天壤之别。她知道，与共产党的领袖结婚就象神父与教堂结婚，所以，一些著名的女性不愿选择这条路。

可能她一开始就有些玩世不恭，她看上去并不象 24 岁的人。可能她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以及自己对别人的影响力，她认为她完全可以让毛泽东听她的话，可以不理党的权威性，可以继续自己的电影生涯。至于党可以命令一个人结婚或不结婚，把一个女人送到莫斯科治病以解除包袱等事，她从未想过，她认为这些都不适于她。

无论如何，蓝苹在 1938 年成了延安的辛德莱拉（灰姑娘）。

她与邓颖超和康克清不同，她们成为党的干部首先是因为她们自己的战斗经历，其次才是因为她们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妻子。所以她们受到尊敬。蓝苹与丁玲也有不同，丁玲这时虽还未结婚，但她是一位很有名望的作家，还是一位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而蓝苹呢？只不过是共产党领袖的“爱人”。

娶蓝苹做妻子，毛泽东不必为婚礼仪式或婚姻登记而费神。这些现代的东西对蓝苹很合适（她与唐纳对这种束缚人的枷锁也不屑一顾）。但是毛不理这些，他比蓝苹大 21 岁，他把蓝苹看作是自己孩子的母亲或是自己的助手。

在任何形式的婚姻中，结婚双方对对方的期望是有不同的变化阶段的，有时这种期望能够实现，而且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期望。难道蓝苹从自己与费、俞、唐等人的交往中不了解这种起伏变化吗？难道毛泽东也不知这一点？尽管后来毛泽东与蓝苹在对对方的期望上产生了分歧，但是，婚后的最初几年中，这种期望是一致的。蓝苹很少发问，默默地接受了自己对毛泽东的依赖。

尼姆·威尔斯在访问过延安以后说：“女人少的地方，她们手中的权力就大。”对蓝苹来说，这一结论不久就可实现，她与毛泽东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斯诺夫人的这一论断。但是，她的权力可能只是在毛泽东追求她的时候才存在。现在二人已结婚了，她身后的权力之门也跟着关上了。她只是毛泽东家中沉默不语的家庭主妇，别的什么也不是。

与毛泽东结婚，蓝苹的地位提高了，有了表现自己的机会，但是，要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是否还得付出很大的代价？

不过就当时来说，与毛泽东结婚本身就实现了她千里迢迢来大西北的愿望。

作为最高领导人的爱人有它的好处。毛泽东和蓝苹实际上

是住在一起，这在延安不多见。延安时期，绝大多数夫妻都是分居的（除非他们在同一单位工作），一般只能每星期六见一次面，他们有警卫人员和整理杂务的工作人员。伙食也比较好，学生和战士每月只有一磅肉，高级干部每月的配给量是八磅。

1938年秋，蓝苹与毛泽东住在一起的时候，毛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一个有三个房间的窑洞（延安时期，住窑洞节省建筑材料）。窑洞在山的一侧，十五米深，后墙是石头，用石灰粉刷一新。前墙为木制，格子窗户上贴着纸，只能透进不多的阳光。窑洞门前是一块平地，有安乐椅、石凳子，还有一小块菜地，毛泽东——而不是蓝苹——常常在菜地里劳动。

窑洞里的三间房子是：起居室、毛泽东的书房兼卧室和蓝苹的房间（后来她与孩子共用）。地上铺着灰砖，桌椅都是粗糙的木头做成的。没有电，有牛脂制成的蜡烛；没有自来水，有大瓷盆，警卫员到附近的水井去担水。但是床上有蚊帐，另外的两件奢侈品是一个木澡盆和一台留声机。

蓝苹带来的东西不多，窑洞里主要还都是毛泽东的东西。毛的书房里有一个书架，上边没有一本蓝苹在青岛和上海时曾很爱读的外国作品和当代文学作品，全都是毛泽东自己的政治、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方面的书（而且都是中文书）。没有蓝苹的演出剧照，没有她喜欢的一些小玩意儿，没有任何她以前上海生活的痕迹。

毛泽东和蓝苹商量，应该取一个新名字标志她的生活新阶段的开始，怎样才能表达这种全新的意义呢？取一个温和的名字还是一个大胆的？是不是应该与毛泽东的名字有些联系？商量的结果，蓝苹有了一个很漂亮的名字——“江青”，这可能是毛的主意。“江”是江河、流水的意思，“青”是指绿色的。也

可能是受唐朝诗人的一首作品的启发，这首诗写的是毛泽东家乡的湘江。

这个名字也暗示了蓝苹远大的抱负，因为中国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说。在很多人看来，——或许也包括毛泽东，因为他也喜欢迎接挑战——“江青”的名字最适合于有抱负、有魅力、冒风险的女性。

江青的生活虽受当时延安的条件限制，还是很舒服的，这是一种家庭主妇的生活，对她是全新的生活。当她后来回忆延安生活时，话题大都是毛泽东和他的工作，她对家庭生活的料理和安排。

毛泽东这时已慢慢地开始发福，江青和他在一起显得小巧玲珑。她优美的长发连同其上海的生活一同被剪了去，现在是延安妇女流行的发型。在毛泽东与西方来访者交谈时，江青几乎从不发话。她只是悄悄地走上前来，由毛泽东把她介绍给来访者（“这是江青。”毛总是这么淡淡的一句）。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握手的习惯这时已在延安形成。有时她无声地走进来，把快吃空的花生盘子加满，毛泽东总是一边谈话，一边不停地喝水。罗伯特·佩恩说，江青看上去非常漂亮，比蒋介石的夫人漂亮，他见过这两个人，他说江青是一个年轻温柔的女人。

“江青照顾毛泽东的身体、日常工作、洗衣做饭。”一位经常见到毛泽东和江青的苏联人说。夜宵摆在毛泽东的屋里，每个人都要参加，包括江青，有时为了等毛泽东结束自己的谈话而一拖再拖。据斯诺说，江青很快就学会了做饭，而且饭菜做得不错，她还帮助买东西，打扫房间。她不喜欢吃辛辣的食物，但是毛泽东喜欢，所以采访者发现，毛家的每一顿饭都有辣味菜。

江青常常打开留声机，听京剧选段，这是她和毛泽东的共

同爱好。不久，她就迷上了桥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对此感兴趣——而且打得很不错。

突然，毛泽东要把江青送去干体力活。南泥湾在延安东南35英里，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共产党的三五九旅开进了南泥湾，赤手空拳使这块不毛之地产出了粮食。江青这时已经生下了毛泽东的孩子，但是他没有告诉自己的任何一位同僚就把江青送进南泥湾。1939年1月，在欢送江青等人去南泥湾的饯行会上，毛泽东说，如果他们不能生产出粮食和布匹，共产党的队伍就要灭亡。

一批共产主义的战士们在山上开凿出住处，用羊皮做成衣服，把古庙上的梁架排下来做成劳动工具。江青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厚厚的手套，这在南泥湾是很难见到的。她不愿意只做轻活，因为她坚持男人能干的事女人都能干。但是实际上，因为她身体生病，因为她是最高领导人的爱人，她没有做过什么重活。这里的负责人也希望她回延安时仍保持很好的体形。所以她大部分时间都是织毛衣，临走时已织了近十件毛衣。

江青生了一个小女孩，这是她四次婚姻中的第一个孩子，也是毛泽东四次婚姻中的第九个孩子。孩子的出世给他们的婚姻增加了粘合剂。

对延安的女人来说，生育是最不受欢迎的事，因为这使她们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处处要求与男人平等。还可能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工作。星期六的晚上，女人可以去跳舞，但是养了孩子就再也不能去参加这种舞会。江青不同，她的演员生涯已成过去，也没有什么政治工作。生孩子不会使她付出什么，还会给她带来好处。

孩子的到来提高了江青的地位，她不再只是毛泽东办公室

里的一位妙龄少女，她对毛泽东的畏惧态度也随之消失。他也不再象她的父亲，他们一起逗孩子的时候，他把她介绍给来访者的时候，都已很象是她的丈夫了。怀中的孩子使她作为毛泽东的“支持者”的地位更加牢固，这是一百条党的决议也不能或不可能解决的。

在中国，给孩子取名字是件大事。这位刚出世不久的女孩姓李而不姓毛，这是不同寻常的。取名“讷”就不只具有一种意义了。毛泽东可能想起了孔夫子的一句名言：“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同时又肖似江青以前的丈夫唐纳的纳。

与毛泽东结婚后，江青一天到晚忙于家务。这主要因为毛以前的几次婚姻，因为战争和革命打乱了中国人正常的生活。同时，即使在延安这个现代风气和个人主义精神比较盛行的地方，中国的传统影响依然存在，这就是：家庭在政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与杨开慧生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这时也来到了延安。但是，毛泽东从未把他们叫到自己家中去，岸英不久就去了苏联。起初，江青和岸英相处得很好，她只比他大七岁，但是自从江青来到这个家后，毛泽东似乎就想让岸英离开一些时候。

另外还有贺子珍的两个孩子，一个是生于1937年初的女儿，另一个是两、三岁的儿子。

江青在谈到这个儿子时说：“他很聪明，可以从头到尾把《国际歌》唱下来。”但是不久，他也和毛泽东其他的孩子一样，“丢了”，中国官方的中共党史上说，“送给了当地的老乡。”

那个小女孩现在和贺子珍一起在莫斯科，她不久就将成为江青家中的重要一员。毛泽东和江青在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字的同时，给贺子珍的这个女儿取名叫李敏。因为中国的一句名言是：“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也就是说，毛与贺子珍的最后一

个孩子要敏于行，而他与江青的第一个孩子要讷于言。奇怪的是，李敏于1945年从苏联回来后，就与贺子珍分开而由江青抚养。而她的姓——“李”，既不是她母亲的姓也不是她父亲的，而是继母江青的。

1942年，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毛泽东的家从杨家岭搬到了枣园。到过他们家的人都会发现，李讷活泼可爱，常常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小女孩常常在毛泽东的书房里玩耍，毛休息或与其他人交谈时，她站在旁边。毛泽东以前的一位参谋，1942年曾在毛家住过一夜。他发现，江青对孩子是不管不问，总是毛泽东照顾这个孩子，教她叫“叔叔”，和她一起下山送来访者。

罗伯特·佩恩在谈到江青时说：“她很直率，也很谦虚。从各方面来看，她的感情都很丰富，是一位贤慧的妻子，温柔的母亲。”佩恩走进窑洞的时候，毛泽东走过来握手，动作显得很笨拙，还耸耸肩膀。“毛泽东的夫人，这位以前的演员，握手很大方，也很舒服。”李敏和李讷也走上前来握手，表情严肃。毛泽东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江青则是很纯正的官话。吃饭时，她总是顺着别人的话题，一般只是插进来问一、二个问题。她询问大家的身体状况，“如果大家的身体都很好，她会很高兴，如果谁有不幸，她总是很同情的样子。”

一天晚上，驻延安的几位苏联官员应邀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顺手把自己舒适的扶手椅让给了那位最高官员，江青不得不走进去又拿出一张躺椅，取开来放在苏联官员的扶手椅边。一名警卫员走进来，递给毛一大杯白干酒。江青穿着整洁的便裤，黑色上衣，不停地走进走出，一把一把地给毛泽东拿花生。苏联人问毛泽东，如果日本进攻苏联，他会怎么办？毛对这个问题很不高兴。等客人走后，江青不停地放留声机，毛沉默了一会儿，要吃炒豆，江青拿来递给他，他边吃边喝酒，然后又伸

了伸懒腰。江青选了一张京剧唱片，毛泽东高兴地顺着节奏打拍子。在江青继续尽女主人之职的时候，毛泽东慢慢地停了下来，进入了梦乡。

1942年，毛泽东正患心律不齐症，一位苏联医生说：“江青不在身边，毛就会变得喜怒无常，不是拒绝量体温，就是不愿吃药。”

美国新闻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记录了他与毛泽东和江青共同度过的一个晚上。两人的衣着都很朴素，她穿着宽大的衣服，腰间扎一根皮带，他穿着肥大的土布裤头。福尔曼发现，窑洞里很安静，“桌子的一角倒置着的茶杯上点着一根蜡烛。为了提神，我边谈边品尝着当地产的点心、糖果和卷烟，喝着淡菜汤。毛泽东不停地抽当地烟叶。整个谈话过程中，几个年轻人进进出出。”

至于李敏和李讷，福尔曼回忆说：“她们先是站在一旁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一人抓了一把糖跑了出去，毛泽东象是没有注意到她们。”

一对常常照看李讷的中国夫妻，二人都是医务工作者，丈夫是延安中心医院的儿科主任，妻子是同一个医院的护士长。他们说，江青不是一位很会照顾孩子的母亲。她常常把小李讷放在这对医生家好长时间。他们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嫉恨江青，但是在谈到李讷的成长时他们说，江青常常忽视自己的孩子。

在当时的延安，很多妇女不会非常关心体贴地照顾自己的孩子，江青与其他的女人相比则更逊一筹。她对成年人很有魅力，但是她不会逗弄孩子，不管是她自己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因为她相信，孩子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而不需要别人瞎帮忙，这与她自己的性格特点非常吻合。

几年过后，江青变得趾高气扬起来，而不再是1939年的那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不语的江青了。她常常当着毛泽东的面谈一些自己的观点，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她开始划分自己喜欢的人和自己的敌人。

当她叼起一根香烟的时候，当她放肆地开怀大笑的时候，或者当她不高兴而皱起眉头的时候，蓝苹似乎又回来了——而且这种气质表现得更加强烈，因为她很清楚自己现在获得的地位。这间窑洞也开始象是有女人居住在里边，她穿着制服的样子也变得装模作样。

奥托·布劳恩常常看到她骑着一匹漂亮的马外出，穿着很显眼的衣服，跟着四名随从。她开始抛弃“延安的朴素作风”。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他现在已在中国居住50年以上——回忆说，有一天在延安城看宋代石刻，“一名少女骑着一匹白马飞驰而来，动作甚至有点粗野，我不知道她是谁。我回到家后提起这件事，他们都倒吸一口凉气说：‘噢，她肯定是主席的新夫人。’”

江青骑马的速度与美国妇女开车的速度差不多，都表现出一种刚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的那种野性。她象一位少女，骑着马到处飞奔，扬起串串尘土。在延安，这是地位的象征，因为延安的马匹很少，而骑马的女性就更少。江青在延安的女性中是独一无二的，她找到了一个表现自己的很好的方法。

苏联电影导演罗曼·卡尔门骑马去见毛泽东，正在淌过延河的时候，前边飞驰过来一匹马。他感到惊讶的是，骑手竟然是个女性。他回忆说：“骑到我的眼前，她猛地勒住缰绳，朝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潇洒的欢迎姿势。”这就是江青，不言不语，但是难以捉摸，从中透出一种坚强的气质。她是赶来欢迎这几位苏联客人的，“我去告诉毛主席，你们正在路上。”她静静地说

道，猛地掉转马头，飞驰而去，右手还在扬起的尘土中不断挥舞。

一天下午，周恩来去党校讲课，江青说服毛泽东同意她和周恩来一起去。她想骑上白马威风一路，或许她还希望和周恩来一起出现在党校的礼堂里，因为她一直是这里的普通听众，直到遇上了毛主席。回来的路上，二人骑马沿着延河缓缓地行走，周恩来的马在前，江青的马殿后。江青比周恩来年轻十五岁，她没有想到周恩来讲了一下午的课很累。她想让周恩来走快些，突然，她策马狂奔，马的前蹄一下绊住周恩来的马的后蹄，这位未来的中国总理“扑通”一声摔下马来，倒在坚硬的河沿上。他的右臂骨折，致使终生活动不便。

1943年，重庆出版的一份杂志在评论延安时说：“自从蓝苹小姐，这位以前的电影明星和毛主席结婚后，”这片共产党根据地“沉闷单调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产阶级的舞蹈，封建主义的地方戏，好莱坞的爱情歌曲，一下都涌进了延安。”

这是一个晴朗的周末的夜晚，繁星点点洒满夜空。延安的头面人物都来到梨园，参加每周一次的舞会，这是江青对延安社会作出的最大贡献。一支支蜡烛发出柔和的光，映出系在果树上的红纸、绿纸和黄纸。夜空中弥漫着不同的音乐，一会儿热情奔放，一会儿又是低沉伤感。乐队象是来自几个国家拼凑起来的，有中国的二胡、美国的小提琴、广东的筝、英国的口琴、陕西农村的班单琴，还有过去的传教士留下的脚踏风琴。

没有砖铺的地板，地面高低不平，跳起舞来尘土飞扬。约翰·塞维斯回忆说：“这种场地更适于秧歌舞面不适于华尔兹。”江青的舞蹈技术非常娴熟，根本不受这种场地的限制，旁边的人一点儿也挑不出她的毛病。孩子们在大人中间钻来钻去，每

个人穿的都是平底布鞋。

正在跳“狐步舞”的时候，毛泽东走了过来，身着白色衬衣、黑裤子，抽着烟卷，一副慈善模样。江青和其他女人一样穿着肥大的衣服，腰间系一皮带，她已经来了一个多小时。她看到树下有三个姑娘正围在一堆说话，匆匆走过去，扯住其中一个姑娘的胳膊，把她拉到毛的跟前。这位国际和平医院的护士小姐恭恭敬敬对毛说：“主席，请和我跳个舞吧。”她低着头，背后的长辫在微弱的烛光中闪亮。

乐队奏起《蓝色的多瑙河》，毛泽东和小护士跳了起来。毛不是一位出色的舞蹈家。他跳起舞来倒很象是在进行体育锻炼。江青在一旁看了一会儿，转而去邀请周恩来跳舞。乐曲转为《叮铃铃》了，节奏加快了一倍，毛还是笨拙地跳着，江青对周恩来笑了笑，转过脸去瞧着自己的丈夫和他的舞伴，脸上露出自豪而舒心的笑容。

周恩来舞技超群，姿势优雅，20年前在法国学的这套技术，他似乎一点未忘。当他与江青翩翩起舞的时候，还真有点儿上海的那种盛大舞会的味道。（如果唐纳看到江青此时的表现，是应该为她自豪呢？还是应该嫉妒她？）江青感到很兴奋，因为她成了众人注目的中心，同时还因为，她在这种场合也能恰如其分地把握毛泽东。

阿格尼斯·史沫特莱在与朱德将军跳舞，这一对舞伴象是一对大象，把法国的小步舞跳得象是坦克出动。史沫特莱后来对埃德加·斯诺说：“我感到，好象是中国的所有军队都从我的脚上踏过。”这时，江青正在和一位年轻的美国兵跳舞，他是塞维斯的大卫·巴列特上校率领来访的迪克斯使团的成员。过了一会，江青又和叶剑英跳起了吉特巴舞，作为一位军事指挥家，叶剑英是同类人中跳得较好的。当时一位在场的人后来回

忆说：“他们成了舞会的中心。”

整个晚上，江青没有和毛泽东跳舞。休息时，江青从神气活现的林彪将军和粗壮的康克清中间穿过，她总是把最漂亮的姑娘引到毛泽东身边来。与贺子珍不同，毛一与年轻的护士、教师或服务人员接触时，贺总是拿着刀追赶毛。江青是一位非常聪明的政治妻子。

毛与贺子珍从未参加过舞会——如果说在江青之前延安有过这种热闹场面的话——因为贺子珍总是拒绝参加这类活动。他们也不象毛和江青那样经常去剧院。如果毛泽东到一个外国人的窑洞里小坐片刻，贺子珍也要问他哪里去了。江青对这类事表现得很大度，她宁愿给丈夫一些自由，希望以此为自己换取一些自由。她不想让毛把她当作是豆荚里的豆。

应该感谢唐纳的是，江青的英语懂得比毛泽东多，虽不十分够用，她还是能给汪东兴讲一些英语入门知识和英语词汇。汪东兴当时是毛泽东的警卫员，后来进入政治局，在1976年江青倒台的时候，他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毛泽东家的服务员有三个人，其中一人后来回忆说：“江青同志常常教导我们，给我们讲课，教给我们怎样写日记，并纠正我们的错误。”江青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常常教导别人，“不是那样的……你真笨……我来做给你看。”

和毛泽东一起到延安的临时剧院看演出时，江青俨然象一位大使陪同她的总统视察自己的领地。如果演出的是现代剧或外国戏——这在延安是很少有的——江青总是一边看一边和毛谈自己的感受。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演出的都是京剧。慢慢地，小李讷也成了“戏迷”，这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共同爱好的反映。

中国的京剧唱声刺耳、锣鼓震天，剧中的英雄都穿华丽的丝绸服装，奸臣则是面貌可憎的白脸。江青和毛泽东坐在一起

欣赏演出时，最讨厌别人打扰。但是刘少奇，这位在延安位居第二，很少有笑容的组织活动家，对京剧不感兴趣，常常在演出中间来找毛泽东商谈公事。一天晚上，刘少奇又凑到毛泽东身边，脸上是焦急的神情，手中拿着一份文件。江青讨厌地一瞥，耸了耸肩膀，对着刘少奇大声说道：“讨厌，又来了。”

一天下午，毛泽东在他的起居室和王明谈话。王明是毛的老对手，但是现在大势已去。他们二人在谈论苏联，王明比毛泽东更了解苏联，也更加亲近苏联。江青厌烦地坐在角落里，她不知道这种陈词滥调何时结束。王明的妻子走了进来，满脸通红，气喘呼呼。“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她对自己的丈夫说，“原来你们两个又吵起来了。”江青马上站起来抓住这个时机说，“你来了真是太好了，”她高声嚷嚷，“这两只公鸡叫人没办法，一见面就斗。”她拉了一下毛泽东说，“把你家的叫回去吃饭，我也把我的人拉走吃饭。”

毛泽东手中有权而且性格倔强，但是，作这种人的“秘书”使江青逐渐地在延安的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不是因为她政治上的处心积虑——个别情况例外——而是其他很多人认为，她对毛泽东做出的决策都可能产生一点影响。

这是有道理的。毛在家里与来访者谈论政治问题时，江青总是坐在一旁静静地听，客人走后，她再和毛泽东谈自己的看法。

张治中作为国民党的首席谈判代表逗留延安时，江青总是每天一大早就来到他的窑洞前。“睡得好吗？今天我们能为您做些什么？”她总是这样问，谦恭而且拘谨。但是谁都感到，她这是代表毛泽东。

曾经给江青用口红写字后来又批评她的一位导演，打算拍一部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生活的纪录片。如果说这个主意背后

有拍马屁的味道的话，江青没有注意或者说并不介意这一点。她想演电影，由这位导演来导演，而他不是主要的电影界的负责人。毛泽东不想这样做。军事问题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大生产运动还需要时刻督促。江青拉着他的胳膊撒娇。她按照导演的主意劝说毛泽东：群众希望看到他们的领袖的生活。看到主席和他的妻子也参加体力劳动，这对干部们也是一个激励，会给他们树立好的榜样。毛泽东终于同意了。

江青开始忙碌起来，象初次登台的演员，她准备了各式各样的衣服，告诉导演怎样安排镜头次序，给毛泽东讲在摄影机前应怎么做。她还有些紧张，她暗暗提醒自己，这不是重操演员生涯，是为了主席的政治生命，是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教育。

延安没有摄影棚，导演不得不把场地选在城南一所学校的操场上。每天早晨，毛泽东和江青驱车来到操场，在一大群好奇的老乡的围观下，来回踱步，思索着革命和战争的问题；挖沟，磨麦，象真的一样，还和一群精选出来的人民代表混在一起。这在1949年以后的纪录片中更为常见。

毛泽东感到不舒服，但是江青洋洋得意。他拒绝拍特写镜头，而她的笑容和姿势似乎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他不愿特地为此换衣服，而她则和在上海时一样要精心打扮一番。江青象是东奔西跑企图竞选连任的政治家，而毛泽东则象是走出书房帮助拉选票的丈夫。

这部片子一直没有上演，谁也想不起来自己曾看过这部纪录片，可能根本就没有编辑完成。多年以后，江青回忆说：“毛泽东从来不喜欢上电影，他在延安的时候就这样，当时我刚认识他。”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助理，江青在开辟自己的道路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譬如对毛泽东工作人员的负责人李六如，江青就恨之入骨。这在第一夫人中并不罕见，她们常常和其丈夫的心腹发生冲突。李六如是一位老革命家、知识分子，他感到江青对毛泽东施加影响，乱下结论，唠唠叨叨，生活作风与延安的艰苦环境格格不入。

1942年的一天，因为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江青的行为都很恼火，李六如一气之下冲进毛泽东的书房，开诚布公地和毛谈这件敏感的事。他历数江青的不是，并告诉毛她毁了毛的形象和威望。两人都不知道，江青这时正在隔壁她自己的房间里，她听到了李六如对自己的攻击。盛怒之下，她冲进毛的书房，双眉直竖，瞪着李六如，“啪啪”地拍着桌子。她边哭边叫，说她丈夫和李六如密谋迫害她。她愤怒地说，李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以这种方式侮辱她。

毛泽东当着李六如的面责备江青。据与李六如较接近的人说，毛要她“闭嘴”。他说，李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比她长——这正是她的痛处——在李尴尬地离开后，毛要江青向他道歉，至少不应该突然插进来打断他们的谈话。江青拒绝这样做。从此以后，她对李六如很冷酷（后来，她手中有权时，免去了李六如的职务）。

毛泽东和江青当着别人的面争吵——以后还会有多次——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是极为罕见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康克清都没有过这样的事，他们也可能私下里有过争执。毛泽东和江青都是个性极强的人，这种个性使他们常常对对方的言行不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毛泽东和江青的执拗都是少见的。江青这位不得志的女演员，发起火来象一位泼妇，而半是农民半是知识分子的毛泽东，也一直没有丢掉湖南人的那

种朴实和火爆性子。

驻延安的苏联官员符拉基米洛夫说：“江青总想独立，对于不熟悉的问题，她也能很快找到自己的办法。她精明、有野心，但是能够藏而不露。”符拉基米洛夫发现，在江青家庭主妇式的文静之中，暗含着某种坚强的东西。她常常对毛泽东施加自己的影响，这在他们婚后的头几年是没有的。“江青机智而不动声色地督促其丈夫去解决很多复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家务事毫不相干。”

这位苏联人击中了这个女人的要害。和在上海时一样，她深知如何运用自己各方面不同的才能。象钢琴家演奏钢琴一样，从不十个指头一起上，而是根据需要使用不同的手指。“她最出色的品质是她极为明确的目的性。”

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兼秘书，江青对鲁艺作了回访，因为毛正在这里作一系列关于政治与艺术之关系问题的讲座，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1942年的春天，延安刚刚有电的头几个晚上，所有与文艺有关的人士全部出席，坐在那里记录。毛泽东的讲话平静而紧凑，富有煽动性。他不停地抽烟，不停地咳嗽。江青自豪地坐在前排，在毛谈到大西北敏感的文艺界时，她显出不屑一顾的神气。多年后她说，此时《讲话》产生过影响。

丁玲等大西北的一批作家，大都深受鲁迅的独立精神的影响。毛泽东在鲁艺宣布：“为艺术而艺术”是错误的，他同时还嘲笑这批作家“要求独立的叫嚣”。在这种形势之下，很多作家退缩了。和其他很多政治家一样，毛泽东也认为，知识分子是国家的不安定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是追求的目的而不是一个追求的过程，因此他强调，任何一件文艺作品都要服务于民族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这两个目的。

毛坚持：“观点不允许成为结论。”他警告这批坐在长凳上的知识分子说，他们只有发表正确言论的自由，不正确的言论不允许成为公开宣布的结论。

在毛泽东给这批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上了马列主义课的时候，江青坐在一旁冷笑。似乎她的上海生涯已成历史沉渣，她开始拥抱延安共产主义。但是她对这一主义到底理解多少，我们不得而知。江青对这种批评以沉默表示支持。这时，存在于江青身上的艺术世界现在已经死去。

在延安持不同意见的作家中，胆子最大的是王实味。他写了一篇锋芒犀利的文章批评毛泽东，批评党对文艺界的家长制领导，批评共产党领导人的不切实际。

一位后来成为江青政治同伙的人回忆说：“江青与疾病作斗争和她作政治斗争一样坚决。”的确如此，她十分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简直象是得了疑病症。但是在延安，她与毛泽东结婚后不久就得了肺结核，这时，她很少再谈论自己的健康问题。党内倒有一些人，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关心起江青来。

巴列特上校回忆说：“迪克斯使团离开延安时，我们得知（江青）患了肺结核，她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这几位美国人不知，是江青身体状况不佳，还是不允许她在公开场合露面。从重庆回延安的时候，巴列特和他的同僚还给江青带去罐装奶粉和可可，希望她“早日恢复健康”。

然而，当毛泽东把他的妻子介绍给这位美国人时（“巴列特上校，这是江青”），巴列特感到吃惊，她“看上去气色不错。”实际上，江青的“优雅举止和姿色”使这位上校为之倾倒。江青的苏联医生奥洛夫博士说：“他们二人身体都很好——我真希望自己象他们那样健康。”塞维斯在他们家与毛和江青进午餐，他回忆说：“江青看上去很健康。”

1945年，江青在上海的熟人、中青党的负责人左舜生和他的同事崔万秋到达延安访问，左舜生很自然地提出要见江青。但是毛泽东告诉他，“江青病了”，他只好提出见一见江青的女儿（他发现，女儿很象母亲）。可能毛泽东认为江青在上海的生活最好是忘掉，也可能他怕党会因为江青“露面”太多面有什么反应。

后来，江青谈到她在延安生病的情况，她只是私下里与疾病“作斗争”。但是实际上，有人以健康为由企图限制她“公开场合露面的”次数，努力使她成为安静的家庭主妇。

1945年夏，毛泽东到达国民党的首都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寻求阻止内战爆发的途径。美国使者帕特里克·赫尔利和国民党的代表张治中飞往延安迎接毛泽东、周恩来和共产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两个星期后，当谈判正在艰难地进行时，江青带着女儿李讷出现在雾都重庆。

她和毛泽东住在张治中的“桂园”，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宅第。在张治中家，她甜甜地对一批来访者说：“我是来治牙病的。”

这是江青唯一的一次和毛泽东一起肩负外交使命的外出。江青只是一位私人助手，因为党要求她不要在公众事务中起（明星）作用。到处找新闻的报人也很少报道她的行踪——尽管对毛的报道占了很大篇幅，毛甚至把自己雄豪的词《雪》交给《新华日报》发表。没有哪个外国人见过她，迄今为止，西方还一直认为她没有在重庆的高级会谈中出现。见过她的中国人回忆说，她是一位“长得很标致的女人”，和其他领导人的妻子不同。在张将军的一次招待会上，她穿着“短袖衫和裙子，有些象中学生的制服。短发没有烫过，额前一缕刘海。”另一位客人说：“她不象是从窑洞里出来的。”

席间，张将军和夫人请江青讲几句话，她很有礼貌地说了几句。一位坐在第十排的客人发现，她的官话讲得很漂亮，几乎不带山东口音。无疑，她也意识到自己不能太突出，所以一再强调自己来重庆的目的是看牙科医生。客人们感到，这种解释有点儿莫名其妙，而且毫无必要。

“桂园”位于重庆的红岩区，室内装饰华丽。江青在房间里踱步，她哄李讷玩，与张将军的女儿素秋玩（36年后，素秋愉快地回忆起这件事）。江青有一种被囚禁的感觉，她只能从窗户里望着山城。同时也感到愉快，因为她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夫人（如果丈夫的运气好，她还会成为中国的第一夫人）。重庆有很多从上海逃来的艺术家，他们在日本人的屠刀逼迫下来到这里，想拍电影，想演戏，想写小说。

江青决定给唐纳打电话。唐纳现在是重庆一家报社的记者、英国使馆的顾问。据知道这件事内情的人说，她想作为毛泽东的夫人，从这一优越地位出发再与唐纳谈一次。

江青在追踪唐纳，象 1938 年在北京和 1937 年在延安追踪俞启威一样。她不会与自己以前的恋人割断联系，除非他们自己彻底断绝这种来往。她没有见到唐纳。据唐纳说，江青没有和他联系上，也可能唐纳不想见她。

当这场政治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在国民党政府的大厅里举行了一次招待会。大厅内人头攒动。毛泽东和蒋介石双双出席，二人点头微笑。重庆的名流呷着酒，吃着点心和花生，伸着脖子瞧着总统和他的对手。部长、商人、记者名流，都排成一行，等待着和中国的两位敌对的领导人握手。唐纳身着浅色西服，发型优美，手中夹着香烟，也挤在人群中等待。毛泽东慢吞吞地微笑着和每位客人打招呼——这是他的习惯——轻柔

的手握着对方的手，问一个问题或是说一句笑话。还差一个人就轮到唐纳了，他看得见毛泽东宽阔而慈祥的脸，还听得见他平静而女性化的湖南腔。突然，唐纳挤出人群，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他经过放有点心和花生的桌子，走出大厅，来到雾气蒙蒙的黑夜中。江青的第三和第四任丈夫失之交臂，把仅有的一次能握手的机会失去了。*

1947年3月的一天，一颗国民党的炮弹落在毛泽东的窑洞附近，爆炸声震得家具左右摇晃。毛好象没有感觉到，继续看他的文件。但是江青却吓坏了，她几乎没见过战争。第二天，江青带着李讷惊慌失措地来到防空洞，唱歌壮胆。国共两党达成和解的一切努力都已归于失败，国民党的飞机对一度平静的延安狂轰滥炸。看起来，撤出延安是不可避免的了。

毛泽东尽可能地拖延，他正考虑打一场新的游击战，他的一些同僚也感到很紧张。江青告诉毛泽东，很多人都要马上撤离。毛训斥她：“你是个胆小鬼，如果你真是胆小鬼，就去和他们在一起好了。”

一周以内，毛泽东、“穿着花衣服的”江青、李讷和两名警卫员，收拾起简单的行装，坐上吉普车，离开了冰雪覆盖的、荒凉的、几乎成了废墟的延安。他们在这里住了十年。延安时代结束了，在其后的两年中，因为与蒋介石的这场最后搏斗，江青出乎意外地摆脱了家务劳动，在战争和政治中扮演了一个温和的角色。

她被任命为共产党的第三支队的政治助理，在这种动荡的战争环境中，她和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他们率领的军队很是亲

* 唐纳见过周恩来，而且很佩服他，他常常把周恩来和毛泽东作比较。

近（另一支军队由朱德和刘少奇率领）。

江青的这一工作，违反了党在她与毛泽东结婚时作出的规定。但是限于当时的情况，谁也没有提出异议。

这是一种动荡的生活。夜间骑马行军，藏在老乡的窑洞里，在这个村庄呆一周，又去那个村庄呆一月。共产党与国民党展开了一场争夺中国的拉锯战，空袭不断。有一次过河时，江青不得不命令战士们拆下古庙的木板，临时搭起一座浮桥。当时一连几天只能吃到菜豆，江青常受胃病的折磨。

她和毛泽东有时骑在一匹马上，在这种艰苦的战斗间隙还能与“主席”这么亲近，这使她非常高兴。她好象又站在舞台的灯光前，要为观众演一场新戏，等待观众的鼓掌似的。

一开始她还带着李讷，但是在一次惊吓中，李讷差一点儿丢失，从此，她便把李讷送到一个比较安全的村子，由邓颖超照看。李敏和其他的孩子早已分散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回顾往事的时候，江青把1947年—1948年看作是激动人心的、大开眼界的时期，她为自己成了“一名战士”而自豪。她同意这种观点：妇女的彻底解放包括获得“镇压的工具——武装力量。”她带着农村妇女的直爽对史沫特莱说：“我们和男人一样有力量！只要给我们枪！”

几十年过去了，江青在受审时还充满感情地高叫：“我是在陕北战役中紧跟主席的人，是唯一的女同志。”

然而，作为政治助理，她的工作性质并不明确，她的工作表现也很离奇。

她向村民们宣传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充满激情的演说使她自己也为之感动。和其他政治家的妻子一样，她坚信她丈夫的事业是正义的。在忆苦会上（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说好话），她动情地回忆起自己过去所受的苦难，每个人都为之落泪。

实际上，眼泪成了她努力的标志，因为她正努力摆脱家庭的羁绊。她认为，有了这种表演天才，马上就能打动观众。她说，她用道德的皮鞭笞责国民党的战俘时，他们全场痛哭，当即要求参加解放军。

然而，多年以后，当她回忆陕北战役时，却显得很狼狈。她要别人拿来地图和简介材料，才能想起曾发生过的一些事，即使这样，还是象猴子看古代文字一样很尴尬。只有谈到一些轶闻或她的成绩时，她才露出一点儿自信。她说，在田子湾，她“深入到群众中去”。她发现一位有病的妇女，并“帮助她梳理长而杂乱的头发。”红军经过回民聚居区时，讲究穿着的回民妇女看到江青制服的衣料，一个个惊讶不止。

一天，部队在怀朱河宿营，她看到一名战士还戴着国民党的军帽。统一战线破裂后，他就该换上红五星。盛怒之下，她命令战士把帽子取下来。为了让这个战士清楚他所犯的错误，她把这顶国民党军帽扣到自己的头上，回过头来瞪着那位吓呆了的战士。

她的言行一定有疯狂的成分在内——也可能一名战士不会轻易忍受一个女人的训斥——围观的人对她很恼火。为了平息此事，她大声说，谁都得服从她，因为她是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实际上是助理，而不是指导员）。

毛泽东不让江青参加领导人的会议。在王家湾时，中央在队伍往何处去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江青只是“间接地”听说此事。在佳县，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修改战略，也没有让江青参加。这本来并不奇怪，可是江青大为恼火。

一次，队伍停下来休息，4位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任弼时）准备开一个会，毛住的窑洞最为合适。江青不得不搬到驴棚里住几天，结果，她体重下降，染上了虱子和

跳蚤，脖子上还鼓个包。这可能是因为太恼火的缘故。战争接近尾声的一个晚上，毛要发一封重要电报，江青认为应该给她过目，但是没有，她大发脾气，并说女同志应当受到尊重。

陕北战役中，江青的容易冲动和自以为是常常使毛泽东大为不满。

1947年—1948年的陕北战役中，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有所加深。在男性领导人中，与她谈话最多的是周恩来，看到她心情不好时，周恩来常常走上前来问寒问暖，和她聊天，问她是不是害怕。

自宋庆龄以来，很多中国女人被周恩来所吸引，江青也感受到了这一点，这不是因为生理的需要，而是因为周恩来的男性风格。他舞跳得很好（与毛泽东不同），江青喜欢这一点。周恩来对江青不仅有礼貌，而且常安慰她。他对所有的女人都很有礼貌，但是对于江青，又多了一层含义，她是主席的妻子。并且他的性格与自己可爱的妻子形成强烈的对照。一位了解这一婚姻的人士说，他们一直是一种合作的伙伴关系，“但是他很喜欢邓颖超，也常常想念她。”

一次，队伍长途跋涉后停下来午餐。“副主席，你的袜子从鞋洞里漏出来了。”江青对周恩来说。周感到很累，但还是回过头来笑道：“没关系，我的脚在路上磨了个泡。”他在开玩笑，在中共领导人中，这种玩笑不多见。

进入1948年，对毛泽东来说，权力已象一颗成熟的桃子悬在眼前，但是他对江青的注意力有所转移。为了拿下北京，夺取最后胜利，中共领导人在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住了下来，这里距北京还有300英里。江青在青岛时的丈夫俞启威已经被任命为张家口市市长。

俞启威这时也在石家庄附近，江青见到他时将谈论什么事，

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么说，她是一个政治妻子，她不会象贺子珍曾做过的那样。

西方女人总是责怪男人，贺子珍对女人和她的男人都进行攻击，而江青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和以后的这类情况下，她只攻击和她丈夫来往的女人。

与此同时，在另一块天地里，唐纳已经离开重庆，在香港的一家左翼报纸《大公报》工作。一位同事看到他坐在办公室里很晚还不回去，又发现他在“用他清秀的字体”写情书。他遇上了一位来自上海的迷人的女记者陈润琼，而且就要和她结婚了。他再也不会回到中国大陆居住。

如果说，江青在陕北战役中是外行的话，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她也常常处于痛苦的矛盾之中。她的政治助理一职，人们普遍认为只是没有实职的职务，她实际上仍是毛的妻子，不可能指派给她一项独立的政治工作。她在毛泽东身边，也总能找到活干，但谁也没有把她看作是正式人员。

在紧张的战斗间隙，她找野生酸苹果给毛泽东当药用。毛在写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时，帕金森氏症使他不得不停下笔来，于是就口授给江青记录下来。战役快结束时，她也离开了自己的政治岗位，回到家庭中来。她把李讷带回到镇川堡与父亲在一起（李讷一直得到邓颖超的精心照顾）。

作为政治助理，她是不成功的——可能一直也没有成功过，因为她首先是毛泽东的妻子。当成熟的桃子落入共产党之手，蒋介石的中国变成毛泽东的中国的时候，江青感受到了胜利的惊喜，然而，她对自己未来的角色，又不免有一丝忧虑。

第四章

黯然失色 (50年代)

“我们住在一起，但是他沉默寡言，说话不多。”

——江青谈毛泽东

毛泽东的胜利使江青黯然失色。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江青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生病和消沉。有时她似乎是要参加某一公众活动了，结果却是无声无息。最令人气恼的，是她的位置一直不确定。革命已经平静下来了，她却不能平静。

3月25日，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在传说，毛泽东的飞机已经从石家庄起飞了。高傲的北京市民都在猜想，即将开始的新朝代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在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住了十个月，共产党的军队在这里集结。在从这一前哨基地飞往帝王之都的短暂旅途中，江青坐在她丈夫身边。飞机着陆时，路边的行人正在抢购《人民日报》的号外，4英寸大的红字标题是：《毛泽东抵达北平》。^{*}在北京尘土飞扬的大街上，人们都在迫不及待地

* 1928年，国民党政府称为“北平”。但是解放不久，毛就把它改名为“北京”。

搜寻未来的线索，一版的号外45分钟就卖光了。

毛泽东红光满面，信心十足，江青却瘦弱憔悴。一位四年没有见过毛泽东的朋友对他说：“你发福了。”毛幽默中带着高兴的情绪说：“是啊，反动派使我变瘦了，现在他们跑了，我又变胖了。”江青面色苍白，双目无神，体重不足100磅。面对首都杂乱的秩序和复杂的官僚体制，江青意识到，两年的陕北战役把她的身体搞垮了。

笼罩在毛—江关系之上的阴云也对她极为不利。不安定的岁月随着内战的结束已成过去，江青在党内的敌人还会继续把她关在笼子里吗？毛泽东会不会唆使他们这样做？

整个北京都在大张旗鼓地开展农民运动。毛泽东在沉思：“这些衣衫褴褛的人能改变北平吗？这种改造会不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江青也在思考运动的方向。或许她能够运用自己的不同才能，为北京打上自己的印记；或许北京政权会想方设法干涉她的活动，使她成为驯服的羔羊，以免给他们带来麻烦。

1949年4月初，江青乘上火车，离开了北京，离开她的丈夫，离开了新中国。她带着护士和警卫员，要去苏联治病。6个月后，毛泽东着一身新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检阅了浩浩荡荡的大军。共产党的精英分子精神焕发地从长安街走过。江青这时仍在莫斯科，孤独、忧郁，她在怀疑自己是否会成为四十年代的贺子珍。

多年以后，江青闪烁其词地谈到她的平生第一次出国旅行。她说，她当时病得很厉害，连年的战争“又毁掉了中国的大多数医院。”然而，她顶多只需一家医院，北京的主要医院并未全部被毁。难道一个病重的女人还要坐车去旅行，而且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她和她的丈夫都从未去过的国家？

江青的确有病，扁桃体炎，身体状况也不好。但是病得并

不重。她之所以去苏联而不在国内治病，主要是因为个人原因和政治因素，这也反映了她复杂的个性和在毛泽东的中国作毛的妻子的难处。

2月28日，毛泽东给远在香港的诗人柳亚子打电报，敦促他回来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3月25日，毛从石家庄到北京的当天，就在北京机场接见了柳亚子。第二天，当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和谈”时，柳亚子写诗庆贺这一事件，同时也庆贺他的家乡获得解放。一个月以后的4月30日，毛泽东和诗一首。这时发生了“紫水晶号事件”，英国和中国在长江发生冲突。就我们所知，江青的反应只是到苏联南部的雅尔塔做了一次旅行。5月7日这天，柳亚子正在家中午休，忽然有人敲门，说是毛泽东和“江青”。他们一起去游颐和园，在那儿邂逅林彪和他的妻子，几个人共进晚餐。

陪同毛泽东前往的是俞珊（俞启威的姐姐，一个表演艺术家）。她与毛泽东的到来使柳亚子把她误认为是江青（他从未见过江青）。

有些了解江青的人，也怀疑江青是自愿去苏联而不愿呆在北京。在延安时与江青交往较多的苏飞回忆说：“延安的生活很艰苦。五十年代初她去苏联是很自然的事——就和八十年代初人们到美国去一样——我认为是江青自己想去。她认为苏联人会很好地招待她，她认为她一到苏联，斯大林就会亲切地会见她。”唐纳的看法与此相似，“她不是真的生病，”她这位前任丈夫评论说，“她只是想到国外瞧瞧。她一直没有这种机会，而在五十年代，最合适的去处也就是苏联。”

在莫斯科火车站迎接江青的是一辆救护车。然而她在苏联做过的最大手术是切除扁桃体，大部分时间在静养、恢复体重，

到风景胜地雅尔塔游览，或呆在莫斯科的老房子里。如果说她没有大病的话，感情却很脆弱，一桩小事也可使她精神崩溃、大哭大叫。后来，她回忆起对克里姆林宫的访问时，有些莫名其妙，说明她当时如果没有某种心理疾病的话，也是在竭力掩饰自己在苏联时的孤独和凄凉。

她说，是斯大林邀请她去的。但是，她到达克里姆林宫时，斯大林的工作人员感到很惊讶，因为毛泽东没有和她一起来。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毛泽东不在苏联，难道苏联政府连这一点也不知道？令人难以置信。可能斯大林根本就没有邀请江青，也可能她去过克里姆林宫，但斯大林的工作人员看到她情况不佳，没有带她去见斯大林。

很显然，1949年，低落的情绪和疾病折磨着江青，第一次去苏联也使她很失望。

江青回到了北京。11月，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她乘毛泽东的车驶向火车站。她要去为一位很重要的客人送行，这位客人就是宋庆龄。这位孙逸仙的遗孀是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的，现在，她要带着自己的工作人员回上海。江青穿着蓝色的毛料裤子，蓝白条相间的上衣，戴一顶新中国干部常带的便帽。她显得瘦削但是无病。她说她是“代表毛主席”来了。她登上专列，在铺着绒毯的车厢里与新中国这位党外地位最高的女性交谈。江青很尊重这位年龄比她大的女性，因为她才11岁的时候，宋庆龄的丈夫就去世了。“江青很有礼貌，也很漂亮。”专列开往上海时，宋庆龄对她的工作人员说。

在这种短暂的社交场合，江青常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她善于这种表演。

毛泽东和江青的住房很华丽。毛总是在取消一切旧事物的

同时，为自己保留一二件。城墙宫门全部拆除，外国使馆迁往荒凉的郊外。毛泽东根本不会去建造斯大林式的平房，他和江青搬进了皇帝的宫殿。在碧波荡漾的中南海边，有一座华丽的明代宫殿，红柱金檐，桐树掩映，散发着历史的气息，也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至高无上。

“有关部门”为主席和他的妻子精心挑选的这个住处，以前叫“香妃宫”，两人的房间“分开而又相通”。每间房都比他们在延安住过的窑洞大一倍。高高的天花板，木雕的屏风，丝绸窗帘，宽敞的窗户，一切都与这里的权力相合。在住过上海的阁楼、延安的窑洞、陕北的农舍之后，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异常华丽、辉煌。然而，在这种地方，江青很难放松下来。

“分开而又相通”，不仅可用来描绘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婚姻关系也是如此。一天晚上，毛泽东与杨开慧生的大儿子毛岸英，在争吵时责备江青，“她对爸爸一点感情也没有，只会唠唠叨叨。”毛岸英现在是党中央的俄语翻译，他的话不无道理。至少可以说，这一婚姻的浪漫阶段已近尾声。在另一次家庭争吵后，这位 28 岁的青年对江青说：“如果你不爱我父亲，为什么不离开这里？”

毛岸英可能也听说过他父亲在延安时的风波，他们没有结婚之前就住在一起。他知道父亲是不可能把江青赶走的，可能他希望江青自己主动离开。但江青不是这种傻瓜，她与贺子珍不同。虽然浪漫的爱情已经死去，她也不会为这种小事离开这里。

江青发现，毛泽东对杨开慧一家很关心，这说明她在毛心目中的位置退后了。共产党解放杨开慧的家乡湖南长沙后，杨开慧的哥哥给毛泽东发电报表示祝贺，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毛的回复有些异常，五天之内，他就给杨兄写了一封长信，信

写得很亲切，还详细地谈了毛岸英和毛岸青的情况。不久，他又让这兄弟二人分别回湖南去看望杨家亲戚，并转达他的问候。他还邀请杨兄和他的妻子李宗德来中南海长谈叙旧。他对杨家的关心（包括后来怀念杨开慧的诗词），使毛更象是失去杨开慧的鳏夫，而不象是江青的丈夫。

这种婚姻关系的疏远不是毛泽东的过错，也不能说是江青的过错，而是环境变化的结果，也可能是单调的生活付出的代价。毛的生活变得高度组织化了，大批的工作人员，接连不断的会议，长时间的办公。毛—江这种领袖与助手之间的伙伴婚姻关系已成过去。延安时期，去看毛泽东也就等于去看江青；内战时期，他们同骑一匹马，而且常常要把卧室腾出来作为政治局的会议室。

长征结束时，毛把较先时间跟他的警卫员陈昌奉（译音）送进了学校。因为在延安这种新的环境里，他不再需要这种关系。陈昌奉为此痛哭不止，无心读书。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他把“他的”妻子也看作是“他的”警卫员——江青在内战结束后也体会到了陈昌奉在长征结束后的那种感觉。他不再象以前那样需要她。

不管毛泽东怎样待她，江青不准备作一名本分的家庭主妇，她需要一份工作。似乎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只有她例外。她以前的戏剧界同行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的妻子，都在忙于自己的新任务。而她成了身居高位却无能为力的娜拉。

她失去了在人民解放军中的工作，这本是很自然的。对此她感到不快。她在苏联的时候，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了，几乎所有的文艺界名人都在其中，包括田汉和周扬，她在上海认识的一些人，还有那位在延安时弃她而去的徐一新所钟情的孙维世。而她，却不在名单之列。

五十年代，江青得到的每一个位子都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来的。中国政府，或毛泽东，或二者兼有，都想把她限制在家庭生活的范围之内。只有周恩来帮过她的忙，她后来还为此公开感谢过周。

这几年来，江青并不是一直在拼搏。离开唐纳，她只身一人来到延安，后来又成了共产党北京的第一夫人。她还是蓝苹，总想表现自己的蓝苹，既能提高自己的地位又能做些实际工作。她还是蓝苹，喜欢凑热闹的蓝苹。

江青不满足，她不愿只作贵妇人一样的消费者。她喜欢奢侈，她认为这是她的权利。但是，她还渴望推开这优雅的饭桌，戴一顶草帽，穿一双布鞋，走到社会中去。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不是把富人的土地分给穷人吗？对于土改，她在内战时期就积累了一些经验。

毛泽东不愿让她去参加土改，其他人也都不希望她去。她却一直坚持，直到对方让步。

她选择了无锡郊区盛产茶叶和丝绸的农村。有关部门安排她先去上海。在上海，党的负责人饶漱石企图尽最大努力把这件事办好，但却使江青大为光火，因为她感到饶在“控制”她。她要去自己以前经常去的南京路买东西，饶漱石却坚持和她一起去。她要立即出发到农村去，饶却摆出了一大堆困难，说她的“个人安全无法保障”。

饶漱石遇到的问题，其他许多接待过江青的官员也同样遇到过。他认为她的想法莫名其妙，但又不得不尊重她，保证她不受伤害，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可能他怕江青与以前的情人联系——这是她的习惯——这种事要是传到毛的耳朵里是不好的。

她一会儿抱怨饶漱石把她拘禁在上海，不让她与人民群众

接触，一会儿又抱怨这位党的书记给她安排的房间（在胜利饭店）太冷，阳光不足。她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做农村调查，但是有关部门处处限制她的行动，阻止她表现自己。

江青认为，她要做的每一件事对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很重要的。因此，她把那些妨碍她行动的人（如上海的饶漱石等）不仅看作是她个人的敌人，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她说，饶漱石对她的监视，使她有一种“要被绑架的感觉”，和三十年代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时一样。这说明党的政治制度在江青看来一文不值，她自己的自我表现才是一切。

江青的确到无锡郊区的农村去了几天，看到了桑树和茶场。所以，她后来才能一再强调：“人民群众并不真正了解我在土改中的表现。”

江青对政府是一个麻烦。“婚姻政治”的时代尚未到来，政府也不因为你是领导人的妻子就给你一份满意的工作。邓颖超之所以有自己的工作，是因为她自己长期以来一直是活跃的政治家，并不是沾周恩来的光。江青对于自己靠边站非常不满，然而政府又不能怎么着她，因为她不只是某一位领导人的妻子，而是领袖的妻子。

很多妇女很高兴地埋头于“妇女工作”，但江青并不如此。她一生都很厌恶这种活动。虽然作为女人的她也同样受到尊重，但她认为，“妇女工作”等于承认男女的差异。她不愿意看到自己与男人有什么不同。参加妇女组织等于接受这种差异，这是她永远也不能忍受的。

江青反复无常的个性，更使政府感到为难。她没有资格从事高级政治工作，但她又不愿去做基层的政治工作。她喜欢做新的工作，但很快就会厌烦。她的舞台作风很难转而适应刻板的行政工作。

冬天降临北京的时候——她在中南海的住处还是相当暖和，与北方寒冷的普通家庭不同，江青得到两个很好的职务。因为她在苏联呆过一段时间，成了中苏友好协会的一员，不过也只是挂名而已，她与那批人没有过多的来往。比较合她口味的是，她进了文化部设立的电影指导委员会，负责审查电影。毛泽东并没有帮江青谋得这些位子，实际上，他希望江青比现在更不惹人注目。是周恩来点头同意的。

文化事业是江青的老本行。^{*}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在苏联的影响下，开始改造中国的文化生活。作为从这一领域出来的人，江青很自然地就想插一杠子。她与这一改造运动的主设计师毛泽东又有着特殊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些作用。

1949—1951年，江青对于影剧界的态度，就象一名法国的一级厨师走进一位幸运的三级厨师的工作间：馅饼里的肝肉太多，羊肉烤得太焦，巧克力奶油冻太苦，等等，等等。在她偶尔去电影委员会作顾问时，在她所能插足的任何文化领域，她到处挥舞大棒，对一切传统的东西发起攻击。

在江青看来，把周围人的艺术成果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或是“封建主义的”，这是肯定自己的必要步骤，因为她感到，自己一直被关在这个领域之外。审查吗？越多越好。她觉得，对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电影，每部踢上一脚，她对艺术的控制就前进一步。

的确如此。江青在三十年代写给唐纳的信中也表露了这一

^{*} 维特克说江青当时是“首席检查官”，是电影局的局长，实际并非如此。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的32名成员中，她排在第29位。她的职务也是最低层次的“高干”。周扬和邓颖超排在第4—6位，袁牧之和丁玲排在第7—9位，毛泽东排在第1位。在江青和她丈夫毛泽东的名次排列上，隔着很大一段距离。

点，她从心底里瞧不起放荡的艺术界。她想进入艺术界，但她又希望在上海的生活能不为艺术所局限。五十年代，这种距离在进一步加大。她感到自己比那些放荡的艺术家们优越——就象一位权势人物，总认为自己比一位思想家更能把握事物的关键。

在无锡参加了几天上改回到上海后，一天下午，她甩掉了饶漱石的监视，溜出来找到了吴涓。当年在上海争演《玩偶之家》时，吴涓对江青为争主角而与导演章泯调情颇为不满，她自己只得到一个配角。江青的黑色轿车沿南昌路开到136弄。她穿着旗袍，戴着黑边太阳镜，敲开了23号吴涓的门。吴涓热诚地接待了她，她敬畏江青，因为她现在是主席夫人。看到第一夫人心情不错，态度友好，吴涓放心了。她们已有14年没有见过面。

江青对吴涓提出两个要求。吴大姐住在上海，和商界关系不错，能否找到一个技术最好的牙医，治一下她那颗曾被打断的“黄牙”？江青还问这位演员朋友能否帮她买一些高级化妆品，北京没有但是在上海的商店里还能买到早几年的进口货。江青还要求吴涓对这两件事要保密。吴涓通过她在电话公司工作的姨妈，完成了江青的任务。

现在江青有了很高的地位，她很想在过去的对手面前炫耀炫耀，就象1945年她陪毛泽东在重庆时，希望和唐纳取得联系一样。她又很羡慕他们，象吴涓这些江青三十年代的艺术界朋友，有很大的自由，而江青作为毛泽东的政治娜拉几乎没有常人所具有的自由。

江青还想去看看赵丹和郑君里。赵丹在《玩偶之家》中演男主角，江青有一次在和唐纳吵架后，还逃到了赵丹家。郑君里是江青在杭州举行婚礼时的男傣相。她请他们二人在锦江饭

店共进晚餐，这里过去是法租界，法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的精英都曾在这里避难，江青更是常来常往。江青对他们二人很热情，也很尊重。她说：“我想，我们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我们可以一起干，在这个新的时代，把表演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但是江青一直没有实现她的许诺。后来，她又到上海去过几次，召集戏剧界名流搞小型聚会，热情地问候，真诚地探讨合作的途径。然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想让赵丹和郑君里等人认识到她现在的身份，同时，也暴露了她自己的希望；她还可以是蓝苹，还可以象这两位演员兼导演一样创造和表现自己。

如果说，她在谈论“合作”问题时有什么具体设想的话，那就是，她想让这些上海时的同仁为自己服务。一位了解她与赵丹和郑君里的谈话内容的人士说：“她只需要自己的亲信。”江青减轻自己嫉恨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这些戏剧界美丽的鸟儿关进自己的笼子。

但是赵丹和郑君里太了解江青了，他们不会轻易接受她的“合作”的许诺。所以，他们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一次会议，向周汇报了文化界的情况，这使江青大为恼火。江青内心微妙而复杂的感情一下子变成单纯的仇恨。如果这些过去的同行不对她阿谀奉承，帮助她减轻心中的嫉恨的话，那么，她就要给他们点颜色看。

在所谓的京剧改革问题上，江青在1949年就放过几炮。延安时期，丁玲等人就试图在程式化的旧模式里加入现代内容，但是谈何容易！再说动乱的战争年代也使他们不能集中精力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过这么一种倾向：这批新的领导人节日里坐在华丽的剧院欣赏中国传统剧目时，他们相信，只要在中国共产党的监督之下，这些传统剧目同样会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所以，当时最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发现，他

表演的传统剧目几乎受到每一个人的喜爱。

但是江青例外。她给梅兰芳贴上“守旧”的标签，而且是代表旧社会。她认为她能够代表新的时代，因为她丈夫是新时代最有权势的人物。她用中国官场里常用的伎俩，请一批听话的知识分子写批判梅兰芳“封建主义”的文章，她拿过来加以修改利用。梅兰芳对江青的攻击特别气恼。因为早在二十年代，他就致力于京剧的现代化，更新剧情，利用当代的一些风俗习惯。但是他最后不得不下结论说，古代的东西不能产生出现代的玩意儿，帝王戏只能是帝王戏，在中国的舞台上，历史的内容和现代的主题不能联姻。

江青的影响还不足以贬低梅兰芳，更不能够动摇他的地位。五十年代，江青禁演的两出戏，梅兰芳加进了一些爱国主义的思想，仍风靡一时，这令江青不能容忍。

随即出现了一部很有影响的电影《清宫秘史》，描写的是慈禧太后和义和团的故事，声情并茂。1949年春天，在上海和南京公演时，其爱国主义情调深受观众欢迎。早在1943年，姚兴农就写了《清宫秘史》的剧本，后由香港昆仑影业公司拍摄完成。共产党接管了各级政治权力，但是还不能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文化界。一些进口影片、书籍等等也不能一概摒弃。

但是在江青看来，“外国的东西”和“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仍是理想的攻击目标。更何况这是腐败的香港制作的一部影片！一部美化封建王朝，把1900年外国对中国的干涉说成是合理的举动，诽谤年轻勇敢的义和团战士的影片！一部丝毫不做阶级分析的影片！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她首先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并能保证这块领地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

江青并非认为一切艺术作品都应有阶级分析，她也不认为，三十年代她寻欢的上海比香港更腐败。江青对《清宫秘史》的

诅咒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我们只需从江青本人对两个概念的解释，就可以了解她的“左倾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意味着权力，阶级斗争意味着复仇。这才是江青在1949—1951年对传统发起攻击的实质所在。

难道她没有考虑过，她的举动对那些喜欢《清宫秘史》的普通男女会产生什么影响？她的优越感使她不会顾及这些。人们可以问英国的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公主，他们炫耀奢侈的婚礼对英国成百万人的经济困难会有什么影响吗？处于权力顶峰的江青逐步发现，普通人的生活是不必考虑的，证明自己地位的权力斗争，才是至高无上的。

1950年，江青经过一番活动，同时利用自己是毛泽东之妻的特殊地位，终于召开了一次文化界人士参加的会议，“讨论”《清宫秘史》。会议由党内负责宣传工作的陆定一主持。作家、历史学家和文艺界领导提心吊胆地来到江青在中南海的住处。屋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她倾向于禁演《清宫秘史》。

文化界人士一个接一个称赞这部影片的历史意义和娱乐价值。他们还引用刘少奇——他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的话，说情节中还有“爱国主义”的思想。江青一开始保持沉默，后来站起来叫道，《清宫秘史》毫无爱国精神可言，纯粹是“卖国主义的”产物。

这就是共产党的中国，对于敏感的政治问题不是通过表决取得一致的解决方法。她“指示”两名历史学家写文章攻击这部电影。但是两位历史学家采取了典型的中国式方法——拖，他们一直也没有拿出多好的、令人满意的文章。可能谁也不会相信江青所说的，《清宫秘史》是一株毒草。然而，不管怎么说，江青这一举动使所有参与这一影片拍摄和发行的下层干部有些畏惧，她就是想给这部片子的前途打个问号。影片暂时停映，后

又重新出现。1954年还流行起根据电影改编的京剧。

江青对《清宫秘史》的批判是在唱独角戏，毛泽东对此没有过问，所以影响不大，只是取得了有限的成功。1954年，毛泽东还说：“我们没有批过《清宫秘史》。”这无疑是对江青的当头一棒。但是，1951年间，江青转而攻击另一部电影《武训传》。这一次，有毛泽东在后撑腰，她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武训是江青家乡山东省的一个著名的乞丐，后来建起学校，成为慈善家，武训说服商人拿出土地给穷人，捐钱办学。这部影片是1949年前由香港一家公司拍摄的，描写了武训兴学的成功。后在周扬和夏衍——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时的长辈，现在的文化政策制定者——的指导下，经过重新编辑，1951年初，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与广大观众见面。公映过程中，三个城市有40—50篇赞扬文章。看到这些，江青非常不安。

她对武训的反感一部分是发自内心的，她最讨厌影片宣传的家长式统治和奴性主义。她称这部影片是“装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垃圾桶（在共产党的术语中，改良主义指只求改善而不进行阶级斗争以求得结构变迁）。

虽然一开始“谁也不听”她的，她还是竭力给武训和《武训传》抹黑，而且她从上次对《清宫秘史》的批判中吸取了经验教训。

她的初试锋芒并不十分成功，可能因为她的方法有些生硬，也可能因为她考虑到，党的领导人一再要求她不要抛头露面。她去找文化部的第二号人物周扬，说她感到《武训传》是改良主义的产物。周扬没有当一回事，他象是对付一个讨厌的孩子似地说道：“我可以容忍一点儿改良主义，你是谁（敢这么做）？”江青大发雷霆，她“砰”地一声甩门而出：“去你的改良主义吧！”

据江青自己说，毛泽东一开始不支持她，所以周扬不接受

她的规劝。1972年，江青在谈到这件事时，夸大了自己的努力，而贬低了毛泽东支持的重要作用。

她说她写过一篇文章抨击这部影片，文章发表后，“解除了敌人的武装”，使影片停映。没有资料证明江青曾发过这篇文章，但是她确实组织了几篇批判文章，这是1951年4月的事。后来，她也确实解除了敌人的武装，因为在她的劝说下，1951年5月，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了一篇嘲弄性质的社论。难道周扬和夏衍没有偏离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标准吗？儒家改良主义者武训，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新人的对立派吗？

很少过问下情的主席，居然来评论一件艺术作品，批评一部电影，甚至抱怨“我国的文化领域”“思想意识混乱”，并进而质问，“有些共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周扬退却了，江青的气势咄咄逼人。

为什么很多文化界的决策人物对江青恨之入骨，这不难理解。她自己没有高位，但是她利用毛泽东的影响，使事物合乎自己的口味和愿望。在延安和内战时期，江青就已悄悄地这样干，那是为了取悦毛泽东。现在，她又一次利用毛泽东的影响，第一次使公共事务符合自己的愿望。

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地方都是如此，权力和地位的争夺远远压倒电影、戏剧或书籍所玩的把戏。江青要求对《清宫秘史》和《武训传》作再认识，就象第一夫人搬进新的办公室后，把所有家具重新布置一样，就象一位新任市长一上任就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桥梁或公园一样，——主要都是为了炫耀或加强自己的权力。

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政治中，宫廷与官僚机构之间经常出现关系紧张的局面（与华盛顿的白宫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

无异)。特别是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执政期间，这时的宫廷常常是个人的。因为江青的不安分、她的才干和她的野心，武训事件在共产党的中国重现了这一模式。“官僚群体”发现自己与“帝王群体”出现了对立的态势。周扬很正确地估计到，在江青来找他谈话时，即使他作出让步，中南海的私房话也会战胜组织的正确决定。

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再到七十年代，这种宫廷和官僚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也可能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有派别斗争的文化传统。不管怎么说，促进这一模式出现的关键人物是江青，对《武训传》的批判是她皇冠上的第一颗宝石。

江青的性格总是乘胜追击。一旦毛泽东表示了态——只是就此事的原则问题，并未支持江青的每一举动。她决定派一个调查组，到武训的家乡搜集武训罪恶行径的详细材料。江青说，当时毛泽东反对这样做，但是她不管。她所作的唯一让步，是让这个调查组打着幌子下去，免得以后出了什么差错，别人把毛泽东看作是傻瓜。文化界的领导这时所能做的，只能是多派两个人到调查组去，作为耳目监视江青，出了问题也好限制她一下。

但这是江青表现自己的机会。无疑，它会象一段动人的唱腔，结束后必将引起掌声。她第一步是作准备，然后拒绝别人的帮助，她要亲自证明，她能够战胜自己的敌人。

江青经常沉湎于幻想之中。少女时代的她就充满了激情和梦幻，在上海的舞台上寻找个人的价值时仍是如此。现在亦无大改变，她感到肩负着某种使命的冲动，她觉得自己成了冲锋陷阵拯救自己的人民的女英雄。

武训的家乡和江青的出生地相距不远，在和当地县的领导

交谈时，她完全能听懂当地的方言。慢慢地，她变得很自信。她公开地说：“再崇拜这样一个人物最终会毁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

在中国，地方势力和真理在北京的新花招面前常常是无能为力。批驳武训的牌已经打出，主意既定，江青的笔记本上很快就记满了当地老农的证词：“武训常常嘴流口水，说明他贪心”，以及一些诸如此类的编造事实。

在谈到武训事件时，江青绝口不提毛泽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关键性文章。其实，正是因为有了这篇文章作后盾，江青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才取得了成功。毛泽东对《清宫秘史》的沉默，成为江青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

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江青的个性都是独特的。然而，她有时又会使我们想起前阿根廷的第一夫人伊娃·庇隆。如果说在我们当代的政治舞台上，这位歌手兼乡村英雄比其他任何一位女人都更象江青的话，那是因为，两人坚强的意志背后，都隐藏着作为名妓和演员的癖好。江青的山东之行，是为了搜寻武训的劣迹，也同样表现出她的自吹自擂、主观臆断。这些性格特点使伊娃·庇隆（也使江青）以狂热推崇和切齿痛骂引起别人的注意。

毛泽东不需要也不希望江青在他身边。所以，在对武训的千尸放完最后一箭不久，她就离开北京，开始了一个新的计划。1951年的最后三个月，她来到湖北武汉郊区的农村，参加土改。

这一次，毛泽东没有提出异议。可能他考虑到江青在山东

* 江青说她在山东呆了八个月，实际并非如此，其间她曾在北京露面；再者，她调查的结果，写成了资料详细的文章，发表在1951年7月的最后一周。这表明，她在山东的时间最多有三个月。

的表现还不错，也可能他希望江青走得越远越好。但是其他人反对。因此，她不得不使用假名李进，即使这样，她一到乡下就发现：自己的行动处处受到限制。

这不是她自己率领的工作组，而是由高级经济官员李先念带头的土改工作队。工作队分组活动时，她感到自己受到了监视，因为她的这一组只有警卫员和她本人。她要单独出去参加农民的斗地主和忆苦思甜大会，一名警卫员劝阻她，她咆哮道：“你是让我脱离群众！”后来她又说饭菜“太油腻”，她说“在家时从不吃这样的饭”。

农民痛哭，这位北京来的夫人也坐下来陪他们哭，眼泪落在这片土地上，象是给这里带来了浩荡皇恩。尽管得了支气管炎，她还是忙于斗恶霸，把他们的土地、家具、衣服等分给一无所有的农民。她说，她必须教育农民“开阔眼界”，她不是神经质，她对妇女问题的分析就很有说服力，使人眼界大开。乡村的极端落后使她震惊，她不停地安慰农民。

与此同时，江青对周围人把她看作神秘人物并不感到奇怪。她一直穿着毛皮大衣，在她周围的人中，只有被处死的地主才能穿上丝绸衣服，其他人全都是衣衫褴褛。她背着照相机，到处寻找题材。她甚至恬不知耻地说，农民看到她不熟悉乡下生活，还问她：“你是谁？”因为在她看来，自己既是土地改革的参加者，也是自己这一角色的旁观者。

老虎和豺狼一样，都是中国神话故事中经常出现的主人公。江青为了吹嘘自己在湖北的表现，也编造了一个类似的情节。谣传当地有一只老虎到处乱窜，江青主动站出来给人们打气，并动员人们去拿棍子。月光下，她躺在床上，听到了恐怖的虎啸。警卫员感到害怕，江青对他说：“你不用怕。”她企图说明，贵族理应行为高尚，尽管必须捏造，却表现了她的自信。

3个月的生活快结束时，江青“没敢”去参加土改庆祝会。她说，那是因为她怕受不了农民的盛情感谢。她回忆道，要回北京时，农民们敲锣打鼓为她送行，有些人哭起来，她也留下了热泪。

江青说，她是想“接近群众”，但是，她想得到的似乎只是群众的崇拜。她努力以严肃的态度参加土改。但实际上，她象是一位名演员，带领群众在稻田里排演了一场土改戏。

1951—1952年的冬天，江青的地位提高了一大步，然后又突然落下。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厅，虽然名称一般，却是一个权力机关。江青从湖北回北京不久，就被任命为办公厅秘书处的处长。迄今为止，这是她轻而易举在党内得到的最重要的职位，也是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她爬的最高位置。办公厅的秘书处控制着党内所有机密文件的流通，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政局的内幕。作为秘书处的处长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不仅成了这些机密文件的看门人，还成了联结办公厅和毛泽东办公室的潜在的、至关重要的纽带。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给他送材料，安排毛会见客人的日程，每天黎明时分处理毛书桌上的手稿，这些都理所当然地成了江青的份内事。

但是她在這個位置上只呆了几个星期。她后来说，因为这一工作比她预料的更“繁重而且紧张”，结果她发高烧，肝区也出现疼痛。但是真正的危机并不是生理原因。她之所以离开此职，是因为她的上级、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建议”，这位能干的四川人不止一次与江青发生冲突。江青同时也失去了其他的职务——在电影指导委员会和在中苏友好协会的职务，这说明，是她自己惹了麻烦。实际上，是毛泽东感觉到自己不能够支持她。毛采纳了杨尚昆的“建议”，而且很策略地解决了这一危机：江青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但是目前她要先“做些自己的事”。

这个问题有两方面。周扬曾抱怨：“江青在场，事情就难办。”（文化大革命中，这句话使周扬受害不浅）很多人同意他的看法。江青很难与人合作，因为她主观武断，装腔作势，而且过分敏感。

她不是那种可以一坐四五个小时有条不紊地处理文件的人。十几分钟就可读完的文件，她也很难能从头至尾看上一遍。她需要刺激性，需要耍点阴谋诡计，这样她才有精神头儿。否则，她会变得疲倦、消沉，甚至生病。

人们不愿与她合作，还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他们对她不满，不是因为她自己的表现，而只是因为她折射着毛泽东的光芒，使那些人不知该怎样对待她。

周扬为江青的问题找到了刘少奇。他也是不喜欢江青，他也没有象江青坚持的在上海时“迫害并压制”过她。江青的这种说法，就象埋在土中的种籽抱怨泥土“迫害并压制”它一样。种籽要发芽，就要在泥土中，但她总想离土而去。泥土也会很惊讶，因为种籽对自己的现状不满。

周扬感到很苦恼，他不知应如何处理江青对文化界的“建议”或“要求”。周扬对国家主席刘少奇抱怨说：“她写来十几条意见，但是很难处理，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是她自己的意见还是毛主席的。”刘少奇仔细地倾听着，这是他的习惯。最后，他告诉这位文化部的副部长，最好把这些事告诉毛主席本人。周扬这样做了，当然是非常慎重的。然而，江青失去自己的位子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决定于毛泽东和周扬的那次谈话。

任命江青到办公厅去工作，可能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她太急于做“实际性工作”，做男人的工作。党的上层人士感到，她破坏了在延安时的结婚协定。到1952年，毛泽东与党和国家蜜月般的感情已基本过去，他感到，自己再也不能为江青而招惹

是非了。1950—1951年，江青还常常陪同毛泽东出席宴会——如果说出席的次数少于刘少奇的妻子和周恩来的妻子的话，但是到了1952年，这种事就没有了。

江青的健康状况似乎还过得去——她又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所以，1952年的某个时候，她的角色危机尚未过去，她就向党提出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表面看来，理由是冠冕堂皇的：这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应动员一切力量赶走“帝国主义”。

江青这一棘手的问题提到了政治局。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说：“江青同志现在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她是在代表我们的党，照顾我们伟大领袖的生活起居。”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是一位能干而活泼的女性，后边我们会更多地谈到她，她有政府职务。“还有什么工作能比这更重要？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党都不应该分散江青同志的精力。”刘少奇拒绝了江青的要求，同时又巧妙地提醒各位：别忘了延安的协定。他两次提到，江青对毛泽东的义务，就是党对毛泽东的义务。

1952年是江青最感困难的一年，而且有征兆表明，以后的日子会更难过。“她自己的”工作成了“毛主席的秘书”。这个职务很模糊，但又必不可少，她不愿自己只做一名家庭主妇，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据说每个人都要有一份自己的工作。毛泽东从未公开谈论过江青在这一时期给他的帮助，江青自己说，她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她找来报纸杂志，把认为该送毛泽东阅读的部分剪下，毛休息的时候，坐在她的床上，江青读给他听，旁边放一堆电报和文件。

毛有时让江青去拜访他想保持联系但又没有时间去看望的人。1952年夏，她来到张治中的家，带来了毛主席的礼物和问

候。这位前国民党将领现在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啊！你们是孪生子。”江青甜甜地对张治中的两个女儿说。

小一点的素秋回答说：“不，毛伯母，我们俩穿的衣服一样。”“毛伯母”是传统的称呼，无形中把江青置于毛泽东之下，但江青对此并不在意。

“我感到很遗憾，”江青说，“我没要两个孩子，只有一个女儿。”

1945年，毛泽东和江青到重庆作历史性访问期间，曾住在张治中家。现在，张家人发现，江青还是很谦逊，不摆架子；显得有些单薄，但不算消瘦。

到中南海这个宁静的角落去过的人，就会看到一个文静而贤慧的江青。1952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毛泽东以前的参谋翟作钧来这里看望老上级。江青正在和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打桥牌，江青和毛从延安时起就抚养毛远新。她热情地欢迎翟作钧，没有一点儿架子，并叫13岁的李讷和15岁的李敏来向叔叔问好，这位老兵受宠若惊。全家人都穿着普通的棉布制服、布鞋。要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从北边他的办公室出来。孩子们狼吞虎咽地吃着鸡蛋、肉和蔬菜。毛泽东吃饭也很快，他边吃边和翟作钧聊天。江青则完全是贤妻良母的角色。

江青对李讷期望很高，但是这位13岁的少女长得不很漂亮，圆圆的脸蛋儿，很结实，各方面都更像爸爸而不像妈妈。江青还没有发现李讷的才能和爱好，她有时怀疑，女儿长大后能否象母亲希望的那样能干（毛泽东关心女儿不如关心儿子的时候多）。1949年以前的岁月中，因为条件和环境的限制，江青常常不得不与女儿分开。现在，江青因生病常去苏联，母女感情还是很难亲近。

一天，江青陪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检阅，她看到李六如也在场。李六如自延安时期就是毛泽东的工作人员的负责人，1942年发生那次不愉快的冲突后，江青一直不愿见到他。但是现在，她没有资格拂袖而去，然而她又不想与李接近。他们坐在那里接受下边百万群众的欢呼。一会儿，全体人员起来绕一周，李六如悄悄地走近江青，笑着说：“江青同志身体好吗？”江青一愣，盯着他一句话也没说。毛泽东走过来说了几句，才结束了这一尴尬的场面。

1951--1952年冬天的风暴并未过去。1952年，江青被“解除了”在家为毛泽东工作的职务，她说，“有些领导人”认为，她应该再去莫斯科治病。

我们发现，这时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才导致了江青去苏联，开始一年的国外生活。1952年间，她想再次在文化界挥舞反传统主义的大棒，再要重复搞垮《武训传》的胜利。她想编一出描写宋景诗生活的现代京剧，宋景诗是山东的一个土匪，武训造反未成的时候，他造起了反。江青在山东调查武训时曾高度赞扬过宋景诗。但是周扬觉得剧本水平低，没有同意排练（后来有过一部写宋景诗的电影，但是与江青无关）。

她帮助上海一家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规模宏大的军事影片《南征北战》，但是引起了强烈的争论。她还想再拍两部描写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影片，也被周扬及其同僚否决了。周扬很干脆地说：“场面太宏大，拍出来不合适。”他不同意用戏剧表现内战场面。

所有这些，江青都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都处处遭到政治上和艺术上的反对。她实在是无戏可唱了，她发现，离开北京去“治病”是不可避免的了。

某种程度上，把江青挤出政治生活的压力，是五十年代中国妇女也都普遍感受到的压力，社会要求她们持家、生孩子。在动荡的战争年代，男女之间有某些平等，现在已成过去。组织的稳定高于一切，高于社会问题，也高于妇女问题，保守的家庭观念是其症结所在。*

或许这是革命进入中年时期的必然规律，因为在二十年代的苏联，男女平等也出现过类似的低潮。妇女独立的先驱亚历山德拉·科隆苔所倡导的独立精神被斯大林时代的家庭中心观所取代。因此，科隆苔成了第一位苏联女大使，也是迄今为止第一位女大使。江青从来没有成为女权主义者——她也不是科隆苔，所以也必然会受到五十年代这种环境变化的影响。

在中国，一个出人头地的女人不可能因为自己干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政府把权力集中到这样一个高度，以致女人要想拥有自己的职业简直是不可能的。在中国，不管是什么政治制度，中国文化对个人生活领域和职业领域从不作明确的划分。1949年后，那些天真地认为自己可以去追求自己的职业的女人，不是因掌权者不信任而处境艰难，就是因上司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而被打倒。

因此，中国文化与共产党制度的结合，使家庭妇女成了女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所谓的政治女性只能分为三类：挂名首脑（如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妇女组织的首领（如邓颖超）；或借助于丈夫的权力而手中握权的女性（如林彪的妻子叶群，我

* 五十年代，发行量很大的《中国妇女》杂志曾赞扬家庭妇女，教育她们怎样赶时髦，怎样审美，倡导多生孩子。迪莉娅曾对此事总结说：“他们告诉女人，家庭妇女通过她的丈夫和家庭，同样可以对社会作出贡献，做这种服务性工作（不付报酬）也是参加社会主义生产。”

们后面还要谈到她)。

江青应属哪一类呢？她的演员生涯已成过去。实际上，进入五十年代后，为了与毛泽东夫人的形象一致，她抛弃了过去的职业。有关她的电影资料、演出评论和描写其演员生活的文章 都被追回并烧掉。

无疑，挂名首脑的角色不适于江青。挂名首脑是少之又少，而且是生就的不是谋取的，再说，江青的气质也与此相距甚远。她更像一名不断奋斗的女人，而不象高贵的挂名首脑。

凭借丈夫的权力为自己谋取一个政治角色（第三种类型），对江青来说也比较困难。这里有两个问题，党总是设法阻止江青去谋取一个较为惹人注目而且有权的政治地位。江青又过于高傲，不愿只通过丈夫为自己谋一职位。五十年代，毛泽东对江青希望有一公职的想法很少支持，王光美的社交活动并没有使刘少奇感到不舒服，邓颖超对于周恩来也是如此。但是这个时候，毛泽东考虑到党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和其他因素，也不希望江青有一具体的工作。

周恩来和张治中的一个女儿谈她的工作问题，周要她去找邓颖超在妇联安排个工作，张素秋嘴一撇，说她不想做妇女工作。总理说道：“你也是妇女，不想做妇女工作？看起来你脑子里还没有性别平等的观念。”邓颖超从早年时起就要求与男人平等，而且她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这一点。从她丈夫和张素秋的谈话来看，她感到在妇联工作也不是低人一等，男女平等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妇女组织就是做些辅助性的工作。

江青的早年经历比邓颖超苦，她不把男女平等看作是既成事实。因此，她不愿简单地只做些辅助性的工作。她觉得自己没有感受到这种平等，然而她又不只是希望获得一种名义上的平等。燃烧的个人欲望和骚动的激情，使她决心以武断的、报

复的手段证明这种平等。”

有时人们感到，中国的女性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保姆式的，占绝大多数，温顺服从；另一种是女皇式的，性格古怪，专横跋扈，永不满足，她总想在自己的一生中为几百年来的保姆们报仇。江青就是女皇式的。

服装也能说明这个问题。江青与那些“妇女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不同，她们穿着象是从慈善机构领来的肥大的裤子或黑裙子，宽松的罩衫使体形全无，塑料拖鞋和短袜。她们的衣服样式，再加上短而直的头发，不施脂粉的面部，看上去纯粹是男人的翻版。

江青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总是在共产党允许的文化范围内，努力从外貌上表现自己的个性。精致的高跟鞋，西式上衣，漂亮的围巾。她精选优质化妆品，头发总是乌黑发亮。她总是倾向于个人奋斗，而不是去参加集体性质的女权主义运动。她不与她们同流，而是力争出类拔萃。

江青在回忆她少女时代第一次去北京时说：“我那时连衬衣都没有。”她的经历与妇联的许多著名人物不同，因此，她有一种奢侈的欲望，这是来自富人家庭的少女所没有的。江青对自己的外貌很得意，使人觉得，快活而有抱负的少女云鹤又出现了。

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正在对自己的这一地位作出反应，就象邓颖超的反应受到周恩来的影响一样。与周恩来相比，毛泽东深沉、雄心勃勃，江青所处的环境也就比邓颖超的环境风暴更大。江青被推进一种工作与权力交互作用的游戏之中。这

* 张素秋的看法与周恩来、邓颖超和江青都不同。她对我说：“如果男女之间是真正的平等的话，那么妇女组织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样使她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么一种思想：即摆脱家庭束缚的唯一途径是获得政治权力。

实际上，玩这种男女关系的权力斗争的游戏，就意味着不能搞妇女团结。江青在给维特克的自传中，只字未提武则天、慈禧太后或其他著名的中国女统治者；也没有提尼姆、韦尔斯、阿格尼斯·史沫特莱或其他参加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女性。一句话，她没有提到自己所知道的任何女人。江青只是代表她自己在玩这种游戏，而不是为所有的妇女的事业。她要运用自己的女性才能，得到一个男人能够得到的位置，象男人一样。

由于江青的个性、毛泽东的巨大权力和共产党中国不时变化的政治环境，她只要不躺在床上，不到苏联，她就不会安分，她要不停地制造紧张。

刘少奇和周恩来是安排江青第二次去苏联的主要人物。在他们看来，江青的个性、她在内战期间的表现，以及她作为最高领导人妻子的两难位置，都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如果江青有兴趣做妇女工作，刘少奇和周恩来会好办一些；如果江青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事情也好办；如果江青乐于做毛泽东的家庭助手，事情更好办。但是刘少奇和周恩来都知道，江青不是这种人。江青毕竟是江青，她是一个骚动不安的人，有不可动摇的目的。毛泽东的同僚需要把江青限定在一个圈子里。

由于肝区疼痛和高烧，江青于1952年初秋去了莫斯科。特点是在冬季，中国人很少愿意去苏联，江青的情况更糟。在苏联的11个月，对她的身体健康和精神都是不利的。疾病没有好转，心理几乎崩溃。

她发高烧，苏联医生给她开了青霉素。肝区疼痛，医生想用针刺抽出有毒的物质，结果使胆汁也变黑了。她又去了一趟

雅尔塔，回莫斯科后，一会儿住在克里姆林宫高墙内的高级医院；一会儿去郊区疗养所逛上两天；一会儿又去乡间别墅，那里有网球场，附近有松树林，还有她喜欢去的电影放映室。

江青有病，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她不满意的是：自己想家，对下一步要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又不答应她回北京的请求——她的病不是非要苏联医生治疗不可。

江青几乎完全被限制在一个女人的世界里，她对此很不满意。除了偶尔能看到自己的男医生外，周围全是女人。她的苏联翻译，江青说，除了一头黄发外，大块头儿很象斯大林。一位彬彬有礼的中国助理翻译，30岁左右，对工作很厌倦。还有一位也是从中国跟来的中年医生，她与江青的关系不时紧张。还有其他一些来来往往的女工作人员，根据北京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频繁的访苏代表团商量的结果不断更换。

全体工作人员协同一致的唯一目的就是照顾江青的身体和精神。一位医生来检查后，江青必然要打桥牌，吃一顿懒散的晚饭，到附近的松树林散步，然后钻进小屋看电影。经常在这里的几个女人，彼此猜疑，谈一些新鲜又不会惹是生非的话题。每个人都在想，别人是不是和自己一样讨厌这里？

在这种环境中，江青很容易找到别人的毛病：这个人背后说她的坏话，那个人懒惰，另一个人不诚实，背后偷看她手里的牌。

江青被迫与苏联社会隔绝，又远离中国社会。^{*}她住进皇家医院，住进斯大林的郊区别墅，她所喜欢的权力斗争、阴谋诡计变得一钱不值。即使那些猛烈抨击她的人——她当时的工作

^{*} 不知为什么，江青好象从未到过中国大使馆。这一幢古建筑原是蒋介石的大使馆，里边摆设着俄国和中国古代的手工艺品——江青很喜欢这些东西（后来，北京又在列宁山上建造了新使馆）。

人员没有人说她的好话——她认为，她在苏联呆的大约两年时间里，没有什么桃色新闻。她唯一的孩子李讷，没有陪她去苏联，只是在学校放假时，才去和她一起住很短的时间，这种情况使母女之间的感情交流越来越困难。

如果她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时光也好打发，但江青是一个宁愿从经验中学知识而不愿去请教书本的人。她的桌子上摆着中文的司汤达的《红与黑》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但她很少能集中精力去读它们。她还经常从中国大使馆收到一些印刷品，大多是关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她和后来一样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

她不会讲俄语，处处依赖翻译又使她感到麻烦。她抱怨说，她变成了聋哑人。如果她的苏联翻译和中国翻译在一起聊点什么，江青就会变得不安，开始咳嗽，或是冷冷地问她们在谈什么那么吸引人。这是中国宫廷里的一个古老的传说：孤独的人总认为讲外国语是在说他们，肯定会对他们不利。半个多世纪前的慈禧就是如此，江青也是这样。她们都认为，说她们不懂的语言肯定是在说她们，是想孤立她，想整她。

漫长的冬季，江青总是伤感地回忆在上海的表演生涯。她和身边的年轻人谈三十年代电影，她们从未看过这些电影。只有那位年纪稍大的医生曾在上海住过，江青告诉她，她拍的电影都是为了革命的目的，而不是纯粹地为了艺术，所以不能只看表面。她回忆起曾与她合作过的演员和导演。她把上海时期的活动、成功与目前的孤独相比较，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生病，因为她和杨尚昆等人的冲突。

江青在苏联时看了很多电影，大都是西方影片。她很欣赏他们的罗曼蒂克和大胆而勇敢的个性（中国电影大都是道德说教式的，没有这些东西）。她忘了自己有病，完全被西方女性那

种无畏的冒险所吸引。江青希望自己也成为那种女人。

一天，中国大使馆送来一个箱子，里边都是江青要王光美帮她在北京选的布料，江青与王光美的关系这时还不错（她们的丈夫现在是中国地位最高的两个密友）。江青的助理翻译打开箱子，拿出第一块布料，江青马上就不屑一顾地说：“鸭蛋黄，根本不能穿。”扔到一边，又拿出第二件，是一块桃红色的布料，“天啊，太俗气。”江青对第三块布料也不满意，虽然这是她一直很喜欢苹果绿。她恼怒地骂王光美“不了解世界”。接着，又和以前一样骂了起来，说王光美入党还不到五年，而且还是因为和刘少奇结婚才得以入党。

江青喜欢表现自己的宽宏大量——只要不和她的目标相抵触。她带着胜利的微笑，把北京送来的这些东西作为礼物送人。她把那件桃红色的布料送给了助理翻译，其他的送给了她的苏联服务人员。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了。江青在疗养所时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一消息，周围只有病人和医务人员。医生和护士不停地告诉她，毛主席一定会来参加葬礼，这使她很恼火。她对北京的情况一点不知，也没有人告诉她，她丈夫是否会来参加葬礼，她只能懒懒地说，这要由党中央来决定。

如果毛泽东来了，会不会来看她呢？可能他会来找她，把她带回北京去。也可能他会让她在这可怕而寂静的白色世界里再呆一个时期。

江青从收音机里得知，毛泽东没有来。她那位遥远的丈夫写颂辞称斯大林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但他是苏维埃阵营中唯一没来参加葬礼仪式的共产党首脑。周恩来率团来莫斯科，并且是唯一的一个外国扶柩者。总理在莫斯科期间，没有去看望江青（这肯定是毛泽东的指示），江青默默地伫立窗前度过这寒

冷的葬礼期。她在想，苏联人会有什么样的表情？那些中国人又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她只能懒散地与其他病友聊一聊这位“天才”之死给世界留下的空洞。

江青的情绪象病房外被大雪压弯的树枝一样脆弱，她甚至产生了奇怪的想法。她把复杂的情况与斯大林的去世联系在一起，她想，来莫斯科参加葬礼的很多共产党领袖很快就会受冻而死。事实并非这样，但是，这种想法减轻了她因毛泽东没来以及毛和她分居带来的痛苦。

在别墅里，一点儿细小的声音，一阵微风或一丝亮光，都会使她变得歇斯底里或愠怒起来，她会兴师动众去寻找奇怪的响声，或是搜遍住处的每个角落去找一只小虫子。一阵微风会使她停止去树林里散步，或毫无必要地戴上帽子，或让工作人员打起阳伞遮挡和风与阳光。

太强的光线会使她感到一种挑战，只有在昏暗的房间里她才感到安全，要是到户外去，必须戴上太阳镜她才感到放心。雅尔塔无垠的海滩尤其使她感到厌烦，她要戴上大草帽，穿上宽大的衣服，再打把阳伞。她从未下过水，她感到大自然的浩渺对她的灵魂是一种威胁。

一天到晚在一起，她的工作人员很容易发现她的弱点。江青对自己也不满意，她对自己周围的一切都不满意，她感到了自己的软弱无力。

江青从不到宗教中去寻找慰藉。她嘲笑中国的宗教传统，在莫斯科，她看到东正教教堂洋葱头一样的尖顶，忍不住也要冷笑几声。她与几个世纪以来有过很大影响的很多女性不同，圣经里的人物伊娃·庇隆——江青完全是世俗的。毛泽东在晚年时还谈过上帝，但是江青认为，谈论上帝、死后的生活、饶恕

之类都是愚蠢的。*

江青的心中没有宗教的概念，也就是说，赤裸裸的个人意志才是一切。她认为，没有超自然的东西，她也不向神灵祈求祷告。她的个人意志决定了周围一切的意义，她有自己的生活。

江青感到苏联腐败了。医院的工作人员伸手要小费，她的护士戴着项链，有一批贵族，讲的是法语，向往西方生活。然而江青自己的本能也是爱虚荣，喜欢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她对把她安排在皇家医院很满意，因为这是为苏联上层人士看病的地方。她说她住的别墅是斯大林自己的；她说斯大林曾亲自下令为她做她喜欢穿的绿色晚礼服；她说她周围的人都是白色服装，对她鲜艳的衣服羡慕极了。

她带着工作人员去专供商店买东西，她答应自己花钱给她们每人买一块布料（至少不用她们花钱）。付帐时，她发现助理翻译买的一块布料比她的贵几个卢布，马上就火起来。“天啊，小任，你买的这件东西可以受用一辈子。”一会儿，裁缝过来与各位商量做衣服的式样，她小声地说，小任选的那块布料穿在身上“象一头熊”。

江青内心很喜欢在她眼前匆匆而过的苏联文化——富裕的生活、浪漫的音乐、各式服装，特别是宽松的上衣和高跟鞋，还有欧洲传统的影响。但是，她感到自己无缘享受这些东西，因此她不遗余力地谴责它。

江青对苏联秘密警察的活动很不满。在她心目中，中国的秘密警察都是在中南海管空调，或在北京站帮她拎箱子的很漂亮的青年。

一天，她在街上被一伙人围了起来，不知从何处又传来中

* 她在表达自己感情时，有时也会说：“天呀”或“天啊”。

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一位苏联行人停下脚步，走到她跟前，友好地要她转告他对毛主席等人的问候。他刚讲完，一位秘密警察从背后抓住他，把他推进一辆汽车。

江青学会了讨厌西方，这对她是一个讽刺。

六十年代，江青的政治敌人中有很多是有国际经验的。他们或曾去过法国（如邓小平），或能讲英语（如王光美），或在日本受过教育（如夏衍）。我们可以说，江青如果亲眼见过这些东西，到过这些地方，她内心也会很喜欢西方和日本的音乐、时髦或戏剧。可惜她只去过世界共产主义的首都，而且这个首都很快就变成了“修正主义者”和“反对中国”的基地。她在莫斯科学习的西方文化使她更加知道，怎样反对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思想”，怎样反对王光美对欧洲服装的嗜好，怎样反对夏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

中国的传统是治国先治家。但是毛泽东个性太强，没有一个安定的家。江青的个性也很强，再加上野心勃勃，也不可能为家庭的安定作出必要的牺牲。1953年秋，江青回到北京后，几乎把她有限的精力全部花在了与家庭成员的争吵上。

毛泽东对家庭成员的态度比较超脱，他可以和他们玩、教育他们、放纵他们，在他们身上花时间——他一直把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人对待。江青不同，家庭成员在她看来，不是一个个分开的个人，而是要有统一领导的队伍。他们要么是忠于她，要么是反对她。如果说毛对亲属关系不太关心的话，江青在这方面就很过分了——她成了中南海这里永无休止的家庭风暴的漩涡。

作为世界上最有权势者之一的毛的第四位妻子，江青处在一个艰难的位置上。周围有丈夫的前几次婚姻留下的问题，内

部的嫉恨更加重了她的困难。

毛泽东家庭中的很多人都在苏联呆过一段时间——毛本人没有——似乎毛的家庭有两个基地：北京和莫斯科。江青和贺子珍都去苏联“治过病”。贺子珍的病情如何我们无从详知，到了1948年，她与毛的共同生活结束十年后，也是贺子珍在苏联住了十年后，她被认为可以回国。在第四任妻子第一次去苏联之前的几个月，第三任妻子启程从苏联回国。*

贺子珍的头发变白了，面容安详，离开延安后她就再没有照顾过毛泽东的孩子。她孤独地坐车回到了家乡，作为中国领导人的前妻，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她与五十年代毛一江的婚姻关系没有牵连，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她住在哪里？怎样对待她？江青在暗暗地考虑这些棘手的问题。

贺子珍希望能住在北京，但是江青反对。毛泽东成了当然的裁断者，最后决定她到上海去住，先到一家疗养院去治疗精神病。上海市市长，后来作中国外交部长的陈毅保证说，他会很好的照顾她并给她经济上的支助（陈毅一直照顾着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和她丈夫，他们在延安时期因反对毛泽东对贺子珍的离婚一直处境不佳）。

现在，贺子珍最起码在600英里之外，但是在中南海，江青要认真地对付贺子珍的女儿了。自延安时起，李敏就和江青自己的女儿李讷一起长大。现在，李敏在读高中，江青的女儿李讷比李敏小两岁，也在读高中。但是江青和李敏的关系处得不好，她歧视李敏——李敏要自己洗衣服甚至床单，李讷则交给服务员去洗——不知是单方面的仇视，还是少女李敏也开始

* 朱仲丽说，1947年，她和丈夫王稼祥安排贺子珍离开了苏联的精神病院回到哈尔滨。贺子珍对此非常感激，江青听说这件事后，对朱丽仲和王稼祥很恼火。

不喜欢她这位继母，江青觉得，“敏于行”的李敏不是一位很聪明的姑娘。

比起贺子珍来，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更使江青烦恼。“杨开慧是党的好女儿”，每个人都说她好。毛与她在湖南的亲属越来越亲热，他与杨开慧生的两个儿子更是经常到他家里来。

毛岸英和毛岸青都不是毛泽东亲手养大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与父亲失去联系将近十年。他们到处流浪，一会在上海街头卖报，一会住进荒芜的破庙里，门口挂一块牌子：“此处卖报，一分一份。”后来，他们随继母贺子珍在苏联住了几年，进学校读书。岸英学习很好，岸青常惹麻烦，追求一位苏联少女。四十年代中期，他们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把他们送到遥远的乡下，养猪、赶驴、拉粪。

但是他们毕竟是毛主席仅有的两个儿子，这对毛泽东的家庭来说意义重大，再说，还要考虑到他们的地位和家庭关系。在党的机关里工作的毛岸英，上司让他到高干餐厅吃饭，毛泽东听说后很恼火，他命令岸英到职工食堂吃饭。

毛岸英个子较高，长得很帅，他曾要求江青离开毛泽东。因为在苏联受过教育，他曾对围绕着他父亲的“领袖崇拜”提出批评。江青把这件事报告了毛泽东，结果，毛泽东当着周恩来总理的面问他此事，毛岸英为此写出了书面检查。

江青讨厌毛岸英，这并不奇怪。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长子当然成为毛泽东的“继承者”，这对江青“仅次于毛”的位置是一个威胁。随着岸英的成年，这种威胁在加剧，他只比江青小七岁。

毛岸英与漂亮姑娘刘松林结了婚，刘不久就在军队得到一份很称心的工作。林语堂在谈到中国家庭关系时评论说：“对一个女人来说，取悦男人是高尚的行为；取悦另一个女人是英雄

行为，而且不易成功。”江青和刘松林一开始就相处得很不好。刘松林说，江青从一开始就对她“蔑视、嘲讽、侮辱”。

1950年，中国参加了朝鲜战争，毛岸英被送上战场。几周以后，美军空袭使毛岸英中弹身亡。刘松林说，岸英之死使江青感到“无限的狂喜”。江青没有参加毛岸英的葬礼，毛泽东对刘松林说：“岸英死了，我想，对江青来说，可能还不如死一条狗。”

刘松林说，是江青密谋把毛岸英送上前线的，这是歪曲事实，但这肯定是毛泽东的决定。大家在谈论这一悲剧时，江青根本没有悲伤或同情的表情。刘松林说，江青对岸英之死感到“很快活”，这可能是真的。李敏回忆说，江青不愿谈论这件事，也不愿谈论毛岸英的生活和性格。

江青把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带进中南海，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李云露比江青的年纪大很多，与江青长得很相象，高个头儿、挺壮实。和江青的不同之处是，她不戴眼镜，也不象江青那样喜欢艺术。她的丈夫解放前就死了，抛给她两个儿子。有一个在丈夫死后不久也淹死了，另一个叫王博文，他和她一起来到中南海。李云露住着一个很漂亮的房间，毛泽东曾对刘松林抱怨说：“江青把李云露安排在我家里住。”

李云露没有江青的地位，她听江青的，江青让她来也就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家里的利益。很自然，李云露对李讷比对李敏更照顾，因为她和李敏没有血缘关系。然而，由于家中已经存在的紧张和复杂关系，李云露的出现无疑是火上浇油。

家庭成员出现了分化。江青和李云露很关心李讷。由于江青的唆使，李云露与李敏的关系一天天恶化。毛泽东基本中立，他更喜欢刘松林，江青和她姐姐不能忍受。慢慢地，刘松林和李敏的关系日趋亲密，她们站在毛泽东一边，疏远江青。

一天早晨，毛泽东工作了一夜后走出书房，他提议，中午

全家在一起吃饭。由于毛泽东的工作习惯和家庭关系的分化，这种事很少有，但是毛泽东提议了，他的话就是法律。这一天，天气晴朗，秋日的阳光照在桔黄色的琉璃瓦上，照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刘松林回忆说，那一天，每个人都“异常高兴”。但是，在谁的房间里吃呢？毛泽东穿着拖鞋走进刘松林和李敏的房间，和她们聊起天来，他的这一举动使天平倾斜了过来。

大家围在一张很大的饭桌前，江青也来到她认为是敌人领地的房间。在场的人有毛泽东、江青、两个女儿、刘松林、李云露和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 但是，当香酥鸡和清蒸鱼端上来时，气氛骤然变化。毛泽东在边吃边聊，江青一声不吭。江青的姐姐可能是对李敏和刘松林的某些话不高兴，突然站了起来，把筷子往毛泽东面前一摔，愤愤然走出房间。毛泽东很不高兴，但没说什么。后来，刘松林问他李云露为什么发那么大火，毛回答：“还不是因为我到你和李敏的房间里去了吗！”

江青是个性很强的人，由于受制于身体状况和党的压力，只好在家里找麻烦。在中南海，她要与毛前几次婚姻有关的人打交道，但是根本问题在于，毛泽东有儿子而她没有，由于中国的文化环境，加上她个人野心勃勃，她很恼火。

可以肯定地说，江青是好战的；但是她把自己的斗争看作是自我防卫——为了避免成为毛泽东的孤立无援的附属物，或者说，为了避免成为贺子珍。

在中国，家庭、社会或政治上的表面平静常常掩盖着内部的紧张关系。中国人民的宗派和美国人的馅饼一样多，因为在中国，每个人都要归属于一个群体，这是根本的根本。关系、背

* 毛远新的父亲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弟弟，1943年在新疆西部被国民党杀害，基本上是毛泽东和江青把他养大成人。

景和忠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年龄的增长，性格也就更隐蔽。毛泽东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力，在这一权力的周围波浪叠起。与世界大多数地方相比，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家庭更容易成为权力斗争的漩涡。

美国的家庭是生活在一起的几个个体，中国的家庭是一个社会整体，它的触角伸进社会之中。“公家”指“公众”或“国家”。“公”指公众，“家”指自家。术语如此，事实也是这样：家庭属于公众领域的一部分。由“家”而派生出来的关系网络、不言而喻的义务和轻度的腐化现象，使江青决心在更广大的“公家”这一领域显示一下自己。

如果共产党努力把她限制在家里，她就要运用家里的权力，不能参与政治的中国妇女常以这种方法来弥补。因为这是毛泽东的家，这个“家”的领域也就几乎和“公家”的领域差不多大。有了这块广阔的天地，毛泽东的娜拉也就不再是娜拉，也就不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娜拉。

于是，在江青为主妇的这个家里，出现了拉帮结派、权力平衡，出现了搞阴谋诡计。

不管江青内心对毛岸英的死是什么感情，自从毛岸英离开这个家后，江青在家里的权力地位上升了。她说刘松林与他们这个家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她慢慢地给这位年轻的寡妇施加压力，让她搬出中南海。后来，她竟没收了刘松林进出中南海大院的通行证。

刘松林偶然听到毛泽东和江青在争论她的前途问题。江青坚决要取消给刘松林的补贴，毛泽东愤怒地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照顾松林。”毛泽东在书房里和刘松林谈话，抱怨江青的“唠唠叨叨”，抱怨她对毛岸英没有感情。他气愤地来回踱步，走到书架前，取出一本古书，给松林读了一篇描写树木

河流的浪漫的散文。树变老了，落叶飘零，慢慢地倒下死去；旁边长期陪伴着它的河流，为大树的死去黯然神伤，慢慢地停滞了、干涸了。毛泽东告诉松林，江青对这个家的感情，还不如河流对大树的感情。

最终，刘松林又结了婚——她说是毛泽东的劝说下才这样做的，这样可以解决她与江青关系不好的问题——但是，即使刘松林和她的丈夫不住在中南海，与江青的关系还是很僵，以致“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冲突。后边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

江青又发动了一场罕见的突然袭击，要重新评价中国著名的小说《红楼梦》。这是1954年的秋季。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同时，毛泽东因为这时在党内受到批评，也比以前关心江青了。

江青躺在沙发上，偶然在她的家乡山东省的一份大学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提出，中国几代人都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描写阴谋诡计和淫邪欲望的无害的小说，但是有不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作为小说来读，应做政治分析。江青很同意。她把周扬等文化界掌权人士作为自己开战的对象。

她找来这本小说，象福音传教士阅读哈罗德·罗宾斯的书一样，专门挑其中肮脏的部分。她看到了罪恶的短剑和正义的节杖。她认为，把这本书作为娱乐去读是错误的，应该把它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第二天，她兴致勃勃地去找毛泽东，把山东那位不知名的作者的文章连同自己的心得体会交给了毛。毛正值心境不佳，对北京当局不满，也想听到外边传来的声音。他说，这篇文章对如何评价《红楼梦》一书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让江青去找《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

为了这一伟大的事业，江青从病床上爬起，驱车来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报社编辑说，这篇攻击《红楼梦》的文章一开始是寄给他们的，因拒绝刊登，最后在山东发表了。江青说，她和毛主席觉得，象这种“不知名的小作者写的有生气的批判文章”应该发表在北京的主要报纸上。编辑一边嘟囔一边说，他们将发表这篇文章。

江青又情不自禁地拿着山东发的这篇文章去找周扬，她希望周扬在《红楼梦》这一问题上能站“错”位置，从而落入自己的圈套。她没有告诉周扬毛泽东的看法，也没有说已给《人民日报》施加的压力。她只是要周扬读读这篇文章。周扬和他在宣传部的同事们说：“这么一个小人物，怎么敢对这本已有定论的小说提出批评？”

后来，毛本人也写了一篇文章，谈《红楼梦》的害处——江青说是在她的鼓励下写的——文章指出，不批判《红楼梦》，就是“毒害青年的心灵”，是“对小人物最大的资产阶级压迫”。毛的言辞很激烈，特别是他把《红楼梦》事件与《清宫秘史》和《武训传》联系起来，这原本是江青扔出的两颗炸弹。然而，这场文学“斗争”的结果是一场妥协，一方面因为很多人讨厌江青，另一方面，毛也不愿把《红楼梦》置于死地，因为他基本上还是很喜欢这本小说的。*

*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态度比江青要好一些，他不愿通过文学的手段实现其政治目的。这在他1964年与王海容的一次谈话中可略见一斑。当时，王海容向毛抱怨说她的同学总是读《红楼梦》而不学英语，毛的态度很明确。

毛：你读过《红楼梦》吗？

王：是的，读过。

毛：你喜欢小说中的哪一个人物？

王：谁也不喜欢。

毛：《红楼梦》值得一读，这是本好书。

在他的侄女努力成为一名现代女性的时候，毛已经是第五次读《红楼梦》了。

《人民日报》终于没有发表这篇批判文章，而是由《文艺报》作了转载。《文艺报》虽也是一份重要报纸，比《人民日报》要差一些。他们只是警告读者，读这本小说要注意，并没有把它从中国古典名著中剔除出去。

江青一有机会总要对文化政策指指戳戳。周扬谈到他同时也代表很多人——对江青很不满。毛泽东虽有时可以不理江青，有时还是帮她说上几句。

《红楼梦》事件中期，重又焕发精神的江青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节的游行队伍。飘扬的彩旗和气球、欢乐的人群、斑斓的焰火，这是毛泽东政权的第五个国庆节。尼基塔·赫鲁晓夫是这一庆典的特邀客人。

领导人站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象一位看着庄稼的农夫，毛泽东显得心事重重，江青则谦逊地站在一边。

周恩来看到江青一个人站在那里，他想走过去把她介绍给赫鲁晓夫。但是毛泽东突然转过身，象侍者接住要掉的盘子似的，走到他妻子身边把她拉开了。他和江青走到一个角落里，观看下边游行的人群。这里离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很远。周恩来站在那里，好象是犯了什么错误。

好象不是毛泽东怕江青向赫鲁晓夫泄露国家机密，也不是怕赫鲁晓夫企图通过江青使中国在满洲问题和对美政策上靠近苏联。可能毛一直没有忘记在延安结婚时，党对江青作出的规定。不管怎么说，毛不喜欢赫鲁晓夫，他不想看到赫鲁晓夫与他妻子在角落里交谈。可能毛泽东也听说过，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宴会上，称江青是“毛的绣花枕头”。

江青严肃地、一声不吭地跟着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在这种全国性场合，江青还没有资格是“毛夫人”，在中国领导人中，她还不能扮演突出的、自然的第一夫人角色。

如果江青真有迫害毛泽东的动机，他的侄子毛远新会觉察出江青的某些行动。但是，结实英俊的毛远新与江青的关系一直不错。五十年代，江青常常带着他和李讷去颐和园划船，或是去儿童乐园。在家里，江青常常夸奖毛远新，并要李讷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哥哥。

江青和毛远新关系亲密的原因很简单，在权力平衡的天平上，毛远新很自然地成为江青的同盟军。因为他的父亲不是毛泽东，他的母亲也不是江青的前任。江青把毛远新看作是自己的“王储”，她没有儿子，但是她可以把毛家的这一位培养成她的儿子。

现在，江青与毛远新的关系是“年轻的伯母”与“小豆子”之间的关系，有朝一日，它会变成一条政治的纽带，把中国缠绕其中。

毛泽东接见了一个令江青头痛的客人，这就是贺怡，她是贺子珍的妹妹。在延安时，她和她的丈夫曾为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问题闹过一场风波。现在，她又向毛泽东建议，寻找他和贺子珍丢在江西的一儿一女。

无疑，贺怡的这一想法动机很简单，但是江青认为，这是有意削弱她的地位。因为江青没有儿子，毛与杨开慧的两个儿子，一个已经死去，一个精神不大正常，如果能找到贺子珍的一个儿子，带到毛泽东家里来，也就是准备做毛的“继承人”（毛与贺子珍的另一个儿子死在苏联，还有女儿李敏现已在北京）。不管怎么说，这对贺怡和她的亲属没有什么坏处，他们都是与毛泽东的家庭有干系的人。

毛泽东对贺怡的建议是否热心，我们不清楚，但是没有阻止她。毛泽东和贺子珍在长征开始的时候，放在农民家里二三

个孩子，经过多方查找，发现了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他被带到北京，经过盘问调查，结果不是他们的儿子。江青有了话题，她对贺怡说：“你今天带来一个儿子，明天又带来一个，天知道你能找来多少。”结果，因为各种原因，也就再没有毛一贺的孩子带进中南海。

江青对她喜欢的人也的确很有感情，但是在中南海也有很多她不喜欢的人——因为她总是怀疑有人反对她，她也认为她有权管理这个家。

刘松林最终还是搬出了中南海。1955年，刘松林要去苏联留学，江青的外甥王博文恰巧这时也要去苏联学习。毛泽东听说出国服装不包括大衣，而大衣在苏联是必不可少的，于是给刘松林和王博文一些钱，让他们分别添置一件大衣。江青从她姐姐处听说此事后大发雷霆，“他是他家的人，博文是我们家的人。应该是我给他钱买大衣。”

家庭成员中，最使江青感到麻烦的是毛岸青。岸英死在朝鲜的时候，岸青才26岁，但是他的心理状况一直不正常，1951年秋季发过一次很厉害的精神病。因为他俄语不错，被安排在中央马列研究所工作。他在办公室里与人吵架，大发脾气，而且打了起来。

毛泽东和江青把毛岸青叫到中南海（他与哥哥岸英一样，都不住在家里），监督他作自我批评。岸青后来的妻子说，江青把毛岸青关在自己养猴子的“笼子”里。毛泽东对儿子的态度很暧昧，他决定，把岸青送到另一个城市去治疗精神病。就这样，因为一直缺乏父母之爱，哥哥又刚刚死去，家庭中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再加上父亲的冷淡和继母的仇视，27岁的毛岸青精神病越来越恶化。

毛岸青在大连的一家医院里，不仅没有治好他的精神病，却

爱上了一位姓徐的护士小姐。江青大为恼火，她认为毛岸青与女人乱搞。在她看来——从她自己的心理水平出发——智力迟钝的人是不会自己挑选生活伴侣的。

因为在苏联住的时间较长，毛岸青的汉语不如俄语说得好。对江青的批评，他总是耸耸肩膀或是淡然一笑，江青看到自己的话作用不大，更是火上加火。

岸青被从大连送往苏联的一家医院治疗。有人说，江青是违背岸青的意志把他“送往莫斯科治病”的，是为了把他踢出去，就象她的敌人违背她的意志把她“送到莫斯科治病”一样。把岸青送往苏联的决定可能是几种因素促成的：有官方的安排，有医务人员的意见，可能还有毛泽东的主意。但是，江青经过一番较量，终于取得了自己的成功，姓徐的护士小姐没有陪岸青去苏联。

毛岸青从莫斯科给徐护士写信，但是很多被江青扣下。1954年，官方决定把徐护士送到莫斯科去，让她与岸青在一起，但是江青从中作梗，阻挠这一计划。第二年，这位可怜的护士小姐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终于放弃了毛泽东的儿子，与大连的一位青年结婚。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的毛岸青又陷入了情网，他如痴如醉地爱上了一位莫斯科的护士小姐。

如果一个中国人与外国人相爱，即使是友好国家的人，也会遭到中国方面的反对（刘少奇的大儿子就在这个时候爱上了一位苏联姑娘，但是他的父亲和中国共产党不允许他与她结婚。我们后面还会谈到这些）。江青这一次有些反常，她出人意料地认为，岸青应该与那位苏联护士小姐结婚。

江青很希望这位年轻人定居在苏联，这样永远也不会再惹什么麻烦。她把项链和衣料送到莫斯科，作为礼物送给未来的新娘。很不幸，这桩婚姻没有成功。

毛泽东和平时一样，把家中的很多事交给江青去处理，但是对岸青这件事的处理，最终还是毛泽东作出决定。

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海风阵阵吹来，毛泽东、江青、李讷和李敏正在陪客人吃晚饭。经过和煦的阳光和咸味的海风的洗礼，全家人都面色红润、精神愉快。这是1954年的夏天，在北戴河毛泽东的别墅里。张治中和他的妻子及四个孩子也感到很放松。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很少有这么和谐，毛泽东的心情也很少这么愉快。

在饭桌上，毛泽东显然是主人的姿态。他一个一个地问这位前蒋介石部下的孩子在学习还是在工作。江青很少说话，只是不停地往桌上端菜。她一直盯着毛面前的盘子，不时地给他夹菜，而且总是默默地把一些辣味菜推到他的面前。张治中的大儿子告诉毛泽东，他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毛面露喜色，说他很高兴。他说话时，江青把回锅肉夹到他的盘子里。

张治中的一个女儿回忆说：“江青很谦虚，也很细心，毛的两个女儿都比江青讲的话多。”

饭后，毛泽东带领张家的人看他的别墅。“这是我的房间。”毛走进一个很大的房间说，里面有一张木床，床边放着文件和书籍。江青的房间在楼下。

这一年，江青的健康状况有所恢复。但是还不到十二个月，1955年中期，她又一次感觉不适，发高烧、体重骤然下降。她从杭州西湖附近的别墅飞到北京，经过检查，妇科专家诊断是子宫颈癌。

江青的心情变得很悲观。她想起自己在济南做学生时主演田汉的《湖上悲剧》的情景，她在想，这种惨事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了。

江青并不担心重返苏联，但是集体的决定也是可想而知的。1955年7月，在一位18岁的护士陪同下，她多少是出于自愿地又一次回到莫斯科医生的手中。她又一次与女儿李讷分别。

在毛泽东和他的同僚决定江青重返莫斯科时，可能他们认为她的确也应该去。在江青临去莫斯科前的6月17日，毛泽东以前的警卫员林金来来到毛家，他没有感到家庭有一种紧张气氛。这是下午三点钟，他陪毛泽东游了一会儿泳，来到起居室，毛把这位年轻人介绍给江青。江青与他握手后，又把李讷推到跟前说“问叔叔好，讷。”然后，他们一起坐下来吃晚饭。

在苏联首都，江青又有了精神，她把个人意志强加给毛岸青和刘松林。岸青正在苏联的一家疗养院，松林和江青的外甥王博文一起在莫斯科大学学习。

她告诉刘松林，岸青病得很重，不要去看他。她又给毛泽东写信，告诉他岸青的好消息，这纯粹是欺骗。中国人生病被关在苏联的医院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江青自己很有体会。

四个月後，刘松林偶然碰到王鹤滨，他以前是毛泽东家里的医生，现在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松林从他那里听说岸青的情况很糟，而且日益恶化，她马上写了一封急信，并想方设法送到毛泽东的手里。她以前的公公还是很相信她，毛把江青的报告放到一边，命令把岸青接回到大连的一家医院里来。

江青一回到北京，就听到从大连传来的不愉快的消息。她本来希望会和一位苏联护士结婚并定居苏联的岸青，现在与刘松林的妹妹邵华正在相爱。”江青听到这一消息简直如五雷劈顶，这桩婚姻无疑会壮大松林的力量，使中南海里“杨开慧的

• 邵华这时还姓张，这是她母亲的姓；松林跟她父亲姓刘。后来，人们称邵华为刘邵华，简称邵华。

势力”也会大大地加强。

江青开始控制岸青寄往中南海的信件，扣留下很多，并毁掉一部分。但是毛现在已经警觉起来，开始关心岸青。他给岸青写信说，“你写给我的信，不要经过其他人。”这显然是指江青，他继续写道：“最好叫松林、邵华或李敏转交给我。”岸青和邵华结了婚。但是因为关于邵华的事，江青好几年没有和岸青说话。

对江青来说，岸青确实是个难题。这位年轻人有精神疾病，毛泽东对家庭的这些复杂问题又常常是撒手不管。江青弥补了这一点，但是做得很不好。邵华比岸青年轻得多，在江青看来，她与岸青结婚，是为了走进中南海毛泽东的这个家。江青对这类事的逐步怀疑使家中的这种紧张关系日趋激化。

正在这种家庭纠纷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毛泽东给石城乡写了一封信，毛的外祖父文氏家族就住在这个乡。毛泽东进北京后，他的文家表亲每年都要来北京看他，回去后就有些飘飘然，因为他们是毛泽东的亲戚，在乡里受到很好的照顾。

毛泽东在写给当地官员的信中说：“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就给他们特殊的照顾，”他继续写道，“我的态度是，我爱他们，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另外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

无疑，江青看到了这封信——她可能是第一次这样做——但是在她看来，这种感情是绝对真挚的。与毛泽东不同，她出身于一个充满着武力的破裂的家庭。毛对他的亲戚的这种态度使江青受到了伤害。她很敏感。她感到，如果不网罗自己的力量击败那些人的话，她的地位毫无疑问地要降低。她还感到，如果毛泽东放弃自己的家庭责任，她就不得不对由此所发生的事有所行动。

1956年6月间，江青和毛泽东在武汉度过了很平静的几

天。毛到长江里游泳，江青坐在船上，虽有点儿不耐烦，还是很高兴地递给毛泽东馒头吃。一个浪头打来，毛重新浮出水面，一边吃馒头，一边问江青感觉如何，然后又钻进汹涌的水中。这次外出，毛泽东和江青很亲密，他还写了一首诗《游泳》。

这是一个晴朗的秋日的夜晚。上海，宋庆龄的官邸灯火辉煌，一场宴会即将开始。当天下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后，已经离开上海机场飞回雅加达。宋庆龄——这位中国最有威望的名义首脑，正在精心准备这次宴会，她已邀请了中国的领导人前来赴宴。她的服务人员还为抽烟的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成员准备了一间吸烟室。

上海市的市长柯庆施来了。随后，毛泽东悄无声息地也走了进来，象是大学教授走进图书馆，江青跟在他身边。宋庆龄简单地向他们寒暄过后，又去招呼刘少奇和王光美。宋庆龄很喜欢王光美的知识才华，认为江青也不错，宴会进行的时候，宋几次和江青交谈。江青静静地坐在那里，别人同她谈话时，不管什么话题她都很认真。她没有随毛四处走动，但是眼睛一直跟着他，整个宴会，她都是一位很尽职的妻子。

江青在武汉和上海时就感觉不适，和毛泽东一起回到北京不久，她的子宫颈癌就恶化了。她不愿做手术，又不愿用放射线疗法植入钴 60，这是她的中国医生的唯一选择。不几周，她又回到了苏联的医院里。

江青病情恶化，她不能参与讨论她的这一次苏联之行。这一过程中，先到苏联去了几个人，莫斯科与北京之间连续三天电话讨论此事——她说，她对别人为她制定的计划很不满意。李讷又一次要几个月见不到妈妈。

在一位中国妇科专家的陪同下，江青来到莫斯科。她病得很重，身体虚弱，情绪低沉。很显然，苏联医方人员怕江青死

在他们手中，把她从一家医院转到另一家医院。不是因为他们怕担责任，就是江青的坏脾气使治疗不能连续下去。她的白血球降到 3000，稍有感染即有生命危险。在给她做放射治疗时，要一边输血一边吸氧。

江青会不会成为医疗事故的牺牲品？苏联的医院常常出现死人的事情，此外，苏中关系又在恶化，谁也不能保证江青的健康问题不会成为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一张牌。非常奇怪的是，江青说，她曾请求让她回中国，但是，莫斯科和北京好象都没有听见。

然而，证据表明，江青自己的精神状态和对国外生活的不适应，是她感到不适的主要原因。1957年1月，周恩来会晤赫鲁晓夫时曾去看望过江青。周恩来说，经过仔细检查她的病历发现：她需要的是幽默、交谈和娱乐。他带去好几个人，和她一起说笑，带她出去吃饭（周恩来非常关心此事，以致把邓颖超托他转交给江青的一封信也忘了给她，结果又带回了北京）。*

1957年春天，江青脱离了危险，她让工作人员给北京打电话，要更合胃口的菜，她讨厌苏联人吃的大块肉。飞机运来了活鱼、香蕉、苹果、茄子、西红柿和其他新鲜蔬菜，这些都是江青的姐姐李云露从中南海挑选的。住在别墅里的江青眼睛发亮了。她到厨房里指挥工作人员做菜，告诉他们怎样做鲤鱼。小翻译蒸菜竟然没看表，她又火了。吃饭时，她一边吃，一边含混不清地指出别人的错误——这个菜缺少调料，那个菜煮的太老。

* 江青对维特克说，毛泽东到莫斯科也没有去看她。维特克指出，这时他们的婚姻关系很糟，所以江青说的话要打个问号。实际情况是，毛泽东于1957年11月去莫斯科，而江青在1957年7月时已经在青岛。所以，毛在莫斯科不可能去看她或给她打电话。

苏联的四位最高领导人的夫人给江青发出了邀请，江青感觉很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她穿一件米色的西服上装、毛皮大衣，戴上帽子，和翻译同坐一辆车，她的中国医生坐在第二辆车里紧随其后，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沉重的大门前。在摆着鲜花的前厅里，四位地位显赫的夫人向江青和她的随行人员问好。在一张很大的沙发上，赫鲁晓夫的夫人坐在江青的左边，马林科夫的夫人坐在她的右边。莫洛托夫的夫人、卡冈诺维奇的夫人、江青的中国医生等人也都坐在松软的沙发上。江青面带微笑，坐立不安，她找不到可谈的话题。大家谈着江青的健康问题，江青盯着地板，手帕捏在出了汗的手里。

席间，马林科夫的夫人说，尽管苏中两国文化不同，她想江青会抓住这个机会的，待身体完全恢复后，可以到苏联电影学院去学习一段时间。江青还要吃鲟鱼，她盯着鱼的颜色，冷冷地说，她怕自己已经没有学生的那股朝气了。刀叉碰得叮当响，过了一会儿，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夫人似乎要说些什么，还是马林科夫的夫人找到了话题。请问毛泽东夫人有多大年纪了？江青如骨梗在喉，很生气，好大一会儿沉默后，她说：“不老也不年轻……”

回到别墅，江青大发雷霆。她在屋里来回踱步，脸色阴沉。她说，她们“瞧不起”她，要她去当学生，还问她的年龄，这是“侮辱”她，“在西方国家哪有这么做的？”

她们知道江青爱听颂辞，她的中国医生俄语讲得很流利，于是对江青说，饭后四位苏联夫人还说，江青是“有教养的”、“时髦的”中国夫人。江青的脸色马上多云转晴。现在，紧张的神经安静了下来，她觉得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吃饱，现在又可以坐下来吃可口的中国饭菜了。

江青第四次去苏联回国后，认为自己死期将近，精神状况比身体状况还差。毛泽东很少关心她。李讷已经18岁了，常常把她认作陌生人。她离开了中国革命的舞台。

毛泽东的政治处境也很困难，他掀起的“大跃进”运动走人歧途，其他政策也接连失误，多年的老战友开始批评他。但是这些事他没有和江青多谈。他们的婚姻关系也在走下坡路，四十年代，江青很顺从毛，情愿在党的监督下做他的助手。现在，江青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相互疏远是不可避免的了。

毛泽东的内心越来越怀念他以前的妻子杨开慧。他送岸青（已经出院）和邵华到长沙，去看望杨开慧的亲属。自1957年夏天起，他四次请他与开慧二十年代在长沙时的保姆陈玉英来北京，他流着泪对苍老的陈玉英很动感情地说：“看到你，我好象又看到了开慧。”他还写了一首感情真挚的怀念杨开慧的词。

五十年代后期，江青大部分时间不在北京，带着她的护士和服务人员住在外地，与国家政事、她的丈夫和女儿（现在在北京大学读书）脱离了联系。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他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这次会上他发表了伤感的谈话，“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已经死掉，另一个也变疯了。”他知道自己处境艰难，毛泽东到他的老根据地长沙去休养。与此同时，江青飞抵北京。带着毛的私人医生，而且不顾毛的发火，让医生开他无权开给的药。

江青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湖南，她讨厌毛泽东的家乡，从来都是避免到那里去。至于毛的出生地韶山，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人到那里去观看学习，她也讨厌。即使在六十年代，她也从未踏上过这里的土地。

毛泽东和江青在一起时，兴趣爱好也有很大的不同。毛喜

欢乘火车旅行，江青喜欢坐飞机。在文学和戏剧方面，毛喜欢中国传统的戏剧和文学，江青喜欢现代的。毛常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起得很迟，江青睡觉起床都比他早。毛对饭菜很少挑剔，吃饭狼吞虎咽；江青则喜欢精美的饭菜还要经常变换花样，常常是毛泽东已经吃完饭了，江青还没有开始。毛不喜欢在自己的住处摆上鲜花装饰一番，或是饲养小动物，江青则很喜欢兰花，自己还养着猴子。毛总是捡起身边的衣服就穿，江青则要花很长的时间刻意装扮——有些颜色她很喜欢（如咖啡色），有些颜色就很讨厌（如黄色），有时她一天更换三套衣服。*

毛泽东不喜欢去看医生，也很少听从医生的劝告；而在江青的生活中，医务人员是常客，她象数自己的敌人一样历数自己的病情。毛曾对江青和那些喜欢她的人说：“我就从来没有过高血压或肝炎，如果一个人从来不锻炼，只是吃好的、穿好的，生活很舒适，哪里也不去，那肯定要生病的。”

在北京时，一天上午，毛泽东通宵达旦完成一篇文章，江青这时正在李立三家打扑克，李的苏联妻子是江青的好朋友。毛让给江青送信来说，他想和江青一起吃午饭。江青正在兴头儿上，直到午饭时间过后才回去。她回到中南海时，毛已经吃过午饭上床睡觉了，他对江青很不满。江青也是一肚子气，因为只她一个人吃饭了，早知如此，她在李立三家还可以打一轮扑克。

这是1958年的盛夏。毛到河南农村视察，江青随同前往。

* 江青曾经对宋庆龄抱怨过毛的穿着：“他总是穿黑色或绿色的列宁服。有一次，一个外国人送给他一条领带，他把它挂了起来，从来也没系过。”她对孙逸仙的遗孀说：“我看过孙中山先生穿西服打领带的照片，你穿着旗袍——这多好！早几天，外国人到中国来，笑话我们都穿着同样的衣服。他们会认为，我们没有自由穿我们想穿的衣服呢。”

江青很少陪毛泽东外访，但是这一次，毛让他的两个女儿和侄子毛远新一起来河南，江青也就跟了来。一天下午，毛与农民代表谈得很晚，他突然又叫几位农民到他屋里坐坐。江青和三个孩子正围坐在一张大圆桌旁。毛指着李讷和李敏说：“这是我的两个女儿，都是学生。”在介绍过毛远新后，毛又介绍江青说：“她就是我的爱人。”

毛泽东邀请几位农民共进晚餐，他们只吃自己碗里的米饭，心情太紧张，不敢去夹桌上的鱼和肉。毛和江青都给他们夹菜，把鱼肉放在他们的米饭上，但是，几位农民还是不敢去碰桌上的鱼肉。饭后吃苹果也是这样，他们高度紧张。他们要走了，毛一家五口走出来送别。江青很谦逊地向这几位农民代表说再见，和在吃饭过程中一样，她完全是一个文静而有礼貌的家庭主妇。

深夜，一条消息传来，俞启威死于心脏病，他才46岁。江青没有参加葬礼。毛泽东以他个人的名义送了花圈，后来，江青在报纸上读到讣告，讣告中没有提到她，文中把俞启威（现改名为黄敬）称为“杰出的革命战士”。自延安时到现在，江青几乎没有见过他。她会不会想起他在青岛时教给她的东西，并帮助她在上海立住脚？她想起了俞现在的妻子、记者范瑾，俞启威会不会告诉范瑾自己的事呢？

情绪低落时，江青总是到广州去。她住在省委的宾馆里。宾馆有一个很大的兰花园，她还养着自己的一只猴子。周围的工作人员很多，但是江青不能平等地对待他们，她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她的嗓子变哑，说话声音很小，她不允许别人说话的声音比她高。她的情绪变化很快，早上说要坐飞机去济南，午饭后改去北戴河，晚上又说要继续呆在广州。她有时紧急召来医生给她做检查，医生来后，她又无限期地推迟。

因为心绪烦乱和任性，她放出一只猴子扑向一位老服务员，他的惊慌失措使江青感到很高兴。不管白天黑夜，她随时都可以叫来服务员陪她打牌。心情好的时候，她不停地教给别人应该怎样出牌；疲倦了，服务员希望她就此罢休上床去睡觉，她会突然叫道：“我还不睡。”他们只得硬着头皮继续陪下去。

她的话题总是离不开三十年代她在上海的生活。她对服务人员一再强调，她当时的确是“很走红的”。看样子她很怀念那一时期，当时她是她自己的女人，轻快活泼，生活顺利，每天都是自由的。

赫鲁晓夫曾两次到过北京，1958年和1959年，他想见见江青。但是江青病得很重，或被认为是病得很重，不能见他，也不能见任何外国领导人。与此同时，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和外交部长陈毅的妻子张茜，扮演了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夫人的角色——会见外国客人，参加大型宴会，随其丈夫出使亚洲各国。

毛泽东即将在上海主持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安排江青来此会面，然后他们将一起去他们在杭州的别墅。江青从广州飞抵上海以后就听说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毛泽东会见了她以前的妻子贺子珍。江青盛怒之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毛迟钝地为自己的这一举动辩护，他说，不管怎么说，贺子珍还是一位“老战友”（贺子珍是老战友，而江青不是）。

党的领导人在锦江饭店举行了一次舞会，这里原是法租界。晚上九点钟，江青拖着一个护士来到这里，她坐在一张远离上层领导人的桌子旁，阴沉着脸，不知是身体不适，还是心中有火。十点半钟，毛泽东走了进来，他没有到江青跟前去。朱德走到江青桌旁，弯下腰问可不可以请江青跳个舞。

江青拒绝了，她说自己太累。但是不一会儿，她轻快地走到文化部的一位英俊的小伙儿面前请他跳舞；两人优美的舞姿

频频旋转，周围很少有人会跳这种舞。毛到处走动，一会儿与一位政治局委员聊天，一会儿又走到另一位面前。江青与这位年轻人跳舞是对毛不理她的一种报复。

11点钟，江青突然离开了。开车回她住处的时候，她狠狠地批评护士，因为护士让她呆得太晚了，不知道她已经很累。

毛不愿意去杭州，第二天，江青一人来到西湖边上的这幢别墅。毛和江青常常是秋天来这里休息。这是一座塔式建筑，红色的琉璃瓦掩映在西湖岸边的垂柳之中。这里唯一的声音是远处传来的鸭鸣和湖水拍打岸边的声音。

江青决定重新装修这幢别墅，她提出了很多要求：门窗都要双层玻璃以遮挡尘土；一色的苹果绿；厕所、电话和其他设施都有助于减小噪音；电影放映室要用古色丝绸屏幕；毛和她的房间要隔开，中间是会客室、盥洗室和餐厅相联。装修后她很满意，经常来这里住上一段时间。

非常了解中国人生活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对我说：“因为我在中国住了这么长的时间，婚姻对我来说只是附带的事，中国人就是这样。”江青就是如此。在山东，她象扔掉一双旧鞋子一样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在上海，她借助于男人而有了一点名声。在延安，这是“爱情的时代”，她也不只是出于爱才结婚，而是出于复杂的原因。五十年代，她抛弃了浪漫的爱情，这毫不奇怪，其他很多人，也是这样。作为毛的妻子，这一位置给她打开了几扇门，但不是她自己愿意通过的门。外表华丽、实质空虚烦闷的生活不会维持长久，因为她是个不安分的女人，她什么也不相信，只相信自己的意志。

她似乎命数已尽。六十年代到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可能只有一个人除外——江青要到此为止了。然而，一根稻草在风中飘荡。

第五章

恢复与报复：在政治的舞台上（60年代）

“我是医生，不是护士。”

——江青

“我们把他们揪出来，再把他们吊起来。”

——江青（谈她在文革中的行动）

周恩来失望但不失策。1957年的一个寒冷的日子，他离开江青在莫斯科医院的病房，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一轮谈判后，带着著名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又回到了江青的病房，程当时正随一个文化代表团在苏联访问。如果说医生对于江青的病已经智穷技尽的话，对这位中国总理来说，只要冷静下来，任何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他在天津时曾在业余剧社的演出中扮演过女性角色，把文艺带入江青的病房，或许能分散她对疾病的注意力。江青穿着绿色的睡衣躺在沙发上，观看程砚秋的表演，周恩来在一直说着一一些愉快的事，直到深夜。江青的情绪慢慢地好起来。

两年后，真是鬼使神差一般，江青在上海的医生“为了使她的注意力从病痛上转移，建议她去看看演出。”她照办了。另外，江青每天还接受针灸治疗，练太极拳，打20分钟的乒乓球，并游泳150米，这些都促使她进一步康复。而后，江青开始插

手戏剧界的活动。

江青的康复还与毛泽东有很大的关系，这位60岁的老人最近对他40岁的妻子已经开始另眼相看。江青是伴随着她床头边一张珍贵的照片进入60年代的，这是她自己拍的江西庐山仙人洞的一幅照片，背面有毛的题诗。1959年，因为大跃进的失败，毛在庐山与他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正在打得不可开交时，江青不受欢迎地插了进来，站在毛泽东一边。1961年的一天晚上，毛和江的关系再次缓和，毛拿起毛笔在背面写下了这首诗，它不是写庐山，也不是写那个时代，而是写与他关系亲密的江青：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亲手将这首七绝律诗抄在照片的背面，并题“赠李进”——这是江青曾用过的笔名。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这张照片上拍的不是庐山仙人洞，而是锦绣峰的御碑亭。这张照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明，在经过十几年的冷落之后，毛对江青开始再度垂青。

六十年代初，江青惊人的康复还暗含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她摆脱疾病和绝望的折磨的坚强意志。可以肯定地说，她的这种意志力量与她的抱负和毛泽东的鼓励是分不开的。她要在中国文化政治的躯体上打上自己的烙印。这个40多岁的女人终于摆脱了子宫颈癌、肝炎等病症的折磨，要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

“我是医生，不是护士。”江青对一批戏剧界的人士说，她

当时正在给他们开医治艺术界病症的药方。这就是江青！在济南读书时就坚持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的江青！在上海命令唐纳只有改正缺点才配说曾是她的情人的江青！在《我们的生活》一文中坚持女演员不是“玩偶”而是与剧作家和导演同样重要的江青！在延安决心靠近毛并把他搞到手（象丁玲曾对我说的“把他玩到手”）的江青！

没有这种精神，没有这种顽强的自信，没有这种从不低头的性格，江青就不可能从五十年代的失望消沉中站立起来。

1962年9月，秋高气爽，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夫人抵达北京访问。当时，中国正努力把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拉到自己的身边，作为毛革命阵营中的年轻伙伴，她的来访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非常热情地举行宴会、茶会，组织观光游览，事无巨细，均在官方报刊上作详细报道。刘少奇当时与毛泽东地位相当，很自然地成了这些报道中的中心人物，但是，在舆论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漂亮的娇妻王光美。9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亲切交谈的照片。第二天，又在第一版刊登了苏加诺夫人和王光美这两人的照片。在其后的几天中，《人民日报》几次刊登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的合影。

所有这些，令江青实在难以忍受。中国人把敌人叫“仇家”，意思是“相互敌视或仇恨的两个家庭”。在中国政治中，它远比个人间的仇恨更能掀起巨大的波澜。江青非常嫉妒王光美，因为王能得到的一切她都得不到。江青的妒意与毛对刘少奇的一些作法不感兴趣不谋而合，因此，她想借助毛的力量，狠刹一下王光美的威风。五天以后，《人民日报》就在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江青和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而在第二版一

个很不显著的位置刊登了一小张刘少奇、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的合影。

如果说，苏加诺夫人对自己的照片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中国报纸上感到困惑的话，《人民日报》的读者却不然，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位外国女人的照片出现的次数，而是密切注视着江青和王光美这两位贵妇人之间的较量。他们知道，报纸宣传对她们是非常重要的斗争武器。江青的照片以前从未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过，七年来，中国的报纸甚至很少提及她的名字。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官方也从未公开披露过她与毛泽东的合影。

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举动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应，这就是，把江青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惹人注目的位置。

在西方国家，领导人的配偶极少能成为国家权力机构中的重要成员，而在毛的中国却恰恰相反。因为西方国家的首脑是经选举产生的，而他的夫人或她的丈夫却没有经过选举，所以，她或他的行动与首脑的国务活动关系不大。在美国，好象只有当总统病魔缠身时，他的婚姻才能成为权力机构中一个潜在的组成部分。而在中国，无论国家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如何，他都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如果卡特总统病入膏肓，不能继续理政，罗莎琳·卡特才有可能行使较大的权力。富兰克林·罗斯福病魔缠身，他的婚姻关系才发生细微的变化，他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从被动的、模糊的位置虽未能转为对国家直接行使权力，却对政治和社会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和埃莉诺·罗斯福一样，丈夫受到的挫折也为江青提供了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长期以来，作为政治家的毛一直被认为是权力的终极，现在，他突然想起利用他能干的、但是一直未发挥作用的江青。和罗斯福夫人一样，江青力图抓住一切可能

的机会挽回影响。

作为毛的妻子，现在又为困境之中的毛重新需要，江青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名政治家。江青喜欢成为英雄，她喜欢崇拜英雄，也喜欢接受别人的崇拜。不久，她就发现自己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这并不是说所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妻子都会象江青在六十年代时那样做。她是一位具有独特气质和才能的女人，洒脱而精明，表面文静而性格坚强。对于丈夫或来宾的提问，邓颖超可能不会有明确的答复，但是对于江青来说，她会明确地阐明自己的好恶。去拜访邓颖超的人，出来后会说：“她这人真好。”江青一般不会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她看上去是一个“颇有心计”的女人，她时刻准备着战斗，时刻准备着要在她头顶的蓝天上写下一个大写的“我”。

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在六十年代初，毛泽东不得不分权给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坚持整顿政治和经济的人。毛在他经常看的一本书中写道：“他们把我当作死去的祖宗供着。”这是抱怨。

六十年代初，双方力量势均力敌，存在着一种权力平衡。毛利用江青和一些新面孔组成了自己的“宫廷派”，提出了一些左的思想——阶级斗争变得越来越尖锐；要求进行文艺改革，使它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反对停止革命的官僚主义分子——对刘邓逐步上升的权力地位提出了挑战。在国家这条大船上，“宫廷派”的成员并不握有实权，但是，他们在甲板下面非常活跃，特别是他们手中握有笔杆子。

毛的左倾观点使刘少奇和邓小平大感不解，但是，只是作为观点存在，这两位务实主义者还是能够忍受的。这些观点使江青极为兴奋。它包括反对传统主义，对这位女人来说，它无

疑胜过一杯美酒。如果她能爬上文化领域的宝座，首先就要把周扬等人打翻在地。

这一时期开始的时候，66岁的毛正在受帕金森症的困扰，他对来访的阿尔及利亚客人说：“我的医生也不能保证我能活多久。”他又在一次军队干部会议上说：“每个人都要准备好交班。”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毛泽东和江青都知道，要想动摇刘邓势力，对共产党的队伍进行清洗，军队是至关重要的。身体瘦弱、声音嘶哑、总是戴个帽子遮住秃头的国防部长林彪，出于自己的考虑，这时已准备完全忠于毛泽东。他从自己的前任、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倒台中，吸取了不少的经验教训。毛开始把林彪而不是刘少奇，看作是自己的第二号人物和自己的接班人。林彪命令军队要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毛则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人民解放军”。

1961年夏的一天，江青来到广东的一个部队视察，这支部队一直与毛和林彪的关系比较密切。江青发现，为了节省开支，连队自己种菜，战士们的床铺和蚊帐整整齐齐，虽然二百米远处就有一家理发馆，战士们还是自己互相理发。

江青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说，因为他们听从“毛主席的教导”，他们不愧是真正的“人民的子弟兵”，这是毛泽东思想引导的必然结果。称赞战士们的节俭精神不是这篇文章的主旨所在，江青关心的是通过行使权力而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而吹捧毛和他的忠实信徒林彪，则是实现这种自我表现的手段。

江青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她不时地对毛泽东逢迎拍马，身体恢复期间，她从文件和出版物上剪下有关的片断呈送给毛泽东，她还把这些事件或观点分成亲毛的和反毛的两大类。她希望毛泽东能对周围的事大发雷霆，她希望毛的愤怒不只局限于

思想上的分歧，更能变成个人间的恩怨。

江青曾微笑着说：“一旦屠刀在手，我就会杀他个片甲不留。”她喜欢学着京剧里的唱腔叫喊。这种好斗的性格使她开始了第二个斗争策略：她要把队伍分成相互仇视的两派。受这种思想启发，江青到处乱窜，她迫不及待地把人们分成左边的和右边的，象剧院里的引座员。她发现，异化的青年最适于用来制造这种分裂。

江青的目的就是制造分化，最好是分化的双方能够相互争斗。她的第三个策略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把自己先裹起来。她宣称，中国半数的政治家和文化界人士都是黑帮或黑帮的代理人，因为他们“反对毛主席”。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革命，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维护妇女的权益和祖国的安全，等等，都要与他们作斗争。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江青需要一批年轻、有野心、又善于摇尾乞怜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

随着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多，江青常常在考虑：穿什么衣服最为合适。

象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这位地位很高的名义首脑，还可以穿1949年以前的做工精致的丝绸旗袍，但是，江青不愿意自己成为博物馆的一件展品。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穿靴子，戴一顶男人的军帽，但是江青的自立精神不是说看上去要象一个男人。是的，她要进入男人的政治世界，但这不能以妥协、以去掉自己的女性化为代价。周总理的妻子邓颖超，喜欢穿普通的服装，江青不愿与大众混在一起，她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从美国回来的艺术界的女性，常穿花里胡哨的服装，江青认为那太女性化，玩偶形象与她要掌权的野心是格格不入的。

她感到，最好是穿一套高级干部常穿的制服，领口加一点颜色，再尽可能地把头发做漂亮些。

中国的戏剧也是进行道德说教的工具，英雄奸臣一目了然，是意识形态专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江青把毛式戏剧看作是自己爬上权力宝座的阶梯。与中国以前的统治者——包括一百多年前的慈禧太后——一样，江青要抓住这门艺术，并通过它来显示自己的权威。戏剧改革成了江青政治生涯的起点，就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温斯顿·邱吉尔，就象加强国防对于罗纳德·里根一样。

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问题，江青由此受到启发（在江青看来，这意味着要先分成相互对立的两派，然后就是斗争）。毛的断言与其说接近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更接近儒家思想。他说，人民群众头脑中的思想问题是政治权力的关键。江青很兴奋，她更加肆无忌惮地修改剧本和唱腔，努力使它们“更加闪光”。这也很符合她盛气凌人的性格特点，她可以让戏剧界人士象小学生一样围着她转。而且她真诚地相信，应该把表演艺术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世界观服务的艺术。

“要么革命，要么取缔。”江青从心底里喜欢这一口号。艺术不能简单地表现善恶美丑，要有鲜明的政治偏向，这一口号给毛泽东以政治上的帮助。中国人喜欢随遇而安，喜欢墨守成规。毛泽东和江青认为，中国戏剧的传统内容应让它成为过去，虽然它也有过轰轰烈烈的时期，但是现在，这些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对新中国的人民不利——至少对毛泽东的“事业”不利。

1962——1963年，江青观看并审查了上千个剧本，她的这些活动大多是在上海进行，她与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柯出身于工人阶级，是一位忠实的左派人物。他对艺术没有兴趣，但是他敬畏毛泽东，同时，他也是支持毛—江婚

姻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领导人之一。”

在上海曾公演过一出短剧，剧本是根据毛 1957 年写的纪念杨开慧的词改编的（“我失骄杨……”）。但是几场过后，就被禁演了，这使上海的戏迷们大惑不解。因为这是柯庆施市长禁演的，江青要求他这样做，她认为，这出戏是对她本人的一种侮辱。

江青到上海总是住在以前的法国俱乐部，市长也总是尽力使“我们的女贵宾”感到舒适。在远离北京政治的这块地方，在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的这种环境中，江青感到很高兴，也很自由。上海的这种左倾气氛，是与北京争斗的副产品，它要在共产党时代，弥补自己过去曾是帝国主义侵华基地的过错（过去的上海被人称为“罪恶之城”、“东方的巴黎”）。

六十年代初，江青与上海的两位左派笔杆子结成了“一母二雏”的联盟，在以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们左右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张春桥和江青一样也来自山东，三十年代曾与崔万秋共事，同为《大晚报》的编辑。这位干将现在是上海市委书记。姚文元则更年轻，知名度也较低，江青三十年代曾见过他的那位商人兼作家的父亲姚蓬子，这位笔头流利的人物很快就象小听差一样完全听从江青的使唤。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江青的忠诚是因为她的魅力、她对艺术的左倾观点，以及她有接近毛泽东的便利条件。

江青利用姚文元等年轻的文人加强自己的势力，抬高自己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因为他们惧怕麦卡锡式的残酷迫害。这种事总是这样进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记者或

* 文化大革命前，柯就要求上海的干部每人要有三本毛泽东的书：一本放在床头，一本放在办公室，一本装在口袋里。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与江青做秘密的杭州之行，他们曾经一起来到西湖边的别墅里举行舞会。

学者，撰文对某一本书或某一历史事件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但是，中国的社会生活总是无风不起浪，它的读者们知道，作者不是单独行动，而是某一位政界要人雇用的笔杆子。但是这位政界要人是谁？他或她的目的是什么？于是产生一种恐惧心理，他们开始寻找作者的“背景”。最终，事态的发展将导致政治上的勾心斗角，然而这正是幕后操纵者的目的所在。江青可谓是精于此道，作为毛的妻子，更有利于她网罗人才，也更有利于她狐假虎威恐吓对手。

1963年5月的一天，上海《文汇报》的读者看到一篇猛烈攻击田汉的一个剧本的文章，迄今为止，田汉的这个剧本一直受到普遍的赞扬。这是江青所为，为了报复那些三十年前瞧不起她的人，这是江青的第一枪。文章的作者很不知名，但是江青和柯市长选中了他来完成这一任务，当时任市委书记兼《文汇报》总编的张春桥下令全文发表这篇言辞激烈的文章。

在北京，江青亲自跑到北京京剧一团，她要开始施加自己的高压政策。她对这批艺术家们说，他们在荒废自己的年华。为什么不服务于未来，而去捡过来的破烂玩意儿？她指示他们马上排演她的一出新戏《芦荡火种》（后来改名为《沙家浜》），它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英雄行为。

剧团人员不知所措。主席夫人命令他们放弃他们一直崇拜的剧目，集中精力去试验新剧目。与此同时，北京市市长、温文有礼的彭真对江青的行为很恼火，他认为，江青无权在“他的”城市里对戏剧界指手划脚，他告诉剧团继续排演传统剧目。如果彭真听说江青要在某一个剧院排练，他一定会在此之前把这家剧院订出去。如果他听说江青想在报纸上发表消息，他马上就会指示新闻界不予发表。

彭真根本就没有把江青当一回事，他认为，江青改革京剧

的努力是无聊的家庭妇女没事找事干。他看过《沙家浜》的演出后说：“象一杯白开水。”

江青反驳说：“只有有了白开水，你才能有茶，也才能有酒。谁离了白开水也不能活。”由此可以看出，她已无意让戏剧成为纯粹的一种娱乐形式。

但是江青知道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是单纯为了艺术。她带了一箱子书来到剧团的排练厅，把这些由作者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一本一本地分送给每一位艺术家，象一位带兵的头目给自己的部下分发手枪。她对这批艺术家们说：“不要认为我到这里来只是推销新戏，我到这里来，是要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 战斗的。”

突然，毛泽东赞扬了《沙家浜》，这杯艺术上的白开水成了政治上的醇酒。彭真的错误就在于，他把戏剧只看作是戏剧；同时，他似乎还忘记了，不管怎么说，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周恩来就从来不会忘记这一点。

在上海，江青说彭真是“大北京主义”的罪魁，得到一些支持。她决定改编《智取威虎山》，这是一出描写1946年共产党军队在与土匪作战的戏。看过试演后，江青来到后台，告诉工作人员，这出戏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废话”。这里与彭真的北京不同，她要把这出戏拿过来，增加它的教育意义。

她在自己的住处边吃饭，边听排练的录音，不时地会带着新奇的想法冲进排练厅。她要求，整个演出都要突出个“恨”字，声音要铿锵有力，要象投入敌群的手榴弹。她说，要改变一千多年来常用的降调，要用升调来表达这种“战斗的决心”。她还给演员示范怎样唱“春天”两个字，唱腔要能表达出“政治的

* “修正主义”一词，是毛给正在堕落的苏联社会主义起的名字。

热情”（特别是正义力量欢呼胜利的热情）。

她教导戏中的女主角如何表达自己的阶级仇恨，她说：“永远也不要忘了，坚强的意志和力量比漂亮的外表更重要。”

她要让英雄更象英雄，删去了那些不雅的台词，并给演员披上一件毛皮大衣；同时，她让土匪穿得衣衫褴褛，而且不得站在舞台的中央，她告诉扮演英雄的主角演员童祥苓，英雄走起路来不能“摇摇晃晃”，说话也不能“吞吞吐吐”。她跑上台去，拍着童祥苓的肩膀说：“要放开！站，要显得高大威武；唱，要唱得铿锵有力！”英雄应该怎样下马呢？江青对童祥苓说：“不能从马背上溜下来，那样没有力量。”这位从来不喜欢软弱男人的女人说：“要从马头上跳下来。”她要求道。

剧本没修改前，童总是把手枪吊在皮带的前边，江青神秘地说：“把手枪放在一边。”童祥苓感到迷惑不解，因为江青觉得，手枪“在前边吊的时间长了”，对身体不会有好处。

江青总是到处指挥，象一位校长视察新任老师的授课，她边视察，边训斥，甚至大发雷霆，好象她不要负任何责任似的。因为她以前演过戏，也拍过电影，她认为，凭自己的经验足可以成为权威，她扭着屁股告诉女演员，漂亮妞儿应该怎样走路；她又告诉男演员，工人阶级不能蹲下来抱头大哭，应该站起来反抗。

有些艺术家认为她疯了；有些人因为戏剧成了一种政治力量而激动不已；有些人因为她来自毛泽东身边而颇有敬畏，说：“我们成了她的工具。”

《红灯记》是江青最喜欢的京剧之一，刚开始排练，她就对工作人员指示说：“演戏就是战斗。”她要求把剧中英雄喝醉酒的场面去掉，要求工人阶级要穿上花哨的衣服以“增强现实感”，要求演员的一举一动都要象军人那样有力，那样不易动摇

（“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但是，北京京剧院的工作人员对她的指示采取消极抵抗的办法。

周恩来不时地打电话询问戏剧改革的进展情况，江青对他的“鼓励”很感动。不过，这位很有心计的总理主要关心的是，这位自封为“圣母玛利亚”的女人与剧院工作人员之间关系的发展，他要努力使这种关系和谐地维持下去。江青感动了，《红灯记》上演了，戏迷们看了感到很倒胃口。

江青曾经说：“我看过西方的歌剧，”他们“什么都唱，象‘你喝茶吗？’‘是的，我喝茶，这茶味道很好。’”现在，她已经开始拒绝这种外来的影响，“我们中国的戏剧就不同了，它只表达积极的情感，主要的情感。”

1964年夏，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在沉闷的政治气氛下开幕了，江青应邀到会作了发言。在这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将上演她改革过的一些戏。文化部的一些重要官员和戏剧界的知名人士也参加了开幕式，但是他们反对江青的做法。

这是江青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话，她在讲话中还了上海市市长柯庆施的人情债，她表扬柯庆施在上海鼓励、“领导作家和群众三结合”的创作道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我们的生活》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即允许演员和观众修正导演的职业偏见。

她对戏剧界的人士大喊大叫：“你们要吃饭吗？粮食是农民种出来的，你们的创作和演出都要服务于农民。”

观摩大会期间的一个下午，江青看到一群不同寻常的人物，有她过去的同行，也有现在的仇人，他们正在悄悄地谈话。其中有《赛金花》的作者夏衍，她曾很想扮演其中的主角；有曾向她求过婚的人；有初到上海时没注意到她的田汉；还有曾抱

怨“江青一来，事就难办”的周扬。

江青微笑着想加入他们的谈话，虽然说这四位艺术界人士都知道要提防着江青，但是他们也感到，没有必要对她言听计从。他们和她打过招呼，什么也没说，一个一个地走开了。江青想让他们记住自己，对着他们大声说：“革命将改变一切！”四位艺术界名流全惊呆了，愣在那里。

戏剧节期间，其他一些领导的讲话都发表了，江青的讲话却一直没有露面。毛泽东是她最大的靠山，这时，毛刚刚宣布，周扬、夏衍等人领导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江青决定试试自己该如何利用这座靠山。一天，她悄悄地离开观摩会，来到首都医院，一位年轻的演员动过手术后正躺在那里休息。这位年轻、英俊、思想左倾的演员是“她的”演员，要在她的《奇袭白虎团》中扮演主角。江青带着新闻记者来到病房，同医务人员打过招呼后，走到病床前拉着他的手说：“毛主席希望你成为真正的勇士，为了革命的文艺事业，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江青的对手也没有保持沉默。刘少奇在谈到江青的新戏时说，她是“瓜没熟就摘了下来”。彭真讥笑它们是“穿着开裆裤子上台”。

有些报纸把八个新戏称为“革命样板戏”（其中有五个是江青在上海培植起来的）。彭真说：“什么鬼样板？我是这里的头儿，我没听说过还有样板戏，谁知道她的戏是不是样板！”脾气急躁的邓小平说：“一大堆人在台上跑来跑去，这哪里是艺术！”

1965年的一天晚上，江青出席一个宴会，她发现彭真也在场，就走到这位市长桌旁，问可不可以与他单独谈谈。彭随她来到旁边一间小屋。她请求彭给她一个剧团作为自己的试验基地。江还拿出一个新剧本给他看，同时强调指出，上海市委书

记张春桥在她排《白毛女》等戏时曾给过很大的帮助。彭真听到张春桥的名字，比听到江青谈她的艺术观点更气愤。他一把夺过江青手中的剧本，拒绝了她的要求，气冲冲地回到宴会厅。

彭真对一位朋友抱怨说：“她一会儿要这，一会儿要那，她不知道北京市长除了哄她玩还有其他的事要做吗？”

如果在一个平静的年代，刘少奇对江青的样板戏的评价是没有错的，刘在谈到革命样板戏强行向人们灌输政治思想时说：“现在人们有能力自己判断问题。”然而，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代。

江青又从京剧转向了舞蹈。她观看了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前者描写的是海南岛一支女兵队伍的战斗生活，后者描写的是恶霸地主和受迫害少女的故事，二者都是中国式的舞蹈与西方浪漫主义的混合产物。江青不喜欢西方的芭蕾舞，如《天鹅湖》，她说那里面尽是鸟和野兽。她认为，芭蕾舞应该表现人类的意志。她让演职人员到部队去体验生活，以便更生动更逼真地表现战争气氛和战斗精神。从脚本中删去了做爱和生孩子等情节后，江青又给《红色娘子军》加上一个近乎宗教崇拜的结局——歌颂毛泽东，使主题升华了。

邓小平对《红色娘子军》的演出发牢骚说：“人们工作了一个星期，就想放松一下。但是现在呢，人们走进剧院，却发现自己又来到了战场上。”刘少奇说，《红色娘子军》是“对当代生活的强制性反映。”至于周扬，他在这个舞剧排练的过程中，把剧中舞蹈演员派到香港演出《天鹅湖》。

但是毛泽东过来解围了。他说：“大方向是正确的，改革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很好的。”此后不久，《红色娘子军》也就跻身于样板戏之列。江青把《白毛女》拿过来，删去其中的性爱成份，让全剧充满了阶级仇恨，也把它塞进样板戏这一神圣

的殿堂之中。

1965年冬的一天，江青来到中央交响乐团，她宣布：“资本主义的交响乐应该抛弃。”音乐家们很有礼貌地向她指出，她不太了解交响乐。江青马上反驳道，音乐要具有更高的革命热情。乐队指挥抱怨说：“你这不是用小锤敲我吗？”被人看作是一个可怕的攻击者，江青更加恼火，她后来用指挥的话说：“我要用锤子敲掉所有陈腐的旧观念。”

江青找出现存剧目中“不健康的东西”大做文章。她派一名钢琴家南下，沿着一次战役的路线重走一遍，目的是帮助他更好地理解 and 演奏《黄河大合唱》。她在根本不了解交响乐的情况下，全凭一时冲动，硬要把《沙家浜》改编成交响乐。一位大吃一惊的小提琴家不禁说道：“我怎么也不知如何把《沙家浜》和交响乐联系起来。”周扬代表乐团反对这一提议：“我们的日程已经安排得满满的，不可能塞进这个节目了。”

江青不顾一切反对意见，因为她认为，《沙家浜》是她的，是她的孩子，这就和李讷一样。那么，她就用华丽的音符去装饰它，就象给小李讷穿上新衣服，她有权这样做，她有权按自己的想象来打扮自己的孩子。终于，她的两部音乐样板戏问世了，这就是《黄河大合唱》和《交响乐沙家浜》。音乐要服务于“革命”的需要，要服务于她的政治生涯的需要。

江青只相信她个人的意志，根本不考虑中国大众的意愿。她厚颜无耻地说，中共中央应该成为戏剧改革的“加工厂”（就象白宫出于下届选举的需要为百老汇安排上演剧目一样）。她说她

* 江青还想对话剧进行同样的改造，但是没有成功，一是她能力不及，二是毛泽东没有给予支持。电影不易受到她的攻击；没有被涂改得面目全非，再说，好多电影明星都很了解江青，如赵丹。她能对赵丹怎么样呢？赵丹总是嘲笑她。

不能为反面人物拍手叫好，在戏剧政治化的过程中，反面人物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敌人，在她的戏剧领域，就是她的敌人。她只为英雄喝彩，英雄要高大完美，性情开朗，长相漂亮，一表人才，并要随时准备拜倒在毛泽东的脚前，拜倒在她江青的裙下。她只知道好人和坏人、光明和黑暗，只知道忠诚和叛徒、欢乐和悲伤。这是孩子式的幼稚。

江青完成自己的戏剧改革的时候，中国戏剧观众的脑子里已经变成一团糊涂。江青对此不在乎，只要毛泽东喜欢。电台广播变得枯燥无味，要想把你手中的收音机变卖出去，原价的四分之一也没有人买。江青的御用文人对此高唱赞歌，他们在评论这些新的戏剧、芭蕾舞和交响乐时说：“它们是无产阶级文艺界闪光的珍珠，是江青同志亲自培育起来的。它们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

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开始全面支持江青。他公开赞扬江青改革过的剧目，全国各大报纸均发表评论，一片喝彩。她碰什么，毛泽东就喜欢什么。

江青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传声筒。她还处处模仿毛的言谈举止。她对一位学兽医学的学生说：“你要学会做一名人类的医生。”这是毛很爱引用的孙逸仙的一句话，孙曾学过医学。听说四川发生了武斗的事件后，她学着毛的腔调说：“来点武斗没关系，至少也是一种实践嘛。”

毛泽东有很强的使命感，他在一首词中写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江青评论说：“我们不要等一个人死了才把他说成英雄，事实上，活着的英雄比死去的多得多。”

江青绝对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她从不向别人低头，也可能潜意识中比较崇拜毛泽东的才能，她在回忆自己早年的生活时，总是努力说的与毛泽东的经历很相似，她说她在上海向

一位朋友借过大衣（和毛一样），她说她曾经在图书馆里工作过（也和毛一样）。

1965年秋，毛泽东和江青离开北京到上海和杭州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次离开北京的旅行，表明江青对毛的影响在逐步增加。这些年，江青总是单独外出，而毛则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北京。毛泽东对上海一直没有好感，但是自1962年起，这里成了江青进行戏剧改革的舞台。杭州的别墅也根据江青的旨意装饰一新，成了她的一个基地，毛则好几年没来过这里了。

他们到上海后，住在前法国俱乐部的一套公寓里，这里专为江青搞了一间电影放映室，又为毛泽东搞了一个游泳池。江青是文化领域的主要活动家，但是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她没有实力，对此了解也很少。毛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利用他的两股势力：林彪的政治化的军队和他自己的左倾“宫廷派”。那年秋天，林彪曾陪毛泽东和江青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左倾“宫廷派”在上海也有自己的势力（尽管这时市长柯庆施已死）。

江青也开始筹划在文化界掀起一场风暴，象动摇某些干部的领导地位一样，她要荡涤文化领域中一切旧有的模式和观念，创立一种新的、政治化的、没有杂质的文化——在她的领导和控制之下。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江青改写的一篇戏剧评论文章，由此开始了混乱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清洗。这种灾难性的自我鞭笞，在当代的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曾有过。

《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于1961年的一出戏，内容是说明朝的一位大臣因犯颜直谏而被罢官的事。毛泽东于两个月前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就宣布这个戏政治上是有毒的。江青的御用笔杆子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撰文，重弹毛已说过的话。但是北京的新闻界没有理会姚文元的文章，首都的文化界人士们仍然认为吴晗的这出戏是好戏。

后来人们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和江青要把这出戏提到政治的高度——而不把它只限于艺术争论的范围。他们感到，这个剧影射攻击毛泽东。彭德怀因为大跃进的失败对毛作了言辞激烈的批评，毛罢免了彭的国防部长职务。但这是江青的借题发挥。毛泽东在1959年曾赞扬过海瑞！正是受了这一启发，吴晗才写下了《海瑞罢官》！

然而到了1965年，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至少江青对毛的影响比以前有所加强。

江青说：“有一天，一位同志送给主席一本吴晗的《朱元璋传》。”但是江青出于自己的考虑，对吴晗和吴晗的所有作品，包括这本明朝开国皇帝的传记，都没有好感。她继续说道：“我告诉他，主席已经很累了，不要打扰他。作者写这些东西只是想挣点稿费，想出名，那就让他写吧。等出版以后，我们再进行批判。我还想批他的其他著作呢，例如《海瑞罢官》。”江青准备对吴晗作突然袭击。

江青把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还有他的保护人彭真）看作是北京文化权力部门的代表。五十年代初，他们就认为江青是到处嗡嗡乱叫的蚊子，而江青则认为他们是自己爬上党的宣传部门和文化部领导地位的绊脚石。现在，把海瑞和彭德怀联系起来（可能作者心中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正符合毛泽东的心理，毛也认为，自己周围尽是一些拖后腿的人。

后来，官方介绍了评《海瑞罢官》的那篇文章出笼的经过，这一介绍足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不寒而栗。《人民日报》介绍说，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应毛泽东的“要求”，在江青的“直接指导下”，在江青的朋友、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的“亲切关怀和具体帮助”下写成的。

六十年代开始，江青又从她三十年代跌倒的地方爬了起来。这期间似乎是一段空白，因为她不得不向别人妥协，因为她一直是病魔缠身。现在，她又回到了艺术界！这一次，她不是作为别人的玩偶，而是作为一个老板娘，她要做男人做的事！她一直反对儒家所谓的“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说教。现在，她手中有权，完全可以敲掉那些过去曾啄食过她的人。

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江青曾竭力为维护自己的独立个性而不断抗争，竭力避免成为别人的玩物，然而，这一切都是消极的。到了1965—1966年的冬季，江青在逐步靠近权力的中心，她已完全可以积极地行动，可以随心所欲地表现自我了。

在北京，彭真市长试图把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所产生的影响限制在学术争鸣的范围以内，但是江青他们并不如此，他们把文艺、政治和外交政策搅和在一起。无论是对一出戏的评价，对苏联的态度，还是从图书馆借出一本禁书这样的小事，只要敢反对他们，就会被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

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受到迫害的高级领导人是军队总参谋长罗瑞卿。罗是林彪的死敌，林彪当时还在上海与毛泽东和江青频繁接触。罗将军反苏不够坚决，这使毛不满。更不值得一提的，江青觉得罗瑞卿反对自己，再说她也很不喜欢罗的妻子。经过一番激烈的交锋之后，罗失去了他的职务。江青拍手称快。

难道罗将军就没有在她改革戏剧的班子中安插特务，随时汇报她的行动吗？当她按照毛主席的愿望、根据柯市长的建议进行戏剧改革的时候，难道罗参谋长没有警告过新闻界不要报道她的政治活动吗？江青对罗瑞卿很不满，曾给他打过一次电话，但是罗在电话中似乎不尊重她，反而认为总参谋部可以干

自己的事，这使她一气之下挂上了电话。现在，终于把这个人干掉了。*

林彪在一次军队文艺工作会议上说：“昨天，江青同志和我谈了话。在文学艺术方面，她的政治觉悟很高。”林彪继续说，那种腔调就象罗纳德·里根任命一位小官一样轻松、油滑，“她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你们应该好好地向她学习。今后，部队有关文艺方面的文件，都要送给她过目。”

1966年，可以说是江青最为得意的一年。这一年的--开始，她就被任命为部队的文艺顾问，成了一名战士，这是她最满意的自我表现方法。她要总管有三百万人的军队的戏曲、舞蹈、音乐和小说等文艺工作。她可以象一名男军官一样，穿上黄色的卡其布军装，这一工作使江青进入了政治权力的主航道。

江青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对林彪要成为毛泽东的副手和接班人的计划很有帮助；同时，林、江所达成的交易对于毛反对刘、邓等当权派也助了一臂之力。

毛泽东开始驱逐他的对手。他到长江中游泳，这意思是说，任何急于接他的班的人，都必须耐心等待。他写了一张大字报，说中国的事情一团糟，并号召全国人民也写大字报，支持他的观点。后来，他回到北京，在十次盛大的集会上，向一千一百万红卫兵表示支持，发动他们起来“造反”。这期间的每一步，江青都紧随毛的左右，而且似乎参与制定了毛的这些行动计划。在中央委员会和那年夏天的其他会议上，江青都成为一支力量，她自豪地介绍自己是“一名战士”。当毛转向青年时——“他们学问不多，但拥有真理”——她马上开始在中国的一些重点大学进行活动。

* 不久，罗瑞卿就从六层楼上跳下（也可能被人推下）。但是他没有死。

比起毛泽东来，江青受传统的影响更少，她也就更热衷于向一切旧事物开战。她煽动学生捣毁庙宇，查抄知识分子家中的古书。总之，她要在这烧掉一切的灰烬中，象长生鸟一样得到再生。

她喜欢这一切。砸碎正常的秩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认为，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创造一个更有活力、更美好的世界的两件工具。现在强调戏剧要突出政治，其实政治也就是演戏。在一次黎明时的集会上，她站在毛泽东的身边，懒懒地挥动手臂，向百万人的欢呼表示致意，他们是毛泽东的“群众”，是她江青的“观众”。一位当时住在北京的英国人回忆起这次在广场的集会时说：“江青向拥挤的人群挥动着红宝书，红卫兵们欢呼雀跃，口号震天。她的眼睛闪着光，有些失态地听着震耳欲聋的口号，眼珠子几乎要蹦出来。”

江青很喜欢这种场景，站在天安门城楼粉红色的平台上，看到自己响亮的、两个字的名字写在飘动的红旗上，歌颂她戏剧改革的伟大成就，这比她在上海演娜拉时在广告牌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更感到兴奋。她觉得，她身边的“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放出的光芒，比莫斯科医院的X射线更使她精神百倍，劲头十足，更有活力。现在，她有权力了，她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那些过去曾使她不快的所有“卑鄙小人”打翻在地。

江青和文化大革命之间，有着某种心理上的“默契”。一个崇拜权威的国度，现在又受到维持社会和谐这一需要的困扰，二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某些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人如邓颖超，对此感到惊恐万状。但是对毫无根基的人如江青来说，这实在是令人兴奋不已的事，他们受到鼓舞，感到激动。寻求和谐的要求总有冠冕堂皇的借口窒息她的自我表现。江青在回忆自己的少女时代时说：“实际上，我在济南处处受到侮辱。”现在好了，

天和地翻了个过儿。

六十年代中期，在很多人看来，江青与文化大革命之间这种心理上的“默契”是一种不祥之兆，不久出现的疯狂场面证实了他们的预料。社会上保守的人们认为，江青无法无天。一位到农村去串联的红卫兵曾说：“农民们认为，如果把这个国家交给一个女人管理，这个国家肯定完蛋。”

对钢琴艺术的保护，是江青反传统主义的一个标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钢琴这种西洋乐器，与牛仔裤、太阳镜和贝多芬等一样，很自然地要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然而它却幸存了下来！这是因为，这种西方表现个人主义的东西曾使少女时代的江青得到解放。在济南实验剧院时，钢琴为少女江青打开了一扇窗户，使她张开了想象的翅膀。正因为如此，这种西洋的、表现个人主义的乐器才被允许在江青的革命戏剧中占有一席之地。

江青亲自建立了三条联系渠道，这对毛泽东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第一是与林彪的关系，毛泽东一直认为自己与林彪不能坦诚相处；第二是与上海的一批“掌权的知识分子”的联系，他们的背景与毛有很大的不同；1966年，她又与自己的老搭档、诡计多端的康生建立了联系，在文化大革命变成一个巨大的肮脏的阴谋时，象康生这种善耍阴谋诡计的人是必不可少的。

1966年中期，江青担任了比几个月前林彪给她的更重要的职务。她成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宫廷派”的笔杆子陈伯达任组长），这是一个煽风点火的组织。在1966年这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季，刘少奇和邓小平从权力位置上下来后，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了中国政府。

文革小组为毛一江一派谋划策。江青的上海朋友张春桥，成了文革小组的第二副组长。另外两位成员是康生和姚文元，康

生直到五十年代一度失意后，现在又回到了舞台的中央；姚文元则是江青一年前在上海时引见给毛泽东的。江青的提升令人吃惊，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现在占据了应该属于政治局委员的位子，并与其他政治局委员一道帮助毛泽东治理这个国家。

要想了解文革小组在国家中的作用，只要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出现以下情况会是什么样子，就不难理解：里根总统解散了他的内阁，只在白宫班子中挑选几个忠于自己的人，组成一个小组，并任命南希·里根负责这个组织，作为美国临时政府，而里根本人则是在高兴的时候才过问一下。

刘少奇和邓小平试图限制文化大革命蔓延的范围，同时他们也想挽救自己，但是为时已晚。或许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能令毛泽东和江青满意。刘少奇在江青一连串的攻击下，愤怒而又迷惘地说：“我的错误就因为我是国家主席。”他说对了，江青只是想把他搞掉。^{*}要让他们的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要解决权力问题，就要把那些经常和他们唱反调的人全部除掉。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毛是在同两个虚幻的幽灵战斗：社会主义没有能够取得他认为会实现的成就，同时他自己也不免一死，这两个问题不可能有答案，也不可能有什么政治上的答案。

“我只是一个传令兵。”江青总是这样说她自己。她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她是谁的传令兵。整个六十年代，江青自己命运的起伏，一直与毛泽东权力地位的波动相一致。当空军司令吴法宪跪在她的面前接受命令时，江青知道，这是拍她的马屁。他在奉承她的同时，另一只眼睛却在盯着自己在毛泽东身边的位子。她深知这一点，她也时常对

^{*} 南唐郡主问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我们有什么错，你要杀了我们？”赵回答说：“你的错就是你活在世上，有人站在我的床边，我就睡不安稳。”

此感到憎恶。即使是在敢闯敢冲的学生高呼她是“毛泽东最忠实的学生和信徒”时，她也知道，这绝不是因为她本人是一名领袖。

但是就目前来说，她的处境比五十年代要强上一百万倍。

瞪着满是疑问的眼睛看世界的云鹤，探索生存之路的女演员蓝苹，五十年代中期处境艰难的家庭主妇，所有这些角色，在成熟了的江青的社会生活中都显露了出来。

那个要求女芭蕾舞演员走男步，从而打破了中国舞蹈长期存在的男女舞步有别的舞蹈改革家，那个穿一身军装指挥别人排练的军人，就是曾坚持认为“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的少女云鹤。那个精心梳理头发，准备向5000名红卫兵发表演讲的人，就是曾在金城剧院后台精心装扮，准备登台演出的蓝苹。那个坚持认为，当官的一旦被清除，他的老婆也要被打倒的文革政治家，就是五十年代在中南海与毛岸英和毛岸青争吵不休的家庭主妇。

这位现在在艺术界指手划脚的女主人，就是曾告诉费先生如何处理家庭纠纷的云鹤；就是指出唐纳的性格缺点并告诉他改正方法的蓝苹；就是五十年代告诉护士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并教导翻译怎样切鲤鱼的江青。

但是现在，这位教师爷所教导的不再是几位服务人员，而是成千上万的中国公民。她象守门人关灯似地禁止一切电影、书籍和戏剧。这位善于制造家庭不和的专家，现在来到了中国的最高权力中心挑起火并。其结果，使中国成千上万的官员和表演艺术家毁于一旦，而不仅仅是他们亲属的悲恸哭号。这位时髦的演员也不再只是戏迷们的欢呼崇拜的人物，而是成了样板，她的风格成了法律，因为她背后有坚强而有力的后盾。

石油部的一位高级干部张兆梅（译音）在一次讨论江青最

新思想的会议上说：“江青是一位女同志，她喜欢自吹自擂。”此后不久，张被罢免一切职务，只是因为她公开讲出了北京许多男性领导人关起门来说的话。

江青把红卫兵看作是她的。延安时期，中国革命是毛泽东的，但是文革期间，她开始把这场革命看作是她和毛泽东共有的。从她的“革命理想主义”中，一直都可看到她要求表现自我的欲望。但是奇怪的是，自从在延安参加革命以来，她的这种欲望有所降低，更多的则是模糊不定的总想整治别人的欲望。她曾一度把自己的这所有热情倾注于和毛的婚姻关系中，倾注于对李讷的期待之上，但是现在，她只把这所有热情倾注于她的也是毛的文化大革命中。

宋庆龄在她上海的寓所等待着江青的光临。这时，这个城市的红卫兵造反运动正进入高潮，一些好斗的人要冲进她的寓所，剪去她的长发，抄去她的书籍，周恩来出面制止了这次行动。事件的结果，毛泽东派江青到上海去看望宋庆龄，她要当面向这位孙逸仙的遗孀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江青象一位司令官，大踏步走进宋庆龄的客厅。宋一时没认出这就是五十年代自己曾招待过的那位温文尔雅的年轻夫人。江青滔滔不绝地讲毛泽东的敌人有多么可恶，那些敢于反传统的年轻人有多么可爱，宋庆龄一声不吭地听着。江青讲累了，宋说：“但是也应该有些约束，伤害无辜的人是有罪的。”江青马上火冒三丈，她愠怒地盯着这位比她年长的贵妇人，好象是突然变了一个人。当时在场的一位宋庆龄的助手说：“江青感到对方在当面侮辱自己。红卫兵对她关系重大，她不敢想象，竟然有人说整个运动都是错误的。”五十年代，宋庆龄喜欢过江青，但是现在，她发现，江青在无耻地公开夺权。她的这位助手说：“宋庆龄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喜欢不介入政治的江青。当发现她

热衷于争权夺利时，她就很厌恶她。”

“陶铸压制我！”江青回到北京后，在人民大会堂对一大批汗流浹背的红卫兵说。她突然觉得有点不合适，马上又加一句，“还压制我们文革小组。”她拉长声音对狂热的红卫兵解释说，她曾再三地帮助陶铸，努力挽救这位来自南方的政治局委员。“我对他很有耐心，但是不管我怎么帮助他，他就是不转变。”这声音象她一脚踢开唐纳时所说的话。但是她的听众，那些被政治风暴搅得晕头转向的年轻人，那些因为来北京见到了中国领导人而兴奋不已的红卫兵，根本不知道这是她个人的感情，还是政治的情绪。

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女人被押上工人体育馆的看台，她披头散发，双臂被一名红卫兵高高地反扭过来，眼睛里射出不屈的光芒。江青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一场面。在1966年12月这个寒冷的夜晚，她的一批仇人将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女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她叫范瑾，是《北京晚报》的编辑，同时也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和剧作家吴晗一起在市长彭真手下工作。

范瑾的罪状之一，是她在六十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邓拓写的杂文。范瑾的另一条罪状很少有人知道，但是江青不可能忘记也绝不会原谅，这就是她成功地占有了俞启威，作为他合法的妻子，和他生活在一起，直到1958年俞启威去世。

对于和俞启威的私人关系，江青的内心一直感到很遗憾。她觉得，1933年俞启威离开她到北京，可能就是不想再和她在一起生活，因为俞入狱期间，她又与另一男朋友同居。1934年她从上海来到北京，没能和俞启威重修旧好，她一直感到很苦恼。甚至还可能有这样痛苦的愿望：她本来应该生下一个俞启威的儿子，而她和毛泽东却一直没有儿子。现在，她和毛泽东的家庭成了一种政治家庭。不管怎么说，内心的某种潜在的欲望，使

江青很想看到范瑾难受。

工人体育馆的那次批斗之后，江青给范瑾罗织了一大堆罪名，并由空军司令吴法宪出面，命令范瑾现在的丈夫、一名空军军官与范离婚。

范瑾没有供出什么，但是她的事业和婚姻结束了。1968年春，范瑾被捕，不久即被折磨致死。她没有看到1968年6月24日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攻击了曾与俞启威共过事的聂荣臻元帅，说聂试图“掩盖”范瑾的一些丑闻，试图“保护”范。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就是要强迫人们承认自己过去曾受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压迫”。在这一过程中，江青总结出一个独特的口号：“我们不能只想到过去的五十天和十七年，还应该想到三十年代。”这是1966年，当时江青在历数1949年以来的官僚统治时期时说的。她想从三十年代拉出一条“错误的文艺路线”，一直与文化大革命的战斗路线联结起来。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条路线，她就可以攻击那些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对蓝苹执行过错误路线”的人。

五十年代，江青对自己过去的舞台生涯无忧无虑。的确如此，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人们从不谈论她过去曾是演员，同时也禁演了《王老五》、《狼山喋血记》和江青演的其他影片。然而，她常对自己的工作人员怀念过去的演员生涯。1962年末，北京从未公开地上映过《王老五》。到上海时，她也时常邀请郑君里和赵丹这样的演员、导演到前法租界秘密会面。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这堆似乎已经熄灭的火又一次熊熊燃烧起来。三十年代文化界的罪恶和那些至今还活着的当事人一直困扰着江青。她在三十年代的经历所出现的一点点涟漪现在都会变成汹涌澎湃的复仇的怒涛。

文化大革命中，她已能够把她在1937年《我们的生活》一

文中提出的思想付诸实施：文艺的社会作用、反对帝国主义、意志的重要性，等等。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那种混乱的环境中，这些思想出自一个女演员、一个不断斗争的年轻女性之口，不会产生什么反响。现在，她完全能够赋予这些思想以更深刻的政治意义。

在政治的外表下包藏的是另一种内核，这就是个人的动机。在上海张庚曾强行要和她结婚；田汉对她不屑一顾；夏衍把《赛金花》的主角没有给她而是给了王莹；周扬也没有帮助她。六十年代，江青要重新描绘这段历史，她宣布说，“直到最近才发现”，三十年代上海的共产党组织被一种错误的政治路线所支配。在江青的唆使下，一群三十年代还没有出世的狂热的红卫兵押着这四个人游街示众，他们头戴高帽，挂着牌子。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工作，他们的家庭也惨遭厄运，全国都知道他们是“黑帮”，是“牛鬼蛇神”。江青异常地兴奋，她神采飞扬地对一批电影工作者说，夏衍“什么工作也不干，整天躺在床上睡觉。”

在和周扬的一次谈话中，江青又一次强调自己追随共产党的热情。她问周扬：“你知道当时（三十年代）我到上海寻找什么吗？”周扬自知现在已不是她的对手，回答说：“我知道。”江青特别强调对她现在的生活至关重要的一关，“我是在设法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周扬低头不语。

好象江青手中有一份名单，上面是这些年来反对过她的人，现在，她要按照名单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揪出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1952年曾违背江青的意愿，劝毛泽东把她送到苏联去。现在，杨尚昆被从家中揪出来，拉上了大街，他低着头，喘着粗气，脖子上挂一只很大的木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每个字都被打上“×”，这说明要在中国的历史上抹掉他的名字。在工人体育馆，一万名红卫兵，虽然他们不知道什么是

资本主义，却高呼杨尚昆是资本主义分子。一名红卫兵将杨反背双手，让他低头认罪。江青坐在复仇的看台上，冷笑着欣赏这一场景。

江青忘了自己一直鼓吹妇女应有独立性，当红军英雄朱德和外交部长陈毅被作为“走资派”“清除”出革命队伍后，她授意把他们的妻子康克清和张茜也打倒。在斗争陶铸和邓小平的文件中，江青作了修改，把他们的妻子也列入斗争之列。当两位部队高级将领徐向前和聂荣臻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后，江青宣布，徐向前的妻子黄洁是“叛徒”，聂荣臻的妻子张瑞华是“敌人的特务”。

有朝一日，她可能会为这种轻率的报复举动感到悔恨——“你丈夫做的事对你也有影响”——因为这对她也潜藏着巨大的危险。

甚至连王观澜也上了她的黑名单，他的妻子徐大姐，在很长的时间里曾是江青的朋友和政治导师。1937年，在江青希望到延安并在那里生活时，难道不是徐大姐给予了她全力的帮助吗？在江青刮起的自我表白和报复的浪潮中，很多人毁灭了，很多人绝望地自杀，也只有江青才能掀起如此巨大的风暴，以至于1966年8月，北京的火葬场尸满为患，难以应付。在经过一个充满武斗和愤怒、猜疑及报复的漫长的严冬之后，1967年的8月，北京迎来了众所周知的“死亡之月”。

有些清洗并不是江青一手包揽的，她自己无力去做这么多的事，没有她，有些事也会发生。但是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使这场运动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并为它注入了自己的感情和戏剧的效果。

三十年代，曾与蓝苹一起看过《美人之心》，又一起到惠中饭店睡过觉的足球运动员李先生，现在住在香港，他对蓝苹不

断上升的政治生涯感到惊讶。他在一封公开信中写到：“你所喜欢的我的勇猛和顽强现在已经消失，然而我对你依旧怀有某种感情，即使三十五年过去了。”这位前足球明星早已发现蓝苹是一个敢冒风险的人物。现在，他在遥远的香港看到，她的这种性格依旧未变，只不过现在是在新的更广阔的舞台上冒风险。

他说：“我只是希望，你对权力的渴望不会改变你的心理；只是希望，你能考虑到中国的普通大众。”

上海。郑君里家中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位电影导演三十年前曾做过蓝苹和唐纳结婚的司仪。电话是张春桥的办公室打来的，这位市委书记想马上见见郑先生。张春桥向郑解释说，江青要找关于她“个人生活”的“一些材料”，他要求郑把自己所有的信件、照片、剪报、手稿和所有涉及到江青历史的材料都送到市委办公室来。郑尽力去做了，他和妻子黄晨一起把早年的东西装成一包，送到市委组织部。但是郑还是很担心，因为张提的要求很不明确，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因早些年言行失误而受到迫害，他们又反复告诉他，“是江青写的或关于江青的一封信或几封信”，这能是什么呢？

在第二次与张春桥谈话后，郑君里告诉妻子黄晨：“谁知道呢？说不定有一天我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在北京，江青对张春桥办事拖拉很不高兴。难道郑君里家中没有她1936年6月写给唐纳的信吗？难道郑就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她蓝苹曾与崔万秋或国民党的人物有过来往吗？

几个月前，江青与国防部长林彪达成的交易，使她与一些军界人士和重要人物的妻子建立起非同寻常的关系网。叶群就是其中一个，这位林彪的第二任妻子很尊重江青，因为她知道，林彪要想成为毛的接班人，江青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江青给叶

群讲了自己现在的处境。要是成了中国的领导人，难道现在不就应该开始塑造自己的形象？不就应该纠正自己的错误形象？

第二天，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给上海的一名军官江腾蛟挂电话，吴现在已是江青和林彪圈子里的人物，他告诉江腾蛟，叶群要他来北京接受紧急“政治任务”。叶群代表江青布置任务，要追回一些材料，特别是郑君里、顾而已（与蓝苹和唐纳同时结婚）或其他活着的三十年代上海左翼艺术家家中的“一封信或几封信”。江腾蛟马上飞回上海布置行动计划。

与此同时，郑君里于1966年10月7日给江青写了一信，他在信中谦恭有礼地解释说：“我已记不得还有你的信，也想不起还有你给我或赵丹夫妇写过的信。”但是，这位导演还是找到了几张照片，“这里有几张三十年代的旧照片，请你处理。”

10月9日晚七点，郑君里和黄晨夫妇二人正在家中，突然闯进一伙蒙着面孔、只露两只眼睛的年轻人。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他们不是红卫兵，而是江腾蛟为这次秘密搜查召集的一批“可靠的干部子弟”。他们要在郑君里和另外四家彻底搜查那些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使江青深感不安的材料。

整个晚上，这些临时“红卫兵”一边口喊虔诚的政治口号，一边搜遍郑君里家的每一角落。他们一页一页地翻书，寻找夹在其中的纸片。他们叫嚣要搜出与“首长”江青有关的任何东西，直到第二天凌晨五点，郑君里和黄晨说他们什么也没有了，这帮强入民宅的家伙带走了所有的纸张，包括郑君里的手稿、日记，黄晨的日记本和他们儿子的作业本。他们临走时还气势汹

* 那天晚上，江腾蛟给他的人定下五条“军纪”：（1）只要信件、笔记、照片和其他文字材料，其余的一律不要。（2）若有人问，就说是上海红卫兵造反总部的；（3）队长可以带枪，但没有命令不准开枪；（4）去掉军车牌照或用纸蒙上；（5）只能说是到这些人家中去搜查丢失的空军机密文件。

汹地说：“你们要是在北京，早就被枪毙了。”

第二天一早，叶群就给江腾蛟打电话，说“首长”对这次行动非常满意。显然，他们搜到了“那一封信或几封信”。

江青所关心的不只是她在上海时期的风流韵事，还有她三十年代被捕入狱的那段历史。1966年春，江青召见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黄池波。她对黄解释说，关于她1934年被捕入狱然后又释放的历史材料肯定记载有误，最好把现存的有关材料全部交出来。^{*}但是据黄的妻子说，他一直拖着未办。“黄池波为什么还没有把我要的材料送来？”1966年底，她怒气冲冲地问自己的一位工作人员。她要通过吴法宪进一步施加压力，一定要找回这些文件（可能的确已不在上海，国民党带了很多文件材料去台湾）。吴法宪对她忠心耿耿，眨眼工夫就可调来飞机。或许是在康生的帮助下，吴法宪逮捕了上海市政府和公安局的二十余位干部，其中包括可怜的黄池波。之后用飞机把他们带到北京，投入监狱。当天晚上，他们在上海继续搜查有关江青1934年被捕入狱的材料。但是结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因为很难确定这些材料是否还存在，也就无从查找。

1967年1月一个寒冷的晚上，江青、叶群和公安部长谢富治在钓鱼台国宾馆共进晚餐，谢富治和吴法宪一样对江青唯命是从。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商讨怎样才能把那些材料追回来。最后，他们决定要“一劳永逸”。叶群马上给空军司令部挂电话，作为吴法宪的密友、林彪的妻子，叶群几乎控制了空军司令部。她命令立即把那些装满材料的箱子送到毛家湾林彪的家里来。

三位领导人乘坐黑色“红旗”轿车来到毛家湾的林宅。门

^{*} 江青说她当时是被“误捕”入狱的，显然是想掩盖她写了自首书才被释放这一史实。

铃响过，验过通行证，记下车号。江青、叶群、谢富治走下车来，来到林宅后面的一个小院里。空军司令部几位的天真的小伙子送来了箱子，林办的秘书上前帮忙。一位穿军装的工作人员点着了一个角落里服务人员用的炉子。江青两手交叉胸前，这是她后来紧张时的老习惯。升腾的火焰照着在场的每个人的脸：叶群紧张而胆怯，江青而无表情，谢富治兴奋异常。这位公安部长打开箱子，把文件、照片一一投入火中，叶群走过去帮忙。江青在旁边来回踱步，不时用眼角瞟一眼炉火。没有人说话。

几个月后，郑君里被投入监狱，于1969年死在狱中。上海市公安局的黄池波一直关在监狱，直到五年后死去。1936年与唐纳和江青一起举行婚礼的顾面已和赵丹也在此时入狱，顾而已死在狱中*（在中国，因政治原因入狱一般都要终身监禁，除非出现政治动荡，否则很难获释）。

江青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妻子，她肯定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攻击对象。她欣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她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写过自首书而后被释放。有了这两条，在1956—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足以把她打成“右派”或“极右分子”，即使不如此，在十几年后的红卫兵运动中她也难以逃脱。当时已经流亡法国的唐纳说：“我如果呆在中国，1956—1957就会遭逮捕，1966年就会被处死。”在巴黎，他感到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前妻给他过去的朋友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很多人涌向他的餐

* 1968年以后，江青并未停止洗刷自己的过去。1968年2月23日，江青交给吴法宪一叠关于上海一位干部孙峻青的档案材料，并说她“想见见她。”3月1日，吴用专机把孙送到北京，江青马上就签署了逮捕孙的文件。第二天，1968年3月2日，江青又叫吴法宪把她以前在上海结识的那位女仆找来，因为江青怀疑这位女仆肯定知道她与唐纳的来往。后来，吴法宪编造出一份材料，说这位女仆与江青在上海的敌人和香港的“某些人”有“地下联系”。江青签署了这份材料，这位女仆被投入监狱，后来死在那里。

馆，想看看这个江青曾经爱过的男人，这使他不得不卖掉那个地方。唐纳苦笑着回忆说：“有些中文报纸说，我在餐馆里专门有一个房间，里面尽是江青的照片。很多人还相信这一无稽之谈，他们可以来看看，我的房间里都是什么照片。”

江青在一次群众大会上问：“你们一定想知道毛主席的近况。”人群一片呼喊，是的，这帮人热衷于破坏，然而狂热的崇拜又使他们坚信自己做的是正确的。江青说：“我告诉你们，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

一位红卫兵回忆说：“我们一直认为她打扮得很漂亮，她的声音低沉而柔和，完全是女性腔调，令人难忘。”另外一位后来受到江青折磨的红卫兵回忆说：“我们想，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

江青喜欢听人群中高呼：“江阿姨，我们爱你！”听到这种口号，她脸上就会放出异常兴奋的光。这似乎与她经常讲蠢话有些不相称（资本主义只会产生“腐朽”的文化，“不适合于广大的人民。”“脱衣舞，印象派，野兽派——都是低级下流的……”）。

在北京大学，江青遇到一群反对她的学生，他们高呼：“我们要绞死你！”“我们要油炸你！”与其说江青感到害怕，她更为这种戏剧性场面所激动。她以很少有的幽默回答说：“我现在非常忙，等我有时间，一定请你们来绞死我，来油炸我。”

她在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一开始就说：“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长期以来，我只是给主席做些秘书工作。”她说这话，既显出她的谦虚，又能让人体会出她的重要地位。为了让这些军官们放松自己，她说，他们肯定比她更了解毛主席，“我一直非常尊重你们红军老战士，”然后她又亲切地谈起毛泽

东，给这批非常崇敬毛的听众留下很好的印象（毛喜欢听“小道消息”，她不喜欢；毛喜欢孩子们和他“争辩”）。她说，她只是一名小学生，后来又说，她在文艺方面给毛不少的知识。

“你们知道，有时我可能太自信了。”江青放低声音说。她说她不能看到坏人取得胜利，她要还击。在谈到彭真干扰她的戏剧改革时，她说：“要是你们遇到这些事，也会很气愤的。”在中国的舞台和银幕上，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军人英雄呢？“当然应该有，但是有人从中捣乱。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也不听我的话。”她谈了半天文艺问题，但是这些军队领导对文艺知道的不多，最后，在结束讲话时，她说，她的讲话中一定有“不少错误的地方，”并请座各位“务必给她指出来。”

在这次讲话中，江青谈了一些她自己的事，虽然近年来被当成笑话，但却是真实的。她叹息着说，她有很多缺点，尽管努力学习，但是学得很不系统。她马上又转过话题说，“如果说我的优点的话，那就是，我一旦开始做某件事，我总是坚持下去，坚持到底，直到把这件事情完成。”

江青对过去给她的约束很不满，她对一批士兵说：“你们知道，在延安的时候，我戴军帽也招来了麻烦，有人命令不准我戴军帽。”现在，她正是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帽讲话，她喜欢这种证明自己的方式。谁说她现在不是一名战士！

一个冬天的晚上，江青参加一个中学生的集会，她这时正处在权力的顶峰。她要在会上谈专制和民主的“相互关系”问题。江青举例说，专制就是要选出“一批坏人”和他们作“斗争”。

江青兴致很高，摇头晃脑，一会提高声音以便传到体育场的最后一排，一会又压低语调以把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她说，年轻人犯错误应按政策处理，“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犯错误就应该把他们“斗倒、斗臭，让他们永世不翻身”。在她讲台的一侧就有着这么两个人——一个是国务院秘书，一个是北京市的领导干部。

江青象过去曾经指挥她登台演出的导演一样，用手指着台下两位著名的、现在成了她的木偶的高级干部，向台下疯狂的青年说：“要不要我把周荣鑫和雍文涛带上来给大家看看？”人群中高叫：“要，要！”江青转过脸命令两位低着头的干部说：“到台上来！”周荣鑫和雍文涛被推到台上，江青带着胜利的笑容。人群高喊：“低头认罪！”二人低下头，等待七千名革命小将的审判。

江青得意地欣赏了一会儿这壮丽的场面，然后挥着手说：“好了！静一静。现在，革命的小将们，革命的战友们，你们都已认出了这两个人是谁，可以让他们退下去了。”

“滚回去！”人群又一次高呼，就象刚才让他们出来时一样。江青开始谈这两人的错误（也就是他们鼓励一批高干子弟组成红卫兵，以与亲江青的极左派红卫兵作对）。她很知道如何运用心理战术，“我喜欢软硬兼施，从心理上来说，这是件好事。”

很多年轻人崇拜江青，除了他们在这种崇拜中能体会到某种乐趣外，还因为江青有个性，有魅力。谁能象江青那样在一种场合大哭大闹，在另外的场合又大嚷大叫呢？谁能象江青那样认为自己是“老娘”，自己有权前后矛盾呢？

六十年代的青年，是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没有经历过贫困，没有经历过男女不平等，也没有受过外国人的剥削，这一切都是江青这一代人的负担。然而，象江青这样从前一代过来的特殊的女性，或许正是因为她们要为生存而不停地奋斗的性格，使年轻人深为感动，因此，她们的生活方式也常常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真象是毛主席在讲话。”一位演员回忆江青的演讲时说，他当时从北京来上海帮助改编歌剧《白毛女》。他回忆说，江青象一阵风走进上海展览馆的一个大会议室，身穿漂亮的风衣，眼睛里闪出激动的光芒，“她说话很有煽动力，也很自信。她告诉我们，她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候，毛主席要她预祝我们演出成功！当时我们很受感动。”

“我们都认为她是代表毛主席说话，”北京一位文化界的工作人员谭先生回忆说：“再说她也很有迷惑力，很会说服人——只是有时候有些歇斯底里，大喊大叫。”谭回忆起江青来到他工作的广播电台的那一次，“在激进派与温和派大辩论的中间，一位姓李的姑娘走到江青跟前，说她在派性斗争中受了欺骗，犯了错误，‘我的思想真的不坏。’”谭感到吃惊，因为李的思想明显地属于温和派，但是这位少女的申辩打动了江青，她拉着李的手，和李一起来到会议室。江青对台下的人说，“不管斗争有多么重要，以后，都要好好地对待‘她的’小李。”谭先生总结说：“我们喜欢江青的冲劲儿，喜欢她平易近人的作风。”

这些年轻人并不真正了解江青，不了解她的个性。如果他们认识了她，就会畏惧她潜藏在内心的阴险和狠毒。但是，他们只看到了江青的外表，江青的行动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他们感到激动。

1967年夏，一位北京大学的学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校园里造反派与党的领导之间接连不断的斗争使这位年轻的、姓陈的学生感到苦恼，他想给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提几条建议。陈和他姐姐乘公共汽车来到中南海的中共中央接待站，他们想问问，能否请江青把这封六页的信转交给毛泽东。

陈回忆说：“我并不十分尊重作为政治家的江青，但是当时她地位显赫，名气很大。我想，通过她给毛泽东提建议应该是

最好的路。”就在陈写这封信的头一天，江青还在北京大学对一部分学生说：“这样吧，你们如果有什么话对主席或对我说，就告诉我，我会安排的。”陈当时也在场，亲自听到江青这样说。

在接待站，陈的姐姐要求见一位小干部，这个干部是她和她丈夫的邻居。不一会儿，一位大干部、江青的助手戚本禹走了出来和这姐弟二人打招呼，“江青同志要见见你们，我们开车去钓鱼台。”

江青从她私人办公室里走出来，有些疲倦但还是很高兴。戚本禹带着陈的姐姐进去见江青，陈冒昧地问戚本禹：“江青同志在这儿，她能不能让我也进去？”

“都进来吧。”江青高傲地说。她走过来拉着陈的手走在前面。

江青随意地翻了翻陈的信的前几页，露出阴险的笑容。陈坐在藤椅里局促不安起来。他在信中告诉毛泽东，江青对北京大学干涉得过多。他后来解释说：“我并没有要求见江青，我只想把这封信送到毛主席的手里。”但是江青把陈看作是一位热情的、漂亮的青年学生，并不十分在乎他给毛写信，她看了看信就放在自己的腿上了。

三小时后，江青结束了谈话。她与陈谈家庭、谈思想、谈身体，也谈到北京大学动荡不定的局势。整个谈话过程中，戚本禹恭恭敬敬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象女王身边的仆人。陈的姐姐也被冷落在一边。江青对惊讶的陈说：“以后再来看，我想你能见到毛主席，看的出来，你比你姐姐勇敢，也更有知识。”

陈说：“只有江青才会一时冲动接见我们，我想，周恩来或康生就不会这么做。现在，我仍然认为，作为政治家的江青是不可靠的，她在步入歧途，但是她的确很有精力，很会鼓动人。她喜欢下来同年轻人接触，具有反潮流的性格——戚本禹只要

我姐姐一人进去，但是江青否决了他。”

陈继续说：“要是有人对江青说，‘我想做你的追随者。’她不会拒绝。要是有人问她，‘江阿姨，能不能和我在一起照张相？’她不仅不会生气，还会很高兴——她马上就会找一个摄影师来。”

这是一个闷热的七月的夜晚，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学校停了课，学生们都在写大字报，聊着最新消息，争论着政府派到学校监督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工宣队”的成绩。江青的到来使该校园里更热闹了。她匆匆地从一个活动中心走到另一个活动中心，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皱眉，不停地打着招呼，向大家转达毛主席的亲切问候。

这时，文化大革命正进入高潮。毛泽东和江青在上海和杭州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回到北京，毛已回来十天，江青刚刚回来八天。首都笼罩着一种朦胧的期待：最高领袖和他迷人的妻子似乎会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

校园东部有几个明代风格的亭子，江青登上一处高台，周围树上一排排明亮的电灯照出江青洋洋得意的脸。和她一起来的有她在文革小组的高级同伙陈伯达，还有已从江青的保护人变成了她的追随者的老狐狸康生。江青高声叫道：“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又喊了几句政治口号后，她的脸突然阴沉下来，并宣布说这次会实际上是一场辩论会。听了江青的话，学生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儿媳妇！”周围的树也都惊讶得摇晃起来。她到这所高等学府来，就是要与毛泽东的第二个儿媳妇、毛岸青的妻子邵华辩论的，她一直是江青在家中最恨的人物。“她妈是政治骗子！”江青用最冷酷的词说邵华，她把邵华和资

本主义的“文艺黑线”和世界上的反华力量联系在一起。她又一次叫嚷：“我从来就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她之所以在这里攻击邵华，是因为邵华曾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

江青似乎讲个没完，“邵华看岸青有些精神不正常，强迫他和自己结婚。”不一会儿，陈伯达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江青背后，要和她说什么，被江青一把推开。她又开始攻击毛岸英的妻子、邵华的姐姐刘松林。她把家庭政治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越讲越激动。陈伯达碰碰她的肩膀，江青暂停了她的诅咒。前边的人能听到陈小声对江青说：“我想该结束了。”江青凶狠地瞪着陈伯达，一万多人坐在地上鸦雀无声，几乎能听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真的，我很恼火。”她昂起头，似乎要把对她忠心耿耿的陈伯达也划入她的敌人之列。“十年来，我一直受这个女人和她家人的气，所以我很恼火！”她突然又提高嗓门说：“应该谢谢她，我的心脏病又犯了……。”绝大多数学生静静地听着，少数人在小声地反对她。

毛泽东没有采取行动制止江青在公开场合宣扬家事，可能没有人敢告诉他那天晚上江青在北京大学的讲话内容。

江青在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能挑起战争。她要求毛泽东，不能让又结了婚的刘松林随意进出中南海。江青还发觉，杨开慧的哥嫂正在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机，企图为杨开慧恢复名誉。她在打到长沙杨家的一次电话战中，使他们夫妻威风扫地，同时也搞掉了他们的工作。

李敏要结婚了。因为她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江青也要闹，象她对待刘松林一样。她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所以李敏要另立门户，自食其力。工作人员问江青要送给李敏

什么礼物，“给她一条被子。”江青说。他们对此很不高兴，因为包括李敏在内，都希望有两条被子，两只枕头和一个床罩。

江青对与毛远新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毛泽东的这个侄子现在已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并正在成为东北地区年轻的政治家。

江青与李讷的关系并不稳定，然而江青还总是想提拔自己的女儿。李讷于1964年或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李讷一般不住在家里而是住在集体宿舍。但是，如果说母女之间还在相互试探的话，江青还是带给女儿不少好处，包括让她看外国电影，李敏是没有这一福分的。

1967年8月一个炎热的下午，吴法宪收到叶群打来的电话，问他能不能来见见江青。这位空军司令马上来到钓鱼台。看到江青、叶群和李讷在这里，刚要写完一张特大的大字报。大字报要攻击军队的喉舌《解放军报》里犯错误的人。

大字报写完了，江青带着疲惫的微笑转向吴法宪，她要求吴把她唯一的女儿任命为《解放军报》的高级编辑。江青要吴法宪办三件事，她要吴法宪调动空军的力量，当天下午就把这些大字报贴到北京各处；要吴从海军、空军和二炮找三十名有新闻工作经验的人当天晚上就到《解放军报》工作；要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在这家军事出版单位为她女儿找一个重要位置。

吴法宪后来回忆说：“我全部答应了她的三个要求。”第二天，李讷就成了这家中国军事喉舌《解放军报》的高级编辑。至于李讷对母亲给的这一位置是否很感激，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工作致使李讷以后的道路充满了波折。

在山东，江青不时地打电话或写信关照她同父异母的哥哥。早年在诸城时，李干卿曾赶走过欺负少女江青的两个女孩，现

在，江青开始向李干卿的敌人发起攻击。

早在1959年，山东省公安部门就开始调查李干卿，确定李是不是象广泛传说的那样，曾与日本人勾结，也拿过国民党的薪水。1960年5月20日，江青给她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写信，为他出谋划策，她告诉他：“你最好提高警惕，不要因小失大。”她要哥哥保持镇定，不要一气之下就破釜沉舟，“你不要怕，天塌下来有人帮你顶着。”对李干卿的调查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到了1968年4月，在新的政治气候下，山东的一位官员王效禹，无疑看到了江青逐步上升的权力地位和名望，开始对曾调查过李干卿的人进行迫害。王效禹与陈伯达接上了联系，此后不久，六名曾调查过江青这位同父异母哥哥的背景的人，全部被捕入狱。

1948年，刘少奇与他的第五个妻子离婚后与王光美结了婚。五十年代，江青与王光美相处得很融洽。江青常常步行到王光美家，她们聊天的内容一般都是家庭、着装以及作为领导人妻子常遇到的家庭问题。

王光美的家庭殷实富足，思想开放，知书识礼。她能讲流利的英语，四十年代曾接待过马歇尔使团和其他很多军事使团。早年她毕业于北京的一所教会学校。或许王光美没有江青那么迷人，然而她有江青所缺少的那种大家闺秀的气质，不需雕饰也显得很美。在北京的上层政界人物中，王光美比江青更受欢迎，人缘也好，尽管她入党时间比江青晚十五年。

然而，江青生病住在苏联时，曾对王光美为她挑选的衣料

• 苏加诺夫人说，王光美的外貌比江青漂亮，“王光美的头发很漂亮，自然地弯曲，江青的头发就很直。”这位非常温柔的印度尼西亚妇女补充说，“从后边看，江青很象一个男人。”

很不满意，并对自己的工作人人员大发雷霆。从那以后，她们开始疏远，江青看王光美处处不顺眼。

进入六十年代，这种疏远加剧了。原因是：她们都已40多岁了，感到应开始做一些新的工作，干一番大事业；她们的丈夫由意见分歧开始走向分裂，中国的政局也开始动荡不安。江青对王光美的攻击开始于苏加诺夫人访华时的照片之事，从那时起，她就想向王光美证明：她也要伸手夺取政治权力。”

1963年的一天，王光美给江青打电话请教穿着方面的问题，她们的关系这时虽然已趋冷淡，但还没有决裂。王要与刘少奇一起出访东南亚，她拿不定主意穿戴什么式样的衣服和首饰。她想，江青爱读小说，而且对服装方面的细节描写都能记住，肯定会有好的建议。

江青建议王穿黑色天鹅绒套装，“象《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英雄那样。”这样显得既“高雅”，又“不俗气”。江青从未去过东南亚，她不知道，王光美穿这样的衣服去访问，说不定会热得窒息的。“总的来说，我不主张戴首饰。”江青补充说。

王光美很重视江青的建议，但是，这种国策访问要很长时间，而且也很引人注目，整个出访过程中，王穿过好几套衣服。在仰光，吴奈温总统送给王光美一串珍珠项链；在雅加达，她戴上它参加了苏加诺总统和夫人举行的盛大宴会。宴会上欢声笑语，充满了非常友好的气氛。在电视上，可以看到王光美弯腰给苏加诺总统点烟的镜头，点过烟后，她与总统手挽手走到旁边一间屋子去欣赏音乐。

* 这使我们想起了武则天。一位历史学家在写到1300多年前的这位女皇时说：“她对权力的兴趣开始于一次残忍的虐待行动。”武当时对敢于蔑视和反对她的两个女人进行迫害。“通过这一次，她性格中残忍暴虐的一面显露出来。她尝到了手中有权的滋味。”武下令，砍去那两个反对她的女人的手足，把她们分别塞进两个盛酒的坛子中。“现在，这两个妖婆可以喝个够了。”武则天在一旁哈哈大笑。几天过后，这两个女人就死在坛中。

在北京，江青看了这个新闻片，她发现王光美戴着一串项链。^{*}

江青和王光美会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不久，这种关系就几近破裂。1963-1964年的冬天，王光美走进一个新的领域，参与农村调研和农业政策的制定，因为此时，江青正在开始搞她的戏剧改革。王可能要与江青一争高低，也可能是对江青改革戏剧的一种反应。王光美参加了“四清”工作组，来到河北省一个公社的桃园大队。

王光美在上海作了一次七万字的长篇发言，大谈她在“四清”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就在刘少奇把这篇发言稿交给中共中央的时候，江青正在北京戏曲观摩大会的开幕式上讲话。就在王光美告诉负责农业的干部什么肥料最适于河北省贫瘠的土地时，江青正在告诉她的演员怎样挎枪才不致对自己的身体有害。就在毛泽东告诉江青，她将作为山东省的人大代表参加人大会议时，江青也在国务院的一份文件上看到了王光美的名字，她成了她的家乡河北省的人大代表。虽然在此之前，王光美对参加这次人大会议一直没有江青的兴致高，她取得辉煌成绩的桃园就在河北省。至于坐在中南海谈论没有出息的孩子，谈论只要工作不要家的丈夫，谈论如何擦拭珍贵的明代花瓶，这一切都成了遥远的过去。

江青最肮脏的思想之一就是，她认为，在政治斗争中，家庭关系能够而且应该被利用起来。如果她想去掉某一个干部，她会让这个干部的孩子起来反对自己的父亲。如果丈夫倒了台，那么妻子也要跟着一起倒霉。

1966年后期，江在一次群众大会上高叫：“我们要把王光美揪回清华大学，叫她坦白交待！”（王光美曾率工作组进驻清华

* 苏加诺夫人回忆说：“王光美给我丈夫点烟，这是很正常的，我也给刘少奇主席点过烟。至于说项链，那只是一般的项链，并不昂贵。”

大学，竭力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这个时候，刘少奇刚被打成“走资派”和“中国的赫鲁晓夫”。

江青在一次红卫兵集会上说：“王光美不老实。她去印度尼西亚之前来看过我，当时我生病住在上海。她说她要戴着项链穿上花花绿绿的衣服出访。”这是江青第一次谈到王光美三年前的印尼之行，以后还有几次。台下的青年急切地想听到下文，江青也希望煽动起他们的反特权思想。“我对她说，准备几身衣服是必要的，我建议她穿黑色的，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戴项链不好。”

“王光美几夜没有睡好觉，但还是采纳了我的建议，”江青继续说，“她告诉我，到东南亚后不戴项链。”

江青复制了王光美这次访问的新闻片，作为攻击王的证据材料。她对台下的人宣布：“这部片子宣扬了资本主义的宫廷生活。”她希望不仅要打倒刘少奇和王光美，还要攻击文化部和她的仇人夏衍（这部片子是在夏衍的授意下拍摄的）。无疑，这部片子表现的是那天晚上王光美戴着项链的场面。

“这部片子就这样出来了，”江青的声音充满了气愤，“千真万确。这个女人戴着项链，她欺骗了我！”人群一片呼喊，支持江青。

刘少奇和王光美在中南海的家受到监视。一天，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王光美接电话。电话里传来女儿刘婷婷抽泣的声音，她告诉母亲一个可怕的消息：姐姐平平出了车祸。刘少奇和王光美急忙来到医院，原来是一场骗局，婷婷可能是被迫打的电话。清华大学的左派红卫兵把王光美拉去实行“革命的监视”，批斗会一直从当天晚上十点开到第二天早上五点，象宣读教义一样宣读了这位“走资派”的罪行。

每隔一小时就有人向江青汇报王光美招供的情况。在清华大学主楼七楼的一个房间里，对王光美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后，王和看守她的红卫兵分别引用毛主席语录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

王还躺在地板上以示抗议。三个女红卫兵强迫第一夫人（刘少奇当时还是国家主席）穿上一件丝绸旗袍、一双高跟鞋，戴上一顶英国贵族式的宽边草帽——这是她“与苏加诺调情”时的装束。丝绸旗袍太小，一个女红卫兵在一边撕开一个口子，套在王开始发胖的身上。

一帮红卫兵象戏弄笼中鸟一样摆弄王光美，他们嘻嘻哈哈。最后，由江青导演的一出好戏开场了，一个红卫兵头目拿出道具戴在王光美的脖子上，这是一串乒乓球串成的项链，每个乒乓球上都打了叉。这是江青报复的枷锁。为了留作纪念，还拍照保存下来。一天一夜的人身侮辱开始了。

王光美措词激烈：“你们无权这样做！”好象在当时的中国，权威并不和她戴在脖子上的项链一样也是假的，在王光美后面的高台上，还站着几名江青的猎获物，他们听着、学着，随时准备揭发王光美的罪行以保全自己。*

在中南海里边的另一次审判中，一位“小将”亲自指挥，让

* 下面是部分王光美与审讯者的对话记录：

审讯者：你必须穿上那件衣服！

王光美：我不穿！

审讯者：在这件事上你没有选择！

王光美：（指着自己身上的衣服）这件衣服足可以见外宾。

审讯者：还接见外宾？你今天在接受审判！

王光美：那件衣服我不穿。不合时宜。

审讯者：那你为什么在印度尼西亚穿？

王光美：当时是夏天……

审讯者：你为什么在拉合尔穿？

王光美：不管怎么说，我不穿。

审讯者：我再说一遍，你在接受审判。你要是不老实，小心点儿！

王光美：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注意气候变化，随时更换衣服。

审讯者：（大笑）毛主席说的是政治气候。要是那样，你早冻死了，别看你穿着皮大衣。

王光美：如果我反对毛主席，我情愿冻死。

审讯者：你就是反对毛主席！

王光美：我现在没有反对他，将来也不会反对他。……

王光美坐两个小时的“喷气式”。王光美反剪双手，低着头站在一群看热闹的人面前。刘少奇当时是大会的主要批判对象，但他只坐二十分钟的“喷气式”，这似乎是江青故意所为，她要借此证明自己的权力。中南海有五个大门，江青坐在其中的一个大门前，招呼人们进去看“表演”。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另一个大门旁不断地打来电话，他想要控制会议的规模和事态的发展。

1967年初，江青并未放弃对王光美的批判。她在一次政治集会上谈到王光美的家庭时说：“你们知道吗，她父亲曾为国民党效力。她自己也是一个大走资派。”江青劝诱刘少奇与王前所生的女儿起来造父亲的反（刘与王前于1947年离婚）。在一次集会上，刘少奇的这个女儿站起来说：“我认为，我父亲是党内头号的走资派。”

江青觉得刘的女儿的发言太软弱了。她安排了一次母女会面，这个女儿第二次发言讨伐她父亲，使江青很满意。从此，王光美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漫画又加了一笔，很快就家喻户晓了。

在当时的中国，一点点消息（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经过渲染、加工、添枝加叶地流传，会越传越神奇。诅咒王光美的大字报和幻灯片铺天盖地而来，好象她还是躺在摇篮里的时候就成了美国间谍。她曾象女皇一样住在桃园大队。她迫害刘少奇的前妻留下的四个孩子。她与苏加诺搂抱在一起。总之，她的行为完全象个坏女人。

1967年9月的一个晚上，江青和康生在钓鱼台共进晚餐，话题转到了王光美。江青想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把王光美关进监狱。康生马上打电话叫来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组长，1967年5月成立的这个专案组由江青和康生直接领导。他们叫这个组长起草一份起诉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正式文件。

第二天一早，专案组长就拿着一叠文件来见江青。文件上写着，“基本上可以认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间谍。”江青看后，在文件上方批示道：“很不妥，退回专案组。”她知道，在中国，“基本上”是搪塞用语，不能完全定性。专案组长又拿着文件去见康生。康生看了江青的批示，告诉组长要他亲自签发逮捕证。在康生笔下，没有任何证据，王光美不仅是“美国间谍”，还成了“日本间谍”和“国民党特务”。江青签署了这份起诉书。

据王光美的孩子们说，判决书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在上面写了“刀下留人”四个字，若不是如此，王光美当时就被处死了。结果，她在监狱度过了十二年。

一辆小车停在刘少奇和王光美家的后门，两位在专案组工作的公安人员走下车来。刘少奇家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已离去，但是戴着白帽穿着白围裙的厨师郝苗还在。一个小时后，他被逮捕并接受审讯。他们逼他说清楚王光美为美国做间谍工作的情况，他回答：“我只是个炊事员。”“那么给我们说说她解放前的活动吧。”郝苗噤着说，他那个时候还是个学生，什么也不清楚。公安人员指责他给王光美和刘少奇做好吃的，这些年一直在腐蚀他们，帮助他们走资本主义的路，为他们做精美的佳肴，季节已过还给他们吃新鲜的上海螃蟹。

郝苗被判处六年徒刑。由于专案组的工作，仅北京市就有64人因与刘少奇和王光美有牵连而被捕入狱。

11月的一天晚上，两派红卫兵“9·15组织”和“9·16组织”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虽然辩论的题目谁也不清楚，但双方还是慷慨激昂，好象中国的未来就决定于今晚哪一派的获胜上。江青也在场，她的军装有点儿打皱，但是脸上放出异常兴奋的光彩。她听着双方的辩论，一言不发，但是，她的出席象

聚光灯一样使辩论气氛更加热烈。最后，她站起来作出裁决。

“你们都是革命组织，”她高傲地宣布，“你们应该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不过，两个组织中都有坏人，特别是在‘9·16组织’内还暗藏着一名外国间谍！”

江青常常突然发出这种指责，她根本没有考虑这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但是，在1966年末这个寒冷的夜晚，江青的心中都有自己的攻击目标，她要夺取全面的胜利。

在北京航空学院，一位年轻人心情紧张地坐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一声不吭。他就是“9·16组织”中的那一位成员，但是他认为，他去参加那天晚上的辩论会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和他父亲一样，这位年轻人长得清秀，留着长发，他是刘允若——正在挨斗的国家主席的儿子，王光美的继子。他就是江青所说的“外国间谍”。

江青离开大厅，走向等在外边的小车。“9·15组织”的人欢呼雀跃，他们胜利了，“9·16组织”被打败了。“你们内部有外国间谍，你们的组织当然也就是反革命组织了。”过了几周，他们才想起来，这是指刘允若，因为他的双亲正在挨斗。江青的小手一指，就为“9·15组织”大开了绿灯。

江青的确也有一点儿“证据”使她能够指责刘允若，但是在恐怖笼罩着的中国，一点儿“证据”就足够了。五十年代后期，刘允若在莫斯科读书时，曾爱上一位苏联少女。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双亲反对他与苏联姑娘结婚。1960年，他们把刘允若召回国内“休假”。

允若和他的女友只有通信联系。1961年，刘允若过生日时，这位苏联姑娘送给他一块手表、一盒糖果。她在每一颗糖果里面都包了一个小纸片，把这些小纸片上的字拼在一起，成了一封情书。对允若来说，他是一名党员，他要和父亲一样遵守

党的纪律，因此，他把写给女友的每一封信都要先给党支部书记过目。

刘少奇和王光美找到了航空部的领导，他们是刘允若所在单位的上级部门，和他们谈了自己儿子的“问题”。

有了这些信作证据，江青足可以打倒刘允若。尽管这些信经党组织审查过，尽管刘少奇也曾和党中央汇报过这件事，但是江青还是要说允若“与外国有非法来往”。在1966年那种大逮捕的环境中，在江青的话就是金科玉律的时候，江青指控允若是“外国间谍”，难道谁还敢提出疑问吗？

在江青提出这种指控后不久，天真的允若搬出了中南海的刘家，来到公安部要求“澄清”一下事实。但是，江青的金口已开，谁也不敢调查此事。他的一位朋友回忆说：“他太蠢了，搬出了中南海。如果他留在那里，他可能会安全些——最起码暂时安全些。”

公安部的人员也担惊受怕，他们把允若送进了看守所。允若害怕了，也惊呆了。他不愿与其他的人谈论这一切，坐在那里呆呆地思考自己的命运。也没有人打扰他，因为哪位干部也不敢碰刘少奇的案子。

1974年，刘允若被关了八年后获得释放，他的精神已经失常。这时他才听说，父亲已死，母亲也在监狱关了好多年。1977年，在他44岁时死于肺病，一直也没有结婚。他的一位朋友说：“他最终还是会遇到麻烦的，但是真正决定他命运的，是江青说他是‘外国间谍’。”

1967年，江青的爪牙飞到昆明，找到允若追求过的电影《五朵金花》中扮演女主角的那位演员，一群红卫兵对她进行了审讯。“但是我告诉你们，我拒绝了他们要我和刘允若结婚的要求！”然而，她的争辩是苍白无力的。“为什么刘家就找上了你？”

红卫兵大声斥责，“你肯定与这些走资派有联系。”女演员受到严刑拷打，至今仍半身瘫痪。

1968年，王光美正在监狱服刑，江青仍不放过对她的攻击。1968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江青说：“刘少奇的那个臭老婆，是美国间谍。”同一个月，中国仅剩的几位领导人举行会议，江青滔滔不绝地谈了她与刘少奇和王光美长期以来的个人仇怨。

“在延安时，刘少奇反对我。”她说得慷慨激昂，周恩来和康生坐在旁边，正在谈论着四川出现的紧急局势，“他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这是老柯（前上海市长）生前告诉我的。”在延安，刘少奇有什么理由反对江青？她当时没担任任何政治职务。答案只有一个。

除了项链事件，清华大学的工作组问题、桃园“四清”与戏剧改革的冲突，“资本主义的宫廷生活”等等。除了这些，最使江青耿耿于怀的，是刘与王光美结婚前的十年，他就在延安带头反对江青和毛泽东结婚，还促成党对他们的婚姻施加种种限制，最主要的就是限制江青的政治活动。1968年9月，江青在一次讲话中高叫：“这个大叛徒，应该千刀万剐。”

至于王光美，这位官方承认的第一夫人，主要是江青个人的仇人。在江青看来，不管她戴不戴项链，都不能作为第一夫人到处抛头露面。

因为极左路线带来的是一片混乱，毛泽东从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退缩了。但是江青不愿象毛那样退得那么明显。因为心情不佳，致使江青不断地生病，也不断地在公共场合大发脾气。但她没有忘记在每次讲话前说一句“毛主席的身体很好”，或是“毛主席让我向大家问好”。当她站在“舞台”上把越来越多的敌人指责为“小丑”的时候，她的舞台风度依然可

见。紧随其左右的姚文元也不停地拍手叫喊：“小丑，小丑！”这个时候，江青扭曲的脸上会露出一丝微笑。到了1967年，1966年的那种狂热似乎在慢慢过去，江青紧张起来，她似乎要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滔天大祸受到惩罚。

一群争吵不休的青年拉住江青，要她为两派的严重分歧评理，江青匆匆地说：“时间到了，我还有一个会。”她对来自安徽的一个代表团说：“我来得匆匆忙忙，还没有想好要讲些什么。”“老康（康生）把我拉来，我一点儿准备没有，也不知给你们讲些什么。”除了她的身体原因外，还因为这时极左的“宫廷派”的威信在下降，而军队的地位在上升，江青已感到自己处境危险。

在一次大型的群众集会上，讨论关于政治斗争中该不该用枪杆子的问题，江青当时显得有些得意忘形。当时毛泽东的观点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能用枪。但是江青，和当年的蓝苹一样，已经忘乎所以，在这个炎热的晚上，她说：“我嘛，要是有人敢夺我的枪，我一定开枪还击。”停了一下，她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话与当时的新政策不符。“当然，开枪是不好的。”然后，她又一次离题，“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有我自己的看法。”每当遇到压力的时候，江青个人的意志力量总是比任何外在的力量更起作用，不管这些外在力量来自导演、剧作家、“走资派”，还是来自她不断变换的丈夫。

在频繁的派性武斗中，江青的神经终日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谎报军情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在毛泽东和江青家里的沙发底下和花盆里，发现了秘密放置的录音机。一天晚上，枪声大作，江青赶忙披衣起床，到处乱闯的造反派冲击了重兵把守的中南海，把江青吓坏了。

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抢救运动”。一开始，文化大革命是反对右倾官僚主义的日子运动，后来变成了反对

“极左派”的运动。在毛看来，这一段时间证明了，文化大革命善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红卫兵被送回教室上课，团结的口号代替了造反的呐喊。毛对上海一个公社要跃进到共产主义的计划泼了冷水。在“宫廷派”中，几位与江青关系亲近的高级成员因“极左罪行”遭到逮捕。很多重要的时刻，都是军队开进机关、学校和工厂，帮助恢复正常的秩序。所有这些，都等于是挖了江青站立的根基。

江青犯了错误，她没有想到要留下几个重要人物在自己身边。复仇的欲望使她在文化领域走到了极端。她不分青红皂白地只抱住红卫兵，而他们现在已经很不得人心。

即使是处在权力顶峰的时候，江青也遭到反对，因为这里的人们中间流传着一句古老谚语：“母鸡打鸣，国不太平。”江青没有很本分地呆在家里织毛衣，而是到处乱跑，人们已经把她看作是拨弄是非的泼妇。现在她感到，传统的敌视妇女的冷风正在向她袭来，而且，当时党要不惜一切代价证明毛泽东的一贯正确，这种风势还要加强。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和江青搞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矛盾，造成了混乱，这是江青的最大问题，尽管这与她的错误不可分离，或者说与对一位名女人的偏见不可分离。即使是在六十年代处于权力之巅的时候，江青也只是一个副驾驶员。她到处赠送《毛泽东选集》，又有谁赠送过她的选集。他们总是对她说：“记住，你的行为会有损于主席的名声。”现在，她开始发现，主席的行为也会有损于她的名声。

* 在“6·16”的问题上，周恩来和他的人对抗江青，这就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有一个红卫兵组织曾经叫周是“资产阶级的臭老板”、“要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可能周对此非常气愤。）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止一个。事态的发展也与毛泽东当初的设想不一样，比预料的走得要远。后期，主要是穷于应付那些始料不及的事件，而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再说，如果没有江青，可能也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可以肯定，毛泽东不会把这场运动叫做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权力下滑的毛转而把江青作为自己的同盟并在思想上前所未有的深受江青影响的时候。它的内容——将意识形态和文艺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反映了江青的特殊兴趣；它的戏剧一样的表现形式也体现了江青的特点。令人厌恶的个人崇拜把毛从一位政治家变成一个神一样的人物，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江青把毛推到“乔治王”的地位。她认为，把毛捧得越高，她自己也就越光彩。文化大革命与江青燃烧的复仇欲望是不可能分开的，因为在延安时受到的种种阻挠和限制，她要谴责并粉碎这一枷锁。

没有人能理解文化大革命，* 或许根本没有什么需要理解的；在虚荣、攻击和强烈的报复欲望的背后，没有任何理性可言。与此同时，很多人真诚地追求他们信仰的事业。但是江青知道，文化大革命没有更深刻的意义，她根本不去关心对人民来说象精神支柱一样重要的事业（戏剧除外）。无疑，她在政治上的无知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更起作用的是她和别人的关系，还有她个性中潜在的邪恶力量，以及她天生具有的政治手腕——迷人的魅力，追求戏剧性效果的意识，一旦激发起来就不会减弱的精力和她善于玩弄力量平衡的本能。

文化大革命对江青有着很强的个人含义，她的独立精神、她

* 刘少奇本人说，他根本就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外交部长陈毅说：“……要是我来领导文化大革命，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了。”

的斗争意志、她强烈地寻求报复的思想倾向——这可追溯到她的少女时代——都走到了一起。

江青有时言行过激，有时也较温和，如在1966秋，她就要求缓和局势。不管采取哪种立场，她的内心都没有思想的根基。当1967年后期，毛泽东从文化大革命的原则上开始退缩的时候，江青开始心情忧郁起来，因为军队进入了权力的中心，这必定要削弱她的力量。她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前景。

如果说，穿着军装的江青并不象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而更象一位橱窗里的模特儿的话，并不意味着江青内心要成为一名“极右”官僚，而不做林彪的“左派”勇士。她两者都不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疯狂的演出中，她穿的服装可以说是很可笑的，但她不在乎。她比任何人都明白，这只不过是戏装而已。当舞台上的灯光消失，脸上的油彩抹去，剩下的不是江青的艺术，而是她的生活。*

文化大革命的战火快要停熄了。江青已经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和她五十年代的销声匿迹一样引人注目。

1969年4月，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宣布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人们很难相信，象毛泽东宣布的那样，因为文化

* 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江青的个人表演，对这一结论持怀疑态度的读者应注意以下四点：第一，北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但是江青的思想几乎没有达到这一水平高度（假设江青有这种思想成份），因为在此之前她的政治思想知识很贫乏。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对自己的绝大多数敌人的错误思想和罪恶言行的指控都是假的、虚构的。江青倒台前，西方的中国学者已经持这种看法（现在北京也证实，她的指控完全是捏造的）。第三，江青的整个成年时期的生活都有一种主观的色彩，要完全证明自己的强烈动机，以及燃烧的复仇欲望。第四，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到处发表的讲话中，以及她倒台后发现的、对自己生活的非正式评论中，都主要是谈论她自己。她与维特克的谈话中，也主要是谈她个人的敌人，她自己所关心的事——疾病、服装、家庭、照片等等——而不是谈论官方的政策（因此，维特克在写文化大革命时，一部分依据江青本人的谈话，主要还是根据“文件材料”，因为江青自己的话并不能充分证明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

大革命取得了“胜利的成果”，这次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表面的风平浪静之下，军人势力与仍然掌权的左派之间正剑拔弩张。在“穿军装的”和“坐直升飞机的”两派斗争中，*毛泽东举棋不定。但自己的那位“坐直升飞机的”、他生活中的巫神——江青，成了中国的统治群体——中央政治局的21名成员之一。

文化大革命安排了角色，定好了次序，产生了奥韦尔式的戏剧思想，为七十年代更为残酷的政治斗争埋下了伏笔，中国仍将饱受折磨。江青，这位文化大革命的戏剧政治中诞生的明星，是把这一伏笔从六十年代带进七十年代的最潜在的继承人。

“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泽东曾给江青写过这样的话。的确，毛常常对江青的行为很不满，可能他内心也已隐约地感到，让妻子担任如此高的职位是一个错误。不久，他就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说：“我从来就不赞成让自己的老婆作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是指林彪的妻子叶群（她也成了政治局成员），可能心中也暗指江青。

江青跑到香山公园去寻找奇花异草的幼苗，她想，把这些植物移到她在中南海的花园里一定很好看。她的这一行径，也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江青的腐败、追求刺激和她中世纪家长制式的政治作风以及六十年代结束时北京的政局。

作为政治局委员，江青的个人出游也要有地方高级官员陪同，当然还要有一大批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队伍到达后，陪同她的万里说想让江青看几个佛像。她是来看花草的，她严厉地警告他们要注意革命思想，但是万里说五百罗汉好看极了，于是，江青很不情愿地来到碧云寺。万里指给江青看一堆被作为

* 邓小平把那些能力有限但权力地位却升得很快的人，称为“坐直升飞机的”。

迷信物品收缴上来的战利品，这里有佛像、新摆的供品、一顶帽子和中山服，还有一尊新塑的毛泽东半身像。

看到毛的像跻身于在宗教的神龛之中，江青很愤怒（还不让她去找花草而把她拉到这里来），她命令公园管理人员把所有有关毛泽东的东西马上从寺庙里拿走。然后，她又宣布，她要买些食物分给公园里的人。她面露笑容，但是脸上的皱纹却向人们说明，她已经是五十六岁的人了。她要扮演一次救世主的角色。当工作人员把米饭、鱼和甜点心塞给惊慌失措的旁观者时，江青在一旁大声说：“吃吧，吃吧！”

第六章 要做女皇 (70年代)

“我要永葆政治青春。”

——江青

“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
只有一个，她自己。”

——毛泽东谈江青

1971年初的一个傍晚，江青和她的几个亲信在听鹂馆共进晚餐。早在一个世纪以前，颐和园里的这处看戏兼用膳之所就深得慈禧太后的宠爱。江青喜欢这种历史关联；她喜欢这发霉的旧餐厅，这铺着金色桌布的沉重的桌子，此处正对着为慈禧演唱京戏的露天舞台；她也喜欢这里的厨师为她做的拿手菜：香酥子鸡和湖里的小鲑鱼。

饭后，江青沿着一条小径散步，它通向昆明湖那雾气缭绕的碧空。突然，她在排云殿墙上的一幅标语前站住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标语的每个字有六英尺高。在那个左倾思想充斥全中国的时代，这种标语根本算不了什么，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然而江青却又惊又气，她愣住了。这原是雷锋——一个著名的年轻烈士说过的话，可现在却变成了林彪的手迹！江青愤怒异常。林彪这是想告诉公众，他是这幅标语的作者。这个卑鄙的家伙在利用毛的威信来提高自己的声望。毛曾

数次给她说过林彪的这一企图。“主席的作用成了一纸空文。”她对身边的人发牢骚说。很明显，这意思是指，林彪这样炫耀他的手迹是一次政治谋反活动。

江青带着一丝邪念回到她的车里。她开始认识到，林彪为什么在屈膝于真理之源时还要固执地用“毛泽东思想”来取代“毛泽东”这三个字。当她的高级轿车驱赶着街上的行人驶回中南海时，她陷入了沉思。这幅冒牌的标语在告诉中国人民，毛的法术将比他本人长寿，而且，从中斡旋的是一只新手。这是林彪的手！抵达自己的住处时，江青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象：全中国的人都被符咒镇住似地盯着毛语录的揭示牌，而这竟是她的暗中竞争者的手迹。看在上帝的份上，换上她的手迹又有何妨！*

在毛的晚年，江青发现自己生活在未来的两种阴影之中：或者，接替毛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因此赢得她奋斗一生的最终胜利，不当男人的附庸，自由地表现自己；或者，被作为暴发户而打翻在地，因为她只是靠骑在丈夫的背上才得以无端地高升。这种困难的两可处境令她越来越难以承受，因为她既害怕，又要奉承，同时又感到憎恨。

毛的一些同僚担心他会长生不老；另有些人则因担心他死得太早而惊恐万状。林彪属于前者；江青属于后者，她需要活着的但是衰老的毛作为后盾。毛去世的不同时机造成林彪和江青不同的利益冲突，但是，这种利益之争丝毫不会缓和他们在争当毛的最忠实的诠释者中的对抗。

尽管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的首脑，但是林彪身材矮小，除

* 在中国，经复制的领导人手迹极易为公众辨认，这简直成了一门标准的技术。

了那偶尔闪出的一丝迷人微笑，他显露着一张菜色的苦脸。作为军事指挥家，他声名显赫，但在其他领域，他则孤陋寡闻。他的为官之道是中国传统中盛行的阴谋诡计。

虽然林彪和江青之间如此不同，但文化大革命还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联系有两个关键之处：一天的每一小时和全国的每平方公里都意识到了毛时代的即将结束；1969年的“九大”后，江青和林彪干的每件事都是为了继承毛。他们相互利用。起初，当毛处于权力的顶峰时，他们的相互利用小心翼翼，并极为成功。但从七十年代开始，当毛处于李尔王的境地时，他们的相互利用就不平稳，不安全了。中国的政治成了一池猜疑的浊水，北京的权威开始支离破碎了。

毛对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说过，象戴高乐和他这样的人，都没有接班人。毛的这种超然姿态使任何一位充当他副手的人陷入困境。1970年，林彪发觉，当第二号人物将意味着要被囚禁在单人牢房里，就象六十年代初刘少奇遭受的一样。至于江青，她则发现自己能得益于这位老者的多疑。也许毛对马尔罗说的话预示着某个日子，在打倒了所有可能的继承者之后，他将把拐杖递交给自己的夫人？这种方式既可以避免选择继承者，又为延续他的生命而选择了一位代理人。

正当毛对林彪作为中国领袖的思想、品格和能力产生怀疑的时候，江青与林彪结成了联盟。毛在1966年春的一次会议后说过，林彪的一些提法，他总感觉不舒服。会上，林彪极力表现出讨好毛的样子，希望促使毛远离政治而成为软弱无力的圣徒。一月份，江青和林彪的夫人叶群在旅游胜地苏州就接触过。叶群是个暴戾的女人，既无江青的美貌，又无王光美的高贵的气质。叶群对江青谈到林彪的挫折，因为他的健康妨碍了他为

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也许，只有患病者本人——江青自己，才能真正理解林彪是怎么想的。她对这一切太了解了，她只是应酬着，但是，她认为林彪的贡献一直就一文不值。她还是极力强调指出，59岁的林彪还很年轻。江青接着暗示了林彪在接替毛泽东方面的优势，林彪对毛多么有价值呀，对毛的思想理解得多么深刻呀，用了一大堆的恭维话。

这次谈话刚过几个星期，林彪就对江青委以全军文艺顾问的头衔。江青和林彪成为背靠背的政治盟友，叶群成了她新发现的朋友的无耻后援者（在一次发言中，叶群高喊过十七次“保卫江青”的口号）。

江青和林彪共同对付刘少奇。江青在军队中对“走资派”的讨伐帮助了林彪清除他的敌人。江青对叶群说：“你恨谁，就告诉我，我帮你除掉他们。”

作为回报，林彪脸上露出一丝干笑，说江青是“我党杰出的女同志”。他下令把江青由干部九级提升到五级。林彪在一份机密材料中对此做了解释：“过去由于江青多年身体不怎么好，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有很大的创造性。”在一系列“江办”递交来签署或审阅的文件中可以发现，林彪的签字总是“完全同意”。

叶群同时成了江青和空军司令吴法宪联系的桥梁。吴法宪为江青提供供她炫耀权力的飞机、枪炮和人员。叶群对江青就象一条哈巴狗。她把部队人员从遥远的东北买来的裘皮送给江青，同时为江青提供海、陆、空三军制服，供她在盛大的场合穿着。一位此事的知情者说：“为了江青，叶群会在地上打滚，把马粪当成甜蛋糕。”

作为毛的法定继承人，林彪变得骚动不安，他不愿意愚蠢地等到这位伟人去世的时候。毛也感觉到，林彪正依靠军队炫

耀权势，正赤裸裸地想当国家首脑，正在抵制他向美国开放门户的计划。总之，林彪是想让毛时刻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1970年和1971年上半年，当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由不和走向分裂之际，江青和林彪的关系也疏远了，不过并未终止。她还不能以林彪为敌。他们互相帮过很大的忙，他们依旧要联合起来，预防从文革的死灰中复燃的“走资派”的进攻，从而为他们的溃败雪耻。再说，如果林彪真的接了毛的班，江青和毛不同，她将不得不在林彪手下效力。不过，江青和林彪的竞争是一目了然的。当时，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私下里评论说：“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一场江青和林彪争权夺力的斗争。”江青很清楚，如果毛泽东和林彪真的摊牌了，她将不得不告发林彪。从复杂的原因分析，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江青也开始怀疑林彪是否具有继承毛的气质。

到了1971年春，毛泽东和林彪终于不可避免地进行了最后的较量。周恩来这位总是在维持演出秩序的舞台监督，成了毛的关键盟友。在这一艰巨的任务中，他与林彪的军队势力，与林彪作为文化大革命领袖的资历，与林彪写入宪法的、作为毛选定的下一任中国领导人的地位作斗争。然而，江青不会放弃她与林彪及其阴谋集团的联系。她并不真的想让林彪接毛的班，但是，他们二人相互利用的不诚实的游戏并未完全结束。

4月29日，毛和林彪互不来往已有很长时间了。叶群对江青说：“江青同志每次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我进行帮助，我非常感动。”江青留出一条通向毛的正式代理人的后路。5月2日，她在电话中对叶群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他。”也许，江青不象毛那样坚信林彪要完蛋了。

江青前去为林彪拍了一张单人照。四年前，在林宅后院的

炉子中，江青烧掉了有关她过去的材料。在林家，她给林彪拍了一张他坐在椅子上读《毛泽东选集》的照片。这次林彪没戴帽子，这是非同寻常的。林彪是秃顶，他一般总是戴顶帽子以遮盖他光秃秃的脑袋。江青很欣赏这幅照片，便把它们发表在7、8两月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上，并附有她亲笔题写的标题：“孜孜不倦！”

8月，林彪给江青捎了个口信，鼓励她接管一些毛的工作，“尽管这对你的健康会有点影响。”同一个月，她去青岛旅游，这是她学生时代呆过的一个港口城市。林彪为她提供了各种方便，包括一位高级军官为她在个城市游览时开关小轿车车门，为她故地重游拍照。在青岛市府礼堂，她吩咐把一幅林彪的新画像挂在毛泽东画像的旁边。

9月8日，在林彪和叶群生命的最后一刻，叶群还从海滨胜地北戴河与江青通过电话。在那儿，林彪的追随者借口度假和庆贺林的女儿订婚，正谋划在他们的南方堡垒广东建立一个替代政府。叶群若无其事地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林家还送去一些上等西瓜，叶群对江青说，这是她初秋时节最爱吃的品种。“请林副主席放心。”江青以这句话结束了这次令人惊讶的通话。

9月12日傍晚，江青在她颐和园的别墅里呆了几个小时，此处的点心就有林家送来的四个西瓜。江青把西瓜分给园中的工作人员，她得意地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

几小时后，北戴河就响了一枪，也许在这之前北京就已响过，之后，一架空军三叉戟载着林彪、叶群及几个同伙在紧急状态下起飞了。然而，只过了两个半小时，它就坠毁在蒙古。机上无一人幸免于难，林彪和叶群都死了。那天晚上毛说过：“让

他走吧，他跑不远。”四年后他又说：“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对于林彪的走向灭亡，江青知道的远不如她丈夫多。几个月后，江青就说林彪是她一生的死敌。11月的一个晚上，江青已到了冬天她常去的广州，欣赏着她那温柔飘逸的兰花园中的美妙夜色。她总是要求不断地变换环境，这里可以呼吸到南方城市特有的新鲜空气，也更容易从香港搞到电影片子。

与其他的国家主要领导人不同，江青的随行人员中，除服务人员和医生外，还有一帮她政治圈子中的文人，他们多数是年轻的极左派和放荡不羁的家伙。

晚餐是鸡汤、清蒸鱼和鸽子。前两道菜她认为是她的健康之本。饭后，江青开始大谈所谓“奸臣”。林彪不仅想当中国的皇帝，而且还对她横加迫害。外人知道他在她的食物里投了毒吗？知道他指示洗印室把她喜欢的影片糟踏成奇怪的红色吗？知道她和毛主席在1971年春天为防他的刺客，不得不搬出中南海，住进一家旅馆吗？

江青讲到林彪的一系列阴谋诡计已经摧残了她的肉体和精神时，她弯腰按摩了一下自己的脚踝。她接着说，不眠之夜使她本来已经衰弱的心脏又加了一重负担。她声音微弱，目光看着远方。最后，她鼓足劲又说，在那些阴谋反对毛主席的人当中，林彪真正是最狡猾和最粗野的一个。

这是一场老掉牙的表演，是演员的职业习惯和哀惋痛苦的多疑病的精彩混合。

是的，象所有其他人一样，江青掩盖了林彪的真相。在她看来，林彪垮台的最大获益者是周恩来，没有他，毛就不可能打败他的副手，周恩来现在将会达到他权威的顶峰。这位舞台监督将会接班当导演，她前进的道路上又多出一块绊脚石。

按中国传统，唯一能保持自己个性的人物是那些肩负着推动社会前进使命的特殊的男性——而绝不会是女性。武断的江青似乎不在这一范围之内。许多不喜欢她的人把她，而且一直把她看作是一个惹是生非的夫人。只有少数人才认识到她内心正把自己置于儒家传统之中。这一点可以从她的自我表现中判断出来，因为她在培养自己成为中国的统治者！江青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中看到了自己，作为这样的女人，她个人的自我实现与中华民族的仁政融合在一个目标中了。

她一直在奋斗，争当独立的女性，与习俗作斗争。多年以来，她努力将对自我的束缚转化为动力。甚至习俗也能帮她立志干一番事业，因为中国历史上已经有过一位得到最高领导权的妇女。

一千三百年前，武则天从一个玩偶到女政治家的高升象征了江青的道路。太宗驾崩。按惯例，他的女人都要送到尼姑庵去削发为尼。可是，这位继位成为高宗皇帝的皇太子并没有忘记武则天。他已立了一位皇后王氏，王氏是从第一级姬妾的位置上提升而来的。但高宗还是借故探访了武则天所在的尼姑庵，第二次去时就不顾一切地把武给带了出来，并在宫中给她安排了一个适当的位置。

武则天证实了她处理国事的能力与她的床上功夫一样好。在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谋杀之后——显然，武则天扼死了自己的婴儿，然后诬陷皇后王氏，指责（对她的指责皇帝也无可抗拒）对此事无一所知的皇后——这位从尼姑庵中拯救出来的皇妃排挤掉了重要的皇后王氏，取代了一个杰出朝代施政有为的第一夫人。

武后生了两个儿子，同时挫败了那些企图阻止她对朝政施加影响的老臣们。这样，她的地位被支撑起来了，而且不久就

凌驾于皇帝之上。这位优柔寡断的皇帝，总是把自己有限的生理机能过多地花在诱惑上面（他的女人包括武后的妹妹和侄女）。武后发动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朝鲜战争，治国任人唯贤，废除了一切妨碍施政的反对派。

已是 55 岁的武则天本应是皇太后并堂而皇之地隐退了。但是，经过一场平静而残忍的斗争，武后冷酷地处置了两位皇太子（她的儿子）以及其他那些对她争当名副其实的第一号人物有威胁的人。终于，她在公元 690 年自封为中国的皇帝——真正的“天子（女）”，第一位这样的女人。

她自称“天神皇帝”，建立了自己的朝代，国号为周。这是整个唐朝最显著的一个空位期（旧王死后新王尚未即位）。“佛教徒们”忙于为这位荣升到迄今为止只属男人位置的女人寻找无可辩驳的理由，他们杜撰的一篇箴言集把武则天吹捧为降临到中华大地上的最大的赐福，并“昭示”人们，她是玉帝派来统治这个世界的女总管。

阴谋是帝制的特有产物，有关继承的积念，直接影响了所有的判断。即令这两点是事实，武后还是成功地，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开明地实行了她的统治，直到她去世，也即以她这个女人为天子的朝代结束，享年 81 岁。她实际统治中国长达 50 年。

以前很少关心中国历史的江青如今成了一名学生。她渴望了解武则天及其他接近皇位的伟大女性的事迹。她的图书馆塞满了这方面的书。一批狂热地忠于她的文人匆忙准备了一些宣扬武后的文章，说武后是“反孔的”，因而也是“进步的”。因为当时普遍认为武则天是位淫荡、贪权的泼妇。江青常对自己身边的人说：“女人也可以做皇帝，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也会有女统治者。”

江青面临着巨大的不平等。两条铁的规则似乎在嘲弄她：没有一位女性被认为可做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没有一位女性在政界上层能扮演一个体面的角色。每一位中国妇女都被要求对这两条远古相传的、不可动摇的真理顶礼膜拜。

武则天做了皇帝，但这是不可重复的畸变。并且，她被认为是通过暴力和色情来攫取皇位的。在中国历史书中，皇后的楷模永远是那些避免成为政治家的循规蹈矩的女人，而那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确实握有实权的皇后被认定是邪恶和灾难。当北京的知识分子在私下交谈中把江青看成是“武则天”时，这已意味着对江的中伤了。

在皇朝统治下，皇宫自成一个小规模的城市，只有一位男性公民，那就是皇帝（太监不计在内）。在皇帝与其一连串的继承人的关系中，女人能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皇帝及其继承人都很清楚。许多皇后因为她们对丈夫的辅佐而受赞美，成千的皇妃因为她们对皇帝的事业和中国未来的繁荣所做的独特而无私的奉献受到称赞。

武后的传记作家写道：“妇女是真正的革命者。因为，由于软弱而被迫认识到生理能力的限制，她们发自内心地拒绝一切由男人建立起来的限制利用公开暴力的心理屏障。”然而，尽管许多中国的政治妇女深知那些法律和道德的约定是男人的工具，但她们口头上还是反复地说，这些约定是伴随她们一生的、恒久不变的真理。

还有另外一种妇女，虽然为数极少，但令人难忘。她们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是由于深知独裁的意义所在，因为她们已经领教过男人统治女人的滋味——这反应了社会性的、更广泛的独裁——这种珍贵的体验使她们拒绝保守其悲怨的秘密。她们的目的就是要荡涤一切阻碍妇女政治家公开并自豪地立于中华

民族顶峰的无理要求。她们呐喊着向位于皇宫一角的姬妾的住处挑战（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是代表普通妇女的革命者，她们追求的只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与满足）。

武则天就是这种女人，江青则是另一种。

然而，权力对女人来说——撇开不可能实现的颂扬之梦不说——只有通过她丈夫或儿子才可以得到。在中国历史上，少数女人以这种方式获得了实权（武则天是唯一做了皇帝的）。她们是皇太后，但是，当她们的丈夫或儿子在皇位而又患病、疯癫或未成年时，她们被允许在屏风后统治。七十年代初，当毛的生命快到尽头时，这也许就是江青所希望达到的地位。

江青开始津津有味地谈论皇太后之一的吕雉，其丈夫刘邦于公元前 206 年建立了汉朝。丈夫死后，吕后囚禁了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并砍去其母的双手和双脚，然后又以自己年幼顺从的儿子取而代之，即昭帝。她统治这个帝国尽管不特别顺利，但还是长达十六年之久。昭帝成年后，吕后就把他害死了。她从宫中找了一位年幼的男孩，取代皇位上的昭帝。但他只是一个身着华丽服装的木偶，吕后则是替木偶说话的人。吕后一死，大臣和将军们将她的全家抄斩，并恢复了令人可接受的男性统治。

在表现中国历史的模式化的道德剧中，吕后是个反面角色。但江青却安然地到处讲吕后的事迹应该重新评价。江青认为，吕后的残忍可由三个因素弥补，这三个因素在七十年代的共产党中国和她的需要密切相关。可惜，当面对历史时，它并不是一种酝酿充分的思想。

第一个因素，公元前 195 年，吕雉的丈夫去世后，她有足以带领中国度过一个平稳时期的能力和勇气。

其次，吕雉不是荡妇。

第三，吕后已经证明了她的气概。为建立汉朝帝国，她同

她的丈夫共尝战争的艰辛。

在其他的皇太后中，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奸诈的慈禧（1835- 1908）。江青时代的有些中国人还能回忆起她。作为皇妃，她升为皇后是因为她碰巧成了皇帝唯一的儿子的母亲。1861年，她丈夫的死导致她统治中国将近五十年，她依靠的是阴谋、暗害以及玩弄权术平衡的专长。

利用自己的妹夫，她挫败了老臣们对她的统治的极力反对。慈禧把她的儿子推上皇位当了同治皇帝，并将他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当他于1874年早逝时，她又选择了她的侄子替代他作了光绪皇帝。然而，当光绪皇帝开始同情反慈禧的改革派时，这位有志青年随即就被投入了监狱。慈禧虽然专制，但也极有忍耐力，她选拔了一批卓越的谋士。跟武后一样，她的思想不会因国事而偏离于情爱。没有她，中国的王朝可能在1911年之前就结束了。

江青对慈禧太后的思想和权术非常着迷。不过，她不可能公开地颂扬慈禧，因为慈禧太后根本没能阻止西方的入侵，而且，她属于旧政权中非常活跃的一部分，而这一政权已经被共产党光明正大地埋葬了。人们决不会选择一位来自昨夜之敌阵营中的人物作为楷模。

在旧中国，如果一个女人不可能获得最高的政治权力，那么，她就不可能为自己所扮演的任何政治角色赢得赞许。一位叱咤风云的皇后万事如意时，人们会说她的成功是靠心术不正；而掌权的帝后二人诸事不利时，又常常是女人受到谴责。

这一说法并不中肯。江青不只是个惹是生非的业余政治家，享乐主义并不能控制她。她有演戏生涯的背景，她处于壮观的政治生涯的中期，她的雄心是作中国的统治者（党的主席）。

那么，江青是否跟吕后一样，也是一个依赖儿子的职业政

治家呢？当然不是。尽管自1966年以来，江青已树立起自己的威望和影响，但她缺少一个可作为她攫取权力口实的儿子。

一位江青的熟人说：“1971年，我又见到了她，我发现，她的嗓音有点变化。”她前一次见江是在1969年。以前，江青说话缓慢而又自信，她有一副漂亮、庄严的嗓子。现在却“干巴巴的，显得声嘶力竭。”六十年代后期政治运动的余波使江青失去了冷静。她喜怒无常，常有草木皆兵之感。她变得更加自负、狂妄。

那位拜访者回忆说：“江青身穿套装，急匆匆地走了进来，象一股旋风。她的嗓门高而急促。她坐立不安，用递来的热毛巾擦脸，从手腕擦到手臂，又从脖子擦到肩膀，仿佛刚从地里干活回来……。”

这位拜访者发现：“要是你向她请教一些戏剧方面的问题，她会跟你讲她的病。你若求教继续革命的问题，她会谈论这个人或那个人如何如何的坏。”

跟林登·约翰逊一样，江青天生就喜欢在谈话时展示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以起到视觉强化的效果。但是，因为林登的胃曾经开过一刀，江青在这方面远远超过她。她会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自己要说明的真理的支撑点。她会张开大嘴，露出一颗断缺的牙齿，这是一个男人留下的，难道这不能说明占人类一半的女性所受的折磨骇人听闻吗？她还会撩起裤脚指着一块小疤，这是一条狗留下的，难道这不能说明革命的敌人无处不在吗？

江青凭借自己的位置成了一位政治家，而且是最不寻常的一个。在中国，政治是经济加地理加枪杆子。不过，江青几乎没有利益集团做她的后台，地方上的根基也不稳固（除了上

海)。她的势力是个人的。她的交易靠的不是政治上的多数票，不是军事分化，也不是工业产值，而是个性。她没有选民，只有追随者。她不善于了解谁与谁之间历史上有联系和交往，也不会预测围绕经济政策的下一个斗争将是什么情况。但她是个天才，善于摆布有野心的年轻人，或揣摸哪一起重要的婚姻有危险。

跟武后一样，江青让自己对资深官员的敌意与对低级官员的热情相互平衡。这就是这两位得以高升的女人偶合的“革命性”本质。她们这样厚颜无耻地夺取——中国文化的每一根神经似乎都与这种思想毫无干系——必须唤醒一个新世界以补救旧世界的不平衡。寻找一个最能干、最有才华的不知名干将是她们两人唯一共同的希望。

江青“出于道德原因的温和的报复”则采取两种形式：利用毛的威望来打击那些不尽心依附她的官员；提拔那些效忠于她的官员。文化大革命中，高层受害者的半数都是江青的私敌，新的极左派分子中则有半数是她们的亲信。

当江青爬得更高、并研究过了那些凭借阴谋和暴力而升降的皇后们时，她开始变得对安全异常敏感。一个谣言使她担心中南海上空会遭到直升飞机的袭击，自己会遭到暗杀。在卫戍部队，即所谓的 8341 部队，知道所策划的阴谋之前，难道就不会有一架军用直升机深夜突然袭击吗？炸弹也许会投向她的卧室；飞行员也许会从天而降，把她劫持到国外，并且会把她投入一间与武后所发明的一样残酷的囚牢之中。

江青觉得在她这座明朝宅邸的顶部应该安装“特殊装置”以抵御敌人的直升机。但是她的戒备心理又太强，不敢公开对自己的工作人员谈她感觉到的危险，以免暴露自己的胆小。她找

来自己的卫士长，暗示了自己预料的危险。卫士长是康生推荐的，他深知康生的一言一行。江青指指天，又伸出一个指头指指自己的胸脯。她本来就一直在导演一出戏，但她的卫士长还是领会了她的意思。他可能也听到了谣传，军队中的“反皇太后”集团已经发誓要在江青自己的床上宰掉她。

经过一番勘察，雅致的瓷砖屋顶隐蔽地装上了有旋转底座的机枪。经费是挪用整修佛教寺庙的庞大基金支付的。直升飞机袭击事件从未发生过，8341部队倒是新增了一个机枪营。

一系列药物疗法之后，江青仍感觉不舒服，她确信医务人员故意给她开错了药，以帮助身居高官的敌人暗害她。这是宫廷阴谋的长期传统。

一天晚上，一位姓赵的护士给江青拿来了常用的安眠药，江青自己服了。半小时后，江青按铃叫来赵护士问：她的安眠药究竟到哪里去了？赵说她已经服了，而江说没有，并坚持要服第二次。第二天上午，她感到软弱无力，几乎连手都动不了。她对其他的服务人员说，她敢肯定赵护士是林彪余党派来企图用过量药物暗杀她的秘密特务。当一位助理护士笑话她这种想法时，江青抓起一把剪刀猛地向她刺去。江青下令对赵护士在钓鱼台国宾馆十七号楼的行动进行全面而长期的“调查”，那位姑娘因此失去了她的护士职务和资格。

绝对的权力是个人特性的放大镜。武后的一位传记作家写道：“绝对的专制者象是演员，他站在巨型哈哈镜前故作姿态，把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扩充到巨大的范围。”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江青，因为她从一开始参与政治就在练习个人的自我表现。到七十年代初，在中国这一共产主义的王国，她的微笑就是大丰收，她的皱眉就是地震，她的犹豫不决则会造成官僚政治的混乱不堪。

武后曾把一只猫驯化得与几只鸚鵡在同一笼中和睦相处，她对此尤其引以为自豪。其方法就是整天给猫喂它喜欢的食物。一天，她传令把这只笼子提到大殿中来，让所有的大臣官员们轮流观看，以满足大家的好奇。这只“喵喵”叫的、驯服的猫在武后看来几乎成了她自己当皇后的才华和独创性的象征。她认为，让大臣们亲眼目睹这一切并对此叹服，对她很重要。然而，不幸的是，这只猫在这种场合可能因为过于激动，突然袭击了一只漂亮的鸚鵡，并把它咬死，准备吃了它。武后差一点儿从御座上摔下来，大殿中的人们忍不住笑了起来，但皇后却怒气冲冲。训斥是少不了的，而且不仅仅是对那只猫。

江青的猴子对江青与武后的猫一样重要。江青对男人越有经验，她就越喜欢自己的猴子。她给猴子穿丝绸衣服，吃最好的食物，当她和猴子在广州的兰花园中散步时，还训练它突然跳起来吓唬人。到七十年代中期，是否奉承她的猴子成了追随者们是否忠于她的简单而有决定性的试验。当某个傍晚你在兰花园中散步时，如果你把猴子的突如其来的降临于你肩上、把你吓得魂不附体当作一种天大的恩赐，这就意味着你在政治上一定是正直的。

国外一些评论认为，江青把自己摆在企图继承毛的位置上。她担心这些评论会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影响，因此安排新闻检查员，把国外报刊上有关她的文章全部剪下来，不让中国读者看到这些文章。《时代》周刊、《快报》等对江青的野心、敏感和意志表示赞许的文章，也有一两页被剪下。

不负责任的权力不仅对选民来说是腐败的，而且它还纵容掌权者不必顾虑远离权力，把个人的人格演化为权力的全部，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使他不被批评所伤害，不受忍让之习俗的羁绊。

掌权的江青谈起世界，谈起她的同僚以及政治问题时，似乎他们都缩小至一个小镇的生活水平，而她则是一盏指路灯。苏联人是污染空气的邈邈的邻居，不可能不从她的篱笆院中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因此是不可相信的。周恩来是可依靠的大叔，他总是很清楚在什么时候干什么事情。林彪是街那头她昔日的朋友，他的哥儿们曾在镇中心广场用无聊的闲话诽谤过她，并暗中破坏她在当地戏剧界的声誉。姚文元是一个绝不会出什么难题的忠顺的男仆。毛泽东是她可望得到庇护的父亲。虽然她不总是理解他，而且有时他还反对她的得意之作。至于周围陋室中的“群众”，则不过是她扮演小镇第一夫人的舞台道具。

当黄华对他的来访者谈到1972年江青的一次引人注目的自我表现时，他气愤地说：“即使是毛主席也不会向别人透露他的私生活。”罗克珊·维特克，一位精明强干而又意志坚强的中国历史学者，与江青在北京和广州呆了许多天，听江青谈论关于生活、关于中国革命和关于她自己的问题。“让我把自己解剖给你看。”江青得意地对这位美国学者咕嘈道，其口气就象用根手杖就把中国的传统和共产党的规章制度拨到一边去了。*

黄华关于毛的说法是不大正确的。在三十年代，毛确实对埃德加·斯诺较为详细地谈过自己的生活，其中有些是后来很多场合不太公开的事情。但是，这位前任外交部长“即使毛主

* 会见之前，这位美国学者还拜见了两位老练的中国妇女领袖，但她很难从她们嘴里得到一些关于她们自己的生活情况。“在一次谈话中，我提醒过四次，我对她们自己的故事比对政治分析更感兴趣。可每次她们都以会意的微笑回绝了我的要求，并继续谈中国、谈革命、谈广大的妇女……这种缄默也许可以简单地解释为礼貌，或政治上的顾虑。但是，似乎还有比这更深刻的原因。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加重了传统因素的份量，它要求所有的人，男人和女人，不要只让别人注意自己。不仅如此，与男人相比，女人似乎更谦虚、更诚实，不象男人那样肯定自己。”

席也……”的说法却有深刻的含义，因为在这一敏感领域只有毛是例外。“只有毛主席才能向别人透露他的私生活。”这件事情更为坦率的说法应该是这样。

江青的确摘掉了自己的面纱，她又一次跨越雷池。

这就是“新的江青”，热衷于刻画自己的角色，公然蔑视她的敌人，蔑视中国的政治习惯。遗憾的是，她蔑视自己真实的过去。她未经毛的允许就会见了罗克珊·维特克，她知道毛肯定不会同意。不过，现在她正在超越毛。她正在扮演的角色不仅是他的夫人，而且是他的得力随从。她对维特克谈到毛的不多，而是谈她自己。似乎她与毛不同，她是地位较低的，但是同样重要的革命者——是一个在毛的身边学到了很多，而且足以从毛颤抖的手中端走他的王国的人。

这同样也是过去的江青。淑蒙、李云鹤、蓝苹，都想要表现自己，希望别人了解她的风格，希望被看成是能自己制定行动准则的独立的人物。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清除了（她希望如此）她与蒋介石集团曾接触过的痕迹，因此，1972年，江青才可以把自己描绘成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甚至在少年时期就痛恨资产阶级。历史的记录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她认为），俞启威使她成了年轻的政治活动家，她的魅力和个性曾几次驱使唐纳自杀，这都是事实。因此，她相信自己能给维特克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她是一个男人的女人，是毛的“支持者”，完全能够继续他的工作。

江青曾毁掉了许多她在上海生活的记录，制造了一段人生空白。如果说她是想为维特克填补这段空白的話，她所填补的也不是真实的故事。在会谈中，姑且不说她的第一任丈夫费先生，就连她的第二和第三任丈夫，江青也只字不提，而且一次也未提到过吕后、武后和慈禧太后。她生活中的男人和她梦想

中的女人都不见了，跟牛排晚餐中没有牛排一样。

当然，毛不愿意江青对一个外国人谈论唐纳或武后。^{*}而且，他也不喜欢这次会谈的整个想法。他诅咒她进行的会谈——把他架空，似乎会谈是她的私事——因为他感到这种举动有想当皇后的企图。至于她泄露“国家机密”我们倒不清楚，这种罪状是一块掩盖真正罪行的遮羞布；她泄露的是一个女人企图非分地攫取最高权力的难以启齿的秘密。

江青对维特克谈到内战；谈到毛泽东不挑食的习惯，总是吃饭桌上离自己最近的菜。但她真正的罪过是用一支红笔在她给维特克的照片上签了名——在过去的中国，朱批是皇帝手书的标志。

北京是否有这样的高层次官员，他们很高兴看到江青的这一自我暴露——按中国文化，这简直是孤注一掷——的行为，并认为她正在钻进圈套了？不管怎么说，江青当时是毫无畏惧。她在会见维特克之前倒是与周恩来总理商量过，“谈一个小时就够了。”周对她的请示作了这样的答复。她对此置之不理。（这只是建议，还说不上是指示。）但是当江青与维特克的会见还在继续时，总理参与进来，劝江青“只谈艺术和文学，不要谈别的事。”这使江青很恼火。看着手中周恩来送来的纸条，她当着送信人的面，大骂不在面前的周：“你就是不让我工作，你竟然有胆量，敢压制我，打击我！”

同时，江青向她的美国客人表现出她是如何能刚柔相济的。她向这位年轻但经验丰富的学者介绍如何战胜资产阶级思想，如何饮用莲子汤以利尿。她认为她们俩能找到生活中崇拜的目

^{*} 当就此事问及唐纳时，他说：“这不是她不谈我的唯一理由，她是为她对待我的方式感到耻辱。”

标，这是好事。当维特克声称她要拜这位中国女领导人为“老师”时，江青简直飘飘然了。

维特克乘飞机来到广州拜见江青。飞机的卧室里铺着丝绸床单，这跟旧中国的女政治家蒋介石的夫人一样，丝绸床单是她权力的象征。对她们的这种作法，男批评家认为是在“走极端”。一天晚上，在餐桌边，江青从一个盒子中拿出一条裙子送给维特克。“我喜欢裙子，”江青说，“夏天穿很合适。”

江青怎么可能既是共产党员又是放纵自己的皇后呢？怎么可能既是除掉过许多人的恶劣女人同时又是一个说点闲话、按快门、谈谈服饰的有魅力的旅伴呢？因为，在权力庇护的环境掩饰下，她在自己的个性与共产主义事业之间作了一系列的鉴别。当她看到父亲揍自己的母亲时，她萌发了反抗精神，这使她与深受“资本家”和“地主”剥削而反抗的阶级联合起来。作为女人，她要求为自己辩护，现在她看到，在中国共产党内，最高权力正在向她手中集中。

1973年的夏末，中国共产党的“十大”会议上，江青的激进派与周恩来的温和派相互抵消了。因为毛高高在上，他似乎对发生在自己脚下的这场争斗不很感兴趣，因此拒绝再选择一个接班人代替林彪。毛泽东依然沉浸在他与林彪斗争的反左逻辑之中，并且把邓小平重新拉上台。江青很不愉快。她与邓小平在气质上的差异是两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所可能有的差异中最大的。

江青象个听天由命的女人，依旧我行我素。如果历史肯定要将她打倒，看不到自己的厄运就算是她的造化了。

那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值得记住的晚上，江青作为主人招待日本的松山芭蕾舞团。几十年前的一幅情景肯定会浮现在

她的眼前。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她恳求过日本来客给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停止侵略中国。如今在人民大会堂，她又堂而皇之地代表几百万中国人接见了点头哈腰的日本代表团，他们提心吊胆地希望中国观众会发现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舞蹈。江青眉开眼笑地送给芭蕾舞团团长一张风景照。日本舞蹈家仔细看时，发现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这是“李进”在庐山仙人洞拍的照片，背面有毛泽东的一首热情奔放的诗，题为“赠李进”。

江青带着自豪的神情，拿出笔在背面写了“江青摄”几个字。这是个大胆的举动。数年来，中国的读者们已熟知毛泽东的这首诗，然而，由于它被认为是一首抒情诗，李进的身份还一直是个秘密。在这个洋溢着中日友好情谊的夜晚，江青决定向世界宣布，李进就是她本人；摄影师不是别人，正是江青自己。

1974年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

他们的婚姻正处于另一个阶段。1973年，江青搬出中南海住到钓鱼台国宾馆的一所豪华公寓里去了。对江青日益增长的任性，毛泽东很气愤。他下令，江青如果要来见他，必须先给他写信。毛在1974年的同一封信中还说：“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江青与维特克的会谈毁了她在毛心目中的形象。

然而，其状况也许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婚姻，绝没有就此告终，对双方来说，他们的婚姻依然具有个人的和政治的分量。

在六十年代，这一婚姻曾热过一阵，因为两人的愿望有共同之处：毛需要江青，江青拥有的一切都得利于毛给她的政治机会。到七十年代，他们不再作为政治配偶共事了。毛掌权但

不再亲政。他悲哀地对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说：“我一身都是病，快要见上帝去了。”在松散的环境下，江青成为一股独立的势力，她确实没有“遵守”毛给她提的一些意见；她两眼盯着的是毛以后的时代，她不再是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丈夫的事业的忠实妻子了。

毛并不总是赞同江青和左派——其实他也不总是赞同他自己，但是，他可能更不喜欢“右派”。文化大革命进展不顺利，但是毛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或者说不愿宽恕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并给他们平反。

八十年代时，中国方面声称，毛在1970年就已经“看透”了江青和她的左派联盟，并且认识到他们和林彪集团在“相互勾结”，这没有说服力。1970年后，毛和江青及其左翼联盟的关系极为密切。如果他想摆脱他们并把中国的未来交给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人，林彪一垮台他就这样干是最理想的时机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当时，他对周恩来的依赖似乎很不情愿，而邓小平则还在农村度日。

江青新的独立势力虽然使毛恼火，但是还不致于使他极端愤怒。“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他骂道，“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面言之，她代表她自己。”那年夏天，江青在北京青云直上，而毛则在官方保密的南方某旅游胜地接见外国领导人。

年底，毛告诉伙伴们：“江青有野心。”这算不上新发现，毛只不过是给她猛击一掌。同时，他断言：“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这是第一次将不可能公开的说法公开了，可是毛并未果断地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制止她的野心。

一场离奇的“批林批孔”（一个死于二千五百年前，一个则死于两年半前）运动正在进行。这是一瓶各斗争派系为了当前

的政治目的所配制的混合酒。江青把“孔子”看作是文革之前曾非常活跃的一切政治力量或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巩固文革这场风暴的“成果”对树立她作为女政治家的形象至关重要。周恩来（他巧妙地在“批孔”运动的前面加了一个“批林”作为装饰）则强调林彪的“左的错误”，巩固反林联盟对于稳住他的地位至关重要。毛泽东则很矛盾。他时而支持江青和她的极左集团，时而安抚温和派。（年底时他说：“该静下来了。”）

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摇摆不定的思想所含的意义对江青来说极为重要。1974年春，毛开始对周恩来冷淡后，她马上感到能对总理（退一步说，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的“孔夫子”）进行隐蔽的公开打击了。年终，毛泽东和江青互通过长信，江青不得不从她反周的位置上作了一点让步；她略为误解了毛的意思，但她还是抱怨自己“基本上是闲人。”她大胆地要求多尽点政治义务，毛的答复是：“做研究。”

江青又一次发现，干工作和作为女人难以同时获得成功。在上海时期，她偶然获得了两者。以后的许多年，作为毛的夫人，她就再也没有碰到过这种事了。文化大革命展开时，她有事可干了，她的婚姻得到了酬报。现在，婚姻的酬报没有了。她肯定不知道，在中国不可能使两者同时成功。

自1966年以来，江青还没有扮演过象1974年下半年这样一个显眼的角色。她到处跑，接见每一个人。她又有了一个“批林批孔办公室主任”的头衔，当了这场炙手可热的政治讨伐运动的头儿。当排列北京的一大批中国领导人的姓名时，她照例是名列榜首。在毛离京的八个月的时间里，她似乎成了政府的关键，成了紧张不安的官员们的领头人。

在纪念她1964年尝试戏剧改革的十周年之际，江青似乎成

了圣人。《人民日报》称她是“毛主席思想的诠释者。”这一令人惊愕的称号以前是封给刘少奇、林彪及其他公认的接班人的一种荣耀。她下达“指示”，这种“指示”就跟梵蒂冈罗马教皇的手谕一样。作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她还会见了塞浦路斯、多哥和毛里塔尼亚的总统，以及其他一些外国政府首脑。她代表毛问候他们，并祝他们的国家繁荣富强。

打开电视机就有她的面孔，看到满意的事她就微笑；察觉到阴暗面她就变得严厉。翻开报纸就有她活动的消息：在这儿排解纠纷，在那儿告诫勉励，又在另一处参观视察，并附有她身穿流行的中山装的照片。

毛从南方某地劝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尽管这位呆在中国南方山上的主席满足于避开争端之地，但他还是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告诉江青：“你积怨甚多……。”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新闻媒介竞相抛出赞扬吕后的文章。吕后意志坚强，当她的丈夫、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死后，她接过权力，贯彻了他的政策，因而赢得赞扬。当江青爬到最高领导层时，形容另一位女性统治者武则天的话现在完全可以用在她自己身上了：“生死褒贬全凭她的话来决定，天子则在御座上袖手旁观，无所作为。朝野称之为‘二圣’。”

一位北京居民回忆说：“那年夏天，我们从电影电视中看到许多江青会见外国人的镜头。她烫了头发。当时，任何中国妇女烫发都是罪过。后来就允许了，许多妇女都烫了这种发型。”

毛离开北京不久，江青很快高升，象是这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她写了一首很大胆的诗，配上自己拍摄的一幅照片，交给了《中国摄影》杂志的一位编辑。诗是写一座山的，照片上是一座直插云霄的山峰，这一巍峨、美丽、端庄而又被低估了的山峰，不是

别人，正是江青自己！这首诗不会获得任何文学奖：

江上有奇峰，
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
偶尔露峥嵘。

“江”是指她的姓，这首诗摹仿了唐诗，同时也使人想起她在延安时取名“江青”以取代“蓝苹”的事情。一首唐诗中说：“江上数峰青。”如批评家们后来说的，江青写这首“朦胧诗”时，不管她心中是否想到了毛泽东，它表明江青认为自己还没有赢得应有的喝彩。（江青竟使维特克相信，这是毛写的赞美她的诗！）

江青告诉《中国摄影》的编辑，诗和照片刊登时要用“琅琊台”的笔名，这是她的家乡诸城一座古老的名山的名字。她要暗示人们——经过一番穿过神秘乌云的摸索之后——谁是作者，但她又不想标上自己的真名，公开宣布她的自负和雄心。

江青想在中国伟大的文学和政治传统中找到自己，武则天对盛唐文学确实做过重要的贡献。她想要提醒那些资深的鉴定家们——当她与毛在延安开始共同生活时，他们中的许多人知道她的名字取自唐诗——她与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的这种长期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很快就要消亡，而且会被取代。

把诗和照片交给《中国摄影》后，江青又突然把它们撤回。后来，她改了主意，把它们又送了回去。她这样来来回回反复了五次，象一只猫决定不了把刚捕到的鱼藏在何处。最后她还是没能把它们刊登出来。

也许，毛泽东从长沙回来后，批评了这个使江青如此激动

的计划。更有可能，江青自己神经过敏地改了主意。虽然她极为自信，但作为女人，她在男人的政治世界里是孤独的。争当女皇不仅会把自己，而且会把中国共产党（和别国的共产党）的历史带到一个新的领域。不管是哪一种原因，诗和照片没有发表，说明江青处于一种政治的或心理的、或两者兼有的危险地带。

一天，毛泽东还在南方，权威报纸《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孤愤》的长篇政论性文章。《孤愤》一文写于二千二百年前，作者韩非是一位现实政治家，政治思想属法家学派。但是，如果把这篇文章与《光明日报》所加的序合在一起读，就会很清楚，1974年的领导层正处于一种麻烦的境地。

韩非描写了一个受制于谎言和派性斗争而走向毁灭的王国。皇帝被谄媚者和“佞臣”引入歧途，尤其是被一“重臣”所哄骗。这位“重臣”安排“恶棍”和“无能之辈”做了朝廷的高官。他们如此对待皇帝是犯了“滔天大罪”，并且，皇帝允许那位“重臣”成为政权的核心是“犯了大错”。

北京市民争相传阅《光明日报》7月23日的这篇文章。许多人议论这位导致毛的王国走向毁灭（按报纸的观点）的“重臣”究竟是谁。那篇序言只是以中国人特有的方式确认这人是“林彪之类”的坏蛋；通过这一死于三年前的昔日的坏蛋，读者们不得不推断谁是当今的坏蛋。这只能是周恩来或江青。这两个尖锐对立的阵营的核心人物，现在是相互仇视的第二号人物。那么，这是谁在攻击谁呢？

几个小时之内，这份7月23日的《光明日报》就被撤回并销毁了。同一天又发行了一份新版报纸，原来排在第二版的《孤愤》文章换上了五条乏味的地方消息。也许是江青在攻击周恩来？但自春季以来，总理一直在住院，大家都知道他年老体

弱，患了癌症。倘若周是靶子，那么，反江集团通过迅速发行《光明日报》7月23日的另一份报纸显示了他们的实力。

也许，这篇文章是在攻击江青。她是那位使毛的朝廷趋于毁灭的“重臣”，因为她在与周恩来、邓小平及其他那些比她资格更老的人争夺毛之后的未来。

一天，在《光明日报》的那阵忙乱之后不久，江青参加了她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支持者们召开的会。会上对于选择批林批孔的教材问题进行了一场犹太法典式的争论。会议中间，江青拿起一份翻译材料，这是一位西方记者发自北京的新闻快讯。她向大家读到：“中国当前的斗争，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的斗争。”江青用一位外国人的话吐露了她自己赞同而又以她的地位不便公开说的思想。她放下这篇文章，向全场扫了一眼，其表情就象一只美餐了金丝雀的猫。她知道她摆好了架式对付周恩来，她对这场斗争感到满意，而且她很喜欢“激进派”的标签。

“周恩来等不到他接主席班的那一天了。”江青对一位同僚轻声地说。这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一天晚上，会见过尼泊尔国王之后，毛对与会的同僚们谈到江青与周恩来的紧张关系：“不是总理等不及作主席——而是我的夫人。”

在一场反“黑画”的斗争中，江青对周恩来的敌意表露了出来。经总理批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的大宾馆和其他公共场所，用一些名画等艺术品作装饰。江青硬说这些艺术品“不健康”。在姚文元的帮助下，她派出了考察小组。这些人粗暴地抢走了七百件艺术品，换上了江青的所谓“革命的”绘画、雕塑和地毯。其中抢来的200件艺术品被集中起来办了个“黑画展览”。政府职员和居委会代表蜂涌而来，到市中心参观这个长达一个月的展览。

后来，电影《园丁之歌》上演了。影片描写了两位善于引导青少年走向光明和正义的中学教师。这部影片的拍摄由新起的湖南政治家华国锋促成，而且深受许多观众的喜爱。影片成功地塑造了教师的形象，赞扬了收获来自辛苦耕耘的思想——中国人念念不忘尊师和苦尽甘来。

但是，197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江青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陪同下看完《园丁之歌》后，却怒火冲天。

当这三位上海激进分子边吃夜宵边议论这部影片时，江青宣布：“片名本身就有问题，怎么能让园丁当老师呢？应该让共产党员来当才对！”这种嘲弄就象她在摆弄一条清蒸鱼。电影中的一首插曲尤其使江青恼怒，歌曲的开头一句便是：“没有文化，我们怎能肩负革命的重担。”她认为这是暗中攻击文化大革命。这估计倒是不错，文化大革命一哄而起，文化被扫地出门，教师则被发配去养猪。

这难道不是对他们一伙人的直接攻击吗？难道不是对他们政治权力的挑战吗？江青继续对吃夜宵的伙伴们说：“这部影片的气氛不正常。老天，女老师甚至在巴结男教师！”不管张春桥和姚文元会有什么看法，对江青来说，男女间这种关系在她的生活中是绝不会有的。

有关《园丁之歌》的信件和电话频繁地往来于江青的圈子中。1974年春，有近一百篇声讨《园丁之歌》的文章发表，大肆宣扬江青在那次夜宵中对张和姚讲过的观点。楚南——江青写作班子的笔名之一，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这部影片“在为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唱赞歌”。

不过，江青的攻讦也并非一帆风顺。这部影片诞生于毛的故乡湖南，在那儿，华国锋极有势力。长沙也开始反击了。1974年12月的一个寒夜，正是毛长期离京期间，他在长沙郊外的宾

馆中，说想看看电影。《园丁之歌》作为地方影片制作的战利品，被选来送给主席观看。毛审阅文件已是体力不支，但他喜欢这部电影。他称赞了它。一位精明的湖南官员见机说道：“主席，这部影片正在批判呢。”毛亲切地笑了，扫视大家一眼，说：“为什么批？你们告诉我它有什么错？我看这是部好片子嘛！”

那天深夜，毛的话象颗炸弹一样击中了江青。她找到那位挑起这事的湖南人，暴跳如雷地骂道：“你竟让主席看《园丁之歌》，你竟然用这部骇人听闻的影片来影响主席。”不过，鉴于主席的评价，鉴于湖南官员和北京的反江官员们的精明谨慎的动作，江青不可能把她的攻讦继续下去。

文化部长打电话向江青请示对《园丁之歌》的意见，江青装腔作势地说：“张春桥负责这些文化方面的事，他对这部片子的看法比我更强烈……。”

江青自以为是和被云雾锁住的奇峰，这种想法不久就在港口城市天津表现出来。武则天不喜欢她的都城长安，一有空就外出。和她一样，江青也感到自己对北京有抵触情绪，并颇为欣赏她在全国的多处根据地。她不仅在杭州有湖边的苹果绿别墅，在广州有带兰花园的宾馆，在上海有以前的法国俱乐部，她还有“模范村”小靳庄，位于富饶的天津郊区。1927年，她第一次进大城市就是从济南来到这里。

中国的某些领导人常热衷于搞模范社区，在形式和管理上，它是整个国家发展的超前象征。在小靳庄，江青也要这样表现一下。王光美（在被江青除掉之前）有她自己的点，在那儿人人都关心产量和奖金。叶群（直至1971年她和林彪死为止）也有自己的地盘，在那儿，士兵们忙于帮助农民。小靳庄是江青自己的地盘，在这里，可以展示辉煌的群众文化，可以证明艺

术是如何改变生活的。

她的车开进小靳庄，全村六百多名农民和他们的家人都拥来向她问候。此时，她说来说去的一句话就是：“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一条令人惊讶的公式，它赋值于两个权威之上，这似乎给了她代表党中央的根据和权力。在招待所的大圆桌旁就餐时，小靳庄的农民领导们从他们与江青的关系中受益匪浅。江青发言时，他们很愿意听到这样的话：“小靳庄是我的点。”她有时还会加上令某些人兴奋的一句：“也是党中央的点。”

江青教导粗朴的老人，在村庄的管理方面，要给妇女更多的权力。十多岁的小女孩写一些蹩脚的诗歌，说只要抵制孔夫子的腐朽思想就能生产出优质玉米。小靳庄人被告知，如果他们象革命样板戏中的英雄那样生活，有一天，小靳庄和全中国都会成为幸福的乐园。

江青从北京带来了礼物：每人一顶草帽，还有麦种和每位妇女一副发卡。与此同时，她的表现就象个神经质的人。睡觉时，她要求把附近所有的鸡鸭猪狗都关起来，因为有一点儿声音都会使她难以入睡。她还觉得有必要把她用裘皮做垫的马桶运到小靳庄。

她在地里干了一会儿农活，显得既有热情又很虚伪。她去收割庄稼，卷起袖子，头发零乱，高声说自己是多么热爱体力劳动。但她从未失去从前的演戏天赋，她高兴地干了一会儿就抱怨太累了。上个星期在北京，她怎么每晚都干得了为主席阅读文件的活儿呢？“我干不了你们这些老农干的活！”但是，在摄影师未工作完之前，她是绝不会从庄稼地里走开的。

真是一个不成功的导演！江青把农民看作是与他们的生活无关的一部戏——争当女皇——中的陪衬。

江青按计划到了天津港。刚从小靳庄出来，她就由二位忠实的亲信陪同，参观大港附近的海上石油钻台。庄则栋是乒乓球冠军，在江青权力上升期间当上了体委主任。如今，他穿着做工考究的灰裤和锃亮的黑皮鞋，发式潇洒自然。这儿似乎用不上他这个部长的派头，但是江青要他来，所以他就来了。于会泳，一位来自江青家乡的音乐家也在场，尽管他对石油一无所知。于现在是文化部长，江青左派圈子里的人物。在中国，体育界和文艺界人士总觉得互相间有一种亲密的关系，而且，这二人都是忠于江青的。

这次参观的原因之一在于温和派和激进派在经济发展和外交事务方面发生的斗争。周恩来和邓小平批评江青总是说些意识形态的空话而无经济行动。（邓小平说过的很不文雅的一句话是：“她占着茅坑不拉屎。”）因此，江青希望向中国公众表明她也关心国家的收支平衡。^{*}

原因之二是，她希望调查一下这块特殊的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和文化水平。就象她的一位助手说的那样，要看看它们是否脱离了“正常的”皇后控制的轨道。

夏天一个晴朗的早晨，江青登上了大港二号钻井平台。她精神抖擞，时而戳戳庄则栋的胸，问他这几周在干什么；时而拿一些她以为文化部没有听到过的邓小平的最新笑话同于会泳打趣。但当他们与石油工人接触后，他们的情绪很快就低落下来。

江青愉快地对一位中年工人说：“给我唱首革命歌曲吧！”他站在江青面前，拿着扳手，呆滞的脸上全是油污。他连一首歌

* 不久，江青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说：“邓小平把我们的原油都降价卖掉了，他连一个起码的爱国者都不是。”

都想不起来。

江青皱了皱眉，低声对庄则栋、于会泳说：“只生产，不革命。”原来，全钻井队没有一个人会唱、并愿意唱一曲革命样板戏！

“我想见见女工。”她宣布。天哪，钻井平台上连个女工都没有。当石油公司革委会主任向江青汇报时，连庄则栋和于会泳也没有了他们的笑容。江青冷冷地逼问：“为什么连个女工都没有？难道你们忘了毛主席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吗？”这位务实的石油工人回答说，钻井是新开的，而且第一批合格的工人恰巧都是男的。她提醒大家：“男人可以做的，女人也能做”。

江青的话就是法律。第二周，就雇来四位妇女在井台上工作。在江青参观期间，平台上连个厕所也没有，工人们都是离开井台跑到边上去方便。现在，不仅有了女休息室，而且不得不建造一间女厕所。有了女厕所，就又另外建了个男厕所。

石油公司革委会主任私下里诅咒江青，而工人们却笑得要死。三个月后，那四位女工也走了。

没有几个天津市民想要穿“江青服”，可它却突然间出现在百货商店的妇女专柜上。这种衣服半新半旧，半土半洋，人们以前从未见过。它是根据一种唐朝服装加工的，象一件两边开襟的紧身褙一样，开着中式小领口，裙子则是宽松的西方式样。上身束腰，袖子是另外缝上的。江青说：“这是中西结合。”*这是她“脑力劳动”的产物。与此同时，在1974年，她却急匆匆地攻击西方文化是“腐朽的”，制片人安东尼奥尼是“罗马小丑”，而且美国文化“不健康”。她要给中国妇女的面貌打上一个新的骄傲的印记。

* 济南艺校开设的中西结合课程也用过这个词。

这件衣服售价二十元（后来有的城市要价还要高）。没有几个妇女愿意把自己一周或二周的薪水花在一件未经考验的、其前途比江青本人更不可测的服装上。位于极权中心的江青根本意识不到这件衣服是多么昂贵。为鼓吹这件衣服，她命令文化官员买了一大批这种服装，发给那些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在公开场合下露面的姑娘们。在天津，电视台播音员、音乐艺术家和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出场时，都穿这种以裙代裤的服装。去伊朗参加亚运会的女运动员们也发了这种衣服，去国外的戏剧团体也莫不如此。为解决服装滞销问题，江青批准了一项分期付款的计划：只要四元钱就可以买到一件这种衣服。

也许只有在天堂或在地狱，而不是在地球上，所有的妇女才愿意穿这种千篇一律的“国服”。不管怎样，至少在中国的土地上，人们是不会穿的。一位妇女抱怨说：“不把衣服全脱下来我就奶不了孩子。”因为她不能按中国人通常的方式撩起衬衫来给孩子喂奶。另一位妇女则说：“五米布太费料了。穿上它我既不能骑车，又不能打乒乓球。”妇女们为逗乐或泄愤常这样问：“你打算什么时候穿江青服？”在南方的热带省份，一穿上这种衣服就感到发闷，上身紧绷绷，下身拖拉拉的。

那些真的穿了这种服装的妇女对其质地和用料搞了许多花样。而那些总想与众不同的妇女则找到了借口，她们会穿上黑色的天鹅绒，或配上珠光宝气的饰物，或趁机穿上一英寸高的皮鞋（这作为中国的极限就跟巴黎妇女的五英寸一样）。这种服装倾倒了一批妇女，惹恼了一批妇女，使许多妇女伤脑筋，使所有的妇女都吃惊。

一位北京妇女说：“这是出风头。”这句话才是问题的关键。对江青来说，自她从小被迫穿她异母兄弟的衬衫和裤子以来，服装一直是她表示自由度的象征。她指望通过她的服装和发式来

表现自己。

中国的高层文化同共产党的风格一样，它们与炫耀无缘，但炫耀正是江青无法抵制的。她常常头戴军帽，秀丽的颌下系一条镶花边的围巾，披一件长外套（天冷时），皮带紧束着完美的腰。难道她没有认识到她给毛的王国带来的是闪电般的冲击吗？

有些中国妇女看到她身居高位而激动不已，这与某些英国妇女看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占据唐宁街十号的心情一样。别的妇女则感到江青已走出普通妇女的队伍了。在推广这件衣服时，难道她一点都没注意到在大男子主义的中国政治界，她那朝不保夕的地位吗？

一位妇女遗憾地说：“只要她稍微温和一点儿，也就不会受到这么严厉的攻击。”

以“国家领导人”的新角色，她给来访的外国显贵最后接见的机会。1974年9月20日，江青会见了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在党内和政界地位都高于江青的李先念，坐在一旁一言不发）。之后的连续两天，江青热情地陪同马科斯夫人观看文艺演出，参观工厂。这位美丽的前马尼拉皇后给江青带来一丝兴奋。她们都是经过奋斗才有今天的强女人。在互相交谈时，她们发觉最好还是直言不讳地聊聊她们所看透的男人世界。

江青的身上总是混杂着女人的强悍和女孩的羞涩。她可以表现得跟英国渔妇一样粗鲁，但她决不是那种把樱桃吃进嘴里再吐核的女人。进嘴之前，她会拿出小刀，仔细地除去核。尽管她来自贫民窟，但她已变成了一个没有服务员的帮助就穿不上鞋的女人。

在与伊梅尔达·马科斯的交往中，她感到能让她的双重性格融为一体，不必时刻想到自己是个掌权的女人。她发现，自

己可以放松一下，好好地享受这段时光。至于菲律宾与蒋介石的台湾有外交关系，而与北京却没有，是江青最不关心的事。从马科斯夫人身上，江青找到了一面镜子，她从中看到了自己所希望的：作为女人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同时又颇具魅力。

9月23日下午，江青决定请马科斯夫人延长在中国的访问。在告诉她的客人晚上看戏后，江青不顾马科斯夫人是周总理邀请到中国来的这一事实，请她留下来。江青笑着说：“我对明天感到太突然。”马科斯夫人同意延长她的访问日期。

第二天上午九点，江青和马科斯夫人在百万群众的欢迎下抵达天津。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象个使童，跑来跑去以满足她们的每个要求。毛的亲戚王海容——外交部高级官员也陪同前来，但是她感到困惑不解。

马科斯夫人一行中有人说：“我认为江青是想显示一下，作为女政治家面对另一位女政治家，她给这个城市带来的是什么。”同时，江青报复了王光美。12年前，王光美招待苏加诺夫人时也演了这一幕。这是江青第一次陪同外国首脑的夫人参观中国。此行的高潮是她得意洋洋地把客人带到“她的点”——小靳庄，观赏小靳庄非农村式的文化节。

农民们载歌载舞，向两位夫人表达了他们的政治斗志。在视察了牲口棚、麦田和面粉厂后，江青向菲律宾客人扼要地重述了仲夏时她在天津作的讲话。可是，马科斯夫人明白中国的武后“比她同时代的男人都更强”吗？她听说过“伟大的封建女政治家”吕后吗？

马科斯夫人觉得江青根本没有“激进思想”，而是一位有高度责任感的“说话温柔而且很女性化的人物。”她带着这种感觉回到马尼拉。与此同时，小靳庄之行成功地给“江青的点”作了全国性的宣传。本来是周恩来邀请马科斯夫人访问中国的，但

江青却把她包揽了。

江青在搭权力的积木。她把群众当作观众；她同她圈子中野心勃勃的、年轻的支持者们讨论政治。可是，她不知道如何使用权力。军事、行政、利率——她没有这方面的头脑。如果她真的做了女皇，她将依靠什么呢？她的政策将以京剧为中心，她对政治路线的想法就是到小靳庄一游。

钓鱼台国宾馆散落的别墅坐落在湖边，高墙挡住了窥视的眼睛。自从江青全部搬出中南海并成为“上海帮”激进分子的头目后，她便把钓鱼台作为她办私事和公事的根据地。十号楼是她的住宅，十七号楼是她的办公室。

在一切没有什么民主的统治中，存在着这样的帮派，他们有自己的开会习惯和地点，有中意的饭店和俱乐部，有堕落的小型组织网络。江青的钓鱼台虽不特别糟，但有自己的风格。随着她权力的增加及人员的扩充，有更多的事情无法处理，也存在着很多不能忍受的事。

她喜欢以听天气预报作为自己一天的开始，其细致程度似乎更适合飞行员，而不是打算躺在床上阅读文件度过早晨的人。风、噪音和光线仍是她主要担心的。她要知道风速、风向以及太阳光可能发出的强度，她还要知道每间房子和宾馆花园每个角落的温度。她喜欢西式早餐，坐在床上吃两个鸡蛋、两片面包和一抹黄油。她会穿着一件睡衣阅读和作记录，直到喊一声：“我要起床了！”便会召来她的服务员，开始洗漱、穿衣、打扮等杂活。洗澡水太热或太冷都会导致有人想谋害她的罪名。在她的厕所里，总是放着香港电影杂志。

江青不喜欢别人打断她的晨思。一天，一位新来的警卫问候道：“首长，早上好。”江青勃然大怒。张春桥赶忙过来打圆

场。他告诉警卫员：“首长在思考国家大事，你怎么能打扰她呢？”

江青总是回避宴会。在人民大会堂的那些冗长的宴会上，仪式太繁，噪音太大，人太多。她不能象在钓鱼台的小群体中所做的那样控制局面。此外，大会堂那工厂般的厨房做出的众多菜肴对她的健康是重大威胁，餐厅服务员收拾餐桌时发出的响声令她厌烦。

心血来潮时，江青总是引述党关于“勤俭节约”的号召和“避免特权”的重要性片断，坚持要她的工作人员与她共进午餐或晚餐。多数中国人会咕噜咕噜地喝汤，吃到最后一口菜时，筷子会碰到碗而发出响声。江青不能容忍这些声音。江青班子中的低级成员因为担心他们超过了最低限度的噪音标准，往往发现，离开饭桌时自己还饿着肚子。他们会悄悄跑到厨师那里，要求在厨房的友好气氛中再吃一点。厨师理解这些，他们会一起坐下，狼吞虎咽地吃着，取笑他们这位不可思议的老板娘。

江青喜欢跳舞，但对她的工作人员来说，组织这样的舞会并非易事：首席女演员应该与满屋朝臣共度良宵。与皇后跳舞的是谁，并且应该是谁呢？当高级同僚准备把他们笨手笨脚的老夫人带到舞会来时，如何满足江青作为一位通晓跳舞的演员的虚荣心呢？

每当在钓鱼台举行舞会时，江青就是明星。她的工作人员必须要在她的健康和自我表现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如果她跳了一通宵，她就会精疲力竭。过后，她会责怪她的护士：“你们知道我是不能跳这么久的。”这时，她瘫倒在椅子上，脱去长袜。不过，如果请江青跳舞的英俊男子太少的话，结果会更糟。由于没有指定的信号，她身边的男子就没有一个敢邀请她跳舞。所以，焦虑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时刻对江青察颜观色。当她脸色开朗时，肯定是某位男士荣幸地被她看中了。当工作人员判断她

跳够了时，女服务员就会迎合她，试图不让她注意到没有人请她跳舞这一事实。当舞会中她长时间不能跳或不跳时，那才糟呢。因为江青没上场，没有人敢斗胆开始跳舞。但有时她忘了通知她不再跳了，其他人可以自在地开始。

北京高阶层的舞会按习惯要在光滑的地板上撒一些白粉，以防老年人或行动不便者滑倒摔伤。这使江青恼火。她怎能在撒白粉以致使速度减慢的地板上自如地跳吉特巴呢？难道要她降低到邓颖超大姐和康克清的水平吗？江青的工作人员会策划，以抵制喜欢撒白粉的其他领导人的工作人员。如果她失败了，她会拒绝跳舞，而是回家去看场电影。

一天晚上，江青与邓小平经过一场关于赤脚医生的激烈争论之后（她把这些医护人员看成是革命的灿烂之花，邓则认为他们最终应该让位于受过正规训练的医生），江青的思想便转向更刺激的家庭晚间电影方面。她刚看完《豺狼的日子》，并很喜欢它。现在她手中有一部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她听说这是部快节奏的惊险片，这正是她在与那位强有力的副总理较量之后喜欢看的片子。她想，要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到钓鱼台来同她一起看就好了。电话通了，两位上海同伙办公室的回答是，他们已经看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结果江青自己看了电影。后来，她在休息之前，和护士打了一圈扑克。

第二天上午，江青获悉张春桥和姚文元实际上没有看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盛怒之下，她训斥了张、姚办公室的秘书昨天晚上对她撒谎，称他们是“反革命分子”。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撒谎的不是秘书，而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在1975和1976年的政治动乱年代，最有威力的弹药是毛同意某个想法或计划的签字。大部分战斗都是围绕着如何理解毛的话而造成的。当“发展国民经济”从毛的嘴里说出时，邓

小平则会立即行动。江青则喝道：“毛主席从来就没有说过这个话，这只是个该死的谣言，当然是谣言工厂传出来的。”

到处都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呐喊，对中国人来说，这就象天主教的弥撒曲一样意义深远。艺术和文学界有丰富的新作品吗？（江青说有，邓小平说没有。）参与国际经济有利于中国吗？（邓说有利，江说没有利。）江青满世界叫喊“资本主义”，就象约瑟夫·麦卡锡到处叫喊“共产主义”一样。邓小平及其盟友选择“教条主义”一词来攻击江青。这些都毫无意义。只有一个问题是重要的：当毛的权力从他手中滑落时，谁会得到它呢？1975年间，江青的策略多为防卫或抵挡，那一时刻到来时，影响权力平衡的将是天意。

江青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指责敌人是“间谍”或“帝国主义者”，却想不到由此而来的可怕的连锁反应。欢迎前国家领导人李宗仁回到北京后，江青称他是“外国特务”。她不喜欢李宗仁，不喜欢他的夫人，也不喜欢周恩来“接受”这位从台湾和美国回来的人的方式。她满不在乎地起的绰号促发了一系列事件，使李宗仁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大部分中国领导人都出席了，江青也非同寻常地到场了。由于坐在有趣的亲王旁边，她决定要让自己高兴起来。她觉得有必要让自己的表演奏效。她笑，她讲笑话，使快活的柬埔寨人甚至更加高兴。随着一道又一道菜，她再三用烈性茅台酒同主桌上的每一位柬埔寨客人干杯，一位在场的大使说：“到最后，她好象站不稳了。”

江青并不特别喜欢茅台酒，但是在这种场合，她把酒杯当作比同僚们高出一筹的手段，并且把她自己置于中柬关系的中心。一位目击此事的外交官说：“我见过的唯一用茅台酒干杯的

另一位中国女性是唐闻生（毛的翻译之一），周恩来为此还亲自批评过她。”江青超出了界线，出了名，避免做了众多领导人中的消极成员。也许，正如这位大使评论的那样，在毛摇摇欲坠的晚年，“她正在寻求宣扬她的优势的机会。”

纽约州的玻璃制造公司与四机部在彩色显像管方面有些联系，他们给部里的官员送了许多漂亮的玻璃蜗牛做礼物。当江青听说这家公司的行为时，她喊叫着问道：“那些蜗牛在哪儿？把它们给我——我要把它们展览出来。”出于对周恩来、邓小平增强中国国际经济参与政策的敌意，她认为玻璃蜗牛是一根套住对手的绳索。她把有关的官员召集到钓鱼台来，解释道：“这是侮辱我们，这是指责我们爬行。”她发誓要把每只玻璃蜗牛送回美国办事处，并制止这笔彩色显像管生意。

官方机构中出现了恐慌。由于江青对玻璃蜗牛作为礼物在美国文化中的意义极为无知，她才得出对这一礼物的含义的推断。也许，美国真的想侮辱中国？……

周恩来开始作调查，材料满天飞，香港商人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也受到了审查。总结报告说：“经调查，我们发现‘蜗牛’在美国是一种工艺品。……毫无恶意。”

江青的举止极为傲慢，同时，她对周恩来和邓小平深怀恶意。现在她变得相当窘迫。

她悄悄地把那些作为战利品而留下的玻璃蜗牛送回去了。而且，她试图销毁一切与此事有关的信件。

江青时常作出排外姿态。她说西方文化“腐朽”而且“淫秽”，她坚持说大庆油田利用“外国设备”是给中国工业“丢面子”，并声称出口中国石油是“把国际能源的危机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救了第一、第二世界的命，却得罪了第三世界。”

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政治家们以“卖国”和“与外国

人有不正常的关系”相互指责是正常的事。然而事实是，江青在政策争议中的立场是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

实际上江青并不象个排外人物。她在习惯上不是个典型的中国人：她爱弹钢琴，爱看电影，爱打扮，并极力抵制社会传统。但是，她也爱说教，有野心；这种结合在她执掌中国政权的环境下，必然导致排外思想。由于她倾向于根据她对西方的可怜了解而把排外思想强加给别人，由于她拥有毛的民族主义来作为自己权威的象征之一，她背叛了她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学到的世界主义和思想开放的价值观，转而成了一个中国沙文主义者。

事情并不矛盾。一方面，她咒骂西方是“色情的”；另一方面，她却喜欢看旧中国的色情小说《金瓶梅》。不过，对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野心家来说，言行一致简直让人笑话。把言行一致留给官僚吧——他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少呢！

在北京西郊香山饭店的一间豪华客厅里，中国所有领事级以上的外交官如期在此等候。他们要听一个重要讲话，为此，他们离开办公桌，带着笔记本来。步入讲台的是江青，她身穿深色套服，严肃地把讲稿放在了主席台上。

江青谈外交政策！如果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那也是可以的。批林批孔运动已经给外交部温和派的工作带来许多稀奇古怪的“干预”。毛泽东离开北京近八个月了，能听到的声音只有江青的。她要做什么呢？

江青静静地朝这批中国外交界的精华扫了一眼，扶了扶眼镜，又微微一笑。她先从心爱的、英明的——退一步进两步——的伎俩开始。她坦率地耸了耸肩，说道：“在外交方面，我是外行，有许多许多事我要向同志们学习。”然后，她便把外交官们钉在了她的权威之剑上。“我只是向同志们传达我在主席那儿听

到的话。大家知道，他很忙，作为党员，整理主席的讲话并传达给同志们是我的责任。”

简直令人难以容忍！她的党员职责并不包括向外交机构传达毛的旨意。可她吸引了听众，“讲话”一词暗示大家，江青打算讲的材料远远不是文件上记载的东西。

江青提供的观点是：世界在不断地变化，只有斗争才能驱散黑暗带来最后的胜利；中国不要“富朋友、白朋友和大朋友”，她寻求“穷朋友、黑朋友和小朋友”；“革命风暴”正席卷每一个角落，为了迎接风暴的到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们应该从里到外“名副其实地红”，应该给他们的外交工作多增添一些革命的战斗精神。

江青看过一些政策文件，她正在拼命想当毛之后的“毛”。通过与她负责的批林批孔运动相联系，她赤裸裸地想把自己的势力伸向外交政策领域，伸向她所知极少的国际关系。

就象《圣经》课堂上一位懂得牢记经典的小学生一样，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来攻击亨利·基辛格：“他的基本观点受资产阶级利益的限制。”她抛弃了毛已认定中国需要美国的观点，认为在中国本上的政界投几颗阶级分析的手榴弹是绝对安全的。她知道毛近来同基辛格之间不愉快。不管怎么说，基辛格是周恩来的朋友，不是她的。

她用儒家布道的方式告诫人们：“慎思，勿怒！”这可是一位在生活中容易感情冲动的女人说的话。香山饭店持续一天的会议，关键是江青在国际理论的新领域中要显示她的力量。要说权威的话，她有足够的毛的指示——或是她领悟到的指示。

演讲中，江青的眼中一度闪着怒火。相当出格的是——她正谈到认为外国人向海外的中国外交官们发射的“糖衣炮弹”（毛称诱惑物的用词之一）——她宣布了她的一个敌人，因为在

北京的私生活不检点，最近被开除出外贸部。他“抵制不了美女装扮的毒蛇。”

毛和其他多数领导人从未这样强调下了台的同僚的私生活。但在江青复杂的头脑中，私生活的不当和政治缺点毫无区别。她自己也扮演过一到两次毒蛇，但是现在已从心中除去了。现在，虽然披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外衣，她照样玩“成者为王败者贼”的简单游戏。只有好人和坏人之分，拥护她的是好人，反对她的是坏人。

江青说话已经象个传统的统治者了。她认为外国人是不可避免的恶魔，可以利用他们，但不要真正尊重他们。中国外部的世界具有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可能占小便宜的地方。江的一切毛主义的字眼并不能掩盖她的家长作风，这跟她的狭隘一样，牢牢地扎根于中国传统之中。

毛泽东和贺子珍（她仍在上海附近的精神病院里）生的女儿李敏结婚之后，江青成功地将她和自己的女儿李讷区分开来。六十年代，当李讷青云直上之时，李敏和她蒙在鼓里的丈夫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并一度被关了起来。

关于毛的儿媳刘松林，江青和毛一直持相反意见。松林已再次结婚，她和她的新丈夫，一位姓杨的空军军官，与毛还有联系，但江青却处处留神不让他们到中南海来看望毛泽东。

江青怀疑比松林年轻得多的杨有野心，他想跨进这个“帝王之家”的门槛，想完全取代毛泽东的儿子、刘松林的第一任丈夫毛岸英。有一次，她当着毛的面尖刻地说：“杨和松林的年龄相差太大了，若是这里面没有某种政治原因，他们不可能真正地共同生活。”江青本来就总是有理。

林彪死后不久的一天，松林和她的丈夫在上海卫戍部队被

拘留了。他们被隔离开来，审问他们所了解的毛—江关系。江青参与了这次审查。松林指出，这是江青策划的，其目的是想知道他们对毛批评江青了解到什么程度。

松林否认她对丈夫讲过毛对江青的看法。她说，他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对“帝王之家”如此之高（或许是低）的交际手段不感兴趣。由于杨只字不谈，而松林的泛泛而谈又满足不了上海卫成部队的审查，对峙状态持续了40多天。江青对王洪文说了这件事（王是一位英俊的上海前纺织工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升得极快），王洪文派了个人来到拘留所。这家伙向杨和松林警告说：“写一份全面检查，坦白交待你们对此事所知道的一切。否则，你们别想出去。”他们被关了将近五个月，才被释放，很可能他们在这期间写了一些东西。

毛泽东和杨开慧患病的儿子毛岸青决心要娶松林之妹邵华。江青对他们也无可奈何。1970年，邵华在北京301医院生了小孩。江青从这件事中看到了危险，这会重新恢复这对年轻夫妻和“帝王之家”的关系。靠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帮忙，江青对301医院邵华的病房进行了事实上的隔离。据这位年轻母亲所述，病房的联系电话被切断，她母亲家的电话号码也被改了。婴儿的父亲岸青正处于精神状况欠佳时期，医院方面在七十天之中音信全无，他甚至得出结论，邵华和孩子肯定双双死亡！

与此同时，江青的同父异母姐姐李云霞在六十年代搬出中南海，到清华大学跟她儿子王博文居住。李云霞在清华大学的邻居解释说：“李讷和李敏长大后，毛家再也不需要她了。”事实上，因为她不屈不挠地忠于江青，所以她也卷入了这个家庭的紧张关系之中。对她的离开，毛没有表示反对。

李云霞搬进清华大学与儿子王博文一起生活，她成了江青的秘密联络官。王博文曾和刘松林同时去苏联留学，现在是俄

语教授。在王光美受挫以及后来清华大学的极左组织皈依于上海的激进派期间，李云霞为她著名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做了一些工作。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已32岁，他现在已是炙手可热的政界人物了，把“江阿姨”奉为他的领导。作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毕业生，他一跃成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在经济发达的东北，他是上海激进派的主要盟友。

正是当辽宁省委宣传部长的毛远新，帮助江青于1973年在学校里发动了“反潮流”运动。这场运动的英雄——一个不答卷，而交了一封信的学生，抨击了有关考试和教科书的整个制度。这个英雄名叫张铁生。江青喜欢这位年轻人的精神，（他扬言：“我决定的主意就是牛也拉不回来。”）而他也喜欢江青的无政府领导作风。毛远新给江青的“装甲知识分子”圈子带来许多张铁生之类的人物。

武后有一个能干的、野心勃勃的侄子武承嗣，他自认为是皇后的皇太子。姑侄暂时相互利用起来，这与江青和毛远新是一样的。江青把他认作是自己的皇太子；不管是因为毛冷落他，还是因为他认为伯父是一只正在下沉的船，毛远新从“江阿姨”的领导中找到了刺激而疏远了伯父。无论后来北京说江青什么，倘若江青没有一点儿政治才能的话，一个具有毛远新那样的能力和经验的男人肯定不会效忠于她。

李讷1965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时，毛给她写了一封令人毛骨悚然的信：“将来，痛苦会折磨你，你将遭受许多挫折。”这是事实。尽管李讷在《解放军报》和北京市身居高位，她还是变得郁郁寡欢。一位在工作中晋升得如此之快的年轻女性是很难找到合适的丈夫的，如此的状况对毛和江的女儿来说是太痛苦了。快到三十岁时，李讷开始担心没有人会娶她——除非她降

格找个农民。

从文化大革命中退出时，李讷的高职位遇到了麻烦，作为下放干部，她住进了农村。在那儿，她嫁给了一位农民。毛并不在意，江青可不高兴了。江青认为，李讷应该跟她的母亲一样有雄心，有独立感。她希望李讷嫁给一位能助她上进，同时又避免依附于他的男人。不过，李讷是另一代人，她缺乏江青的雄心。江青对李讷的期望超出了这位年轻女人所能承受的。

李讷——现在是一个女儿的母亲——身体欠佳，以此为由或别的什么原因，她放弃了军队报社和市政府的职位。江青试图劝她与丈夫离婚。不过，适于江青的逻辑并不能吸引李讷；毛一点也不在乎他的女儿“不求上进”。就离婚问题，江青和李讷吵过四次。李讷最终还是同那位丈夫离了婚……

江青利用中间人来劝毛给她上海的同僚王洪文安排新的工作。中间人以王海容为主，她是毛的表侄孙女，现已升任外交部长助理。

一位常见到江青和王洪文在一起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说：“王洪文完全受江青的支配。在一次为我举行的招待会上，王洪文准备祝酒时，江青放肆地戳戳他的肋骨，鼓励他。”这种举动给这位来访者留下了他们关系暧昧的印象。江青指望王洪文——年轻、忠诚，而且还有幸得到毛的赞许——将来当江青王朝的主管大臣。

江青把王海容和毛的英语翻译唐闻生召到钓鱼台十号楼。这两位不可分离的女人对患病的毛所起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比正式渠道还要大。江青希望这两位年轻女性给毛带个口信：被疏远的妻子恭敬地请求她衰老的丈夫在国家机构中给王洪文一个副主席职位，以和他的党的副主席职位相称。这难道对这位

年轻有为的人不是巨大的鼓舞吗？难道不是预防盘踞在周恩来的国家机构中的邓小平的积极措施吗？

江青对中间人的选择也许不明智。这两位女人在毛身边，她们对江青不太满意。作为“上层女人”，江青显得有些傲慢，而且她们还常听到她们敬爱的老板抱怨她们的话。毛拒绝了江青让王洪文担任国家职务的建议。也许他认为是江青自己想要一个高职位。

在一系列政府会议之后，江青焦虑不安，再一次派人去找王海容和唐闻生。周恩来从医院里蹒跚地走出来，对这些会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江青希望从她的钓鱼台所在地向中南海总部她的丈夫转达她的怨言：若干同僚正在滑向右边，而且不断把她找出来当靶子。

王海容和唐闻生把江青的口信带给了毛。毛对他信赖的两位年轻女性喃喃地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有责任感的王海容向毛提出一个委婉的问题：“对您怎么样呢？”毛继续向这两位晚辈吐露衷曲：“我不在她眼中，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弄翻脸的，现在人家都在敷衍她，我死之后，她会闹事。”毛似乎想到了他之后的继承权摆脱不了的关键问题。

毛在长沙时，王洪文赶来纠缠他。王谈了周恩来的“野心”，来自邓小平的危险，以及江青的上海激进派的冤屈。他暗示——这是江青的主意——总理不是真的病重，而是在医院打发时光，以密谋提拔邓小平并反对毛的既定方针。难道主席想不到，该让张春桥来当总理吗？

毛是想不到，也不打算想到。他感到江青和她的三位主要同伙——他开始称他们是“上海四人帮”——在对他施加压力。没有什么比使一位行将就木的人怀疑自己正受胁迫更感到反感

了。无疑，毛拒绝提拔王洪文。

尽管使用了常使她名誉扫地的高压手段（她本来以为它带来的名誉会和她的身份完全相配），江青还是开辟不了任何她自己的政治地盘。这时，她不依靠毛的权威了。

毛对陈永贵——一位对激进派持同情态度的农民出身的政治家说道：“你经过钓鱼台时，当心别让‘四人帮’成为‘五人帮’。”他更加怀疑“上海四人帮”了。

尽管党和国家的多项预算为江青的大笔花费——工作人员、旅行、别墅——开了方便之门，她们需要为她的服装和照相设备筹备资金。毛不关心金钱，他很富有，因为他的著作给他带来丰厚的稿费，但江青却常常手头拮据。毛曾一度拨给江青许多钱。但是江青感到麻烦的是，她每次取款时都不得不应付毛的助手张玉凤。张玉凤知道江青的每一笔花销。

一天晚上，江青取款后对张玉凤辩解说：“小张，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大笔钱，但就我来说，这还不够维持我生活的一个零头呢。”

江青希望毛的侄子毛远新把书款拨到她的资金中，他是个理解“阿姨”的年轻人。但是毛不会让张玉凤撒手不管。毛喜欢远新，可他也知道，他的侄子亲近江青的程度至少和亲近他一样。1975年1月，当江青与毛在金钱方面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困难时，她不得不给张玉凤写了张条子：“我能从那笔款中取出八千元吗？”显然，她为买灯光和其他昂贵的照相器材借了钱。她给毛的秘书写的这封短信综合了她性格中所特有的宽宏大量及强横粗暴。“我后来把设备作为礼物无偿地送给中新社了。”她当然可以要钱。不过，她确实认为党和国家的利益应该置于首位，因为这套设备可用来完成重要任务。

“所以，我必须还这笔八千元的款子。”江青平静地对张玉

风解释这笔她实际上不是必须要还的钱（数额是巨大的，比当时大部分中国人十年的工资还要多），“不过，还了钱我心里才会踏实。”因此，她要从她的资金中转出八千元。“如果取不出八千元，主席不忙时，请主席给我八千元现金就够了。”

江青没有全部拿到八千元。1975年春、夏二季，她从毛那里几乎没得到钱。毛开始比以前更看中邓小平了。他给江青写信说：“我重病在身，81岁了，也不体谅。”

江青提议拍一部“王铁人”事迹的电影。王进喜是大庆油田的工人，意志坚强，政治上富有战斗精神。可是影片拍成后，她又不喜欢了。规规矩矩的创业者、富有理性的计划以及严守党的传统——在她看来都不是美德。它缺乏“革命的乐观主义”情调（比如高呼“天当被，地作炕”），会被“右派”们公开取笑。

更糟的是，影片让主人公严厉批评领导人“象个爱说话的老太婆，整天在你耳边唠叨。”1975年2月25日的一份材料中，姚文元讨好江青说，主人公说的话看来“完全是指你。”江青提出十条批评意见反对这部电影，以这些意见她就可以在春天便把它扼杀在摇篮中。

但是，剧作者反驳了她。张天民利用毛和江青之间的紧张关系，给毛写了信，大胆地谈了他的电影。毛在张天民的信中潦草地写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毛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这并不能减弱他那难以辨认的批语的一贯正确之处。他还补充说：“不要求全责备。”老人家在猛烈抨击他妻子的不懈努力。

江青对张天民给毛写信恶狠狠地骂道：“他竟敢告老娘的状，但老娘不怕。”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令人惊讶的材料、电话

及深夜会议，参与的有张春桥、姚文元、文化部长于会泳和其他一些核心人物。江青说这部电影“技术行话太多”，“情节不连贯”，更有甚者，“曲解了毛泽东思想”。不过，核心问题是那偶尔骂骂的“爱说话的老太婆。”

尽管有江青政治班子的努力，但毛的批示是不能反对的。江青退却了。9月，江青在大寨大队的发言中咕噜说：“尽管我提到了这部电影，但那十条罪状实际上不是我搞的。”

与康生不同，江青在收回自己的成见时，不可能掩盖她真实的感情，不可能把老虎叫做小狗。面对包括这部电影的剧作者在内的广大听众，她大骂：“该死的，竟敢攻击我！这个张天民给主席写了封信。”她正在加重自己的真正忧虑。“他背后肯定有支持者——是些坏蛋。”她指着剧作者问道：“你多大了？”张天民彬彬有礼地回答说，他四十六岁。“你还是个孩子，你想诽谤我，对不对？好，今天老娘就教训教训你！”“谁给你出主意向主席批评我的？”江青仍旧当着许多观众的面，厉声问道。

“没有人。”张回答。

“老天在上，给主席回话，如果你有胆量给他写的话，就告诉他你撒了谎！”

在钓鱼台17号楼一次激烈的会议上，江青还想证明她在这场风波中起的作用。她得意洋洋地宣布：“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主席，主席未作答复。后来他把第二封信由邓小平转给了主席。”江青认为自己揭露了对她不公正的根源。“是邓小平强迫主席写了这个该死的批语。”

张春桥给他的老板撑腰。他总结说：“主席用词很慎重。他说无大错，不过，我们能搞清楚，它确实有中错或小错嘛。”

毛本人也觉得江青变得太爱说话了。那年年初，他引用了古代一条精练的短语“三多一少”。这是指“周恩来多休息，邓

小平多工作，王洪文多学习，江青少说话。”这表明了毛对左派的愤慨态度。对这些话——剧作者张天民肯定也听到了——毛显然又补充了一句：“她要把脚彻底收回去，耳朵要始终张着，不过嘴要闭上。”

由于同毛有这种紧张、困难的关系，江青的政治处境充其量只能是挥发性的。一方面，自林彪垮台后，她无可非议地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第二号人物的主要候选人。这尽管危险，但极有诱惑力，并因此而有朝一日接毛的班。另一方面，作为女人，她自我感觉到当领导人的夫人——如她所说是他的“助手”——所受到的令人发狂的约束。对任何一位第二号人物来说，想开创独立形象是相当困难的，但更难的是这位等待者是中国人的夫人——或任何一位夫人。在反毛的最后行动中，她是否应该果断地采取自己的立场？或者，只有凭借她的丈夫，极权才能降临到她身上，因此，她应该做忠实的妻子，毛主义的楷模？

江青总是在作“助手”。如果她在毛主义的共产党机构与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一个本来就能推动她去探索的主题——之间建立了联系，并因此而投合了中国妇女的心意的话，也许她本来能够把她暗中积累的反毛情绪掩盖起来。这肯定不可能，而且她也不会尝试这样做。结果，她成了个不谨慎的、缺乏远见的人，背离了她的自我所具有的魅力。

无疑，她耳边充斥过那些语重心长的或吹毛求疵的批评。她应该一心一意地照顾毛！光天化日之下，她在妇女干部中鹤立鸡群，发表她的各种观点，这是为什么？她应该呆在家里织毛衣！

许多人把江青看成是诡计多端的皇后。七十年代中期，她这样的人——回顾一下在上海戏剧界，她作为唐纳夫人所享受的乐趣——正在获得新的独立。但是，未开化的、保守的舆论

并没有——在这不同寻常的、特定的政治领域——承认她作为独立者的权利。“老娘”扬言说她并不怕，不过，她不得不把自己看作“老娘”未免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1975年中期，毛在谈到江青的三位上海同伙时对她说：“不要搞‘四人帮’。”（对这个四人集团有这样一种说法：“江（青）头，张（春桥）手，王（洪文）腿，姚（文元）嘴。”）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毛批评了他夫人的阴谋诡计和极左观点。尽管江青受到伤害并很恼火，她还是写信做了自我批评。后来，她对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人士说：“因为我不想影响团结，所以承担了一切非难。”

江青觉得邓小平正在利用毛对她的批评，把它夸大，并以此企图摧毁上海激进派（这是她在想象中极力要对邓采取的方式）。她指出：“主席一直在批评双方，但（邓）从来就没有提到过对他和他的同伙的批评，而是继续夸大对我们，特别是对我的批评。”

江青常常忍不住要咒骂邓小平。有一次，她大胆地对自己的一位同伙宣布：“中国有个叫邓小平的国际资本家代理人。”缓了口气，她又承认道：“可是，我们的主席却一直在保护他。”

毛是一口大锅的锅盖，他阻止了锅中的相互倾轧。他可能一度极希望邓小平，后来是华国锋，能成功地与江青合作（而且邓和华可能一度也这样做过）。

江青决定到大寨去参加一系列政治会议。会上，高级领导人都在激烈地争吵，同时又都在尽心讨好毛。同时，他们又凌驾于毛之上而对中国公众所忧虑的毛之后的未来自告奋勇。江青乘专列来到山西省的这个山区小镇，随行人员有一百多位。她要求在宾馆挂上黑窗帘以挡住每一丝光线，还要安装新的日光

灯，因为现有的那些启动时的嗡嗡声太响。她还要求，在她逗留期间，禁止机动车辆驶入这个大队。

为了联络自己与当地人的感情，江青忽发奇想，要在附近一座虎头山上建一防空洞。在摄影师的陪同下，她亲自在开土动工时挖了5分钟。

“我这个人天天挨骂！”江青在大寨讲话时这样叫嚷，“共产党员还怕骂？算什么共产党员？”她的那些耐心的听众和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花费了巨大开支，从各个城市赶来听她的周末发言。她向这些人表露了她的痛苦和反抗精神。“最近在北京我刚跟他们斗了一盘。我就是不怕骂。”

江青向她的听众总结了她的策略，“修正主义分子”和一些军人不是正在诋毁文化大革命造就的文化艺术成就吗？让他们中伤吧。“不过嘛，嗯，我又要骂人了，他们简直是混帐王八蛋。”

江青声称：“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她庄严地挥了挥手，又用食指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左派的领袖就是鄙人。”

在大寨的政治斗争庆典——对外说是农业会议——中，邓小平、华国锋及其他人的发言都发表了。但是当江青的发言稿送到毛的办公桌上时，他表露出强烈的反对态度，很瞧不起它。他加的旁注说：“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毛不仅不喜欢他夫人的讲话，也不喜欢她在大寨大队的整个行程中所表现出的哗众取宠的本性。

康生患病进了北京的一家医院。他的秘书传话说，他要见王海容和唐闻生，她们来到这位善于干秘密和肮脏勾当的可怕的头目床边。康生解释道，他快要死了，最后还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毛主席。

康生喘着粗气，向这对年轻人说：“江青，还有张春桥，历史上是共产党的叛徒。”他还说，“江青给我看过张春桥叛变的材料。”至于江青的问题，康生非常清楚她在三十年代与蒋介石势力勾结的内幕。他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在向主席作全面汇报之前，先去拜访两位老干部，他们能提供江青和张春桥政治上堕落的更详细的材料。一个叫吴钟兆（音译），三十年代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现是北京一个博物馆的干部；另一个是王观澜，他是江青在上海的密友徐明清大姐的丈夫，徐大姐曾和江青一起从西安到延安。

江青和康生的密切联系建立在同乡观念之上，并由多年来的暗中互助而巩固，即使是这种关系也没能经受得住阴谋、猜疑、背叛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康生认为，江青不会接替毛，所以他努力保护自己的名誉。

康生和江青相互间竟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康生欺骗、操纵和谋杀，他是冷酷的权力工程师，他很清楚自己在干坏事。江青则过于沉溺于自我的表现。与康生为扩充自己的权力面进行的有计划的努力相比，江青对自我表现、自我辩白和报复的追求几乎太幼稚了。不过，这是一种绝对的、贪婪的追求，与康生清醒地使用各种手段相比，它具有同样的破坏性。

王海容和唐闻生对卷入如此可怕的激流是否合适产生了一连串的怀疑。她们认为，在见吴钟兆和王观澜之前，应该向外交部长乔冠华和他漂亮的妻子章含之请教一下。乔冠华是她们的顶头上司，章含之则是毛泽东的英语教师。1975年夏的一个炎热的夜晚，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到外交部长家。他们诚挚地劝阻了两位年轻的密使。乔自己并不认识王观澜和吴钟兆，当然，有些材料涉及到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多彩的私生活，但是对她政治上曾叛变一事，乔冠华和章含之则一无所知。

外交部长及其精明的夫人明智地作出了反应。后来，章含之汇报说：“我们劝王海容和唐闻生别把康生的话带给主席。我们认为，倘若康生真的有事想对主席说，他可以口授给秘书。我们觉得没有理由去鼓励这两位许多事都不了解的青年同志来转达他的话。”

王海容和唐闻生从自己的立场提出了她们的看法，党组织无意“恶化江青事件”。但是，她们应该“置身于政治中心之外”，并“隐居以度残生”，仍是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王海容和唐闻生暂时保守了秘密，未公开这一爆炸性事件。

1976年1月的一天，举国恸哭：周恩来死于癌症，终年七十八岁。他的逝世令每一位认为他不会这么快逝世的人都难以置信。百万人在寒冷之中默默地注视着送葬的队伍，灵柩四周披着黑黄相间的玫瑰花丛。总理先于毛去世对中国是个不幸。如果周恩来在世的话，本来可以平息毛泽东去世的影响。

林彪死后，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处于冷漠的对抗状态。四、五十年代，江青的谦虚和魅力吸引了周恩来，但是，当江青变得象武后一样冷酷而且精于算计时，周对她的好感消失了。当江青躺在莫斯科的医院倍受癌症的折磨时，周恩来撇开公务，甚至超过了毛泽东委托他的范围，努力想使她高兴起来。但是，当周恩来与癌症作斗争时，江青的反应却很冷漠。

周恩来的逝世对江青来说是个天大的恩赐。不久，她对一帮忠实的追随者说：“我原来是个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我出来了，可以说话了。”

周去世几个小时后，江青妄自尊大地大步走进医院病房，惹恼了其他一些领导人。她叫邓颖超为“我亲爱的小超”，而对病床却难得扫一眼。在场的人，包括医护人员在内，都感到很吃

惊。因为，只有周恩来本人才对他夫人用“小超”这一昵称。

看到江青在床边没有脱帽，九十高龄的朱德（他在文革中被免职后又重新平反）忍不住了。当领导者们从周的床边离开后，他愤怒地对江青吼道：“苍天在上，难道你的缺德事还没做够吗？你损害了中国革命！”

周恩来的灵堂设在紫禁城西侧一间装饰肃穆的大厅里。数百万人在电视中看到了国家领导人在那儿举行的悼念活动。邓颖超接待前来吊唁的高级领导人。邓小平走近灵柩时，她深情地接受了他的问候。而对江青，她则毫无表情。江青走到灵柩边，又一次没有脱帽。中国各地都注意到了这一公然的藐视行为。沈阳的一名军人抓起一把椅子扔向电视。在广州，一群从北京路街道的电视中收看现场转播的观众，也齐声喊：“揍死她！揍死她！”

有一个细节没有向广大电视观众转播，但是，一个目击者注意到后，感到难以置信：江青暗黑色的外套里面竟然穿着腥红色的内衣！

江青和邓小平在政治斗争中摆好了架势。在北京的那个充满着谣言、恐惧和悔恨的春天，江青在两个方面优于邓小平：周恩来的死削弱了温和派的力量；而毛的心情与1975年完全不同，他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和他的政策，对江青却恢复了宽容的态度。

江青和她的盟友给邓小平取代周恩来当总理的任命设置了障碍。作为回报，温和派阻止了江青让张春桥担任这一职务的建议。受毛保护的华国锋被任命为代总理，以此作为折衷的办法。比起较为能干的那些人，华国锋的敌人比较少。

尽管江青不太清楚该如何对待和蔼可亲的华国锋，但是，她感到她的政治地位比1975年稳固了。她要继承毛的希望之火再

一次点燃。

中南海的来宾们发现，江青在逐渐向毛的住处靠拢。她似乎在她的老房子——紧挨毛的住处——呆的时间比过去多年来都更多。毛远新离开了他在沈阳的高级职位，成了伯父工作人员中真正的头目。毛现在很少离开他的院子了，这增加了江青的影响。她和毛远新监视了所有的电话和来往的文件，而且，用一些更顺从的翻译取代了他们不喜欢的翻译。

江青陪同应毛的邀请来华的理查德·尼克松夫妇来到剧院。这一次，周恩来不再给她的迷人之夜布上阴云。歌舞节目包括《台湾同胞我们的骨肉兄弟》，表达了北京“解放”这个岛屿省份的决心。歌一唱完，江青便跳了起来，使劲鼓掌。帕特·尼克松也跟着她一起鼓掌，可是她注意到，她的丈夫只是略微欠身离开一下座位，然后又坐下了。尼克松夫人突然坐了下来，只有江青还在继续鼓掌、喝彩。

有一首悬挂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的诗言简意赅：

某女士真疯狂，
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
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
好景终不长。……

成千上万的市民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惊讶地看着这

首攻击江青的诗。时值纪念故人的清明节，为纪念周恩来摆放的花圈和颂词变成了对极左分子的抗议，这是周逝世三个月以来最强烈的抗议活动。

这次活动不仅存在着众多对江青潜在的愤怒情绪，指责她思想狭隘，而且，对中国将会走向何方表示忧虑。一幅标语用硕大的毛笔字写道：“别让江水冲走对总理的怀念。”它用了双关语嘲弄江青的名字（江水指江）。有的诗还颂扬了毛以前的夫人杨开慧，这又是对江青的一记耳光。

江青躲在中南海，听到了广场形势的汇报，她感到忧虑。不过，其程度不象她以往那么强烈。对女性统治者根深蒂固的偏见，她无能为力。然而，她仍旧低估了自己与周恩来作对的危险。

纪念周恩来的这些天，对人们有特殊的含义。自行车不会丢失，纪念碑附近无人吸烟，乘公共汽车去广场和从那里出来的人目不斜视。可以说，这起事件标志着舆论作为中国政治的独立因素诞生了。但是，江青的政治判断却太狭隘了。”

她对舆论的理解从来就不伟大。一年又一年，她的这种理解已经不是她在宫廷的走廊里想出的阴谋，而仅仅是操纵这种存在于那些走廊之外的情绪。不明智的是，她想把花圈和挽联从纪念碑前撤走，终于，她如愿以偿。无疑，毛泽东点头同意了这件事。

结果，一场激动人心的、有秩序的悼念活动酿成了一场暴

• 面对挑战时，江青不具备武后的远见和冷静的自制力。有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攻击了武后的性生活和朝政治理，神色紧张的大臣把文章带给武后看。她看后问：“谁写的？”回答说是一个参与了反武联盟的学士骆宾王写的。听后，武后马上说：“这要怪宰相，他把一个有才能的人打入冷宫，而不提拔。”当自我受到震动时，江青就没有这种超然态度。

力。它持续了十四个小时，至少涉及一万人。汽车被烧毁，人们都在动武，许多人受伤，有些人惨死。

尽管江青经常提到她与“群众”的联系，但她只是把他们看作玩具和小丑。在政治舞台上，需要的时候，就把他们移来移去。现在，这些玩具和小丑希望象人一样走路、说话和思考了。

江青所能攻击的只有邓小平，尽管天安门广场事件不是这位东山再起的副总理策划的。

政治局于惊慌之中召开会议，江青带头极力要求采取强硬措施。毛不在场，但他通过他的侄子毛远新转达了一项指示：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这个决定被“一致通过”。尽管邓小平不是毛的接班人，但江青也决不会是；而且，她似乎没有认识到她的未来所面临的灭顶之灾，这是广大民众原有的呼声。

江青的对手受到威胁。一时间，政策的春风吹向她这一边。文艺界的官员们被召集起来以协助她策划丰富多彩的戏剧表演来纪念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江青通过她在清华大学的小组，包括她的同父异母的姐姐的活动，说服清华大学新开了一门介绍武后和吕后事迹的历史课。

招待外国领导人时，江青摆出的架子使人回想起她那伟大的1974年。一天晚上，会见过江青之后，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说：“她……从不放过每一次向这个或那个党的领导人发号施令的机会。”他和江青以及她的同伙看过一场足球赛。过后，马尔登谨慎地说：“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江青是从哪里得到‘唠叨婆’这个绰号的。……”

康生告发江青的报告突然摆在了毛的桌子上。章含之在写给毛的这封迟到的信中说：“去年夏天，我们听到了捏造的对江青同志和张春桥同志的指控。现在我想，这一切都是邓小平导

演的。”这位外交部长的夫人这样解释。她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借口，因为邓小平已被打入政治的底层，一切罪名都可以往他身上推。

章含之讲述了她所了解的全部情节。康生临死前为了挽救他的历史地位而对江青同志反戈一击（章含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康生已于1975年12月死去）。信件的结尾，她在找王海容的错。“整个事情平息下来了。但后来我们看见一位老人蹒跚地从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中走出来，而王海容恰好路过，我问她这位老人是谁。她说，‘他是吴钟兆。’我必须说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有意安排吴来参加宴会的。”

尽管章含之的报告以一种牵强附会的方式送到毛的面前，但它确实包含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毛最亲密的副手、江青最长久的盟友之一在临终前说过，江青在三十年代曾是个叛徒。毛把这个爆炸性的事件搁置一旁。从此，对康生的指控也没有做过任何调查。

外交部长的夫人同时也把整个事情告诉了江青本人。江青向章含之怒气冲冲地说：“这个狗杂种，在各方面都超过林彪。”“被你自己的人打击是特别可怕的。”

周恩来去世了，邓小平被打倒了，中庸者华国锋被选来接受了毛给予的职务，这样，毛似乎又一次否定了有哪一个人能真正继承他的想法。对于江青，难道她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甚至在许多方面被人憎恨？

然而，要给自己一次机会，江青既没有能力，也不够圆滑。她知道如何玩弄宫廷政治，但不知道如何操纵国家政治机构。

江青在一天之内对北京的三个单位作了旋风般的视察，它们全部是她的后盾。江青提醒身边的人，这些视察要在新闻界

报道。她将代表毛泽东出现在公众面前，以表明她在国家忧患时期与人民团结一致。她身着青衣，看上去完全是个忧心忡忡而又趾高气扬的第一夫人。她来到中新社印刷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大谈她对中国未来的希望。

当天下午，一位北京记者写了快讯，题目是：“江青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亲切慰问首都人民。”姚文元是全国报刊的权威，但即使是他也不同意这篇自吹自擂的文章。江青的随从企图把它刊登在《北京日报》上，这是份市级权威报纸。这篇文章由于它的自吹自擂而被扣住了，编辑们故意拖延了很长时间以致使它失去了生命力。

江青在小靳庄对她的那些着迷的、极有水平的农民听众说：“去年夏天我就想来看你们，但他们不让我来。”现在，她自由了，她喊叫着——但她的声音听起来并不自由自在。“我不敢给你们送文件材料了。”她告诉农民们，不管他们对北京的争吵详情是否真的感兴趣。“因为他们说我一直在给你们送秘密材料，还说这是犯罪行为。”

她在村子里住了几天，也许是想摆脱她在北京时的紧张情绪。由于她对饮食十分挑剔，她让厨师们往来穿梭于京津二地，带来一些天津地区没有的中药和食品。晚上，她发表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讲话。

“目前在政治局，我是一个人的组织，单独一个人。”她告诉默不作声的农民们。这句话的用意何在？她继续说：“分配政府职位时，他们不知道怎么安排我——他们只好接收我。”江青的意思是，作为女人，她是未被政治局理解的一分子。“那里笼罩着一种强大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她脱口而出。

江青的话题随随便便，一会儿是北京的形势；毛主席生命垂危；一会儿是小靳庄的形势；她批评当地让一个男人，而不

是一个女人来主持他们的政治和文化会议。

她宣布：“在生产领域，妇女是根本。”这样，她接触到了实质性问题，并设法给她的观点披上了合适的马克思主义外衣。“因为劳动是生产力的基础，所有劳动都来自妇女。”她力图把再生产的事实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权理论。这是妇女在医院中创造人类的历史。她总结说：“男人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仅仅是一滴精子。男人应该走开，要让妇女来接管管理方面的职务。”

9月2日，江青来到大寨这个贫困山区。她宣称：“我到这里来是同修正主义错误路线作斗争的。我是毛主席的秘书，他手中的一切也是我手中的一切。”

大寨是左倾主义的堡垒，在那里，贫穷被视为光荣。村民们对江青要有七辆汽车护送、四匹马供她骑着游玩感到敬畏（事后又感到令人难以容忍）。那些非常了解江青的人认为，她要么是陶醉于她眼前冉冉升起的最高权力之雾，要么是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此决定要孤注一掷。

她问：“我的防空洞怎么样了？”这是指她去年的规划。哎呀，那些执拗、务实的大寨人已经把她的防空洞改成猪圈了。他们认为虎头山上有那么多的沟梁和岩洞，防空洞也就不必要了。“你们怎么能毁了我的防空洞？”她尖叫着，刺耳的声音吓得鸡飞狗跳。“肯定是邓小平命令你们这样做的！”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邓小平。”给江青带路的妇女惊恐地哭丧着脸说。

江青很恼火，但是几分钟后她就平静下来。帮忙挖了一会儿水渠后，她累了，放下锄头说：“我出了一身的臭汗——来个人替替我吧。”当地的妇联主任走过来拿起了锄头。江青厉声喝道：“不是你，你接替我不合适。”

江青在大队供销社大手大脚地买了一些她不需要的东西。

之后，她说要给售货员们讲话。她指示说：“拿张纸来，写下你们父母的姓名。”看到大多数人都把父亲的名字写在前面，她告诉他们这是不对的。她大谈中国早期的母系社会，那时的人尊重他们的母亲，却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她骄傲地说：“女人掌了权，你们首先要想到自己母亲的名字——还要造你们父亲的反。”

江青在天津和大寨的表演有一种躁狂感，日益增长的紧张情绪似乎使她脆弱不堪。跟武后曾经有过的感受一样——或升为皇后，或沦落为妓遭受耻辱。江青感觉到了这种处于刀刃边缘的压力。

同武后一样，她有非同寻常的雄心。也同武后和吕后及其他中国的女政治家们一样，她在作垂死挣扎，以挽救其受“压制”的命运或可能的声名狼藉，这是许多没有丈夫或儿子可作依靠的宫廷妇女的命运。正是这种不安全感 and 缺乏政治手腕，才使得江青在1976年夏末的活动中带有不顾死活的特征。

1976年9月5日晚九点半，江青在大寨住宅里的电话铃响了。北京来电，毛泽东已神志不清，江青应该马上回去。已经上床的江青起身收拾了行李，在等候去石家庄的火车时，她打了桥牌，还兴高采烈地聊天。这是她的神经质，不是中国官方后来指控的无情无义。

石家庄到北京的短途旅行之后，她驱车驶入中南海，马上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我什么都不怕。”她不由自主地反复说道。可是实际上她确实很害怕。

在某种程度上，江青已是摄政皇太后了。毛泽东已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而她则被普遍认为是他的政治影子。但竞争者还存在。另一个可能的继承者是华国锋。令江青惊慌失措的是，

一天晚上，毛与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会见后，当面给华国锋写了一张条子。他在上面写道：“你办事，我放心。”竞争者中还有邓小平，虽被免职，但在军队中还有影响。他有能力纠集所有仇视极左的势力。

江青，摄政皇太后；华国锋，温和派；邓小平，守在沼泽地的造反者。

毛泽东的住地气氛沉重，这是难以承受的悲痛。工作人员泪流满面，为他们的主席，也为他们自己。政治局成员来来往往，轮流在这里值班，在极度悲伤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他们的担忧。这种紧张感就象紧箍咒一样，对此，江青比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承受。

她召来很多的助手，后来又认为她受不了这么多人。她喊道：“不值班的都给我出去！”使新来的人困惑不解。她闯到卧室，给毛泽东擦背，轻轻活动他的四肢，并给他擦上爽身粉。接着她又跑出房间，觉得必须首先把注意力从这里转移出去。她给文化部打电话，要来几部影片。

指责江青的人可以轻易地说，她在后三天中做错了事。某些医护人员抱怨道：“她不该给主席翻身。她这样做时，主席的脸都青了。”极可恶的是，她对悲痛的医护人员说：“你们应当高兴！”秘书张玉凤守在毛的床边。她后来颤抖着说，江青在9月6日还“为钱的事来纠缠主席。”事实是，江青想还给毛她以前从他那里额外支出的钱，这无疑带有一种负疚感。

确实，她的举止易于受到攻击。她只是不知道该做什么。而且，实际上她为毛没有可做的事情，也许她为自己的政治前途也没有多少可做的事。但是，说她对毛的奄奄一息“幸灾乐祸”就可笑了，她比其他任何人都需要让毛活的久一些，也希望如此。正是由于她对紧随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近乎恐慌，才

使她的行为易受指责。

9月8日晚，由于受不了紧张的神神经刺激，她来到中新社。她和几位亲信在防震会议室找来这位记者或那位编辑。她担心这个通讯社有受命来暗算她的“特务”；她希望创造出“支持者”，当考验的时刻来到时，会站在她的一边。这是一次毫无意义的、破坏性的袭击。

江青很不满意地回到中南海。夜深了，但她没有上床睡觉。这里灯火通明，医护人员聚在一起默不作声。大多数政治局成员都在场，还有毛的两个女儿和侄子毛远新——他现在还活着的一个儿子毛岸青却不在，因为江青不想告诉他这一危机，担心他的大脑受到刺激。忙碌的笔杆子们正准备着第二天的讣告，他们决心让这一政治震撼以最佳方式为人们所理解。开头一句便是：“毛主席逝世了。”

灵堂无数的花圈旁，伫立着成千上万的市民，每个人都试图哭得比别人更响。花圈中，有一个菊花编制、配以绿叶松柏的巨大花圈，上面的挽联是：“深切悼念敬爱的导师毛泽东主席，您的学生和亲密战友江青。”* 江青作为遗孀，她不象邓颖超悼念周恩来那样的悼念毛。她从来不是只把自己看作毛泽东的夫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寡妇是一只单翼小鸟，江青一想到这一点就怕得发抖。她是以同志的身份来悼念毛泽东的。

江青亲手制作了这个花圈，坐着哭了好几个小时，用剪刀把花剪好，然后紧扎在一起。她的政治盟友认为，她本来应该利用这些时间来磨利刀刃，以挥向华国锋、邓小平和其他人。

* 挽联上的签名还有毛岸青、李敏、李讷、毛新宇（岸青的儿子）和毛远新。江青和其他的家庭成员在名单排列上还有过一场争吵。江青不顾他们的反对，把毛远新的名字加进来；而他们（尤其是岸青的夫人邵华）也不顾江青的抵制把岸青的儿子的名字加了进来。

一星期后，百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江青缓步走出，就象在一艘高大帆船的甲板上移动。轮廓分明的白净面孔与熨烫平整的深色中山装形成鲜明的对比，她凝视着前方。这时，华国锋在致悼词，葬礼主持人王洪文探身察看着华国锋圆胖的手中的每一页稿子，似乎在核实这些话是否与前一天晚上政治局激烈的会议中苦思冥想出来的悼词一样。

江青和她的同伙不无势力。政治局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支持她；极左阵营中有上海和东北的大部分势力——中国的两大工业基地；还有中国十一个军区中的五到六个军区；毛罩在她头上的光辉比其他任何人都多。

在毛去世后极度悲痛的日子里，江青的正面对手是华国锋。但是她知道，邓小平及其支持者团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她最初的行动之一是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华国锋追问：“讨论什么呢？”江青厉声说：“我不能告诉你。”会上，她提议，邓小平应该被彻底清除出共产党（原被允许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但她的建议未被通过。

1976年，极左派和折衷的左倾分子之间的联合松懈了，这是警告的信号（中间偏左的人物如汪东兴和陈锡联）。由于感觉到毛的去世会把中国吹向右边，折衷的左倾分子一步步地同华国锋、同军队的主要势力、同在沼泽地里策划的温和派们联合起来。

转而反对江青之前，汪东兴犹豫了一些时候。他后来说：“幸亏华国锋同志和叶剑英元帅比我果断。”

毛远新支开了坐立不安的秘书张玉凤。在他的协助下，江青急忙浏览了毛的手稿。她尤其想找到毛临终指示的原稿，象“按既定方针办”这一类的话。然而，秘书张玉凤打电话告诉了

汪东兴所发生的事情。这使得江青和华国锋大吵一场，江青当时大吵大闹，“你想甩掉我——好一个主席对你的善心的回报！”在这之前，江青和毛远新在离开毛的住宅时把几份文件装在信封里带走了。

每一方都悄悄地纠集了一定数量的军队，每一方都为即将来临的胜利准备了宣言。江青的《告党和人民书》称华国锋“反党”，并宣布自己是党的主席，张春桥任总理，还附有新任女主席的“标准像”。

竞争中的双方在会议上交锋时——时而愁眉不展，时而怒目圆睁——主题多为毛的遗言，尤其是“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除极左派外，大家都说毛从未说过这种话，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和其他人指出，毛只写过“照过去方针办”——一条极其模糊的指示。它不象江青的说法那么明确，没有指明毛在临终时确定了几条特殊的方针。

“这几个字是捏造的！”华国锋对江青大发脾气，“你和毛远新随便把它们加了进来。”

江青反驳说：“你血口喷人，这是对亲手扶植你的人的彻底背叛。”

这以后，江青利用她对新闻媒介的影响，公开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文章署的是她欣赏的笔名“梁效”（两校），文中声称“按既定方针办”是毛真正的临终遗言。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邓小平无疑也从他的藏身之处——广州附近的温泉疗养院发表了意见）对“梁效”的文章大发雷霆。在陈锡联将军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支持下，他们在10月5日凌晨召开了五人秘密会议，地点是北京郊外西山的总参谋部，讨论了所面临的挑战：“梁效”的文章、一些军队的调动以及江青和她的团伙扩充势力的计划。在长沙，有一个较大规模

的集会，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新头目华国锋”。为此，他们五人决定对这一争端要快刀斩乱麻。

如果说，江青掌权靠的是毛的身体的话，那么，她的垮台可能就是由于毛的话。

与此同时，江青集团提供了一份文件，它证实，那个神秘的“既定方针”是毛明确授权让江青统治的真正“遗愿”。不管军队如何调动，江青在目前这个时期的准备还不够充分，而叶剑英和华国锋都采取了军事行动。一个步兵团和两个坦克师布署在长城和昌平附近；另一个军也调到北京郊区；广州军区司令受命准备了两个师，随时可能空运到北京；8341部队受命处于紧急状态。南方的许世友在一次会上拍着桌子对他的同僚叫道：“要是你们不逮捕那个女人（江青），我就北上！”

华国锋在10月5日晚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的这次会议上，极左派对空缺的职务提出了一些建议：江青当党的主席，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委员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的联盟无动于衷地听着，他们作记录只是为了能在下周利用这些建议来指控江青“篡权”。会议结束时毫无结果，一致同意第二天晚上继续讨论。

10月6日晚，王洪文来到中央委员会大楼的第二会议室参加预定的会议。警卫从屏风后一跃而出，把他击倒在地，带上了手铐。五分钟内，张春桥和姚文元分别同样落网。这时，华国锋和叶剑英在旁边的房间里通过闭路电视注视着“逮捕”的进程。江青没来开会。华国锋和叶剑英看看表，然后找来汪东兴。

一小时后，一队摩托车和一辆军用吉普悄悄驶过空旷的大街，接近了北京动物园。吉普车中，汪东兴给他的三名部下指了指有一扇高大铁门的残破灰墙。这就是官园公寓。为完成这

项特殊的夜间任务，从 8341 部队三十七支队精心挑选出来的一名营长和两名连长接受了指令。他们跳出吉普，来到大门边，向两位岗哨出示了他们的证件。他们悄悄走进漆黑的公寓，由于细心研究过了楼层图，他们知道哪一个房间是他们真正要袭击的。他们足登胶底鞋，走路跟猫一样轻。他们找到主人的卧室，摸到电灯开关，啪地打开了灯，冲击了这间优雅的卧室，用自动步枪对准了床上。

江青象只老虎一样从床上跳起来，怒目圆睁，睡衣零乱不堪。“不许动！”士兵们齐声喝道。即刻的沉默象一个世纪那么长久。然后，江青瘫倒在地，哭喊连天。在她的呜咽声中传来营长的一声怒喝：“你被捕了！”江青转过泪水模糊的脸喊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胆敢发动政变！”

江青与群众——她的听众们的关系在她需要的时候并未给她以帮助。与她的对手的政治组织的行动相比，她在模范村小靳庄的视察就无足轻重了。叶剑英等温和派、华国锋、前左派汪东兴瞬间联合成一股力量，冒着风险，终于如愿以偿。

毛说过：“江青是纸老虎，不堪一击。”看来毛是对的。

毛的侄子毛远新也被拘留，他与“江阿姨”靠得太近了，江青在清华大学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李云霞匆忙离开了儿子的家，从此以后就再也没人在校园中见过她了。

大批漫画涌现出来。江青的名字不是用毛笔写成，而是用画出的枯骨拼出来的。这位 62 岁的老妇被画成巫婆，长舌吐出，左手捏着真理，右手握着谎言。她在镜子前现出一条狐狸尾巴，翘着嘴巴发牢骚，在粉墨登场前正检查着自己的洋戏装。

一些拥戴江青为明日之女皇的人现在也用漫画把她画成了过街老鼠。一些人还走上北京街头，高呼“千刀万剐江青！”与此同时，人们一直高举着一幅画像，那人们崇拜的人物却是

她长达 38 年的丈夫。从此以后，人们就把江青当作白骨精了。

广州有一幅漫画：江青坐在豪华的扶手椅上读《武后传》，她旁边推着一大叠书，包括《香港美容沙龙指南》和《苏联政变详情》。它要揭示这位丑恶、堕落的女人三个特征：野心勃勃；企图美化自己；以某种方式结交中国的敌人。

第七章

“住口，江青”（法庭审判—1980年末）

“我从未屈服于打击，这是我一生中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江青给唐纳，1937

娜拉：我必须证明谁是对的
——是这个世界，还是我。

——引自易卜生《玩偶之家》

与绝大多数在监狱中的中国人不同，江青不仅从不认罪，而且也从未感到她有什么要认罪之处。这导致了难以忍受的冗长的审讯和中国各方面对她的无数指控。在被拘禁的最初几个月里，她的心里充满了愤怒和绝望。

江青被关在秦城监狱。一位曾在此服过刑的犯人说：“那里没有人，只有阎王和幽灵。”犯人们被单独关押，不给牙膏，以免吃牙膏皮自杀。但是，到了1977年底，绝望的江青企图以另外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把脑袋往墙上撞。

在江青看来，马克思主义认为自杀就是放弃革命的说法与孔老夫子的理论是一样的意思：女人因受羞辱也必须自杀，如果一个男人（不是她的丈夫）有跨过她卧室门槛的行为的话。

但是，在她房间里安装的橡皮墙和门外窥视口的不断监视，粉碎了江青的自杀企图。

后来，江青的精神有所好转。邓小平在1979年告诉一位外

宾：“她受到很好的照顾，吃得也好。”这大概是事实。她每天一元五角伙食，相当于普通中国人的二到三倍。有时还有鱼、肉、牛奶等，这是秦城监狱的高级待遇。早餐是米粥和包子，午饭和晚饭都是两菜一汤。

江青爱吃包子。不管是甜的、菜的，还是肉馅的，她都喜欢。一天晚饭时，江青偷偷地把两个肉包子塞进袖子，准备留作夜宵吃，被看守发现。看守她的警卫喊道：“把包子放回去！你只能拿你现在要吃的。”江青羞愧万分，把偷拿的包子放回原处。

有一段时间，江青可以看报纸。她甚至读起三卷本的《“四人帮”罪行录》，1977年内部发行的这套书在上层人士中间广为流传。1978年2月，她给中央委员会写了封信，声称这套汇编是一堆谎言。^{*}

江青在谈到自己受审前的一段时间的拘禁时说：“我吃得好，睡得香。”她还引用中国古代的一句成语说：“我闻鸡起舞（原指一位因国土沦陷而每天早起操练以图收复失地的著名将军）。我努力使自己身强体壮，以便有一天阔步走进刑场。”

一辆窗帘紧闭的小轿车迂回驶出北京城，经过一块写着“禁止入内”的标志牌，在微微起伏的麦田和白杨树间来到秦城监狱紧闭的大门前。几位检察机关的官员走出轿车，沿着布满铁丝倒钩和电网的长墙疾行，来到江青的牢房。她正在做她每天的功课：打太极拳。这是一种有节奏的蛇行体操，可以健体安神。

当那帮检察官用干巴巴的官腔宣布江青的地位已经改变

* 在押期间，江青对自己在监狱受到的各方面待遇都无怨言。1980年，她不能再看到报纸（怕她了解其他十名被指控的罪犯的言行），对此，她很恼火，说：“即使是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能看到报纸，我怎么不能？”

时，她怒气冲天：“拘留我?!我在这里无声无息地呆了四年了。”检察官说秦城是拘留所惹恼了江青（她认为，早就应该要么判刑，要么释放）。“我可以告诉你们，这里不是拘留所，而是该死的监狱。”她的反驳毫无意义。她对身穿灰色制服的来客补充道：“我不是刑事犯，我是政治犯。”但她的吼叫遇到的还是无动于衷、正儿八经的面孔。

江青醒悟到，她将面临一场“三堂会审”，这是一种京剧式的审判，其目的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复仇。

她向检察官指出：“我现在不是政治局委员了，我只是毛泽东的夫人。我还有另一个角色是被告。仅此而已。”

检察官们走后，江青浏览了她收到的材料。她注意到，“四人帮”的排名顺序是：王洪文第一，张春桥第二，她第三。她对警卫喊道：“为什么我不是第一？”

江青是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被捕的，到1980年她受审时，中国已经进入邓小平时代，华国锋的过渡统治很快便成为一段回忆。

华国锋是监督官，汪东兴是执行官。自江青1976年10月被捕至1978年的某个时候，华和汪负责江青的案子。拘留期间，华国锋与江青谈过两次，华劝她说：“承认错误，重新做人。”江青报之以冷笑：“你敢不敢放了我？只要释放我，半年之内我就会除掉许多象你这样的人。”华国锋开口了，“如果放了你，人民不会饶了你。不出半个小时，你就会被撕成碎片。”

在1979年和1980年，陈云接管了江青的案子，41年前，江青在延安设法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时，陈云与她谈过话。接下来是彭真在1980年夏负责对江青作审判前的讯问。彭真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对手，江青现在呆的地方就是他当时的牢房。

江青身着素服、黑色的裤子，迈步走向特别检察官办公室

内的一张木桌前。两位士兵站在她的两旁，他们手戴白手套。两位书记员坐在桌子正面，桌上是一堆文件——对她的起诉书。她镇静地站着，默不作声，既未口吐狂言，也未饶嘴饶舌，只是偶尔稍向后靠靠，她的大脚稳稳地踩在绿色的地毯上。检察官宣布了她的“罪状”。江青盯着他们，象是耐心的教授在聆听一位二年级大学生毫无意义的纸上谈兵。

一位戴白手套的士兵递给她文件，江青俯下身，取出眼镜，签上了她方整的字体。名义在中国至关重要，给江青及其同案犯的定名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不仅使她与她的三个上海同伙联系起来，而且还与林彪的五位军人同伙（他们已在狱中蹲了九年）和陈伯达挂上了钩。

江青接过起诉书副本，把它卷成一卷，左手拿着，就象一本电影杂志。她用右手轻轻理了理头发，等着看这些执法者还想做什么。

《武后传》的作者是这样写她在六十八岁时的外貌的：“在她的侍从们看来，她的容貌保养得这么好，使她们觉得她并不老。她浓妆艳抹，姣好的容貌掩盖了衰老的进程。”66岁的江青与此大同小异。她的相貌跟从前一样。她打扮时髦，举止仍带有演员的味道，下意识地让自己的举手投足都引人注目。

如果说江青那年冬天修饰得体，那是因为她知道这次审判也许是她的告别演出了。她疲惫、沮丧，身体时好时坏，盟友也没有了。但是，她觉得必须充分利用这次最后的演出机会。4年来，她没有一个观众。现在，她的观众人数众多，聚精会神。她要让他们看看“真正的”江青。

是政治？还是戏剧？江青在这二者的交叉点上玩了几十年的火。在山东和上海展开她的表演生涯的过程中，她跻身于共产党的圈子。她利用女演员的魅力和天资打进了延安社会的中

心。她行使她在六十年代最终攫取的权力来对付戏剧界人士。现在，她日子政治对手已把她捉拿归案，她要在最后的演出季节挽救自己的“尊严”。

她是否需要国家指派律师为她辩护？江青一本正经地讨论了这件事。她要让她的律师在法庭上代表她来回答问题。她坚持律师要真正地按她的布置进行辩护，而且，他必须以此作为辩护的出发点；党的“九大”和“十大”（1969年和1973年）的决定是那个时代中国高层政策的有力体现。

没有任何一位中国律师会接受这些条件。尤其是党代会决议的有效性这一点，它会强调“犯罪”和“政治错误”之间是有区别的，而不存在这种区别正是特别法庭审讯江青一案的关键。法官对她的条件付之一笑，江青对法官也回之一笑。她将为自己辩护。她把这些不愿按她的旨意为她辩护的律师称为“阳奉阴违的投机者”。

对江青的审讯不得不进行了三次，因为前两次江青在起诉人面前“行为不端”。每问一个问题，她都是刺耳地回答：“我怎么知道？”可是，到了1980年11月20日这个寒冷的下午，江青听得很仔细，泰然自若，一个人都没有骂。

事情如期发展，江青逐渐同意了审判长的意见：审判不会延长，如果以后几天还要开庭，她可以呆在北京城内，面不必作长途旅行回到监狱去；作为回报，她答应不干扰诉讼程序。

她那女演员漂亮、生动的声音背后隐藏着她的好斗性格。江青抱怨说，她不可能对迄今为止的起诉作出反应。她指出，她没有机会全面研究。此外，她所能看到的对她来说似乎相当含糊。

有一部分起诉内容引起了她的注意，并使她大为不悦。他们怎么能把她和林彪相提并论！她拿起笔在起诉书副本上的这

一段旁边写道：“我不同意。”

检察官有几件事要宣布，江青却说：“你讲的大部分我都听不清楚。”语调中并未流露出她急于想让他大声把话重复一遍的意思。

江青被押回牢房。她在那儿仔细研究了北京政府现在将如何考虑她的政治生涯问题。分析过起诉书的措辞之后，她明白了，起诉书指控她犯了两大罪状：迫害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企图篡党夺权。

“被告江青在1974年秋阴谋阻止邓小平担任副总理。”这是11月26日，特别法庭终于开庭。35位法官及600名特邀代表正襟危坐，地点是座落在正义路的公安部礼堂。江青身穿素色套装，依然镇定自若。从笼子似的被告席围栏里可以看见她的手，指头在从容地活动着，一张一合，帮助她放松下来。她在控制自己。她的策略是保持“尊严和理智”；这第一条指控是很容易推脱的——中国人民肯定能理解政治斗争与刑事犯罪之间的区别。

一个证人出来作证。“谁指使你去长沙向毛主席汇报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活动的？”这个人哭丧着脸答道：“江青下的指示。”证人就是王洪文！他比江青小32岁，他要想着未来，所以背叛了江青，承认了一切指控。一度干劲十足的王洪文现在几乎面目全非，耷拉着脑袋，光秃的小平头，脸上露出一副倒霉相。

江青静心听了一会儿年轻同伙的诉说，不时轻松地晃动脑袋，后来她变得局促不安，身子前倾，紧按挂在头上的耳机，翻起白眼瞪着王洪文。王洪文作证时，她大喊要去厕所。审判中断一会儿后，王洪文未在法庭上重新露面，这时，江青那种当王主子的态度忽然又闪现出来。她吼道：“他在哪儿？王洪文在

哪儿？”

作为江青反对邓小平和周恩来活动的证据，张玉凤写的证词在法庭上宣读了。这位漂亮的女秘书是毛指定掌握江青从他的资金中借款和补助的使用情况的人物。在长沙，毛与王洪文谈话时，张玉凤也在毛的书房。当检察官宣读张玉凤写的“四人帮”极力要挟毛的证词时，江青坐得笔直，盯着前面，方整、白净的面孔象一座雕塑。张玉凤没有到庭。

毛泽东晚年的两位年轻翻译唐闻生和王海容出庭作证。这时，江青开始对她表现良好的许诺犹豫不决了。唐闻生说：“我们马上就看透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江青挤眉弄眼，嘴撇得老高，歪着脖子，盯着天花板。王海容也发言说：“毛主席对江青很生气。”江青喊道：“我要发言！”可是庭长没让她说话。

审判长曾汉周问江青：“1974年10月17日晚（王洪文去长沙的前一天），你是否召集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在钓鱼台17号楼开会？”

“没有。”

“什么？”

“没有——我对此一无所知。”

“你们四人商量了什么？”

江青遗憾地瞥了法官一眼，答道：“如果我对这次会议一无所知，怎么能告诉你会上讨论了什么呢？”江青还在控制自己，并努力做到“有风度”，但她拒绝回答向她提出的大多数问题；她的态度激怒了准备按原计划审判的法官们。

王洪文脸上似乎闪过一丝不安。招供时，他牢记两条：“四人帮”绝不会重新掌权；他认的罪越多，受到的处理就会越宽大。但是，江青对所犯罪行的矢口否认使审判出现了新的局面。

审判期间，被告通常都规规矩矩，因为他们怕死，希望得

到宽大处理。这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是江青断然否认一切罪行，她不相信会处决她。在这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上层人士从未被这样处理过。

人们会说，江青选择抗拒这条道路是因为她认识到她的政治前途已彻底完蛋了。然而，导致她抗拒的唯一可能的原因是她60多年来始终一贯的性格。对江青来说，唯一不变的实在就是她自己的生活 and 欲望。她认为这正是所谓的现实世界。些许令她不快的举动、或某个与她不协调的观点是不合乎自然规律的，就跟鱼长在树上一样，并且，她毫不怀疑她能够战胜其荒谬之处。

1980年12月3日上午，江青大步走进法庭。她抚平衣服，理理头发，弯腰坐在便椅上。每位公诉人和证人面前都放着一杯茶，而江青面前只有一排麦克风。特别法庭开庭之前，江青回首环顾听众席。一位身着绿衣、脖子上系条黄围巾的女人正盯着江青；一会儿，这两个女人的目光似乎相遇了。这就是王光美。

“被告江青，你怎么知道王光美同志是美国特务呢？”

“我国政府的报纸上这么说的。”江青脸上毫无表情，但声音生硬，轻蔑地翘着嘴。

公诉人一再声明，江青要对刘少奇的“迫害致死”和他夫人被囚禁十二年负主要责任。江青抓紧了起诉书副本。

每个证人都带来一大批对江青不利的证据，包括刘少奇的厨师郝苗，他曾在狱中呆了六年。“我要发言！”江青刺耳的声响彻整个大厅……

“住口，江青！”一位法官喝道。

“住口，江青！”六名法官异口同声地喊道。

公诉人拿出了有力的证据。江青曾指使搜查了刘少奇和王

光美的家，以寻找犯罪材料。江青摘下眼镜，放在右手中一挥，打断了江华庭长的话。她向法庭反问：“抄他们的家值得大惊小怪吗？告诉我，你们现在难道没有抄过我的家？”她不顾一切地接着又说：“破四旧（中央1966年8月下达的一项指示）必然导致抄家。这是革命行动。”

播放了一盘录音带。寂静的法庭听着江青在权力顶峰时期的讲话。“我可以告诉你们，”她正在一次表演艺术会上高喊“刘少奇是个大反革命，坏透了。……他应当死一千次，千刀万剐。”

“被告江青，你听清录音了吗？”

“恐怕没有。”

嘈杂的录音又放了一遍，听众们又被带回到那个江青总是有理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大家听了很不舒服。江青紧按耳机。“这确实是我的声音。”

检察长黄火青说，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人大代表未经全国人大或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不受逮捕或审讯。那么，你江青有什么理由剥夺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自由？江青仰头靠在椅子上，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人民日报》开始了对这次审判的报道：“反革命要犯江青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的罪魁祸首。12月3日上午九时，被两名女法警押上了人民法庭……。”

不管是不是罪魁祸首，在“十人审判”中，江青是唯一真正否认她以前的犯罪事实的人。

12月的第二个星期，江青对她的起诉人的耐心进一步下降。她是否同康生合作准备了一份中央委员的名单，只要有可能就他们将他们打倒和撤职？江青尖厉地叫道：“你们有事实，但你

们歪曲了事实。为召开一次讨论重大问题的中央委员会的重要会议作准备，这样做是正常的、合法的。”

一位女法官喝道：“那时你不是中央委员！”

“你看……”江青试图解释。

“这怎么能是正常的呢？”这位法官怒斥道，“又怎么能是合法的呢？”（当女法官高声斥责时，江青傲慢地摘下了耳机。）

“如果你们给我机会，我愿意告诉你们。因为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这在当时相当于中央委员。”连她的对手都承认这是个绝妙的回答。

法庭提到了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生活。她是否命令追查在郑君里（江青与唐纳结婚时的男傣相）和他夫人黄晨家里的一些材料？江青回答说：“在我能够告诉你们我是否与追查这些材料的事有任何牵连之前，我必须先看看这些材料。”其口气就象一个自信的女孩在没有抓住她把柄的父母面前说话一样。

她继续说：“你们一会儿提到照片，一会儿又是笔记本，再后来又是信件——结果我根本不明白你们指的是什么。”

当公诉人提到她三十年代的活动是“反革命活动”时，江青象只熊一样蜷缩着，盯着椅子。过后她又跳起来，“这些反革命活动是什么？”她对法庭咆哮着。法官没有说话。当然，空气中的火花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她作为蓝苹的私生活点燃的。

黄晨出现在法庭。

“阿黄。”当郑君里——1969年死于监狱——的遗孀来到证人席时，江青惊叫起来。

黄晨不客气地回答：“我不和你说话。”停了片刻，她又说：“你曾是蓝苹，对不对？我告诉你，三十年代的历史是你自己写的——想抹也抹不掉。”

“就因为我们在三十年代认识你，”黄晨不是对着法官席，而

是对江青说道：“就因为那些你想收回的信中，有一封是给唐纳的，你搞得我们家破人亡，我丈夫也被整死了。你太残忍了！”黄晨哽咽起来。

“阿黄，我真不知道这些”。江青改用上海方言说起来，她的声音变小了。

前空军司令吴法宪有个跟老绵羊一般的肉下巴，喉咙里涌出滔滔不绝的道歉话。他告诉法庭，1966年10月，他多次执行了搜查上海艺术家住宅的行动。和其他军队中的被告一样，他象个垮掉的人，同意了法庭所说的一切。他总结说：“江青是首犯，我是她的帮凶，……我恨自己。”

尽管有有力的证据，但江青还是否认她指使了上海的抄家活动。

当作家廖沫沙出庭作证时，法庭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声。廖沫沙是江青在上海时的朋友，江青曾住在他家，后来跟他吵过架。文化大革命中，廖被当作“敌特”坐了8年牢。廖在证词中把自己受的苦与刘仁联系起来，刘仁的遗孀作为特别法庭的法官坐在他面前。

廖沫沙对江青说：“你和你的同伙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这些罪行比人头上的头发还多。”这位作家停了停，擦去眼镜上的泪水。“北京人民对你恨之入骨。”

江青终于控制不住了。“不要再胡说了！”她顿着脚嚷道。廖沫沙的老泪纵横引起了听众们的阵阵怜悯之情。廖对刘仁遗孀遭遇的动人描叙使江青于苦恼之中失去了耐性。

“坐下！”一位男法官喊道，“你没有权利说话。”

“我有权为自己辩护。”江青指着自己的胸脯。“我还有权揭发你们，”她指着廖沫沙，尖声喊道：“这个人与‘三家村’有牵连，不是吗？……”

“住口，被告住口。”当廖沫沙用一只拳头砸椅子，又捏紧了另一只拳头时，一位法官想让自己听得清楚些，他对江青大声喊道。当廖继续颤抖着哭述时，江青高喊“奸细”、“修正主义分子”打断了他的话。

首席法官曾汉周的脸变得通红，他命令江青退出法庭。两位女法警拽住她的胳膊，她挣脱了她们，但她们很快就又扭住了她的手，把她拖出了特别法庭。广大听众鼓起掌来。

江青想保持“冷静”和“尊严”的打算落空了。五次开庭把她拖垮了。两位女法官对她特别不客气，她们一点也不管听众对怀着敌意的证人们爆发出的欢呼声。最重要的是廖沫沙在世人面前侮辱了她。在三十年代，那个她过去最有情趣的时代，廖沫沙在1933年她窘迫之时帮过她的忙（这使她回想起她因为依赖男人而蒙受的耻辱）。

离颐和园不远的树林中，100多名学生来此野餐。他们背着包，拿着做饭的炊具和一捆捆干柴。正当他们准备午饭时，老师的一声哨音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几棵老树下支起一幅漫画，“四人帮”以漫画的形式被描绘出来，其中江青是只老鼠。老师讲解了江青的罪恶。孩子们从背包中拿出石块和包着土的纸包。投掷开始了，每击中那只“老鼠”一次，就引起一阵天真的欢呼。

江青在廖沫沙作证期间大闹法庭过后，她问监狱的看守：“我在电视中怎么样？”他们无动于衷。“你们这样是什么意思？你们没看吗？看守我是你们的工作，你们怎么能不看呢？”在等待下一次出庭时，江青决心把毛泽东当作她辩护的靠山。

江青迈步走向法庭大厅长长的过道，两位女法警冲过去揪

住她的胳膊。由于对她们在前一次开庭时的推搡感到恼火，江青极力反抗。“你们上次为什么抓我的头发？”江青恶狠狠地骂她们。她把两个姑娘推到一边，独自昂首走进围栏之中。

“江华，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江青透过她的金属眼镜框盯着这位法庭庭长。他似乎吃了一惊，一会儿又冷静下来。

“可以，你问吧。”

“法庭是不是刑场？”江青说话就象律师开始盘问证人一样。“上次法警扭伤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内伤，现在我的右手都抬不起来了。”她把左胳膊缓缓地放在右臂上。法官们在椅子上有些坐立不安。“还有一件事，我们有约在先，江华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们不让我说话。你们妨碍我时，就马上在法庭上叫人来喝彩，作为对付我的武器。这就是你们对待我的方式。”

“听我说，江青。”

“我是在听你说！”然而江青已经让自己听够了。这是个老泼妇的声音，可她的一生似乎被描绘成充满活力和能量。这种声音缓慢，而又滔滔不绝，语调偶尔也出其不意的急促。她摇头晃脑，往椅子上一靠，双脚极为放松地向前伸展着，她讲话时，右手为强调而上下有力地挥动着。

江青说：“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象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

每当她讲到毛，就有一位法官插进来阻止她。

江青冷笑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的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

她不是泥菩萨。“我是毛主席 38 年的妻子，”她继续说，“我是战争年代留在前方追随毛主席的唯一的女人。”法庭的听众们大笑。江青向全场摆摆手，嚷道：“你们那时候睡在哪里”？大家笑得更响了。

江青投出一颗炸弹。“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结果，法庭上又是大乱。江青在叫嚷中又吐出一个信条：“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礼堂。这时，听众们鼓起掌来。

江青终于度过了可怕的考验。中国共产党的左翼分子们因为他们干的恶事而受到了严厉的指责。邓小平已代表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冤屈的人报了仇。

江青在她的一生中，尤其是后半生，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如果抛开这些不说，她不是政界的反面角色或政界的英雄，她是法庭上的“明星”，因为她只是她自己（没有一个人象她这样，也许缄默的张春桥除外）。“谁是对的——是这个世界，还是我？”江青曾象娜拉一样的问过。江青本人就是“至高无上”的，她肯定她是正确的。因此，她把自己以及自己的“人格”带上了审判台。跟她对自己及自己的人格所答非所问一样，她并没有使它“自相矛盾”，她没有向中国人民道

* 我们不能肯定毛是否写过这种或长或短、随便什么内容的文字。很明显的是，《中发 24 号》文件中并没有任何表示毛给华写过这张有嫌疑（可长可短）的条子的手迹。

歉。

中国共产党（包括别国的共产党）中，没有哪一位女人升得如此之高。她成为中国四千年历史中少数几位最有权力的女人之一。作为女人，她还是不可避免地具有女人的特质并遭受女人所面临的一切。她终生奋斗的是要超越家庭妇女的角色，承担一部分家庭妇女的角色——超过了普通妇女的作用，使丈夫步入歧途——她都已经厌烦了。

第八章

骚动的监狱生涯 (1981—1990)

1981年1月25日，十名罪犯并排站在特别法庭上，象笼中的困兽一般，聆听对他们的公开判决。张春桥和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其他人的判刑则较轻。

一周以后，彭真来到秦城监狱看望江青。她提出两个请求：一是要写回忆录；二是要面见邓小平和华国锋。彭真回答说，国务院会考虑的。^{*}他告诉江青，必须干一些体力劳动。而江青则希望逃避通常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说自己很喜欢做布娃娃。彭真回答说，国务院不反对。

据监狱方面的人说：“她三天就能做一个布娃娃，样子很好看。她一边缝制布娃娃，一边哼着曲子。她喜欢听收音机里的

^{*} 江青至少在1981年时见过邓小平一面，(当时华国锋已不在权位。)至于她写的冗长的回忆录手稿，则无从知晓。

新闻广播，吃饭时还很有兴致地与女看守聊天。”

彭真认为，应该告诉全世界：“江青还活着，我们要继续养着她。她只有一张嘴。”

1981年底到1982年初，江青变得不太驯服。她拒绝写每月一次必须完成的检查（王洪文在另一座监狱，他的检查总是写的比要求的多）。她开始在监狱的墙壁上写抗议的标语。有一天，她写的是：“不怕杀头。”看守们洗去标语，并警告她再不要这样做。第二天，她又写了同样的一句话。同时，她开始在自己制作的布娃娃上绣上她的名字，这样，她制作的布娃娃也就不能再出售，而是被一个一个地堆在仓库里。

“她坚持在政治上、思想上与人民为敌。”彭真这样宣布。

北京和山东出现了传单，据说来自江青的牢房。江青在传单中为文化大革命辩护，说自己一直跟随毛主席。并且宣称，邓小平的共产党已经背离了这一路线。她发誓要出来拯救中国。1982年夏，在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江青致信中央。“我要在大会上发言。”她提出要求，“我要与邓小平和胡耀邦就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不然，我死不瞑目。”

1983年1月，江青的两年缓刑期已满。尽管胡耀邦和彭真都曾在1982年对外界提到过江青的强硬态度，中共还是宣布说（依据法律的要求），对她的认罪态度作了调查。“她不再公然反对改革。”于是，北京没有处死毛的夫人。

事实上，江青一直是拒不服从。她对一名看守说：“我没有什么遗憾的，我认为我已经完成了要做的事。”

如果说江青没有什么遗憾的话，她同样也没有多少可以期待的东西。她时常对看守发出抗议性的批评，或者写信给她以前在政治局中的同僚。然而，在监狱的高墙之外，邓小平正在

赢得越来越多的人心。1984年，解放35周年之际，改革的时代已具雏形，同时也正在成功地脱离毛泽东晚年的路线。江青似乎也变得听话一些了。

公安部的一位官员在回答香港一位记者的提问时说：“她生活得很好。我们没有用她对待我们的办法对待她。她可以看书，看报，还可以听广播，看电视。”

1984年春，45岁的、离了婚很长时间的李讷，来到秦城监狱看望她的母亲，并和她谈了自己准备再次结婚的打算。江青问：“这个人知道你是谁吗？”李讷回答说，她的男友王景清在军队工作，很清楚她的家庭背景。江青讪讪地说：“你现在是双重身份，既是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的女儿，同时又是最大的反革命江青的女儿。”

江青努力想在李讷的婚姻大事中扮演某种角色，但是结果并不愉快。江青的宽宏和傲慢很快又表现了出来，她很兴奋地对女儿说：“下一次把他带来，我们要在一起吃顿饭”。作为江青的女儿，李讷生活很不易，不过，在邓小平时期，李讷比她母亲的处境要好一些。王景清曾在中央警卫团工作，李讷他们结婚时，收到了杨尚昆送来的一盒糖果和一条床单。杨尚昆曾负责过中央办公厅的工作，自1987年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

1984年，江青讲了一些关于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的好话。自她被捕8年来，这还是第一次。谈到她的对手和这些80年代中期的继承者，江青说：“邓小平、胡耀邦是讲道理的人。我每次给他们写信，他们都有答复。”江青通过女儿李讷对这些“讲道理的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这个要求就不易答复了。她说：“我老了，什么都不能做了。我想，最好能让我出去服刑。毛主席也不会把任何人关很长时间的。”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请

求。同时，她还说：“要是能出狱，我想住在中南海的那一幢老房子里。那里空气新鲜。”听这口气，似乎她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夫人。

这一请求在领导层中引起两种明显不同的反应。有些人认为，如果让她出狱，改为某种形式的软禁的话，中南海是比较安全的地方，比她自己家里或北京的其他住处都要安全。如果住在其他地方，江青会大放厥词，她自己也容易受到攻击。另一些人则认为，让江青居住在政治权力的中心，“等于放虎归山。”

不能完全排除，江青的这一请求是她试图在社会生活中重新扮演某种角色的精明的第一步。但是，更多的猜测应该是，她可能确实感到老了，觉得疲倦了。特别是要求住在中南海，只能说是江青不现实的野性性格的最后一次流露。

结果这一请求遭到拒绝。但是，可能是因为胡耀邦在1984和1985年作出的决定，整个80年代后期，江青在监狱外边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从1984年5月起，江青可能就很少呆在秦城监狱。她总是定期到复兴医院、公安医院和301医院治疗喉癌和其他疾病。还有可能一度被转移到另一个监狱，并有可能曾在李讷的家中住过一段时间。

对江青来说，时光一天天地消逝，然而她的生活依然悬浮在邓小平时代的历史之外。当中国稳步向前发展的时候，江青也较为安静，囚犯一般都是如此。在江青的一生中，80年代后半期，可能是她读书最多的时期。绝大多数书都取自她自己的拥有一万册书的图书馆，由李讷带给她。现在，这些书都堆在李讷的家中。80年代后期，江青的造反精神似乎有所复活。

母亲和女儿经常争吵。当两个女人因互不满意而吵个不休时，李讷的丈夫王景清总是尴尬地站在一旁。有一次，江青要

李讷给领导人写个便条，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当李讷说她不能这样做时，江青异常愤怒，咆哮着把李讷夫妇带给她的西瓜摔了一地：“连你都不管我了。没有良心。”江青似乎更喜欢李讷的丈夫王景清。特别让江青高兴的是，王与她一样，也是书法爱好者。她常常兴致勃勃地与王景清谈论书法，而李讷则僵直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言不发。

不时地有谣传说江青已获得自由，但这些都不是真的。1988年10月，一直通过李讷与江青保持联系的名门出身的作家朱仲丽，在她北京的家中告诉我说：“谣传江青已被释放，这是不对的。她还在监狱，虽然说随时可以去医院治病。”

1988年秋的一天下午，复兴医院的病人们看到，几辆军车和一群卫兵疾驶而出。几天以后，《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一篇简短的报道，说江青曾到复兴医院接受治疗。同时还提到，江青已不在狱中，而是被软禁了起来。报纸以一种不带偏见的方式报道毛泽东的遗孀，这是很少见的。因此，第二天，负责新闻出版的政府机构下令，这条新闻不得再出现在其他任何地方。原因不仅如此，中共领导层不愿意让很多人知道，江青已不再关在监狱的牢房里，而是在复兴医院、公安医院或其他地方打发时间。

江青的健康每况愈下。被捕已经12个年头过去了，从前的支持者依然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自己也依然没有任何可能重登权力宝座的迹象。1988年12月，毛泽东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江青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得到允许，组织一个家庭聚会来纪念这个日子。但是，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听到要求被拒的消息，江青一口吞下五十多粒安眠药片。她的举动被及时发现，从此也就不再给她任何安眠药品。在毛泽东九十五周年诞辰这一天，他的仍在世的亲属作了一次为数极少的公开露面。李讷、

李敏和毛岸青（三人同父异母）分别携带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里——唯独没有江青。

1989年3月底，江青结束了软禁生活，重又回到监狱。因为咽喉癌需要接受治疗，江青时常乘坐一辆灰色的小货车往来于监狱和医院之间。医生建议切除部分咽喉，遭到江青的断然拒绝。她害怕自己因此再也不能说话。

1989年6月以后，这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江青都呆在监狱里。她织毛衣，读书，看报，看电视。一篇带有敌意的报道说：“监狱的看守发现她笑得很怪，便问她感觉怎么样，她板着脸莫名其妙地说：“这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毛的遗孀给中国的政治依然投下了一层阴影。因为毛泽东的声望构成了邓小平政权的基础，所以，江青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坚持两点”，动摇邓小平及其同僚的地位，说明其权力地位偏离了合法的轨道。1989年11月，中央领导层决定，允许江青恢复软禁生活。听到这一消息，江青提出，要么回到中南海毛的故居，要么回到她70年代的住处钓鱼台十七号楼。当两项要求均遭拒绝时，江青绝望地用手在脖子上抹了一下，说明她有自杀的想法。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幢两层小楼，并有陪同护士一起居住。这一安排，是为了江青每周一次到公安医院接受治疗。

1990年初夏，《华亚》(Huaya)杂志报道了江青的言论，说明她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感到后悔。她说，中国政府没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青在努力利用人们对毛的怀念情绪，为自己捞取一点资本，证明她才是毛泽东最忠实的追随者。令某些政府要人吃惊的是，当江青看到电视里又一次播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和《沙家浜》时，她“深受感染同时又非常激动”。有好几次，她要求李讷设法搞到这几出

革命样板戏的录像带送给她。这样，她就可以借此回忆过去辉煌的岁月。

《华亚》杂志还报道说，江青写东西的热情很高。当有人问她写作的主题时，她会“狡黠地一笑”，然后嘲讽地说：“等着瞧吧！”1990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江青母女之间的关系更加趋于冷淡，李讷夫妇去看望江青的次数和同她呆在一起的时间比以前都少。在一次会见过后，李讷的丈夫王景清说：“江青的腿脚不太灵便，走路时要扶着墙才能站起来，才能行走。不过，她皮肤依然白皙，头发乌黑。”

江青在根本的问题上仍无悔改迹象。1990年7月，一份限于《人民日报》记者内部传达的秘密文件说，江青依然密切注视着政治的动向和政治人物的更替。文件说：“她野心不死。”在这之前不久，江青对她的一位女看守说：“十年以后，你就会看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会回来的，真正的革命者就会重新掌权。”她仍在做着她的女皇梦。

第九章

自杀之谜 (1991年5月14日)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他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一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这再一次表明她对自己和毛的婚姻的怀念之情。“润”是毛泽东早年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指江青的“青”。3月18日，江青高烧退了，体重减轻了几磅。她被转移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疗，病房内有卧室、盥洗室和起居室。医生再次建议给她的咽喉施行手术，但是她拒绝了，同时轻蔑地说：“我就不信你们敢小心翼翼地对待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在她日趋虚弱的时候，江青更是常常想到毛泽东。她在枕边保存着他的手迹，衣服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江青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早，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同时要

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做一个花圈。但是两项要求均被拒绝。

江青觉得，应该抓紧时间撰写她的回忆录。每天早上，读过毛的书后，她就坐在摆有纸和笔的小桌旁。情绪高兴时，为了修正历史的记录，她还会就自己正在写作的手稿的题目征求护士的意见。“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怎么样？她问护士，或者，“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她还会想到更富有挑战性的题目：“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

5月10日，江青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回到酒仙桥她的住处去。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但是没有允许她这样做。5月12日，因为听说了江青的情况，李讷和她的丈夫来到医院看望江青，但是江青拒绝见他们。5月13日，她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道：“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25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斗争路线，同时江青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同一天，江青还写下了如下的话：“经过20多年的奋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人民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赢得了革命的胜利……。”这是江青留下的最后遗言。

5月14日凌晨1：30分，护士离开了江青的卧室。将近3：00时的时候，虚弱的、绝望的江青从卧室爬到盥洗室。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浴盆上方的铁架上。她用被子和一个枕头垫在下边，以便自己能够到打结的手帕。她将头伸进绳套，接着又踢开身下的被子等物……。3：30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吊在浴盆上方。其他的护士和医生匆忙赶来，但是已经太晚了。这位曾经是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的“白骨精”，在她77岁的时候死去了。她的尸体重104.7

磅，比3月15日进入这家医院时轻3.18磅。

当天下午，李讷得到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不知是出于李讷的意思，还是因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官员的坚持，李讷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以后的5月18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李讷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其他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李讷要求把骨灰盒送给她。这时，全国和全世界对江青的去世仍是一无所知。

1991年6月初，《时代》周刊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消息。《时代》周刊报道说，据6月1日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说，江青“上吊自杀”了，消息还说咽喉癌是自杀的原因。几天以后，6月4日晚11时，中国政府证实了《时代》周刊报道的主要内容，公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改判无期徒刑，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医。”

公告没有概括江青的一生，没有提及她曾官居高位，也没有提到她曾是毛泽东长达38年的妻子。如果学校的孩子们读到这则刊登在《人民日报》第四版角落里的消息，他们不会想到，这个女人曾是毛泽东的夫人。

如果西方记者没有受到《时代》周刊这一未被证实的报道的刺激，而反复再三地向中国各官方机构提出江青命运的问题，

这一消息可能永远也不会公诸于世。

假设中国政府曾经决定宣布江青死亡的消息，而拖了几周才这样做，那就是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出于实际需要的考虑。

另一种拖延的原因可能是，正如香港一家报纸后来引用公安部来源的消息报道的那样，需要调查江青的死亡是自杀还是其他原因。这家报纸写道：“政府高级官员指示说，在调查结束之前，不要公诸于众。”

官方公布的消息称，江青自1984年5月4日一直是保外就医，事实上，在这个日期之后3个月，司法部一发言人还说，江青年初曾提出希望离开监狱改为监外服刑的请求被驳回。1988年，官方新闻媒介几次提到江青仍在狱中服刑。1991年1月，一份大陆报纸在报道江青的近况时还说：“她被关在一间二十平米的小屋里，房间装上了特制的窗户，以便透进光线，同时警卫也可以看到她，而她是什么也看不到的。”无论江青从监狱到医院，还是到软禁，这中间是怎样来回转换的，说她自1984年5月4日起一直是“保外就医”，这是不确切的。

30年代，因为与唐纳发生纠纷，江青曾谈到过自杀。1976年被捕后，绝望使她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1984年9月，因为拜谒毛主席纪念堂的请求被拒绝，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因为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1986年5月，因对处境不满，她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她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感到了绝望，对自己的咽喉癌，对自己的处境和前途，对自己与女儿的关系，等等。这种心情同时又受到负责她这一案件或看守她的人的刺激。除此之外，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青已经在精神上做好了准备，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认为邓小平已经放弃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绝望的心情加上她的“对毛的忠诚”，个人的和政治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她认为，中国已没有希望，她自己也已毫无前途，因而走上这条道

路，这并不奇怪。

《人民日报》及其他主要报纸在很不显眼的位置报道了江青的自杀，《经济日报》和《法制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为了尽量缩小这一事件的影响，为了使中国人不再认为江青是任何意义上的毛的支持者，他们在她的死亡公告中略去了与毛有关的一切东西。

政治的风车从来就没有停止转动，上海的《解放日报》，在6月8日发表了唯一的一篇关于江青死亡的评论文章。报纸写道：“这个女妖死了，但是毫无疑问，死亡不能免除她的罪责。”文章还说，江青在60年代的“残暴统治”使许多人把自杀作为“唯一的抗议方式”。但是文章小心翼翼地说：“当然，江青的死亡不属此列。”

几十年前，江青在上海演出《玩偶之家》曾轰动一时，其中，娜拉的一句台词说：“我要证明谁是对的——是这个世界，还是我。”在她结束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相信，江青一定以为，她从自己的一生中找到了娜拉的问题的答案。

江青是一个鲜明的个人主义者。她要给周围的所有人都留下自己的印迹，而不只是婚姻。但是，作为高层政治人物的江青，离开了毛是无法生存的。如今，她随毛而去，从这一点来说，江青的自杀可能还带着某种程度的满足。

江青的一生还是做过一些事情的。几年的戏剧生涯收获甚丰。这位出生于山东农村一位木匠家庭的小女孩，没有呆在乡下养鸡、喂猪，嫁给一位农村小伙，尽管这小伙解放后也可能成为公社的一名小干部。她幻想过，奋斗过，并且打开了生活的大门，而后她又“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作为一个个人，一个自我至上的女人，江青在生前和死后都引起了世人的注目。